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性別、認同與地方

GENDER, IDENTITY & PLACE :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

Linda McDowell

編譯館主譯

徐苔玲·王志弘合譯

性 別 、 認 同 與 地 方

概 說

法國女人創造沙龍，英國男人發明俱樂部。沙龍裡有男人，俱樂部中卻沒有女人？

地理學怎麼會和性別扯上關係？難不成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性別屬性是社會建構的，那麼，女性氣質與男性氣概隨著時空不同又有什麼變化？女男社會關係能有多大的變異範圍？地理學家對這些議題有什麼意見？

這些是作者在本書中處理的核心議題。作者由各種地方開始，接著將視野擴大至全球的流動與遷徙，討論在其中性別關係的變化，如何影響和反映了這些空間的性質，以及人們對女男言行舉止的共同期待。本書結合各種日常生活經驗與理論，除了質疑二元對立的性別框架外，也更積極探討性別的多樣性，及其與空間的各種關係。

本書巧妙地結合了理論與個案研究，並於每一章文末，大量羅列相關著作，提供讀者參考。對於空間與性別的關係，無論是初探式的了解，或者希望更深入的研究，這本書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精彩讀物。

ISBN 986-81076-5-2



9 789868 107656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 (100) 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
電話 (02) 2370-2123 傳真 (02) 2370-2232
www.secio.com.tw

性別、認同與地方

GENDER, IDENTITY & PLACE :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

Linda McDowell

主編：國立編譯館
合譯：徐茲玲、王志弘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copyright © 1999 Linda McDowell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性別、認同與地方 / Linda McDowell 著 . 國立編譯館主譯 .
徐苔玲、王志弘 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群學 , 2006
〔民 95〕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 : 面

譯自 :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ISBN 986-81076-5-2 (平裝)

GPN 1009501175

1. 女性主義 2. 性別

544.52

95006606

性別、認同與地方 — 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原著者 : Linda McDowell

主譯者 : 國立編譯館 譯者 : 徐苔玲、王志弘

總編輯 : 劉鈞佑

編輯 : 李怡慧 助理編輯 : 沈志翰

發行人 : 劉鈞佑

著作財產權人 : 國立編譯館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
面授權,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 : (02) 3322-5558

出版者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 : (02) 2370-2123 傳真 : (02) 2370-2232

網頁 : <http://www.socio.com.tw>

e-mail : socialsp@seed.net.tw

信箱 : 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撥 : 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著
作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由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06.05 一版 1 印

定價 : 新台幣 450 元

獻給 Olive Morgan Leith, 我的母親

作者簡介

琳達·麥道威爾 (Linda McDowell) 是劍橋大學地理學研究院主任，以及紐罕學院 (Newnham College) 的教師兼副院長。

譯者簡介

徐苔玲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現專事翻譯。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序言與誌謝

PREFACE AND ACKNOWLEDGEMENTS

viii 前幾年，地理學的女性主義研究還沒有目前這麼建制穩固以前，我在某次工作面試時，被問道：「女人和地理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儘管現在的提問者可能不會這麼唐突，但被形形色色的人問及：「性別跟地理學有啥關係？」仍然是常有的經驗。

本書企圖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目標在於，概述地理學觀點和女性主義取向的某些主要關連，並且以我過去幾年閱讀並樂在其中的經驗研究，來闡述這些關連。就和類似本書的文本一樣，這些重點反映了我的興趣，以及某些我曾經參與的研究。我主要研究當代英國的性別議題，其次則探討其他「先進」社會。我也是都市與社會地理學家，關注全球城市裡工作性質的轉變，所以我援引的事例便反映了這點。我嘗試兼容並蓄，但是在後文裡，有關像「第三世界」國家的性別關係，或是生態女性主義取向和運動的記述，仍然有所不足。令人欣喜，但又叫人洩氣的，是我們這個主題範圍廣袤，沒有人能夠精通其中的所有次領域。所以，本書不會提供你或許想知道的每件有關地理學與性別的事情，但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是趣味十足的起點，引導你探究（我認爲的）目前我們這個學科當中，最振奮人心的學術成就。我介紹了「經典著作」和一些比較新的作品，我希望這些個案研究能夠激勵所有地理學家，考慮從事女性主義研究。

ix 雖然本書封面上有我的名字，但是像這樣的書，其實是連結許多國家地理學者的女性主義網絡的發展成果。我從事學術工作的最大樂趣之一，就是參與這些網絡，以及從中激發的學術熱忱和諸多友誼。很難提及對這本書有所貢獻的所有人士，從中挑出一些人致謝，或許會招惹埋怨，但是，我特別想要感謝蘿絲（Gillian Rose），她對初稿的機敏評論，正是友情支持和學術批評

的適當結合。我與瑪西 (Doreen Massey) 共事了幾年，她的精力和熱忱總能激勵我付出更大努力。感謝席格 (Joni Seager) 為人慷慨，讓我以她的研究為範例。鮑比 (Sophie Bowlby)、福特 (Jo Foord)、韓森 (Susan Hanson)、路易斯 (Jane Lewis)、麥肯齊 (Suzanne Mackenzie) 和孟柯 (Janice Monk)，都是一開始就支持我的好朋友。洛威 (Michelle Lowe) 是老朋友了。最近我與夏普 (Jo Sharp) 的合作樂趣十足。還有五位不尋常的女性主義者和研究生，我現在有幸與她們一起共事：富比士 (Dorothy Forbes)、葛松－哈地 (Flora Gathorne-Hardy)、克雷爾 (Rebecca Klahr)、梅斯 (Paula Meth) 和派瑞 (Bronwen Parry)。

第九章較早的版本發表於《高等地理教育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1997)，題目是〈女性 / 性別 / 女性主義〉(Women / gender / feminisms)。感謝期刊編輯與發行人同意我重印其中部分。

作者和出版商也要向下列同意使用版權資料的單位致謝：

黑玫瑰書坊 (Black Rose Books) 同意從 T. Amott and J. Matthaei, *Race, Gender and Work: A Mult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S* (1991)，取用第 325 頁的表 10.3 ；

洛特列奇出版社 (Routledge) 同意使用 S. Reinharz, 'Experiment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 in G. Bowles and R. Duelli-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第 168 頁的表 11.1，以及第 170-2 頁，表 11.4，還有 J. Fiske, *Reading the Popular* (1992) 的第 57 頁；

皇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同意使用 J. G. Townsend, 'Towards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gender', *Geographical Journal*, 157 (1991), 第 26-7 頁表一；

加州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同意從 C.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9) 摘錄第 xi-xii, 16, 17, 95, 97, 184, 189-90, 190-1 頁。 Copyright ©1989 Cynthia Enloe。

我們已盡全力考察版權所有人，若有不慎疏忽之處，出版商一有機會，將樂於提出必要安排。

目 錄

圖片目錄	iii
圖表目錄	iv
序言與誌謝	v
第一章 導論：地方與性別	1
第二章 安適其位與不得其所：身體和體現	47
第三章 家、地方與認同	97
第四章 社區、城市與地域	131
第五章 工作 / 工作場所	167
第六章 置身公共場所：街道與快感空間	201
第七章 性別化國族國家	231
第八章 移置	275
第九章 結語：女性主義研究的困境	303
參考書目	335
索引	377

圖片目錄

2.1	都市藝術：描繪男性身體	63
2.2	紋身的女人	71
2.3	慶生：都市壁畫	79
3.1	鉚釘工羅西：第二次世界大戰女性 勞工的熟悉形象	109
4.1	舊金山卡斯楚區的同志尊嚴旗幟	144
4.2	女人的餐廳，位於舊金山卡斯楚區 邊緣地帶	145
6.1	當代購物空間：北倫敦，布倫特十 字街	219
7.1	倫敦廣門維納斯	267
8.1	美國的流離華裔女性	286

版權說明

圖 2.2 The Tattooed Woman, original postcard c.1920, coloring Al Bama, ©Quantity Postcards, Tilt Work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圖 3.1 Rosie the Riveter, World War II poster, c. 1942, the National Archives/Corbis. 其他圖片都由作者拍攝

圖表目錄

統計圖

- 5.1 女性薪資佔男性薪資百分比，英國，1996 177

表

- 3.1 從事私人家戶服務受雇婦女比例，依種族
族裔群體分，1900-1980年，美國 115
- 9.1 性別區域地理學的廣泛資料 313
- 9.2 研究方法的對照性宣稱 319
- 9.3 傳統研究方法與女性主義研究方法比較 320

1 導論：地方與性別

INTRODUCTION: PLACE AND GENDER

性別的地方

1 性別與地理學如何產生關聯？男人和女人是否在世界不同地方，過著迥異的生活？還有，如果性別屬性是社會建構的，那麼，女性氣質與男性氣概如何隨著時空不同而變化？女男社會關係有多大的變異範圍？在所有社會裡，男人通常占據舞台中心，而女人侷限於邊緣地帶嗎？地理學家對這些議題有什麼意見？

這些就是我在本書裡要檢視的各種問題。這些議題，在廣泛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裡，似乎日漸重要，近幾年來，以卓越的地理學術語進行的辯論，成果斐然。各種學科裡的學者，以字面和隱喻的意義，撰寫移民和旅行、邊境和疆界，以及地方與非地方。這些爭論反映了近幾十年來，特定人士與特殊地方之間的聯繫，發生了重大的分裂和轉變。大量的人民遷徙和金錢流動——比較抽象的社會科學語言，稱之為勞動和資本——是現代世界中，聯繫各地的多組社會關係與連結，日漸朝全球尺度發展的結果。而且這些遷徙已經移置（displace）並阻斷了數百萬人的生計。國族主義運動、戰爭、饑荒，以及跨國資本和全球企業的發展，導致許多人被迫遷移，其他成千上萬人，則志願且通常是暫時性的動身橫越廣闊的地理距離，為了娛樂和增廣見聞而旅遊。

2 這兩種移動類型都徹底改變了個人和群體認同、日常生活，以及領域或地方之間的關係。對越來越多人而言，遠離「家園」變得司空見慣；有些人在離出生地很遠的地方定居謀生，世界有太多成為「居無定所」（placeless）、「不得其所」（dis-placed）的人，注定處於沒有歸屬的棄置邊境，無論是歸屬於有國族領土基礎的國族，還是歸屬於階級或區域。對許多參與這些旅程的女人而言，移動和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有關，因為地方資

本和多國資本將她們大量引進，成為新國際分工的受薪勞動力。資本的觸手遍及全球，意味了在韓國、柬埔寨和加德滿都（Katmandu）的女人，最後都跟西歐的女人一樣，替同一家公司工作。

對這些女人當中的某些人而言，她們的旅行也許不涉及廣闊的地理移動；可能只涉及地方旅行，甚至完全沒有身體移動。反之，隨著女人進入工廠，或是在菁英分子家中擔任家務勞動者，以及因為她們透過西方資訊科技和大眾文化的滲透與文化支配，取得與其他時代和地方的聯繫，她們經歷的移置（displacement），乃是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變遷的結果。無論移動是否涉及身體，移動幾乎總是與性別區分的重新協商有關。這些重新協商正是後文各章的主題。

研究者已經針對各種空間尺度，依照家庭、工作場所和公共場合的不同位址，針對這些變遷進行了理論化和探索，在轉移焦點到這些討論以前，我想檢視這些龐大的物質變遷，如何影響我們對地方與認同之間關聯的認識。

空間、地方與「地域」

全球互連（interconnection）和移動的漸增規模造成的綜合結果，往往被假定為是「地域」（the local）意義的衰退——顯現於人們花費於特定地理區域內的時間總數、周遭朋友和家人的數量，以及在地域層次施行的控制，無論是政治決策與行動，或資本活動的經濟後果方面。其推論是地域依附感的終結，是具有獨特性和文化形式之地方歸屬感的終結。有時候，對於世界上特定

地方的某些人（當然，特別是富裕的西方男性）而言，前面提到的某些特質，無疑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對於世界上許多人而言，日常生活持續發生於受限的場所（locale）之內。即使是對最有機動力的人而言（國際金融家或許是最極端的例子），工作和家庭日常活動的絕大部分，總不免在有限的區域內進行。全球貨幣交易商可能以驚人的速度在全世界移轉貨幣，但他自己（通常是個男性的他）卻坐在香港、倫敦、紐約或其他某個金融中心的顯示幕面前。到了晚上，這些交易商大概多半會回家，在他們辦公室日常活動距離內的某處，而不是前往國際機場，飛到世界上另一個地方。

儘管多數日常生活「地域化」（localization）的事實毋庸置疑，但一個或許更有趣的問題是，二十世紀的巨大變遷對於「地方感」的概念和存在，產生了什麼樣的衝擊？民眾是否還會覺得自己是當地區域的一分子而擔負責任？還有，穩定性的喪失，或許更精確地來說是固著性（immobility），那一度將人的一輩子，以及一個家庭的好幾世代，根植在特定地方的固著性，其喪失是否意味奠基於地方的習俗與言行的衰退？是否意指造就某地方特殊性，並讓這個地方與其他地方區隔的社會習俗減弱了？

這些或許是特別令人類學家焦慮不安的問題，因為他們整個學術存在的理由，都在於調查「其他」地方生存之道的特點，及其與自身生存之道的差異（Okely, 1996; Olwig and Hastrup, 1997），但地理學家對於現代性的後果、資本主義全球形式與日俱增的支配性，以及假定的地方歸屬感的喪失，也感到些許焦慮。然而，經驗證據減緩了這種焦慮，因為世界上許多地方尚有很多持續不歇、甚至強化的地方感跡象。這些跡象包括以大致能接受的形式呈現的地方習俗、實踐和語言的復興，以及族裔國族

主義，和使越來越多人陷入地方困境的普遍貧窮與剝奪的驚人影響。此外，如同越來越多地理學者和人類學家認識到的，以全球化一詞總結所有變遷的結果，並非世界將合而為一，減少地方差異，反而是「差異、多樣性並非來自地方社群的健全和真實性、根植於傳統、抵抗並適應一個力量日益強大的現代世界體系，而是弔詭地源於全球化變遷本身的狀態」（Marcus, 1994: 42）。

不過，對地方意義感到焦慮，以及明了全球化勢力乃是重建、而非破壞地域（locality），因而產生的一項正面效果，就是轉而對地域觀念或地方本身，有更為細緻複雜的概念化。將地方當作地圖上的一組座標，確定清楚而有邊界的一塊版圖，這種常識性的地理地方觀，已經備受質疑。地理學家現在認為，地方是有爭議、流動且不確定的。界定地方的是社會—空間實踐，這些實踐導致重疊與交錯、具有多元且變動的邊界的地方，由權力與排外的社會關係建構並維繫（Massey, 1991; Smith, 1993）。制定劃設邊界之規則的權力關係，造就了地方。這些邊界既是社會的，也是空間的——它們不但界定經驗的區位（location）或位址（site），還限定了誰歸屬一地，而誰可以排除在外。

史密斯（Smith）認為，「只要地方營造得彼此有別，塑造地方便意味著生產〔地理〕尺度（scale）」。所以，尺度「與其說是不同地方之間的差異判準，不如說是不同**種類**地方之間的差異判準」（Smith, 1993: 99，強調為原文所有）。因此，「界定邊界和範限認同的是地理尺度，控制則環繞其間而操作和競逐」（p. 101）。在這個意義上，尺度被視為不同**種類**地方間差異的社會—空間界定，並且在近來是差異為組織動力的地理文獻中廣受採用。我和喬·夏普（Jo Sharp）用尺度來組織我們的讀本《空間，性別，知識》（*Space, Gender, Knowledge*）（McDowell and

Sharp, 1997)，貝爾與華倫亭（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在他們有關食物的書《消費地理：我們就是我們飲食的所在》（*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1997）裡的做法也一樣。我在這裡也採用相同策略。

但是，界定地方，以尺度來區分地方的差異，並不意味地方是在單一空間尺度上運作的過程產物。因此，家園或鄰里，是由尺度圈限的地域——那是將其他人排除在外的規則／權力關係——但它們的構成是各種因素交錯的結果，這些因素可能會在那裡同時發生，但不僅侷限於它們產生作用所在的地域層次。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 1991）認為，地域是全球和在地過程——運作於各種空間尺度的社會關係——交錯而造就的。這產生了她所謂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地方或許不再像前引文中馬庫斯（Marcus）所認為的有「真實性」和「根植於傳統」；而是由在地方上交錯並賦予地方特殊性的社會－空間關係所界定。

所以，在瑪西文章所舉的例子基爾本（Kilburn）裡，她和其他在地居民經驗到的地方獨特性或特殊感，是由來自愛爾蘭和巴基斯坦的移民組合，由不但賣麵，也賣咖哩和烤馬鈴薯的「中國」店家，以及由僱用當地來自塞普勒斯（Cyprus）、南非和印度次大陸的女人，替一家高級連鎖店從事服裝加工的國際服裝公司所界定的。因此，當代全球城市（如倫敦）中地方的「真實性」，是由流動與移動、交錯的社會關係構成，而不是由穩定性和固著性組成的。即使倫敦內部的地域性，可視為在地全球性（globality）（全球狀態〔globalness〕？全球化〔glocalization〕？它們全是可怕的字眼，但捕捉到了我的意思）的極端事例，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幾乎沒有「原封不動的」地方了。

人類學家對地方也有類似的理解。因此，一位關注英國及其他地區的地方或地域性質變化的人類學家茱蒂斯·歐克利 (Judith Okely)，體認到地方的關係性 (relational nature of place)，也注意到地方是經由不均等權力關係的衝擊而定義、維繫和改變的。她主張，「居住於相同空間的不同群體，能夠藉由巧妙的手法來創造和改變疆界」(Okely, 1996: 3)，當然，也有使用諸如暴力或合法排除這類沒那麼精巧的手段。中歐與東歐的新興國族藉由排除「他者」來界定自我——例如，將波士尼亞人 (Bosnians) 排除在馬其頓 (Macedonia) 之外。而且，在較小的空間尺度上，北愛爾蘭城市裡國族主義者和「保皇黨」(Loyalist) 的空間，是經由排除來界定地方的另一個極端事例。在其他地方，不一樣的人確實生活在一起，但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距離。社會距離不總是意味著地理距離，同一個笛卡兒空間¹的居住者，可能住在很不一樣的「地方」裡。此外，被稱為關係性地方 (relational places) 的東西——透過群體與個體之間社會關係而建構的場所——隨著特殊的社會實踐以不同方式，為了不同居民，連結了地方和區域，或是連結上國族和全球，而會在空間尺度間上下滑動。

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圖像來想像這種地方和尺度的新意義，設想成雙螺旋，而不是維繫空間分隔的舊式三層蛋糕盤。女性主義理論家伊莉莎白·葛洛茲 (Elizabeth Grosz) 雖然探討的是身體而非地方，但她採用一種很類似的形象——莫比斯環 (the Möbius strip)，而非雙螺旋——也掌握了這種相互連結與變化的

譯註 1：笛卡爾空間 (Cartesian space) 即歐幾里德空間 (Euclidean Space)，指數學上的二維或三維空間，可用向量等數學語言來描述或度量的空間。

意義。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因為關係性地方這種新概念化和再現的流動性，就興奮過了頭，因為社會習俗和制度性結構顯然會歷久不歇地，將地方「設定」於時空之中。但也有可能發生快速變遷，例如中歐和東歐的戲劇性事件，於 1989 年至 1991 年間就重繪了這個部分的世界地圖。或許有相對確立且穩定的地方體制 (regimes of places)，或是社會－空間聯合 (socio-spatial associations)，橫越時間而綿延持續，但隨後卻經歷危機時期而遭致推翻和取代。

體制 (regime) 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組儘管有輕微變異，仍能維持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關係，但往往在尤其涉及經濟變遷的危機時期，容易遭遇周期性的動亂，這樣的體制概念也是思考性別關係的有用方法。在導論接下來的部分，我會更詳細檢視這個論點。不過，在這麼做之前，我要簡短提一下法國人類學家馬克·歐莒 (Marc Augé, 1996) 的論點，他認為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經驗到的這種變遷，其最終後果就是非地方 (non-place) 取代了地方。

非地方是指當代世界上，交易與互動是發生於匿名個體之間的區位，個體往往被剝奪了社會認同的一切象徵，除了識別號碼之外：例如提款卡的個人識別碼，或護照號碼。的確，自動提款機和機場是非地方的典型例子。依歐莒所言，我們每個人身為匿名個體，與科技客體或官員或雇員互動，他們對於我們身為一個人並不感興趣，僅僅對於我們做為一個數字，或是統計數值，匿名化的川流 (flow-through) 有興趣。在這些空間裡，我們個人的社會屬性和我們的社會群體成員身分，變得毫不相干：當然，只要我們有錢從事現金交易或購票旅行就可以了。因此，在非地方，社會性別屬性，或甚至是我們的生理性別身體 (sexed body)

都變得無關緊要，開啓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控制與解放空間。雖然我們或許能夠短暫地，或者持續幾個小時，逃脫我們的人際關係和責任，但這些交易也受到周密監控，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各種電子監視形式管制。

歐莒的論點很有趣，但是，這些論點與網際空間（cyberspace）的自由與監控類似。當我們上網瀏覽，我們的身體屬性變得毫不相關，或者應該說是任意流動，變化自如。我們可以隨心所欲，依自己喜歡的任何形式進入網際空間的聊天室。唯一的限制是我們的想像力，當然，想像力傾向拘限於我們在「真實」空間裡能夠取用的有限主體位置。但除非網路的觀點交換變得物質化，否則在其他互動形式裡，將我們界定為女性氣質或男性氣概的性別屬性，都無關緊要了。既然如此，讓我們繼續探索性別和性別關係的物質面向，但是記住「地方」這個觀念，它是各式各樣流動和互動，跨越各種空間尺度運作的具體交錯點：在本章末尾，我會回頭討論這種地方的概念化。

界定性別

如果近來地理學研究中，地方的概念化變得更加微妙，那麼性別的定義也是如此。女性主義學者，包括地理學家，著重的焦點也改變了，從主要是強調世界各地男女的物質不平等，轉移到對於性別定義裡的語言、象徵、再現和意義的新興趣，以及主體性、認同和性別化身體等問題的關切。大約十年前，亨利塔·摩爾（Henrietta Moore, 1988）在一篇針對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研究評論裡指出，該學科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範圍，包括了有關「成為女人是怎麼一回事、『女性』範疇的文化理解如何隨時空而變

化，以及這些文化理解如何連結上不同社會中的女性位置」(p.12)的分析。她認為，這種理解的發展需要性別和性別關係的概念：亦即女人和男人，以及公認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屬性，橫跨時空而界定的不同方式。她主張，我們或許可以從兩種視角來看待性別：「不是視其為象徵建構，就是當做一種社會關係」。

這兩個面向——做為一組物質社會關係，以及做為象徵意義的性別——不能真的區分開來。在界定性別，以及先前討論地方定義與理解的變化時，很明顯的，社會實踐，包括在各種位址與地方（例如工作場所、家裡、酒吧或體育館）的廣泛社會互動，以及思考和再現地方 / 性別的方式，都相互關連且彼此建構。我們的意向和信念，總是在文化上塑造，並有其歷史和空間定位，而我們全都據以行動。譬如我對於年輕人的感受，涉及有關他們行為的社會假設、我自己身為青少年兒子的母親經驗，以及當地年輕人晚上在劍橋街頭表現自己的方式！這影響我與他們互動的方式，這些行動繼而影響我的態度、信念和未來意向，左右我對於世界及其中不同人群的地方的知識與理解。

所以，人們所相信的男女該有的合宜行為舉止，反映並影響了他們想像的男人或女人模樣，以及他們期待男女行止的方式，儘管男女隨著年齡、階級、種族或性慾特質而有所不同，而且這些期待和信念會隨著時間及不同地方而變化。唯有做為一個肖像或形象，譬如聖母瑪利亞（*Virgin Mary*），女性氣質的觀念才（幾乎）是普遍、完整而不會改變的。對其他人而言，公認的標準會隨時空而變。

除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以及更普遍的地理學研究中，所謂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Barnes and Duncan, 1992; Duncan*

and Ley, 1994) —— 亦即大幅強調象徵、意義和再現 —— 過去約莫三十年來，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標也起了變化。我在這一節的目標，就是要簡述這些變動的重點。之所以要簡短，是因為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找到有關女性主義地理學史的全盤解說 (Bondi, 1990, 1992; Duncan, 1996b; Jones III et al., 1997; McDowell, 1992a, 1992b, 1992c; G. Pratt, 1993; G. Rose, 1993; Massey, 1994;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 1997)，以及其他領域的說明 (Alcoff and Potter, 1993; Gunew, 1990, 1991; Jackson, 1993; Lovell, 1990; Barrett and Phillips, 1992; Pollock, 1996)。女性與地理研究群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成員合寫的新書，是個絕佳的起點。但除了本章提供的摘要外，接下來的每個獨立章節中，在探討概念、理論和個案研究時，都會反映出女性主義地理學者重點的變化。然後，在最後一章，我還會利用方法論的透鏡來闡明變動的重點，據以指出不僅研究問題改變了，探究這些新問題的研究方法也改變了。

女性主義學術研究

一般而言，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關鍵目標在於，闡明性別分化的建構和意義，它是關鍵的組織原則和社會權力軸心，也是身為具有生理性別 (sexed) 和社會性別 (gendered) 之個體的主體性、自我認同感建構的重要部分。我最近見過針對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提出的最有趣定義之一，是葛里歇達·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在她編輯的《視覺藝術中的世代與地理》 (*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 in the Visual Arts*) 文集序言裡提出的：

女性主義支持對於女人，以及女人為了自己和這個世界而渴望改變的政治承諾。女性主義擁護充分欣賞女人以文化形式來銘刻、接合和想像的事物：從稱為「女人」或「女性」的身分出發，介入意義與認同的場域。女性主義也指涉了藝術、文化、女性、主體性、政治等術語理解方式的理論革命。但女性主義並未暗示一個理論、政治立場或觀點的統一場域。女性主義曾被等同於婦女運動，這在歷史上很重要，理應如此；但是此時此刻，它做為提出性別問題之場域的自主性，獲取了特殊的政治與理論重要性（1996: xv）。

9 所以，誠如波洛克清楚說明的，女性主義既是政治運動，也是理論分析場域。她提出的定義，不出所料，反映了她身兼藝術史學家、地理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的訓練，關切日常行為與政治行動——除了再現干預，還有物質介入——我們也許想在波洛克第二個句子後面，插入這句含意廣泛的片語。此外，我覺得她的定義十分簡潔而完整，而且最重要的是，如同我們馬上要進一步探究的，她強調了女性主義理論的多樣性。事實上，現在很多地理學家談的是〔複數的〕「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地理學」，寧願用複數而非單數來強調他們的觀點與取向的多樣性。請注意我前前提過的這本合著的介紹性書籍，標題是《女性主義地理學：探索多樣性與差異》（*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而先前出版於 1984 年的書，則比較直接地標明《地理學與性別》（*Geography and Gender*）。

然而，就像波洛克提到的，學院裡的女性主義，不僅是提出性別問題——有關性別的定義、差異和影響——的地方，也是必須提出身為學者和學術研究主題的女人，在學術圍牆內代表誰的政治問題的地方。我想先探討做為學術研究主題的性別，把身為

學者的女性位置的問題放到本章最後。

波洛克在她的書中主張，「女性主義必須堅苦卓絕、長期奮戰，才能贏得對於性別差異之組織性核心地位的承認，以及性別和性慾特質做為社會與主體構成平面之效果的承認」（1996: 4），這一點在我們這個學門裡，跟其他學科一樣真實。蘇珊·克里斯托福森（Susan Christopherson, 1989）在基進地理學期刊《對蹠地》（*Antipode*）的一篇文章裡沉痛指出，對大多數地理學者，甚至那些關切階級不平等和社會改革，自詡為基進分子的人而言，有關性別、正義和平等的問題，仍然位居「計畫之外」。讓主流地理學者接受性別區分與階級、種族／族群一樣，都是社會差異的關鍵軸向，經歷了漫長的鬥爭。我們太常假定性別只不過是女性特質，因此只有女學者和女學生才感興趣。我們當中教一門或許大膽加上性別與地理學〔複數〕，甚至女性主義地理學〔複數〕標題的課程，或是將女性主義觀點引進像經濟地理學這種實質課程的人，往往必須針對如何使我們的教學被認真看待，以及除了女人，如何使男人待在我們的教室裡，交換意見。

除了對於我們研究的閱聽人的誤解，還有一項或許更嚴重的錯覺。一般通常（不正確的）假定女性主義學者，只關心性別，卻排除其他主體建構和歧視的軸向。這也是一種有所誤導的假設。波洛克便強調：

女性主義並不像馬克思主義偏向階級，後殖民理論傾向種族那般，偏重於性別。首先，有各式各樣的女性主義，和各種有關女性受壓迫的分析有不同方式的結盟。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總是關切階級課題，黑人女性主義則詳述帝國主義、性慾特質、女性氣質和種族歧視的構造。根據多元的女性主義廣度，女性主義處理環

繞著種族、階級、性慾特質、年齡、體能等複雜且有特殊組織的權力構造，但女性主義也必須是特殊的政治和理論空間，命名並剖析性別差異做為以特殊方式運作的權力主軸，但這種特殊性既不賦予性別差異優先權、排他性，或凌駕任何其他特性的優勢，也不允許性別差異在概念上孤立於構成社會的社會權力與抵抗的紋理（1996: 3-4）。

這是個複雜的宣稱，值得再讀一次波洛克的論證。它也提出一個重要但困難的問題，就是理論分析和尋求變革的政治動員之間的關連，你應該還記得波洛克將理論分析與政治動員界定為女性主義的雙重焦點，因為女人或許會沿著階級和族群界線的利益而分裂。但是我認為，波洛克所言毋庸置疑。至關重要的是，理解社會權力和壓迫的所有軸向之間的交錯關係，並且了解性別差異和性別關係會與其他權力軸向相互關連，因此性別差異和性別關係在時空中以不同方式建構。儘管如此，我們仍舊必須堅決主張，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和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如何建構，並且形成權力基礎的這個問題，才使得**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與眾不同。再者，我們必須堅持改變性、性別和權力之間關係的政治承諾。女性主義者不僅要分析，還要拆除強化女性劣勢的結構，挑戰傳統理解下的女性氣質定義和限制。南西·米勒（*Nancy Miller, 1988*）便主張，女性主義者「抗議女性生成（*female becoming*）的方便虛構」。不過在這計畫裡，不斷有男性加入我們，他們也要抗議男性存有（*male being*）的方便虛構。

女性主義計畫——在理論上檢視身為女人或男人的不同方式，反對當前可得的選擇——當然不是小型事業。它不外是要求拆解日常社會關係的基礎、大多數制度和權力結構，以及當前性別劃分所依據的理論基礎。這是因為女男之間範疇差異的

假定——女人是一回事，男人是其對立面——深深鑲嵌於我們身為個體的自我感、日常互動、制度結構，以及西方智識思想之中。雖然大家越來越認可社會經驗的多元與差異，但相信女性氣質屬於女人，而男性氣概歸屬於男人，認為這種區別的說辭很恰當的信念，仍然極為強大。如同瑪西主張的，「深刻內化的二元論 (dualism) ……結構了個人認同和日常生活，經由建構社會關係與社會動力的運作，影響了其他人的生活，並且從西方社會深刻的社會—哲學基礎，導引出陽剛 / 陰柔的符碼」(1995: 492)。儘管事實上，女性主義學者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二元假設的錯誤性質，但是二元性別劃分的信念，仍然是當代社會實踐的關鍵要素。因此，女人及其女性氣質的相關特徵，被界定為非理性、情緒化、依賴且私人，和男人相較之下，接近自然而非文化，男性特質則被描繪成理性、科學、獨立、公共且有教養的。一般認為，女人受到身體和情緒的擺佈，男人則代表對於這些較卑劣特質的超越，是相對於女人身體的心靈。

許多女性主義學者已經證明，二元性且階層化之範疇差異的信念，將女人建構為不如男人，而女性氣質的屬性相較於男性氣概，也得到較低的評價。這種信念深刻鑲嵌於西方思想的結構與實踐裡，埋藏在社會科學學科的區分，以及社會制度當中。因此，市場和國家的公共性質，分別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研究的基礎，而在家裡的「私人」決定，則是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的領域。派特曼與葛洛茲 (Pateman and Grosz, 1987) 編輯的文集，清楚介紹了西方社會科學的二元結構。

這種二元劃分也深刻隱含於空間的社會生產、在「自然」與人造環境的假設，以及影響誰該占用哪些空間，而誰應該排除在外的規則中。因此，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二元範疇塑造了地理

學術研究（進一步的解釋與事例，參見 Mackenzie and Rose, 1983; McDowell, 1992a, 1992b, Massey, 1994; G. Rose, 1993;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 1997）。所以，很顯然的，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替自己設定了一項野心十足的任務：拆除並重建我們的學科結構、我們藉以建立理論，以及連結人群與地方的方式。

12

因此，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特殊目標，是要調查、揭顯並挑戰性別劃分和空間區分的關係，揭露它們的相互構成，質疑它們表面上的自然特性。所以，這裡的目的是要檢視女人和男人以不同方式經驗空間與地方的程度，並顯示這些差異本身如何成為性別和地方之社會構成的一環。依常理，性別關係有其明確的地理形勢，因為女人的附屬地位和相對自主性，以及男性權力和支配的程度，在國際間與國家內部都變異極大；在性別的社會建構、性別區分，以及與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有關的象徵意義方面，也有明顯的多樣性。誠如波洛克指出的，建構性別的地理或多重地理，「提醒大家注意地方、區位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將性慾特質議題連結上國族特性、帝國主義、遷移、流移和種族滅絕」（1996: xii）。

不過，由於公與私，內與外的空間區隔方式，在性別劃分的社會建構上扮演核心角色，性別關係也成為地理學家的核心關切議題。認為女人占有特定地方的想法，不僅是各種制度（包括家庭和工作場所、購物中心和政治制度）之社會組織的基礎，還是西方啓蒙思想、知識的結構與分化，以及在這些區分裡可能研究的主題的根本特徵。

因此，你應該很熟悉如下這種依性別劃分的二元區分清單：

男性的

公共
外在
工作
工作
生產
權力
獨立

女性的

私人
內在
家庭
休閒 / 娛樂
消費
依賴
缺乏權力

我建構了這張二元對立表，但是類似表單除了鮮明的女性主義文本外，在有關現代英國社會關係和制度組織的各種討論裡也找得到。跟女人和女性面有關的特徵與屬性，不是被視為「自然的」，因而無須解釋，就是被認為無關宏旨，不適合嚴肅的學術分析。想想看，比方說，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者花了多久時間，才說服她們的同事，相信家事或家務勞動，與辦公室和工廠裡的受薪勞動一樣，都是「工作」，因此應該成為他們分析的一部分（參見 Oakley, 1974; Rowbotham, 1989）。同樣的，休閒活動與購物，直到最近才成為地理分析的重要領域（Wrigley and Lowe, 1996）。

13

揭露尋常的性別預設如何塑造思想和知識的性質，可說是意義非凡。這意味了重新思考性別劃分，形同需要重新建構西方知識本身：這項任務浩大，比起顛覆男女之間的結構性不平等，或許猶有過之。不過，當然，這項任務取決於性別不平等的顛覆。

現在讓我們轉向我們的地理學和一般學科中，知識重構的簡史。

思考性別

自從 1960 年代晚期女性主義復甦，引介並重新定義性別一詞，目前性別一詞以兩種不同但相關的方式使用。在一篇非常清晰的論文〈詮釋性別〉(Interpreting gender) 裡，琳達·妮可森 (Linda Nicholson, 1995) 概述了性別一詞用法的歷史，我在這裡將加以援用。

區分生理性別 (sex) 與社會性別 (gender)

第一種使用性別的方式，就是社會性別 (gender) 傾向於用來跟生理性別 / 性 (sex)² 這個詞對照。生理性別描述生物差異，相對的，社會性別則描述社會建構的特徵。優秀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兼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1949 年出版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書中她宣稱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而成的，從而挑戰了生物決定論的預設。

一個人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沒有生物、生理或經濟的命運會決定人類在社會上呈現的體態：在男性和被描繪成陰性的閹人之間，塑造這種創造性的不確定性者，正是整體文明 (de Beauvoir, 1972: 295)。

雖然波娃將女人置於男人與閹人之間，就像她著作中的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c) 預設一樣，已經遭到了挑戰，但她確認

譯註 2：在本書裡，sex 一般譯為「性」，gender 譯為「性別」。但是，在類似此處刻意強調與生物的 sex 對比的社會建構之 gender 時，將 sex 譯為「生理性別」，gender 則是「社會性別」。

女性氣質是社會建構的，這一點在英美第二波女性主義來臨之際極為重要。女性主義思想和行動在 1960 年代的復甦（如此稱呼以有別於「第一階段」或爭取投票權的鬥爭），便援用了波娃的著作。女性主義者看重波娃對於女性氣質之社會建構的論證，並藉由採用有別於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一詞，來闡述這項論證，指稱女人被「造就」的方式。因此，許多當代女性主義者早期理論著作的關鍵目標，在於質疑看似永恆、有生物基礎的兩性差異，動搖女男之間具有絕對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的宣稱，以及很重要的是，證明女性在體力和智力機敏方面都較低劣的假定，並非「自然」現象。

區分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可以將社會性別理論化為生理性別在文化或社會上的精心構作，而且有改變的可能。人類學的文化觀念在這裡具有關鍵重要性，因為男性和女性角色與行為隨著不同文化而有明顯的變異，即使在這裡，某種「自然」過程也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如同歐特納與懷特海（Ortner and Whitehead）於 1981 年主張的

性別的自然特徵，以及性與生殖的自然過程，只是為性別和性慾特質的文化組織，提供暗示性且模糊不清的背景。性別的性質，男人與女人是什麼，男女之間實際上或應該存在哪種關係——所有這些想法，並非單純反映或詳細說明生物性的「已知事實」，而是大體上是社會和文化過程的產物（p. 1）。

在一篇最著名且深具影響力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早期文獻中，蓋兒·茹賓（Gayle Rubin, 1975）指出這些過程如何透過她所謂的性／性別系統而相互關連。她認為，這種系統是「社會據以將生物上的性慾特質改造為人類活動產物，並讓已改變的性需求獲得滿足的一組安排」（p. 159）。經過這種轉化與社會調節，「性」

變成「性別」。妮可森用一種生動的類比指出，性與性別之間的模型或關係，就像衣帽架一樣。性或生物差異是基礎框架，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社會，將形形色色的大衣吊掛於基礎框架上，這些大衣就是社會定義的性別特徵安排。這項區分的一大好處，是女性主義者得以質疑性別劃分的「自然性」，並將性別劃分理論化為可以改變的。這也使她們得以假定女人之間兼具類同與差異，對地理學家而言，將性別關係理論化為橫跨各種不同尺度而有空間變異的現象，被證明是非常寶貴的。因此，性別化的特徵不僅隨著不同國度和歷史時期而變化，在日常空間與互動中也呈現多種面貌。所以，比方在酒吧、俱樂部、國會建築、學生宿舍、辦公室裡，性別象徵的運用，以及合乎性別期待的行為，都各不相同。

將生理性別置於社會性別底下

不過，在第二種後來的用法中，社會性別一詞不被認為可以跟生理性別區分開來；相反的，後者可以含攝於前者之內。妮可森（Nicholson, 1995）在理解或界定性別的第二種方式上，汲取並引述了喬安·史考特（Joan Scott）在《性別與歷史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中的解釋。

所以結果是，社會性別（gender）是生理性別差異的社會組織。但這並不意味社會性別反映或實行了固定且自然的女男身體差異；反而，社會性別是確立身體差異之意義的知識……。除了把生理性別差異視為我們有關身體的知識的函數外，我們看不見生理性別差異，但那種知識並不純粹，它涉入廣泛的各種論述脈絡，無法獨立自存（Scott, 1988: 2）。

據此，社會性別差異的第一種視角裡的生物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遭到挑戰，而原本假定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生理性別差異屬性，則被揭露為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化裡特殊群體的特有事物」（Nicholson, 1995: 42）。這種認識意味了

我們不能期望以身體做為男女區別之跨文化宣稱的基礎……「一路探到底」的差異……不僅紐結於我們許多人聯繫上性別的有限現象（換言之，連結上個性和行為的文化刻板印象），還紐結於具有文化變異的身體認識，以及何謂身為女人和男人的意義（p. 43）。

因此，身體也是可以分析和理論化的變數，而非常數。下一章將討論近來有關身體的研究。

父權體制、性別體制與性別協商

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和其他人的早期研究，大部分是以第一種意義來界定和分析性別，主要重點在於揭露物質性社會實踐造成不平等性別關係的各種不同方式。在這種研究裡，父權體制（patriarchy）是個重要概念，它既有助於連結性別和階級，也有益於從理論上說明女人在各種社會中受壓迫的原因。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父權體制指的是父親的法律，身為父親的男人施加於妻女的社會控制。在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較為特定的用法上，父權體制所指涉的系統將男人群體建構為優於女人群體，從而假定具有支配她們的權威。在先進工業社會裡，有幾種方法建構並強化這種優越性和控制：例如，透過稅收和社會安全系統中的法律系統，以及透過日常態度和行爲。

如果我們以法律系統為例，整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女人的法律地位是受扶養者，她的生活和財產掌握在她父親或丈夫手中。例如，直到 1885 年通過已婚婦女財產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以前，女人只要進入婚姻狀態，全部財產就落入丈夫手中。在英國，女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能投票；直到 1948 年，女人才成爲劍橋大學的正式成員；她們直到 1967 年才得以合法墮胎；直到 1970 年代，女人才可以在沒有男性保證人的情況下，取得抵押貸款。

沃爾碧（Walby）在《理論化父權體制》（*Theorizing Patriarchy*, 1990）一書中提及，先進工業社會中的父權關係，是由六組分析上可以區別的結構所建構和維繫的，在這些結構裡，男人支配並剝削了女人。她辨認出的這六組結構是，家戶生產（男人將女人不支薪的家務勞動價值據爲己有）；受薪工作中的父權關係（女人被隔離到特定職業，獲取較差的報酬）；國家的父權關係（男人主導制度，並制定帶有性別偏見的法規）；對付女人的男性暴力；性慾特質中的父權關係（男性對女人身體的控制）；以及文化制度裡的父權關係（男性支配了不同媒體的生產與形式，以及媒體中的女人再現）。

父權體制概念由於包羅萬象，而遭致了根本的批評。父權體制在早期的理論化階段，被認定爲男女關係的普遍特質，所以並沒有替其變異或女人逃脫父權體制勢力的可能，留下多大餘地。沃爾碧的六種不同結構區分，在一定程度上迴避了這種普遍批評，因爲她認爲在她辨認出的這六種領域的每一種當中，父權關係都會採取特殊形式，即使如此，她的構想也因其無所不包的性質，以及種族中心主義（奠基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而遭到批評。沃爾碧還因爲忽視性別關係和其他像是基於族群、年齡和不

同性取向的社會區分的相互關連，而遭受非難。

沃爾碧後來的構想，承接這些批評的重擔，她抱持相互關連結構（interconnected structured）的觀念，同時認為這些結構或關係組合，是在特殊的環境和地方，以不同方式連結起來。她從使用父權體制一詞，進展到採用性別體制（gender regime）這個字眼，後者也由相同的六組關係構成。沃爾碧區分先進工業社會中的兩種主要體制：她稱其為以私人父權關係為特色的家務體制，以及由公共父權關係主導的公共體制。她如此描述這兩種體制：

家務性別體制奠基於家戶生產，這是女性工作活動，以及剝削女性勞動和性慾的主要結構與位址，同時也以將女性排除於公共之外為基礎。公共性別體制不是奠基於排除女性於公共之外，而是奠基於女人在受薪工作與國家結構，以及文化、性慾特質和暴力裡的隔離和附屬地位。家戶仍然是公共形式裡的相關結構，但它不再是最主要的。在家庭形式中，受惠者主要是家中女人的個別丈夫與父親，然而在公共形式裡，有更多集體的占用。家庭形式裡的主要父權策略是排他性的，將女人排除於公共場所之外；公共形式的策略則是採取隔離主義和從屬關係。在這兩種形式裡，六種結構全都有關，但彼此之間的關係各異。為了理解性別體制的特殊事例，往往必須了解階級、族群關係與性別的相互構造（Walby, 1997: 6）。

儘管這些體制或許在分析上有所區別，但沃爾碧承認它們時常共存，而且女人以不同方式涉入了每個結構之中。

由於年齡、階級、族群與區域所引發的性別關係多樣性，會有不同形式的性別體制同時共存。〔在英國〕比起年輕女子，年長的女人比較有可能捲入偏向家務的性別體制。因職業而位居較高社會經濟群體的女人，比較可能涉入較為公共的形式當中。巴基斯

坦與孟加拉血統的女人，比較可能涉身家務形式，而比起白種女人，黑種加勒比海裔女人更有可能涉入比較公共的形式 (p. 6)。

18

我發現這種由分離但相互關連的結構，組成不同體制的想法，是一種在分析上辨認變動中的性別關係的有用方法。特別是沃爾碧在她最近的體制構想中，說明如何將階級和族群差異含括在內。接下來的各章，我將討論沃爾碧勾勒的諸多領域和社會關係，例如聚焦於家庭及其中的社會關係，然後專注探討性別關係，如何在資本主義工作場所的社會關係中組成，並受其影響。

沃爾碧近來以更微妙的性別體制概念來取代父權體制觀念，使得她的著作更為接近另一位重要的性別關係理論家。他就是羅伯·康涅爾 (Robert Connell)，在性別學術研究發揮了關鍵影響，原因或許在於他是最早關注男性氣概之社會建構的分析者之一 (Connell, 1987, 1995)。他也發現性別體制的概念很有用，而且跟沃爾碧一樣，強調性別體制結構內的變化和多樣性。康涅爾採取葛蘭西式 (Gramscian) 的視角 (葛蘭西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作家，相對於更粗暴且直接的宰制形式，葛蘭西強調權力的非強制面向，時常透過文化形式而運作) 書寫。因此，沃爾碧以類似馬克思理論化強制性階級壓迫的方式，來理論化加諸女人的獨特支配性與強制性的男性壓迫相對的，康涅爾則關切文化同意和快感的形式，以及建構和維繫性別關係的多元方式。

儘管康涅爾認為不同的社會，是以相對穩定的支配或霸權式性別體制為特徵，他也注意到各種對抗性體制可能和支配體制共存，挑戰了維繫支配體制的性慾特質和性別假設，而這可能導致變革。因此，康涅爾提出了一種方法，以避免對於無所不包且看似無法改變的父權體制的批評。他還指出，有關性慾特質和性別

化位置的觀念，不僅是由權力和壓迫所強加，而且人們會以置身於特定性別體制中的主體位置為樂。這種理解使得康涅爾更加接近某些女性主義者的論證，她們開始認識到，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為個別女人帶來了快感和樂趣（例見 Coward, 1984）。

根據康涅爾的看法，相較於沃爾碧的六組結構，性別體制是由三組結構組成。他區分「(a)權力，(b)生產，以及(c)貫注 (cathexis)（情感依附）的關係」（1995: 73-4）。因此，我們看見除了沃爾碧著重的由力量所生產的支配外，如果我們採取康涅爾的方法，就比較能夠理解為何人們，尤其是女人，會受制於、甚至喜歡並頌揚她們在父權關係裡的位置——早期女性主義者向來頗不以為然地論及女人「與父權體制共謀」這檔事。讓我們更仔細審視以下摘錄的康涅爾的三重模型。這是康涅爾區分權力、生產和貫注的方式：

- (a) 權力關係 當代歐洲 / 美國的性別秩序中的主要權力軸向，是女人全面性的附屬和男人的支配——那是婦女解放運動稱為「父權體制」的結構。儘管有許多地方性翻轉（例如女人當家，女教師與男學生），這個普遍結構依舊存在。儘管目前有接合女性主義的各種抵抗，父權體制還是持續不歇。
- (b) 生產關係 性別分工經常呈現在任務分派上，有時候此任務分派會達到極度細緻的程度……。對於性別分工的經濟後果，以及男人坐享社會勞動產物之不均等股份的股息，應該予以同等關注。最常以不平等工資率的角度來探討問題，但也應留意資本的性別化特徵。透過性別分工而運作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是一種性別化的積累過程。因此，男人（而非女人）控制公司與巨額私人財產，並非是統計上的偶然，而是男性氣概之社會建構的一環。雖然聽起來難以置信，但財

富的積累已經透過性別的社會關係，與再生產領域穩穩地連結起來了。

（在此，我們或許會注意到，擁有資本的階級向來關切彼此通婚，以及為繼承而合法生育的重要性，而且這其實是早於康涅爾的著作出版一個世紀以前，恩格斯（Engels）論證女人在家中的主導地位的基礎）

（c）貫注 性慾往往被視為天生自然，以致通常被排除在社會理論之外。然而，當我們以佛洛伊德式的（Freudian）術語來思考慾望，認為慾望是依附於對象的情感能量，這時，慾望的性別特徵就很明顯。這對異性戀慾望和同性戀慾望而言皆然。因此，塑造並實現慾望的實踐，是性別秩序的一個面向。於是，我們可以針對其中牽涉的關係，提出政治性的問題：這些關係是共識性的，還是強制性的，是否均等地付出與接受快感。在女性主義的性慾特質分析裡，有關異性戀體制與男人的社會主導位置之間關連的問題，就變得很尖銳了（Connell, 1995: 74-5）。

20 我們可以看見，沃爾碧和康涅爾的模型有清楚的重疊區域。他們都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的淵源，都強調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關係。我們可以將沃爾碧的第五和第六種結構——性慾特質和文化——對應到康涅爾的貫注上，但是康涅爾明確將權力當成可以區分的結構而獨立出來，權力也支撐了他的其他結構；沃爾碧認為權力存在於生產和再生產的領域中，但她選擇以對付女人的男性暴力的這種獨特展現，來指認權力是個不同的結構。

我認為，沃爾碧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她沒有解釋女人依附於個別男人，或是執著於特定性別秩序或體制秩序的理由。康涅

爾藉由強調情感依附而能夠掌握這一點，但是我覺得他有點低估了其他可能，就是女人或許會認為她們除了「加入」(buy into) 主導的性別秩序外，別無選擇。因此，我要簡短介紹理解性別體制的第三種方式。不像康涅爾和沃爾碧的著述是基於先進工業社會的事例，丹妮絲·坎蒂猶娣 (Deniz Kandiyoti) 1988 年發表的論文，明顯聚焦於非歐洲社會。在這篇論文裡，坎蒂猶娣不僅掛慮要在廣大的地理基礎上分辨父權結構 (例如，區分亞洲和非洲的父權體制)，並且關切於探討女人大多接受而非反抗父權結構的原因。她注意到不同的家庭結構，以及妻子和寡婦依賴父權親屬關係的特定結構的方式，從而主張女人乃是出於自利，而支持這種對於她們長期生存和生活水準而言乃屬必要的體制，即便它是壓迫她們及其女兒的體制。

坎蒂猶娣在著作中，堅持要確認女人的能動性 (agency)；身處兩種廣泛的父權體制下的女人，或許是附從隸屬，但未必卑屈奉承。她們能夠置身於父權關係裡從事工作，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顛覆父權關係。因此，與康涅爾以及沃爾碧的後期著述一樣，坎蒂猶娣指出可能改變性別體制的方式。這三位作者都堅持複雜性和多樣化：既顯現於性別關係導致女男不平等關係的方式，也呈現於改變的範圍和理由。他們也都強調性別、階級位置和族群血源的相互關連。例如，康涅爾在《男性氣概》(Masculinities, 1995) 一書中，說明白人男性的自我感，除了對立於白人女性氣質外，又如何對照於理想化的黑人男性氣概觀念而建構 (賽加爾 [Lynn Segal, 1990] 在《慢動作》[Slow Motion] 一書中，也持相同論點)，他還主張，能夠接受的男子氣概和女性氣質觀念，隨著階級位置和「種族」而不同，也隨著時間和區域與國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因此，複雜多變的主導性和對抗性的性別體制觀念，提出了一種有用且結構化的方法，來探究性別關係的地理多樣性。我會在往後各章採用這種研究方式。與沃爾碧和康涅爾的研究一樣，我的經驗研究，連同我在研究期間閱讀的文獻，都是以先進工業社會的個案研究為基礎，本書的焦點也反映了這點。我確實在適當地方引介在其他社會從事研究的學者觀念和個案研究，但是我怕自己在這方面孤陋寡聞，無法提供廣泛的「南」「北」比較。

在我們穿越女性主義理論化的歷史，繼續旅程以前，針對結構性的取向，還有最後一句話：父權體制或性別體制是一組結構化的不平等，這種信念近來迭遭解構和後現代論點的抨擊，它們指出「女人」和「男人」這兩個範疇是暫時性的（我隨後就會詳盡探討這些論點），也不可能透過「大理論」（*grand theories*）來理解差異和多樣性。然而，跟沃爾碧一樣，我相信沒有必要為了解論化複雜性，而放棄了結構性關係這個較廣的概念。我於前文引述的三位理論家，都承認性別和階級、年齡、族群及其他因素，像是性慾特質，彼此交錯的方式十分複雜；但是，女人群體在某些情況下顯然是附屬於男人、與男人之間有不平等、遭受到男性群體的支配，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掌握方法，來理論化這些承認了社會群體間結構性不平等的差異。無論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各種版本的社會建構，有多麼流動不定，但眾人還是習慣假定女性氣質的建構不如男性氣概，還是一種習慣言行，因此整體而言，所有男人群體還是捲入對女人的支配。

多樣性、差異與解構

從前述論點看來，現在你應該很清楚，性別關係「位居基礎，是權力、階層和不平等的關係，不像常識性的範疇偏愛表達的那樣，是二分、對稱和互補的關係」（de Almeida, 1996: 8）。有許多不同的「操作性別」（doing gender）的方式（West and Zimmerman, 1987），身為男人和女人的方式。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不但有支配性的版本，還有多元和對抗性的版本。這些版本兼具地理與歷史特殊性，橫跨各種空間尺度而有所變異。而且，性別本身現在被理論化為諸多變數之一，或者換個更正確的說法，性別是由階級和族群特性相互構成的（Brewer, 1993; Davis, 1981; Giddings, 1984; Kobayashi and Peake, 1994; Malson et al., 1990; Mirza, 1997; Peake, 1993）。

儘管認識到女人之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從 1970 年代起，尤其是那些受到後結構和後殖民理論影響的各種批評者，卻開始解構性別是個穩固建構的觀念。他們的批判奠基於黑人女性主義者稍早的論證，認為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和政治，暗中假定的是白人主體。例如，在爭取女人對自己身體控制權的政治抗爭中，可以自由運用的避孕和墮胎是一項關鍵要求，但是許多有色人種女性認為，絕育往往違反她們的意願。對她們而言，更重要的是能生育、生小孩的權利。同樣的，女同性戀者指出，許多女性主義書寫和學術研究中隱含了異性戀特質，她們要求將有關「另類」性慾特質的問題納入議程中。她們的訴求因為 1980 年代同性戀與酷兒（queer）學術研究迅速崛起而聲勢日大（Craig, 1992; Fuss, 1990; Herdt, 1992; Kimmel, 1988; Sedgwick, 1990; Simpson, 1994; Weeks, 1986）。

受後現代理論影響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儘管較早期的女性主義批評西方啓蒙知識反映了資產階級男性世界觀，但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本身還是堅持中心主體（centred subject）的啓蒙觀念，以及理想化的社會進步觀。做爲將被剝奪者的聲音——對「他者」的各種禁令——納入學院論述的一般運動的一環，有關知識和真理的單一觀點（哈洛威〔Haraway, 1991〕稱爲「來自烏有之處的觀點」〔the view from nowhere〕），已經遭到質疑。後殖民評論家，如蓋亞翠·史碧伐克（Gayatri Spivak, 1988）和瓊德拉·泰爾佩德·莫罕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 1991），以及有色人種女人，包括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 1982），力促白種女人重新檢視她們研究中的女性主體，理論化「種族化」認同的複雜性，並迫使她們從白種女人的特定立場，而非從「女人」角度寫作。一種探究白種女人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新興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正持續發展。因此，例如馮宏·薇爾（Vron Ware, 1992）開始探索白種女性在英國統治下印度的地位，露絲·法蘭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 1993）則研究她自己和其他白種女性的種族主義信念，儘管她們是身爲白人而成長於戰後的美國。

由於女性主義學者不但受到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述的影響，也很熟悉精神分析文獻，這種多重立場的探究便伴隨了更富挑戰的發展，開始重新將主體理論化爲關係性和偶然性的。這種觀點主張，主體並非僵固而穩定的實體，以其明確的性別而進入社會關係，反而總是流動而暫時的，處於變化過程。性別是透過論述和日常活動而建構與維持的。那些我們或許會歸類爲解構主義者的女性主義者，在這種研究裡採取了好幾個方向，我會在下一章更深入探討。然而，簡單的說，這種研究質疑性別差異的二元區分，以及將性別屬性描繪成兩極區分的做法。因

此，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主張，「沒有天然束縛女人身爲『女性』的東西。甚至沒有一種『身爲』女性的狀態，這本身是一種極度複雜的範疇，是在有爭議的性別科學論述和其他社會實踐中建構出來的」（1991: 155）。

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有關身體的新興女性主義研究方面，是個重要理論家。巴特勒與哈洛威有點不同，她認爲性別化的身體（sexed body）本身就是從已經二分的性別立場建構而成的——也就是說，男性和女性這兩種性別被視爲理所當然——還透過科學、醫學和其他論述而建構，身體則是以相同方式來確認的。巴特勒（Butler, 1990a, 1993）認爲，這種認同作用能夠歷久不衰，是透過她所謂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nce）而建構的，異性戀體制的規範性虛構，逼迫我們大多數人遵照霸權規範來操演，這種規範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界定了兩極化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標準。然而，她指出這種兩極化性別的論述建構，或視爲當然的建構，或許會由於顛覆性的操演而遭致質疑，所以，扮裝（drag）是重要的顛覆行動。我會在下一章更詳細探討這些論點，但我在這裡要指出，她們已經提出有關身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或真實性的重要問題。在評論這些辯論時，卡洛琳·紐（Caroline New, 1997）最近嘗試在性別化身體的論述建構中，重新插入「真實」。

雖然性別差異不只是二分的，但我堅持性別差異是真實的。然而，人類能夠大致成功地將其二分，絕非意外：性別差異確實有兩極化的分布，可以用性慾特質的演化說明來解釋。確實存在有男性和女性的能力與傾向，儘管這些能力與傾向能否及如何體現於特定案例中，端視整體因果脈絡而定（New, 1997: 179）。

我同意鈕的評論的要旨。事實上，她的精神與我們學科裡相當重要的實在論（realist）科學觀很類似，雖然我不同意她將因果關係歸屬於脈絡的做法。在我看來，性和性別之間的關係具有歷史和空間上的偶然性，儘管如她指出的，演化的生物變化影響了「真實的」性別差異。因此，身為女人或身為男人的意思，是依脈絡而定、關係性的，而且可以變動的，雖然會受限於各時代界定的容許和逾越行動的規則和管制。因此，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琳達·艾爾考夫（Linda Alcoff）認為，性別「並非做為一種既定事物而成為起點，反而是透過習性、實踐和論述的基底（matrix），以並非任意的方式予以形式化的假定或建構」（1988: 431）。

將性別重新理論化為論述建構和操演的虛構，極為振奮人心。例如，在工作場所的研究方面，這使我們得以針對職場文化提出一整套新問題，性別認同如何透過工作中的日常互動而建構，以及，重要的是，它提供我們直接挑戰不平等性別關係的思考前景。比起父權宰制這類無所不包的概念，承認多樣性和可能的對抗策略，使我們能以更細緻的方式來思索職場中對女人的支配。它也導向了有關語言、姿勢、言談風格和身體呈現等新興研究問題（Halford et al., 1997; McDowell, 1997a; Tannen, 1994）。

在生殖與重建手術領域的新科技影響下，進一步推動了性別之為流動的概念化。當前的性別似乎逃脫了身體的限制，或者更準確的說，身體被重新定義。例如，從體外授精和不孕治療，到代理孕母，有各式各樣方式來控制生殖，使得性別和性慾特質越來越流動易變、靈活可塑，幾乎成為又一種供人挑選的個人認同面向。現在，女人在更年期以後還可以「隨意」成為母親，或者如其所願，重新塑造她們的身體，在多數情況中，收入水準似乎

是唯一的限制。當血緣、親屬關係和婚姻的傳統聯繫，看似幾乎與生殖過程和家庭生活無關，以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瑪莉蓮·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 1992）的話來說，我們似乎已經抵達了「超越自然」（after nature）的時刻。

女性主義的「文化」轉向或解構轉向，成就在於將具體性和特殊性的論證，置於新興比較研究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們有正當理由可以宣稱，地理學問題現在位居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核心。不僅其他地理學者（例見 Katz and Smith, 1993）提出了這項宣稱，其他學科的學者（例如參見英語教授柯比〔Kirby, 1996〕所寫的書）也這麼主張；他們強調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有關地方、有關提出宣稱者的區位和位置（positionality），還有如何傾聽和詮釋那些我們太常忽視的邊緣人聲音（McDowell, 1992a, 1992b）。不過，尾隨新興主體理論，以及穩固認同的解構而來的，是對於獨特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與政治前景的新焦慮。如果穩定的「女性」範疇不再，那麼我們怎能代表她提出主張呢？

「許多女性主義者思考過這個兩難困境的含意（Fox-Genovese, 1986; Grosz, 1994; Mascia-Lees et al., 1989; McDowell, 1991b）。在此，做為一種典型意見，艾爾考夫的看法是：如果『女人』不存在，而且依照女人名義提出的要求，只不過是強化了她們扮演的虛構神話，那麼我們還能以女人之名要求什麼。我們如何能夠要求合法墮胎、合宜的兒童照護，或是基於比較價值的薪資報酬時，卻不涉及『女人』的概念？」（1988: 420）。這些顯然是難題，但我覺得並非無法解決。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揭露並解釋區分人群，將他們安置於位居不平等關係的社會群體中的結構與過程。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在二十

世紀末，資本主義似乎成功推展到越來越多國家——人們被區分為擁有徹底不同的人生可能和機會的社會階級。同樣的，種族主義態度和種族歧視，使許多有色人種的生命飽受摧殘。我在這個導論裡主張，在其他各章也將更詳細指出的是，女人群體擁有的機會，比男人群體來得少。在許多社會中，女人經常得不到教育機會。大概在所有社會裡，女人都賺得比男人少，因此較少掌控財源。我一方面小心不要將女人建構為受害者，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她們蒙受支配與暴力的特定形式。在這些情況中，雖然不應該否認使女人彼此有別的那些差異——例如，階級和族群差異，以及世界不同地區的地方差異——但是，女人以女人的立場來發言，並且宣告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願景，還是很重要。誠如傅瑞澤（Nancy Fraser）的提議，「女性主義者既需解構，也要重構，既要顛覆意義，也得規劃烏托邦希望」（1991: 175）。

地理學與女性主義者

如我方才主張的，不均等的性別區分支配和界定了人群、知識和社會制度。無論男人之間有何差別，也不管近幾十年來女人地位的改變幅度（通常很大），男人群體依舊構成了當代社會權力基礎的多數。這種情況在學院和其他機構中皆然。雖然從 1970 年代起，到 1990 年代末的這幾年，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及人文地理學的重要時期，產生了有驚人的典範轉移，影響了學科性質，以及學科與「真實世界」發生關聯的方式，但大部分還是由男人擔任系主任和重要委員會主席。教學和專業研究方面女性比例的增加，還比不上逐漸增加的大學女生比例（在我的系上，女

生已經占大多數)，雖然英國地理學系的初階職位中，女性人數逐漸增加。但是在資深層級，就罕見女性蹤影——在英國，只有四個學系是由女人當系主任——這個層級的地理學議程仍舊由男人設定，對於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之地理區別的問題，不像許多女性地理學者那樣關切，感興趣的男性地理學者很少（有一些，但太少了）。當然，並非所有女人都關心性別問題，而且如果這麼假設就錯了，就像認為性別議題是「女人的」議題也不對。但是，從先前幾頁的內容，我們很清楚知道，男人也是有性別的。

至少在英語世界裡，地理學內部女性主義組織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1970 年代的某個時候。而且一開始就有雙重焦點，一方面要揭露性別化的地理形勢，另一方面要發揮實行可能的另類出路的功能。因此，1979 年英國的專業學會，即英國地理學家學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現在與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合併）成立研究團隊時，其雙重目的包括了，性別的理論研究，以及致力提昇學術機構裡的女性地位。當時更廣泛的政治承諾，可能嚇壞了地理學的建制——也由於我們自己認出這種承諾的烏托邦主義，而使其受到抑制。無論如何，整個 1980 年代，由於對於女性之間的差異和隔閡有與日俱增的認識，國際性姊妹情誼的理想主義觀念，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尤其是階級、族群特性、年齡、性傾向的分歧，使得我們不可能代表所有女性地理學者發言，遑論代表整體女性。

不過，政治計畫的承諾還是核心目標。美國與加拿大大學地理學者組織的女性主義團體，也針對學院中的女性地位，發表了明確聲明，而且持續好幾年蒐集統計資料，以便掌控婦女運動移轉到制度障地的情況（McDowell and Peake, 1990; Momsen, 1980; G. Rose, 1993）。現在，有少數自認為女性主義者的女人位居要

27 職，比如說在英國、加拿大、美國和澳洲擔任地理系主任職位，雖然人數還是很少。誠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至少在英國，雖然大學層次的學科逐漸是由女性主導，但是到了研究所階段，男人在數量上還是比女人多出一倍。有人認為，我們學科的結構與實踐，有某種特殊的陽剛性質：或許這源於地理學的形象，就像柯斯葛洛夫（Cosgrove）在另一個脈絡裡所稱的「一種有毛茸茸胸膛的學科」（Cosgrove, 1993）。地理學在發展歷程裡，致力於脫離身體的理性知識的啓蒙理想（參見 G. Rose, 1993），在這方面，地理學當然在科學和社會科學中並不孤單，雖然在地理學和人類學共有的與探險及帝國（Driver, 1992, 亦見 Stoddart, 1986，以及 Livingstone, 1992 有關地理學起源的討論）的關聯裡，或許特別能吸引男人。

1970 年代晚期以降，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對地理學造成的衝擊，有顯著的增長——為免前文有關男性支配的簡短陳述過於悲觀，我該強調這項成長發展迅速。許多學系的新課程，一份新期刊《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以及現行期刊（可以看一下像是《社會與空間》〔*Society and Space*〕的改變）裡越來越多的論文、新書（Gregson and Lowe, 1994; Hanson and Pratt, 1995; Massey, 1994; G. Rose, 1993）、讀本（McDowell and Sharp, 1997）和文集（Jones III et al., 1997;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 1997）；現在還有越來越多《女性與地方國際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Women and Place*）的系列叢書處理女性主義地理學的學術研究（這系列叢書的總編輯是摩姆森〔Janice Momsen〕和孟科〔Janet Monk〕）。不同國家的專業學會裡，不同的女性主義核心小組成員，尤其是比較年輕的女性，成長也十分迅速。然而，就其基礎而論，至少在英國，那

些於 1960 年代期間是青少年，或進入高等教育體制的女人，似乎在早年特別有影響力。當然，如果考慮 1960 年代婦女運動的崛起，與其他基進政治抗爭和運動的結合，這種情形就不令人意外了。1960 年代晚期，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反戰和學生運動，全都很重要。

在分散各處的某些地方，可以找到有關這些女人的生活，以及她們何以對女性主義地理學感興趣的一些概述。1993 年，我替《高等地理教育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訪問過蘇珊·韓森 (Susan Hanson) (McDowell, 1994a)，韓森與孟柯 (Janice Monk) 是最早刊登於美國期刊的一篇女性主義論文的合作者 (Hanson and Monk, 1982)，她們都在一本美國導向的新文選《女性主義地理學關卡》(*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Jones III et al., 1997) 的分輯裡，提出了介紹性文章，孟柯的導論特別涉及私人經驗。仔細考量她們的生活和地理學變遷的摘要，我開始思忖自己對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承諾。我得到一個結論，我大半輩子自認是個女性主義者，雖然在最初的二十年左右，我對此不假思索，但隨後好幾年，我的政治信念和學術工作並未同步產生。我成長於父母都「工作」、煮飯、打掃的家庭，是三姊妹之一。雖然我在學校裡最要好朋友的父母，對待她的方式迥異於對待她哥哥的方式，令我深感困惑，但是我當時並未充分認識到，我的成長背景是多麼特殊的例外。

28

安·奧克利 (Ann Oakley, 1985) 提到，對於許多在 1960 年代晚期和 1970 年代，捲入現在所謂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女性 (我也不例外) 而言，單一性別的手足，以及單一性別的中學教育十分重要。確實，我在單一性別中學教育後，就讀紐罕 (Newnham) 三年，那是一所位於劍橋的女子學院，雖然教職員

當中沒有女性，但那裡的女性優勢卻消除了當時（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大學地理系非常陽剛的氣氛。直到我在倫敦成為研究生後，我才注意到並受到男性優勢的影響。那個時候，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裡有少數女學生，以及非常罕見的女教師。然而，幸好在我學術生涯任職的所有學系裡，我從未成為唯一的女性（雖然我頭三年在劍橋教書時，是僅有的兩名女教師之一），而且我於1979年起成為女性與地理研究群的一員後，也獲得它的支持。

這個團體近來出版了第二本有關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書籍（1997）。我參與了第一本（1984）的寫作，目前稀鬆平常的反身性書寫（self-reflexive writing），當時對地理學幾乎毫無影響。我們選擇在最早出版女性主義地理學聲明的團體中刻意保持匿名，我得趕緊補充指出，這不是因為我們想置身不讓建制發現，而是因為我們希望堅持集體聲音，而非宣稱我們的權威。第二批女性主義學者——跟第一批人馬有些重疊——也選擇了這種集體策略，但我認為她們也很明智地清楚表明了自我。在她們的書《女性主義地理學：探索多樣性與差異》（*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當然，這個標題反映了我在本章概述過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中某些著重點的變化）中，稱為「個人書寫」（Writing personally）的迷人章節裡，女性與地理研究群的十名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為她們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歷史提供了洞見。我希望你能讀到這些篇章。甚至，我希望你能結合《女性主義地理學》和《女性主義地理學關卡》（Jones III et al., 1997），來閱讀眼前這本書（我自己對於認識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貢獻）。這三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不少差異點，儘管它們都鎖定相同的讀者群：你們裡頭開始以地理學家為職志的人，

以及我希望有許多僅是對女性主義地理學可能是什麼，感到好奇的其他人。

本書也是吉莉恩·蘿絲（Gillian Rose）的《女性主義與地理學》（*Feminism and Geography*, 1993）的姊妹作。吉莉恩主要是關心地理學知識的理論狀況，及其性別化的方式，我在這裡的焦點則多半放在性別關係裡的社會和文化變遷，雖然這種區別當然不能像表面那樣區隔開來。我們都認為，我們學術研究的一項主要關切，乃是透過女性主義觀看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來思考。我在這裡考察的議題和發展的取向，也反映並補充了《空間、地方與性別》（*Space, Place and Gender*, 1994）的重點，這是朵琳·瑪西在幾近二十年裡撰寫的論文集，顯露出她對於性別關係抱持變化多端興趣和研究取向的迷人路徑。過去十幾年來，我享有跟朵琳共事的特權，更確切的說，我是她論文集裡某篇論文的合作者。所以，我倆也有私人情誼。最後，我最近和夏普合作出版了一部女性主義文選《空間，性別，知識》（*McDowell and Sharp*, 1997）。這部文選的目的是向大學生讀者介紹，地理學家及其他學者針對空間、地方和認同所做的某些「經典」研究，此外，我希望你也會覺得它是一本有用的入門書。

這些新近書籍清楚顯示了外面有群求知若渴的讀者，想知道是什麼構成了不同地方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以及在千禧年末，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如何改變，或者可能被改變的方式。

全書架構：立基的地方、流動與尺度

我在後面章節將探討二十世紀末，女人和男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與特殊地方產生聯繫感受的變化幅度。誠如我在前文提

30 過的，經常有人認為移動性（mobility）漸增的結果，是女人和男人在一生當中，身為相對穩定、以地方為基礎的社區和網絡成員的程度降低了。雖然我們無法否認（人員和金錢流動的）移動性，但是和瑪西一樣，我認為地方（地方依附）還是很重要。大部分時候，我們很多人過著受到空間限制、地理約束的生活，置身家中、鄰里、城市、工作場所，而這一切都位於國族國家中。當然，這所有位址或地方，都是透過成套複雜、交錯的社會關係而建構，這些社會關係在不同層次運作，受到越來越複雜且多變的信念和態度、意象和象徵影響。電視、錄影帶、網際網路，讓越來越多人（但主要仍侷限於世界「北方」富裕的都市居民）接觸到幾乎無窮無盡、各色各樣的文本和影像，涉及一切想得到的議題。即使如此，這些素材也是由不同類型社群（有些是空間上固定，而且有地域限制）的成員接收和處理的，這些人在社群裡，乃是依照諸如階級、種族、年齡和性別等社會特性來區隔。

這些社群本身可能是「真實的」，意思是成員彼此認識，而且經常有面對面互動。所以，在家裡、當地街道和工作場合，我們經常認識許多其他人，他們的地域「所在」和我們的重疊。在其他情況裡，社群是「被想像的」，亦即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所指的國族國家成員的想像社群。我們歸屬於同一個「地方」，但我們彼此是陌生人：我們共同歸屬的「社群」是透過神話和想像、習俗和儀式而建構的，這些都強化了我們身為比如說英國人或法國人、肯亞人或日本人的感受。在後面的章節裡，我想檢視構成我們身為男人或女人感受的各種地方。我要指出，人和地方都是性別化的，所以，社會與空間的關係是相互建構的。

章節的安排大致上是按照逐漸擴大的空間尺度順序，首先考察最地方性的關係。我辨認出各種位址和地方，性別關係在其中有所差別地建構而成，同時影響和反映了這些位址的性質，以及為人接受的男女言行舉止的共同期待。誠如我解釋過的，我將地方概念化為由橫跨不同空間尺度的整套關係構成；但為了分析這些相互連結，必須有個地方或地域焦點。換言之，地方觸及了地表，是在空間上定位的模式與行為。同時，要記得我也指出，除了社會裡最富裕的成員以外，日常生活其實就是地方事務。然而，要理解這些地方上的地域關係，例如智利移民在格拉斯哥（Glasgow）重建他們的「家園」感受，或者倫敦的塔米爾（Tamil）難民，結合了「那裡」和「這裡」的文化與習慣，創造出新的地方感，需要的不僅是「地方」分析，而且要拆解橫跨時空的關係和空間實踐。地方就是在這些網絡節點（node）上，透過與這些網絡相連的文化意義而建構的。

不過，這種概念化對書記（scrivener）可說是深具挑戰。馬庫斯也認識到，如果要再現這些相互連結，就需要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他問道：

31

如果民族誌描述可以不再受限於特定情境下的場所或社群，也就是文化過程自我顯露的地方，而且可以在民族誌現場就掌握到民族誌描述的話，那又怎樣？要如何描述發生於跨文化空間、同時位居不同場所、位於平行、分隔但同時並存的世界裡的文化過程？（1994: 40）

他提出採取蒙太奇（montage）技巧，以便脫離線性寫實主義模式的可能性。不過，我的野心沒那麼大，在後面章節我採取

的是傳統寫作方式。也許，蒙太奇比較適合再現原初的田野工作，而不適合我在這裡面對的評論者任務。傳統的敘事結構似乎比較適切。不過，在某種意義上，隨著主題和作者的位置或認同日漸成爲分析目光的焦點，蒙太奇，或至少是同時性（*simultaneity*），在地理學研究裡也日益豁顯。當然，瀏覽許多期刊就會發現，晚近地理學家在他們出版的著述裡，除了文本，也越來越仰賴視覺素材。

我將材料分成幾個章節，主要將重點放在特殊的場域和場所，例如，區別購物中心和工作場所，街道和家園，熟悉的地方鄰里與城市街道和公共空間這類較具匿名性的場域。或許有人認爲，有些區分是人爲的，確實如此。因爲做爲不同空間尺度上，具有領域界線之空間的地方，也是個社會建構。和性別觀念一樣，有關地方、邊界和成員身分的想法，都是社會的建構。我在這裡選擇這些特殊位址和地方來討論，是因爲它們對於當代（主要是）工業社會裡，性別和性別化行爲與意象的另類建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區位。對於年輕或年長的男女，對於異性戀或同性戀者來說，不同空間具有特殊的意涵和不同的權力關係，這些都會與時俱變。例如，就有小孩的婦女而論，家可能既是安全的所在，又是個陷阱；對於工作了一天的受薪勞動者，家可能是渴望已久的避風港，或是必須反覆協商複雜的年齡與性別關係的地方。都市街道和公園，對於某些人而言是解放與探索行爲的空間，但對其他人來說，卻是難以接近、或是恐懼與危險的地方。

如我將說明的，這些區分，尤其是公共與私人之分，長久以來都與性別區分有關，每種區分都被假定爲某種生理性別的「自然」的領域。過去二十年左右，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拆解這些區分，指出它們並非天生自然。我也會在後文

挑戰這些自然化的假設，並且說明不同社會活動領域之間的關連。但我也會指出，這些區分仍然很重要，除了體現於性別二分的構成裡，也表現在許多社會的法律與制度結構中。這些區分依然是分割我們學科主題的重要方式：譬如，區分經濟地理和社會地理，都市地理和零售地理。然而，雖然我的章節架構看似與這種劃分雷同，但我在這裡會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關連。畢竟，在一本地理學著作中，涵蓋這所有主題一併探討，並不常見。

在這裡，我嘗試將做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組理論轉變，以及一項分析題材的性別關係與女性主義交織起來。然而，主要重點在於後者。我的目標是，透過引用各種廣泛資料來源的詳細經驗實例和個案研究，來闡明理論的轉變。我在相關地方援引我自己的研究，但是我也嘗試引介地理學門邊界內外的許多其他著作。我羅列了大量對其他著作的參照，面對日益增加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裡，有關性別分化的文獻，希望這個簡短導論能夠充當引發進一步探索的激勵和資料來源。我希望你覺得後面的章節既有趣，又深具啟發性，能引導你進一步探討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

延伸閱讀

在地理學和其他學門裡，有許多很好的女性主義理論和研究入門書。我在本文裡引用了這些書，但在這裡我應該再提及一、兩本。在《地理學與性別》(*Geography and Gender,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女性主義與地理學》(*Feminism and Geography, G. Rose, 1993*)，*《女性主義地理學》*(*Feminist Geographies,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女性主義地理學關卡》*(*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Jones III et*

al., 1997), 以及《空間, 性別, 知識》(*Space, Gender, Knowledge*, McDowell and Sharp, 1997) 裡, 訴說了地理學的故事。我也在《人文地理學進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McDowell, 1992a, 1992b) 的兩篇文章裡, 提出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研究紀要。然而, 這所有書籍和文章有個主導性的英國中心偏重。在其他社會裡, 有些針對女性主義地理學學術研究發展的評論。例如, 布萊登與錢特 (Lynn Brydon and Sylvia Chant, 1989)、孟柯 (Janice Monk, 1994)、摩姆森 (Janet Momsen, 1991)、摩姆森與湯森 (Janet Townsend, 1987) 合著, 以及之後與金耐爾 (Vivian Kinnaird, 1993) 合著的書, 已開始訴說地理學故事, 但細部尚待填寫。《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期刊鼓勵在西方以外機構工作的女性主義者發表著作, 國際地理學協會的性別委員會發行有用的通訊, 包括了國際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社群所撰新書與論文的清單。《人文地理學進展》也收錄對近來出版的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的傑出年度調查。

若要參閱更一般性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觀點, 你可以察看於洛維爾 (Terry Lovell) 的讀本《英國女性主義思想》(*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1990), 古鈕 (Sneja Gunew) 的《女性主義知識: 批評與建構》(*Feminist Knowledge: Critique and Construct*, 1990) 和《女性主義知識讀本》(*A Reader in Feminist Knowledge*, Gunew, 1991), 莫札 (Heidi Safia Mirza) 的《黑人英國女性主義》(*Black British Feminism*, 1997) 或伊凡思 (Mary Evans) 近來所撰的優秀教科書《當代女性主義思想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1997), 後者具備簡潔的優點。有兩篇很出色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評論, 畢竟女性主義人類學很接近女性主義地理學, 可以查閱摩爾 (Henrietta Moore, 1988) 寫的

《女性主義與人類學》(*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以及李奧納多 (Maria De Leonardo, 1991) 的《知識叉路上的性別》(*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最後，要取得術語奧援，有一本由安德爾等人 (Sonya Andermahr et al., 1997) 編輯，很有用的《女性主義理論詞彙》(*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你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應該一併參考《女性主義地理學詞彙》(*A Glossary of Feminist Geography*, McDowell and Sharp, 1999) 這本專業指南。

2 安適其位與不得其所：身體和體現

IN AND OUT OF PLACE: BODIES AND EMBODIMENT

導論

34

我在前一章指出，整理吸引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注意的多樣問題和議題的有用方式，是聚焦於不同類型的「地方」，藉由建構地方邊界的權力關係運作，來區分各個地方。我要從最直接的地方開始：那就是身體。雖然地理學家可能不太容易將身體設想成地方，但身體確實是個地方。如果你願意的話，身體是個人的地方、區位或位址，一個身體和另一個身體之間，多少有些不能滲透的界線。雖然身體毋庸置疑是物質性的，具有諸如形體大小等各種特質，因而必然占用空間，但身體呈顯在他人面前，以及為他人所見的方式，則依人們察覺自己置身的空間和地方而有所不同。例如，在俱樂部裡，你可能會發覺你的姿態、身體飾物，還有占據空間的自由，都與你星期一早晨出現在課堂上的時候，大異其趣。本章的重點就在於這些彈性特質、外觀呈現和空間占有。並且指出，與常識和第一印象相反，我們的身體比一般認為的更加流動且富彈性。因為這種易變特性與地方及位置有關，所以，我們在本章初次遭遇的許多議題，會在其他地方重述；工作中的身體會在第五章重逢，第六章則再度面對譬如有關假日、海灘的議題。但是在這一章，我是為了奠定體現¹地理學（embodied geographies）的理解基礎，才提出這些問題。

35

本章分為五個部分。在此，會介紹我認為過去幾年內，女性主義學者所做最激勵人心的某些研究。近來有關身體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有十分卓越的成果，不僅挑戰許多有關我們身體性質

譯註 1：embodiment 一詞譯為「體現」，乃取其以身體做為存在之展現，或是透過身體而現身存在的意思，也蘊含了本書作者視體現為牽涉變動之操演過程的含意。

想當然爾的觀念，也迫使女性主義者和其他學者反思有關生物學、身體的想法，並重新考慮性和性別的區分：女性主義者正是透過這項關鍵區分，首次處理了有關有性別的身體（sexed body）的問題。

我們馬上就會遇到這個問題。我在這五節的每一節裡，專注探討的議題和問題如下。首先，當前社會科學家何以認為身體問題格外重要？其次，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對於身體如何占用空間知道些什麼，又能從中發現什麼？第三，我要檢視身體如何被理解為某種天生自然之物，而且是可以與心靈（mind）區別開來的東西。我將論證，將女人建構成迥異於且不如男人時，心／身二分法是一項關鍵因素。在這一節，也會指出，大小、形體與諸如此類的身體差異，是社會歧視與不利條件的基礎，並且就社會正義的觀念來評估身體差異的含意。第四，轉而重新思考和質疑心／身的區別，提出有關身體如何連繫上性別，以及身體和性別的可能關係有多麼變化多端的問題。身體為何很要緊？身體是社會的腳本和操演嗎？如何理論化這些問題？還有最後，一如在本書所有的章節，我會介紹一些有關這類主題的地理研究。

有關身體的問題，不常（或不直接）被視為地理研究的一部份。傳統上，這個學科專注於公共領域而排除私人領域，將身體以其屬性和操演及其性慾特質，被斷然視為完全是個人私事。不過，正如我在這裡要指出的，在最近說明身體如何透過各種空間尺度上的公共論述與實踐而建構的女性主義研究中，這種假設已經遭到質疑和反思。身體研究也改變了我們對空間的理解，因為越來越清楚的是，空間區隔（無論是家庭或工作場所、城市或國族國家的層次）不但被身體化的實踐和活生生的社會關係影響，也反映其中。由於有關身體的新研究急速擴展，理論上也十分繁

複且具挑戰性，我在這裡只提供比基本入門稍多一些的討論。文末的延伸閱讀應該有助於你更仔細探討這類研究。

為何過去幾年的身體研究蓬勃發展？

36

誠如許多優秀的女性主義思想導論清楚指出，日常生活空間上區分為所謂的公共場域和私人領域。前者主要涉及男人，後者則與女人有關，在女性主義數十年來的討論裡，是一項核心主題（例見 Jones III et al., 1997; Lovell, 1990; Pateman and Grosz, 1987; Phillips, 1987; Massey, 1994; McDowell, 1992a; G. Rose, 1993;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 1997）。不過，在這些探討裡，身體往往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確實，對於身體的肉體屬性及其情感與慾望的忽略，部分是因為對女性主義理論家而言，思考由身體引發，有關女男身體差異意義的棘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燙手山芋。但是近幾年來，出版了大量有關身體研究的社會科學文獻（往往把重點放在性別差異上）（Bulter, 1993; Bordo, 1993; Diprose and Ferrell, 1991; Falk, 1994; Featherstone et al., 1991; Grosz, 1994; Jacobus et al., 1990; Jagger and Bordo, 1989; Martin, 1987; Synnott, 1993; Tseelon, 1995; Turner, 1996; Young, 1990a, 1990b）。情況似乎是，在邁向二十世紀末的同時，身體不但是整個社會監督和管理的對象，還成為橫跨社會科學的主要理論關注。

大多數人認為，身體不僅是關鍵的社會議題，而且無疑是個人關切的核心對象。到了二十世紀末，在對待身體的一般態度

上，迷戀和恐懼似乎謀取了支配的位置。因此，對身體的崇拜（在運動、飲食和外科手術介入方面）及頌揚，與蹂躪身體的二十世紀併發症愛滋病的發展同時並存。正如對這種疾病的恐懼清楚顯示的，身體與性慾特質及性行為有了緊密的關連。在八卦小報上，這種關連也連結上縱慾、「性變態」或異常的觀念。因此，有關身體、身體的形式、意義及實踐的問題，與涉及主體性和認同的複雜議題相關，也跟社會實踐有關，經常被界定為既深刻屬於個人，又是公共評論的主題。在此我要表明，身體和性慾實踐是社會建構且可變的，牽涉何者是 / 不是「自然」或「正常」的不斷變動假設。換言之，身體和性慾實踐有其歷史與地理。

身體在最近社會理論中占據的核心位置，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先進工業國家於二十世紀晚期發生的深刻物質改變的結果。急遽的經濟變遷改變了工作和休閒的性質，將身體置於個人和社會的關切核心。它同時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及個人快樂和痛苦的來源。如透納（Bryan Turner）所論，

37

強調快樂、慾望、差異和嬉戲的當代消費主義特徵，是一些相關的過程，即後工業主義、後福特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引起的文化環境的一環。隨著基督教禁慾正統的腐蝕，以及大眾消費主義的蔓延，資產階級工業資本主義的道德機制，及其對性享樂的宗教與倫理譴責，絕大部分已經不復存在（1996: 2）。

我曾在別處指出，從製造業轉向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已經將具體工人從體力轉變為交換產品的一部分（McDowell, 1997a）。服務業特定的身體操演，成為交換過程的一部分，並且，如透納敏銳的評論：「勞動的身體變成了令人渴望的身體」（1996: 2）。

休閒活動方面，身體也移向了核心位置。晚期資本主義理想化的、發出渴求和令人渴望的身體，必須加以鍛造，以便在經歷了健美身體崇拜勝利的年代中，創造一種優美而可以接受的操演。瘦削和健康是男人和女人的首要慾望，不只透過運動，也藉由健康照顧和飲食實踐（儘管近來在英國有對於像是紅肉的恐慌）的普遍改善來達到目的。藉由外科手術的進展，人們可以修整、收攏、重塑並割除他們身體討厭的外觀，從而實現渴望的體形。於是，在這些意義上，越來越多人認為，身體已經變成更為可塑且可變的物體。當今可能的最極端改變，或許是性別的重新指派，改變性別化認同和軀體之間的關連。甚至，某些評論家將身體視為後現代性的最後邊境，是實現差異最具挑戰性的場域。

二十世紀晚期，關於身體的議題，標示了一段漫長時期的結束，在這段期間內，身體、性慾特質、生殖力、資產和所有權以特殊方式相互連結。在封建時期與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由於繼承在財富和私有財產移轉上的角色，涉及女人貞潔和忠誠的傳統性道德觀變得非常重要。更確切的說，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壓迫女性的起源，正是在男性控制女性身體的工業資本主義中形成的（參見伊凡斯與瑞德克里夫〔Evans and Redclift, 1987〕以及科沃德〔Coward, 1983〕對於恩格斯論點的傑出摘要和評論）。二十世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包括可靠的避孕法、離婚立法、女人大舉加入受薪勞動而取得更大的經濟獨立、服務業、大眾消費和廣告的崛起，全都改變了生活方式，以及對待一夫一妻制和男女關係的態度。甚至，有人主張在某些地方，對於幸福、享樂主義和慾望的追求，已經取代了忠誠；但有些人不認為這種取代是完全正面的。

這些改變如此重大，以致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2）指出，其結果是「親密關係的轉變」。如紀登斯所指認的，這些改變對許多女性有幫助，使女性免於懷孕的恐懼，並且解脫男性對其生殖的控制（雖然不孕醫療仍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紀登斯認為，現在男女之間的社會契約有可能出現嶄新形式，以情感表達和身體親密關係為基礎，創造不同的性慾概念，紀登斯稱之為「可塑性慾」（plastic sexuality），新男女關係的基礎在於協商，而非強加的權力和鬥爭。但是，對某些女人和許多男人而言，這些改變的效果並非積極正面。擔心女人日益壯大的經濟與情感獨立的男人，似乎越來越訴諸對女性暴力相向，而且有許多女人由於協商（和強制）的一連串關係，導致獨自生活一段期間而受苦。這些論點都很有意思，但紀登斯在書裡只提供發人深省的事例，而沒有針對變化程度，以及諸如社會階級、年齡群體或國家區域之間的變異，提出有經驗證據的周密評價。他也忽略所得分配頂層和底層之間漸增的經濟懸殊差距。對許多女性而言，伴隨關係終止而來的，依然是身陷貧困。然而，毋庸置疑的，身體和性慾特質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在當代工業社會文化中占有關鍵性的支配地位。

這些物質改變伴隨「後現代」時期發生的理論轉移。二十世紀晚期，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在反思並重新理論化身體上，尤其影響力，儘管其他理論家，從十九世紀末的佛洛伊德，到當代的法國後結構主義者，也將性別化身體的分析置於他們著作的核心。這類著作的關鍵成分，是解構啓蒙思想所確立的身心對立的核心地位。如麥克耐（Lois McNay）提到的：

主要關切是要藉由說明構成主體基礎的理性與自我反思觀念，如何奠基於對身體領域，以及身體透過類比所代表的一切——慾望、物質性和需求等——的排除和壓制，從而拆解穩定與統一主體的概念。於是，身體範疇在用來對抗人文主義文化對理念的偏重上，有其戰略價值（1992: 13）。

此外，如我在前一章指出的，身體已成為女性主義理論化和再理論化的重要位址，因為規避體現（embodiment）重要性的老方法——在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有用的女性主義區分——在面臨這些思考自我的新方式時，也須加以解構（Gatens, 1991）。

定義

開始檢視身體與空間問題之前，釐清本章使用的一些術語，或許會有所幫助。儘管許多作者傾向於交替使用身體和體現這兩個術語，但我認為，後者更有用處，因為它掌握了流動性、變化過程和操演的意義。而操演在近來質疑人體與社會認同之間關係的理論取向裡，是個關鍵要素。在本研究中，如我們在後文會發現，身體不是理所當然被視為固定的實體，反而是具備可塑性或順應性。也就是說，身體可以在不同時刻採取不同形式和模樣，因而也有其地理形勢。

雖然我不會只探討性慾特質（Sexuality）（我也會討論比如說有關體重和健康的身體問題），但定義性慾特質這個術語也很重要。性慾特質是由一整套性慾望、性認同和性社會實踐所組成，受到認可或規範特定性慾活動的信念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如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所述，性慾特質與「身體及其快感」有關。現今廣泛承認，性慾特質是有關習俗

和實踐的事情，就如同它是「自然」本能一般。甚至有人指出，在性行為過程當中，人類最重要的器官是介於兩耳之間（譯按，指大腦）。由於這些行為和實踐是在社會和歷史上界定的，它們發生於一整組權力關係之中，而在異性戀活動裡，這組權力關係中，最尋常的就是男人定義並控制女人的性慾特質。但是，這並非否認同性關係內部的權力關係，也不是忽略在某些情況下，個別女人對男人行使權力的方式。堅持這種性慾特質的定義會很有用，因為正如近來有關工作場所性別歧視的研究，援引女性主義的論證指出，組織不但建構某些（通常是但不僅是女人的）身體主要是性慾化的，所以不適合工作，而且組織本身也滲透著慾望和快感的屬性。讓我們轉而討論某些有關身體安適其位（in place）或不得其所（out of place）的議題。

40

空間中的身體——身體是個地方

在第二節裡，我要集中討論我們或可稱為西方身體的議題，關注寓居於當代西方工業社會的人群。當然，不同社會對身體的理解和態度大相逕庭，本章結束以前會仔細考察這些差異。讓我們以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的一段文字來展開這一節。下文摘自我在第一章所提，史密斯討論尺度的論文。這是他描述身體是個尺度的方式（記住，他定義尺度為不同種類地方之間的邊界）：

個人認同的主要物理位址，即身體的尺度，乃是社會的建構。身體的地方標誌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邊界，兼有社會和物理上的意義，而且除了照字面界定的生理空間外，還涉及「個人空間」（personal space）的建構。根據朱蒂絲·巴特勒所言，身體也是

一種「性別意義的文化所在」……。事實上，西蒙波娃主張，男性氣概文化認為女人等同於身體領域，卻替男人保留脫離具體、非肉體認同的特權。很顯然地，不僅性別，還有社會差異的其他形式，都圍繞著身體認同而建構。楊恩（Young）特別指出，「身體的量度」（scaling of bodies），如其所述，除了挪用性之外，還挪用各種肉體差異（最明顯的種族，還有年齡和能力），做為社會壓迫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假定基礎（Smith, 1993: 102）。

所以，史密斯指出，空間中的身體引發有關身體占據空間與地方的各種問題。我首先要探討空間區位這個面向。請注意史密斯提及的三位女性主義理論家——巴特勒、西蒙波娃和楊恩（Iris Marion Young）。我會在這一節和往後的章節裡，介紹她們的思想。不過，身體首先是定位於空間之中。人因工程學（ergonomics）——這或許是專門考慮空間中身體的唯一學科——不僅考慮家具和機械裝置的設計與形狀，如何適合「標準」（或甚至是非標準）人體的問題，也探討身體如何配合某個空間的問題。這部分的主題已被稱為人際距離學（proxemics），反映了它的重點是公共或半公共空間中，陌生人之間的鄰近性的問題。它包含公共運輸中的「擠塞」因素調查（例如倫敦與東京的地鐵系統，有個「擁塞因素」加進了多少乘客能夠在尖峰時間擠進列車廂的計算式中），人們如何在公共空間挑選或站或坐的地方，像是圖書館，或是公共運輸系統上，甚至是電影院隊伍占據的空間（顯然等著進電影院觀賞色情片的人，比起其他電影類型的觀眾，彼此會站得靠近些）。社會科學家（尤其是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空間中的身體也有興趣，但他們的重點放在比較一般的階級和地位、族裔和性慾特質，以及群體接受與排除等議題上，而不是關注人群和擁塞因素的實務議題。

身體習性

法國人類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在發展對於身體及其在空間中實質定位的社會意義的理解上，非常重要。他研究經由身體姿勢、姿態、臉部表情和說話聲音而運作的階級區別，將這些影響效果概括於他的「身體習性」（*hexis*）概念中。這個術語指涉了社會世界及其身體銘刻之間的關係。因此，身體習性包括了個人和群體承載其身體、向他人展現身體、替身體挪移或爭取空間的不同方式。布迪厄認為，「社會區別和實踐鑲嵌於最無意識的姿勢中，或在顯然最不重要的身體技術，像是走路或擤鼻子，吃飯和說話的方式裡」（1984: 466）。他認為：

一個人與社會世界及置身其中的適當地方的關係，再沒有比某人覺得有資格從別人那裡取得的空間和時間，更能夠清楚表現的了；更精確地說，是表現於某人利用物理空間中的身體，透過有自信或含蓄、擴展或拘限的（「出場現身」或「無足輕重」）舉止姿態，而宣稱其權利的空間（1984: 474）。

就如大多數女人所知，尤其如果她們最近曾經搭飛機旅行，坐經濟艙，緊鄰幾乎是任何一位男人身旁而坐，這些男人似乎覺得他們比女人有權占用更多可用空間。用布迪厄的術語來說，男人在空間中出場現身，女人卻無足輕重。

布迪厄也指出，身體可以理論化為一種記憶，是無法透過有意識的思考或行動輕易抹除的記憶。他認為：

把身體當做「記憶慢跑者」的社會化邏輯，沒有比那些只須像戲服一般迅速穿上的姿態、姿勢和話語（單純的感歎詞或偏愛的陳腔濫調）綜合體更好的意象了，藉由身體報應的召喚力量，喚醒

一個備便了感覺和經驗的世界。身體體操的基本動作，尤其是在性的、生物學上預先構成的面向，負載社會意義和價值，擔任最基本的隱喻，能夠喚起與世界的整體關係，並藉此召喚整個世界（1984: 474）。

在這個段落裡，我們發現布迪厄將性別化的身體理解為「自然的」，一種「生物學上預先構成的」客體，這正是有關身體的女性主義者，以及後來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家致力要解構的論點。不過，在轉向這些理論家的論點以前，我們繼續追問有關身體、身體姿態、話語、身體的服裝、頭髮和裝飾，以及身體占用空間的問題，將重點從布迪厄強調的階級，轉移到性別差異。

身體政治

身體風格、姿態和呈現的問題，以及這一切被建構和強加的方式，長久以來一直是女性主義政治的關切。連繫上第二波女性主義理論化的婦女解放運動，出現於 1960 年代晚期的歐美各國，同時還有環繞著反戰、反種族歧視、反消費者，以及勞工運動的學生行動主義，這些運動有某些共同議題和策略。從 1960 年代運動初始，女人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包括墮胎和避孕，就是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許多讀者或許很難想像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早期的英國氣氛，當時未婚女性不易取得避孕建議（我記得，1960 年代晚期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爲了獲得《週日時報》（*Sunday Times*）的刊物「與口服避孕藥共處」〔*Living with the Pill*〕而去函索取，期望這份刊物會放在不起眼的褐色信封裡寄來），1967 年以前墮胎也尚未合法化。對於「女性不適」（*female complaints*）醫療化的挑戰，也是透過自助運動網絡而進

行，獲得波士頓婦女保健組織（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出版的手冊《我們自己的身體》（*Our Bodies Ourselves*）協助，這本手冊於 1976 年發行英國版，也得到許多市鎮裡健康婦女（Well Women）診所的發展支持。

女人的身體透過節食和化妝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常規化」（normalization），尤其是選美大會，也遭到直接挑戰。例如美國最早的行動之一，是 1968 年八月的「拒絕美國小姐」（No More Miss America）示威遊行。女性主義行動主義者兼作家朵爾金（Andrea Dworkin），早年熱情洋溢地書寫女人如何被建構為欺騙（artifice），以及她們的身體自由如何從幼年起就遭受控制。晚近，沃爾夫（Naomi Wolf, 1991）重提這些論點，雖然對「欺騙」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以下是引述朵爾金的文字：

43

美的標準以精準措詞描述了個人與自己身體的關係。這些標準描述她的動作、自發性、姿態、步伐、她可以擺佈身體的用途。它們精確界定了她身體自由的向度。當然，身體自由和心理發展、智能及創造潛力之間有連帶關係。

在我們的文化裡，女人身體沒有哪個部分未被觸及、沒有經過改造的……。從頭到腳，女人臉龐的每個特徵，身體每個部位，都遭到修改、變更。這種變更是持續且反覆的過程。這對經濟、對男女區分的主要實質、對於身為女人最直接的身心真實而言，都至關重要。從十一、二歲起，到她死亡為止，女人會花費大部分時間、金錢和精力在約束、拉扯、塗抹自己和去除臭味上頭。認為男性扮裝癖藉著使用化妝和穿著服裝，誇張地模仿他們想要變成女人，是個尋常但錯誤的想法，但是對於浪漫氣質的真實知識清楚顯示出，這些男人已經滲入了身為女人（一種浪漫化的建構物）的核心經驗（1974: 113-14）。

早年，身體快感也是一項政治議題，女人聲稱她們擁有性自由的權利，可靠避孕法的發明使性自由更有可能。然而，回顧起來，許多活躍於 1960 年代婦女運動的女性主義者認為，那個年代的「自由性愛」變調成爲許多男人所渴望的無承諾性愛 (Rowbotham, 1989; Greer, 1997)。不過，正是在這些年間，1950 年代和更早幾十年的性偽善飽受嚴正挑戰，更大的自由使女人得以探索各種身體形象和性慾。晚近幾十年來，女性主義者開始重申，時尚和欺騙不僅僅是女人身體的商品化，而且頌揚外貌、風格和健康。

應該將改變身體外形及安排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視爲選擇的議題，導致了意見分歧。例如波爾多 (Susan Bordo) 以爲之震驚的譴責姿態，引述美國女性主義期刊《海佩提亞》(*Hypatia*) 裡的一篇文章，該文替整容手術辯護，視其爲「首先……牽涉了自行掌握自己的生命」(Davis, 1991: 23, 引自 Bordo, 1993: 20，強調爲波爾多所加)。波爾多認爲這很不負責任，因爲矽膠隆乳的危險逐漸爲人知悉，更不用說再度提及，嘗試迎合特定階級和種族化女性美形象所蘊含的危險議題。

44

女人與自然——女人是自然

史密斯 (Smith, 1993) 的引述裡提到，西蒙波娃認爲，女人被視爲受限於身體，而男人相對於女人身體，是無肉體或抽象的心靈。我曾在前一章指出，將二元範疇映繪到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社會屬性上，是西方啓蒙思想的關鍵特徵。在其發展裡，女人特殊的生物屬性被當成不證自明，尤其是月經、分娩和哺乳，既是男女差異，也是女不如男的根源。因爲這些特徵被視爲天生

自然，女人很難逃脫她們的身體陷阱。甚至，由於男女身體的二元區分看似如此清晰而「自然」，使得身體對女性主義理論而言是個難題。女性主義理論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最初決定——前者顯然自然而不可改變，後者是社會建構，所以可能改變——產生了一個問題，羅柏森姆（Sheila Rowbotham）便認為：「由於女性主義者堅決忽視女人的生理構造真正存在，因此反女性主義者很容易拿女人的解剖構造來決定女人」（1973: 11）。即便是現在，對於身體的新認識破除了生理性別 / 社會性別的區分，焦慮依然存在。摩爾（Henrietta Moore）針對女性主義理論身體研究的回應，並不孤單：「我們的相似之處難道真的都奠基於我們的身體？我發覺僅僅是提出這個問題，就讓我深感厭惡，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要氣得咬牙切齒」（1994: 17）。

但問題依舊存在：體現的意義為何？身體是否至關重大？多大程度上，身體是男女之間權力和支配模式的基礎？人類學家已經指明，在許多社會和諸多不同時代裡，女男之間明顯的自然生物區分，已經映繪於價值或社會品質的差別上。由於女人有月經來潮，也因為她們生育後代的能力，女人被視為比較接近自然、無理性、汙染源、神聖但低劣。另一方面，男人則被認為是有教養、理性而優越的，是相對於女人身體的心靈，甚至是無形或無軀體的存在。「女人」和自然性質的關連如此普遍，使得自然和（或）地球經常在象徵上再現為女性。

45

莫荃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精采絕倫的書《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 1980）中，從各個不同社會的神話、傳說、藝術、科學文本和其他再現形式中，追溯了這種關係的歷史軌道。比如說，在美國霍皮族印地安人（Hopi Indian）的神話裡，大地被視為女性，要好好珍視以免遭強暴，正如十九和二十世紀

的英國田園詩中，鄉村是富饒的女性。利齒和尖爪染紅的大自然，具有威脅性的女人或女巫，這類相反意象也是自然和女人之間的常見連結。生態運動援用母親般大地的形象，則是晚近的事例。地理學家也不免有這種連結，在不假思索的時刻創作了書籍封面或插圖，所繪製的丘陵與山谷，或許可以解讀為女人裸體（例見波遜爾斯〔Porteous〕《心靈地景》〔*Landscapes of the Mind*, 1990〕的卷頭插畫）。針對女性氣質和大自然的這些刻板印象連結，有個挑戰性的顛覆，即攝影師貝里斯（Diane Baylis）將地景再現為男性身體（參見 Nash, 1996b）。因為男人身體難得成為都市藝術或塗鴉的主題，圖 2.1 的壁畫可說是格外醒目。

46 女人與自然的關連，或者自然再現為女性的做法是如此廣泛，促使人類學家歐特娜（Sherry Ortner）於 1974 年認為，自然與文化的區隔，及其分別與女人和男人的關連，或許是女男之間的跨文化或普遍差異的基礎。她認為，儘管女人和女性氣質有非常多樣的文化概念和象徵化，但女人的從屬地位似乎是普遍現象。為了尋找這種附屬地位的解釋，歐特娜主張，女人因而必須聯繫上每個文化裡遭受貶抑的東西。她認為只有「一事物吻合這種描述，那就是最廣義的『自然』」（Ortner, 1974: 72）。只要男人在象徵上等同於試圖支配並超越自然的文化，那麼女人由於她們與自然的緊密關連，也必須接受支配和控制。然而，重要的是要強調，歐特娜並非主張女人是「自然」或「自然的」，而是認為女人在各種社會裡在象徵上與自然連結在一起。雖然針對歐特娜的普遍假設，以及她視為理所當然的男女二元劃分，已有不少批評，但她的研究對於探討性別的社會建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方法。這也是歐特娜留意的重點所在，指出性別的社會建構非常多樣，是在文化上建構，並透過社會實踐來維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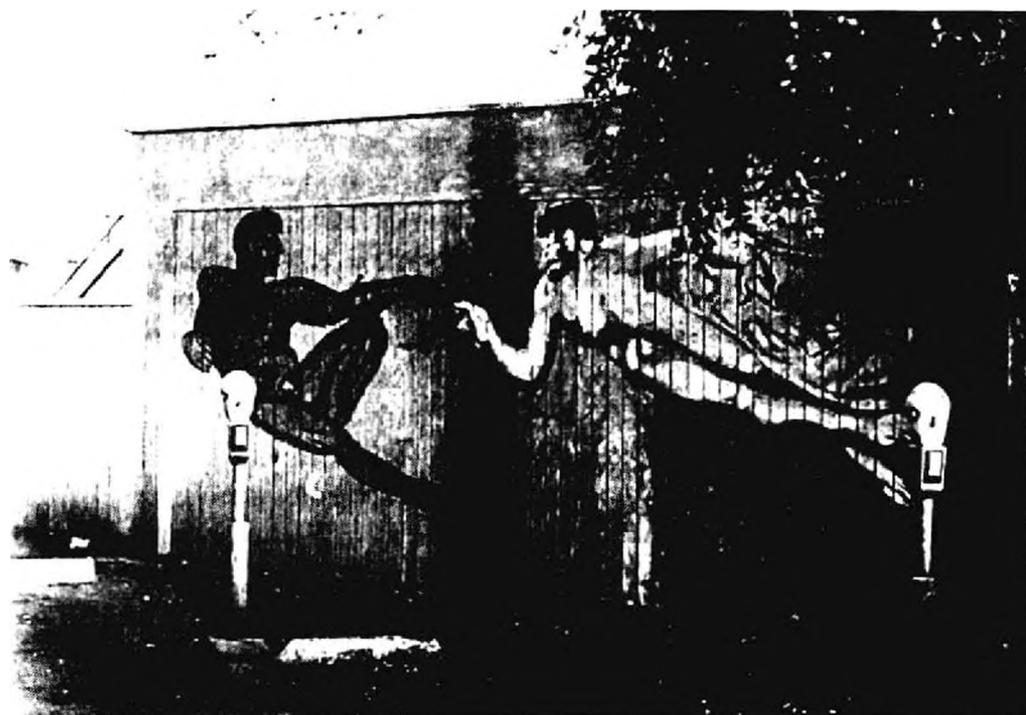


圖 2.1 都市藝術：描繪男性身體

不過，在往後的人類學研究裡，女男二元區分這種顯而易見的普遍性，受到了質疑。例如，哈瑞斯（Olivia Harris, 1980）發現，玻利維亞高地（Bolivian Highlands）印地安人把單身漢和自然連結起來，已婚夫婦則跟文化有關。十年後，梅格絲（Anna Meigs, 1990）根據她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島東部高地（Eastern Highlands of Papua New Guinea）的研究，主張那裡的個人不只根據解剖構造的生物性質，也按照他們身上具有的某種男性和女性實質的不同數量而分類，但後者可能會透過諸如飲食和非正式接觸活動而改變。事實上，雷克爾（Thomas Lacquer）認為，西方社會對於身體的「兩性」觀點，直到十九世紀才占居優勢。基於一項針對古希臘以降醫療文本的研究，他說明「單性」（one-sex）觀點其實很尋常。在〈體液與器官的類屬肉體經濟〉（generic corporeal economy of fluids and organs, Lacquer, 1990: 35-6）的概

述中，女男的區別只在於女人擁有的相同器官比較不發達。現代西方「兩性」身體觀的出現，是與現代社會裡的其他社會和文化變遷有關，尤其是有關自我的新興觀點，以及家庭和非家庭生活的漸增分別。

47

在西方，性與生殖器官的關聯，一般而言杜絕了男人被定義為女人的可能，反之亦然，除非是變性（*transsexualism*）這種特殊事例，以及情況不是如此的其他地方。所以，在某些非洲社會裡，某個擁有女性生殖器的人，能夠以在英國不可能的方式占有「丈夫」的社會位置（*Amadiume, 1987*）。在某些美洲印地安人間，也找到相反的事例。由於認同不但繫於肉體認同，也跟精神價值息息相關，可以視所以「男人」（擁有男性生殖器的人）為半男 / 半女（*Williams, 1986*）。

很多從事田野研究的女人類學家也注意到，她們的權威混淆了她們的性別歸屬（參見 *Okley and Callaway, 1992*）。例如，蓋沃茲（*Deborah Gewertz*）在研究川布里（*Tchambuli*）人的性別差異、體現和認同觀點期間，發現她參與男人聚會，意味她的研究對象認為她「或許一點也不是女人，而是在穿上褲子後，長了男性生殖器的怪異生物」（*Gewertz, 1984: 618*）。而且，如妮可森（*Linda Nicholson*）所指出，學院女人挑戰了女性體現和女性氣質的某些關連：「生殖器官可能使我們徹底女性化，但實際擁有的政治技術，以及（或是）出現在像學院這種先前由男性主宰的機構裡，必然顯示某種男性氣概的社會化」（*Nicholson, 1995: 57*）。

過去二十年來，明確的女性主義人類學發展，也挑戰了「西方」某種看似不證自明的假設，即自我和身體是協調一致、固定不變，而且有界線的。摩爾指出，對於原住民族自我與認同的人類學研究，「懷疑人類必然要設想為擁有固定本質之有邊界實體

的假設，也質疑身體總是認同之根源和所在的假設」（1994: 36）。

我認為，這是個很難掌握的困難論證，因為在西方思想中，理性、有邊界的自我概念是如此具支配性。然而，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的是，身體是可能受到社會實踐不同影響的表面，以及身體可以轉變，並以不同面貌出現在特定觀眾面前的觀念。在下一節，我要檢視兩種觀念——身體是受到銘刻的表面，以及身體操演——它們是晚近女性主義理論化的核心。首先，我要簡短回到開頭的論點來總結這一節，亦即某些群體——尤其是女人，但也有各式各樣的他者——的身體及其物質特性的連結或侷限，正是不平等和壓迫的基礎。

量度身體與文化帝國主義

「量度身體」（scaling bodies）的概念——根據身體差異來區別社會價值——是女性主義政治學者楊恩發展出來的，她在《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中主張，「儘管每個女人的經驗、機會和展望有個別差異，任何處於既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的女人境遇，還是有可以描述並讓人理解的全貌」（1990b: 142）。她認為這個全貌乃基於女性的體現（female embodiment）。這本書是針對社會正義的自由主義理論提出的傑出質問（我們在第七章會更仔細再度討論此書），楊恩概述了她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機制的運作，如何建構了主宰群體和弱勢群體。身體區別在生產劣等地位上很重要，因為受支配群體被界定為除了他們的身體以外什麼也不是，並認為是被禁錮在令人討厭的身體裡，主宰群體則占有無標記的中立、普遍和無形體的位置，按照預設就是白人和男性氣概的位置。蒙受身體侷限，並

以不恰當的姿態標記的女人，被界定為「她者」(Other)。她們的拘限狀態由於理想化女性身體（目前是年輕、苗條和白淨）的建構而加劇，這是多數女人無論如何都難以企及的標準。楊恩解釋道，「雖然保留了某些文化空間來尊崇女性美及其令人嚮往的特性，但部份正是因為這種輪廓鮮明的想法，使得多數女人淪為邋遢、醜陋、令人憎惡或懼怕的身體」(p. 123)。

戚龍 (Tseelon) 延伸這個論證，認為女人因為五種建構女性體現的悖論，而遭到限制，蒙受懲罰。這包括了端莊悖論——女人因被建構為誘惑而受罰；欺騙悖論——女人被建構為狡詐，因欠缺本質和本真性而遭邊緣化；能見度悖論——雖然女人在文化上隱匿難見，卻被建構為奇觀；美麗悖論——女人意指美麗的同時，卻體現了醜陋；還有最後的死亡悖論——女人不僅意味死亡，也表示對死亡的防禦 (1995: 5-6)。透過文化帝國主義機制，女人被建構為心靈理性空間（尤其是科層官僚、學院、科學和高科技的工作場所）裡的不合宜身體。在我探討勞動市場體現的研究中，我試圖說明女人的禁錮於身體中，如何使得她們被界定為職場中的她者，在這些職場中，理性智識的無形體（即男性）屬性，得到高度的評價 (McDowell, 1997a)，瑪西 (Massey, 1995) 也針對劍橋科學園區的高科技實驗室從事了類似研究。在第五章，我會回頭討論有關工作的性別和體現的各種問題。

質疑身心二分：身體之為表面和操演

法國觀念史家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於 1980 年代中期過世，他是書寫身體和性慾特質方面最有影響力的戰後社會理論家之一。地理學家已經非常熟悉他的著作，因為他感興趣的領

域之一正是空間和時間的社會建構。由於他對後啓蒙歐洲影響深遠的三卷性史研究，傅柯（Foucault, 1979, 1987, 1988）在質疑笛卡兒世俗理性主義的身心二分上，顯得格外重要。他認為，將身體當成在進入社會關係以前就存在的啓蒙觀點是錯誤的。反之，他透過精密的歷史分析，顯示道德態度、法律和制度結構，以及個人和人際間的態度與行爲，如何產生性別化體現的形式，發揮規範作用。簡言之，傅柯因此認為「自然的」身體並不存在。甚至身體的生物屬性，也是透過科學和其他論述而由社會建構。

傅柯指出，身體快感和性實踐沒有任何「自然」或「正常的」東西。許多談論性慾特質的歷史認為，性實踐是祕密而不足爲外人道的，傅柯卻主張情況正好相反，他認為在不同時期，對於什麼是「正常」、哪種性實踐可以允許，何者是違規、冒犯「得體」的公認標準並要加以禁止，都有共同的協議。他把這種於特定時代生效的，有關性慾特質的一組主導觀念，稱爲論述體制（discursive regime），並將不同論述體制連結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發展，以及現代社會的崛起。

在現代資本主義下，引進新式社會管制來掌控新近都市化的人口。在傅柯所謂的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ies）的崛起過程中，他認為這種管制有賴於透過新監視機制，從事身體的社會控制。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一書中，傅柯認為，現代的權力不應該視爲由上而下、基於消極禁制的力量，而是由下而上運作的力量。傅柯稱這種權力形式爲生命權力（biopower），以彰顯身體控制的含義。他認為，公民並非屈服於國家及其機構由上而下施加的權力，權力也是一種連結客體、事件和不同社會層級之微觀或毛細管關係的精密網絡，透過比方說關注提升生活水準和健康的正面管制而連結。因此，性慾特質的

管制不只是透過國家控制，也藉由他稱為個人行為的自我監控而運作。誠如卡特（Angela Carter）曾經令人難忘地提出評論，即便是在臥室，當我們想像我們正在從事最私密及「自然」的活動時，我們還是在身旁拖著「我們社會的包袱」，它影響了誰將什麼東西擺放在哪裡。

依傅柯之見，身體和性慾特質的管制乃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事。生命權力的運作乃透過對女人和兒童性慾特質的控制、生殖行為的管制，以及將性變態指認為是個人病症。整個二十世紀性政治的悠久歷史，就是試圖擊退這些主宰論述的權力，並質疑何謂「正常」觀點。

回到身體**本身**，而非性慾特質的管制來說，傅柯將身體理論化為一種由社會實踐銘刻的表面，指出身體受到了論述所建構之機構場合的作用。這導致了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身體在這些實踐過程裡接受規訓和常規化，社會再生產也得以促進。規訓過程發生於各種社會場合，從家庭和學校，到工作場所。雖然傅柯特別關注像監獄和精神病院這種機構，以及犯罪和「異常的」個人，但是他注意到身體的經濟利用也涉及了權力和隸屬關係：

身體大致上是做為一種生產力，才獲得權力關係與支配的投注；但是，另一方面，身體做為勞動力的構成，唯有納入隸屬系統中才有可能；身體唯有既是生產性的身體，又是隸屬的身體，方能成為有用的力量（Foucault, 1977: 26）。

雖然傅柯並未專門說明男性和女性身體生產中的性別差異，但是這些力量的均衡，以及管制這些力量的方式，或許有男女差異。地理學家已經開始研究生命權力在不同位址和區位上，生產合宜且馴化身體的不同方式。例如，費羅（Philo 遵循傅柯對於

「異常」的關注，研究了十九世紀的瘋人院（Philo, 1989；另參見 Philo and Parr, 1995），以及我們往後會看到的，關切職場裡「馴化」身體之生產的地理學家，也援用了傅柯。

身體之為表面

對女性主義學者而言，尤具成效的是，傅柯將身體視為一張地圖、做為社會銘刻之表面的觀念，而且當然，對地理學者來說，地理的類比頗為令人振奮。然而，葛洛茲（Elizabeth Grosz, 1990）認為這個觀念留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如果身體是空白表面，不清楚的是不同訊息如何銘刻在身體上，以及這些訊息是否以及如何可能予以抗拒。傅柯似乎認為，權力／知識論述之外存有身體和快感，但是，他並未明確指出這些身體和快感是什麼，或者它們的根源為何。儘管有這些欠缺，葛洛茲認為肉體銘刻的隱喻，對那些有興趣書寫女性身體史的女性主義者來說很有幫助，這使得被父權學術研究與制度消除的女性身體得以現身。葛洛茲堅決主張，女性主義者要認識到生命權力並不總是理解成負面的。除了由壓制性和暴力性的實踐銘刻，以產製具生產性及臣屬的身體之外，她提到身體也由各種實踐所標明，包括「區分男女身體的自願實踐、習慣和生活風格：化妝、細高跟鞋、胸罩、髮膠、衣服、內衣標明了女人身體，正如髮型、專業訓練、個人打扮、步伐、姿態、健身和運動方式可能標誌了男人身體」（Grosz, 1994: 142）。

51

於是，在此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連結上我在本章稍早提過的女性主義分析及政治運動之外，也看見了布迪厄和傅柯研究的相似之處。然而，葛洛茲的主張與先前朵爾金及其他人所提的女性

主義宣稱有所區別的是，葛洛茲的主張除了強調女性身體銘刻，也注重男性身體印記。女性主義者現在承認，女人**和男人**，儘管程度不同、方式不一，但都從屬於規訓權力和肉體生產體制。誠如葛洛茲指出的，女人「不比男人更文化或更自然。只要男人置身規訓監控之外，父權權力關係就無法使女人成為規訓控制的對象。這不是多寡的問題，而是差別化生產的問題」（1994: 144）。此外，男人和女人不但屈從於規訓權力，也能抵抗它，擁有在身體銘刻裡獲取快感的本領，也具備顛覆支配論述的能耐。

當然，認為身體是個供裝飾的表面，不是什麼新見解。表面銘刻有悠久的歷史，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做為裝飾性、也是逾越行徑的紋身和身體穿孔，或許可以穿越時空，追溯自史前人類，以迄二十世紀的龐克族（Maffesoli, 1995）。

53

葛洛茲在最近的研究裡，開始理論化多重女性身體的可能性，透過不化約為母性身體的各種身為女性的方式來思考。如此一來，她針對某些基進女性主義理論家的早期研究裡，將性別差異設定於母性身體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雖然和傅柯一樣，葛洛茲相信身體是有待銘刻的表面，但她的論點比傅柯更進一步，認為身體本身也是在文化上生產出來的，而非先於銘刻而存在，你願意的話，可以將先存的身體想成一塊無生命肉片。因此，葛洛茲主張

身體，或者說是複數的身體，無法以任何簡單的方式，適當地理解為非歷史、先於文化（precultural）或自然的物體；它們不僅由外在的社會壓力所銘刻、標誌、刻劃，也是自然本身的社會構成的產物與直接效果。事情並不是身體依據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迫切需要而有多種再現方式，但身體基本上還是相同；而是這些因素積極地將身體生產為一種確定類型的身體（1994: x，強調為本文所加）。



圖 2.2 紋身的女人

葛洛茲指出，「再現和文化銘刻直接構成了身體，並且有助於生產身體本身」。身體不像任何其他物體，「它們是視角、洞見、省思、慾望、能動性……的核心。身體並非呆滯不動的；它們的運作相互影響且富生產力。它們行動並有所反應。它們帶來新穎、令人驚奇、出乎意料的事物」（1994: x-xi）。

但即使如此，性別差異如何生產的問題仍有待回答。在這一點上，葛洛茲自己清楚提出一組相互關連的議題，很有幫助。她問道：

為了生產我們熟悉的特定性別形式，性別中立、不確定，或雌雄同體的身體便遭到了銘刻？或者，各種身體，所有身體都有特殊的性面向（無論它是男性、女性或兼有兩性），依據該面向的形態學，而在身體上和文化上加以銘刻？換言之，性別差異是原始的，而性別銘刻是一層文化覆蓋，或是對於存有論上先在分化的重新書寫？或者，性別分化是具文化特殊性身體的各種銘刻形式的產物？是銘刻產生了性別分化？或者，性別差異暗示了一種有所分化的銘刻形式？（1994: 189）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需要針對不同時空中的身體及其銘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長期檢視，建構體現的比較地理。不過，各種身體顯然都有其物質性，而性別的二元區分在許多社會裡也很常見：葛洛茲認為，「性別化身體的二元分歧，依我之見，是不可化約的文化普遍現象」（1994: 160）（不過，記得雷克爾的觀點，他認為在「西方」，這種兩元分歧直到十八世紀才被接納。而且今天在某些社會裡從事的人類學研究，讓我們得以質疑這項斷言）。即便我們接受這種兩元分歧，身體，以及身體能夠擔負的形式、過程和從事的活動，仍有幾近無窮的適應性。在某個時代、某些文化中，可能或被允許的事情，在其他時代、其

他地方，則屬不可能或遭到禁止。雖然巴特勒（我們現在要轉向她的研究）在身體無可化約的物質性上，與葛洛茲見解一致，但對於性別分歧若非早已存在，就是普遍性的這種觀點，她則比較不確定。如我在後文指出的，巴特勒認為二元區分本身就是社會實踐的產物。

身體操演

將身體和自我理論化為流動而可變的，已經導向一種理解，認為身體的物質特徵及其性別操演不必一致。雖然社會建構論者，自高夫曼（Goffman）於 1960 年代的著述以降，已經認識到社會行為是由不同位址的變動操演組成的，但是在 1990 年代，女性主義理論家巴特勒的複雜理論著作，極具影響力。巴特勒的核心觀念是「操演的性別」（*performative gender*）。巴特勒認為在當代社會中，性別認同是種操演，是在試圖施加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體制中，由「行動的風格化反覆」（*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1990a: 140）構成的（記得在先前第一章有關性別體制的討論）。巴特勒主張，我們針對性別認同假定為「自然」的東西，幾乎是不存在。因此，性別認同可能因逾越行動而破裂或顛覆，揭露出「異性戀連貫性的管制性虛構」（1990b: 338）。

巴特勒認為，在當代先進工業社會中，強制異性戀知識體制（*epistemic regime*），生產並物化了堅持女人劣勢的存有論上的二元性別區分（男人和女人的建構）。但是她指出，性別並非定位於生物差異中的二元區分，而是一種被當成真實的持續性扮演（*impersonation*）。身為女性並非「自然事實」，而是「一種文化操

演〔其中的〕『自然性』〔是〕透過論述上受限的操演行動而構成的，這些行動透過性範疇，並於性範疇內部生產了身體」（1990a: viii）。對大多數人而言，這種構造的目的在於生產出連貫一致的認同，並以異性戀的管制性虛構為基礎。我們透過行為、姿態和服裝來建構或捏造一種藉由肉體符號和其他論述手段來展現和支撐的認同。因此，巴特勒相信

55

性別不應該被建構為穩定的認同，或是產生各種行為的能動性所在；反之，性別是藉由行動的風格化反覆，在時間中精細建構，並設定於外部空間的認同。性別的效果是透過身體的風格化而產生的，因此，性別效果必須理解為一種世俗的方式，在其中身體的姿態、動作，以及各種風格，構成了持久不變的性別化自我的幻覺（1990a, 140-1，強調為原文所加）。

所以，我們在這裡得到一種相當接近布迪厄早期著作的說法，但是有極大差別，布迪厄將性別差異視為理所當然，巴特勒則不然。反而，她將身體理論化為並非供文化銘刻的性別化的、先存的表面，而是由建構強制異性戀系統的政治力量限制和構成的。這種「身體」的見解，與視身體為無生命物質的笛卡兒觀點恰成對比。巴特勒認為，即使是身體邊界，也是由霸權實踐建立的，是由界定了「肉體可滲透性和不可滲透性之固定位址」（1990a: 132）的可接受性之社會限制所確立的。

如果性別的界定是迎合特定區位之主導論述和實踐的構造，而非固定或穩定的範疇，這就撬開了一個空間，不僅得以檢視特定異性戀操演成為霸權的方式，還能考察抵抗的前景。然而，巴特勒的著作尤其煽動性，因為她發現透過「擾亂」（trouble）二元範疇的文化實踐，有可能逾越二元性別，她於是迫使我們轉而關注建構身體操演的其他方式。她主張，各種行動都可能在性、

性別和慾望範疇中，造成破壞性的裂痕與不一致，並質疑這些範疇之間宣稱具有的關係。「將支持男性霸權與異性戀權力的自然化和物化性別觀念，加以顛覆和取代的可能性……〔其起源〕並非透過描繪遙遠烏托邦的策略，而是動員、破壞性擾亂，以及增殖那些試圖藉由裝成認同的根本幻覺，試圖保持性別於固定位置的構成性範疇」（Butler, 1990a: 33-4）。

巴特勒自己藉由檢視同性戀和亂倫禁忌，來研究這些不一致現象。她的著作對地理學家影響尤深：例如，可見於對城市中女男同性戀抵抗行爲的理解，以及「偏差」性慾特質如何在城市不同場域中「不得其所」的分析（Bell and Valentine, 1995）。在本章最後一節裡，我要檢視一些討論「偏差」性慾特質和諷仿性操演（parodic performance）的研究，也要看看對身體感興趣的地理學家，開始針對懷孕和生病身體所做的研究。

56

我希望目前為止你已經清楚知道，性別化身體的問題、其發展和區分的原因，以及身體、性慾特質和性別之間的連結，乃是所有性別關係分析的基礎。我會在接下來幾章中說明，有關具體女人之合宜地方的假設，被用來正當化和質疑父權支配系統，它將女人排除在特定空間場域外，又使女人侷限於其他空間場域中。在這個意義上，女人「了解她們的地方」就具有字面和隱喻上的意義，性別體現和地理區位也深刻糾結在一起。在具有特殊性別分隔型態和性別化權力階層的性別體制建構中，社會關係和空間過程相互增強（當然，在不同時空會有不同方式，這就是性別關係的地理分析如此適切而動人的原因）。

所以，隨著我們依循後續章節前行，會一再遭逢在不同位址（例如在家裡、在工作、休假中）以不同方式操演性別的性別化身體。在本章最後一節，我以地理學者和和其他女性主義者的少數

幾個經驗案例，開始探討性別化的身體。前兩組例子與本章中間小節的討論有關（涉及身體、邊界，以及討厭的身體），其後的例子採用發展了巴特勒的身體操演概念的地理學研究。在最後一個例子裡，我們轉向身體與城市之間的隱喻關聯。

空間與地方中身體的個案研究

1 學校裡的身體

我要藉由政治理論家、人類學家和文化理論家，以及地理學者所做的一些經驗研究，來追索女人和男人占用空間的差別。讓我們拿女孩如何被養育成會以具性別特殊性的方式來占用空間，這樣直截了當的描述開始。

57

在歐克利（Judith Okely）的書《自己或其他的文化》（*Own or Other Culture*）中，她將人類學眼光轉向自己的童年，以及1950年代英國女子寄宿學校裡的教育。歐克利在此論及了男女青少年的身體，被容許占有空間的不同方式：

運動是身體的遊戲場。得到偏愛的競賽在男子學校裡有助於發展潛能，然而在女子寄宿學校課程中，那些競賽卻是在女孩潛能上強加人為限制。這種性別偏差也可在公立學校裡發現，而且持續不斷。男性專屬的運動，包括英式橄欖球、足球和拳擊（歐克利的註腳：1980年代中期以降，出現某些女性英式橄欖球和足球球隊。但這些及許多其他運動，依舊是由男性主導，顯示於任何電視體育節目或報紙體育版）。以女性為主的運動，包括落網球（netball）、長曲棍球和曲棍球。男女都打網球，偶爾玩玩板球。

男女運動的差異，顯示了不同的身體經驗。男性運動的某些特質，在允許女性參與的運動中缺席。英式橄欖球需要球員間的身體碰觸。把手臂和整個身體都當成武器來使用。要求球員將他們自己和對手摔倒在地。女孩運動中，身體接觸或身體的這種運用，都不被允許……。

英式橄欖球與足球需要猛力踢球，因此要張開並抬高雙腿。女性決不能踢球，以免她們踢另一種球〔譯按，指踢男性睪丸〕。把腿抬高踢腿的女性，在支配性的男性意識形態中，被認為是在隱喻上暴露她們的生殖器。缺乏目標的踢腿動作，被體制化為興奮作樂的康康舞（1996: 144）。

歐克利回憶她的學校裡對女孩身體的控制，從禁止她們離開地面的規則，到較小尺度的管制。

女孩的身體姿態不斷接受檢視。無論何時，學生都要坐、立或走得很筆直，下巴抬高，背挺直，肩膀自然向後。身為女孩體態舉止監護人的女教師，行使可觀的權力。女孩在進餐、作禮拜和「點名」時，受到詳細檢查。當女孩懶散往前傾時，會有刺刀手出乎意料插在背上的恐懼……。檢查制服、指甲。碰到衣領的頭髮必須削剪，因為長髮暗示了性慾（1996: 140）。

十年後，在這所我待過的女子學校裡，仍然實施相同的髮禁，還有禁止我們捲高袖子的規定。根據女校長所言，捲高衣袖讓我們「看起來像洗衣女工」。很顯然的，不但是性別界線，階級邊界也必須加以監控。我很想知道，當各位讀者在學的時候，學校是否仍舊實施這些規則和管制，或者對你們來說，歐克利的經驗宛如另一個世界。

2 「不得其所」的身體：懷孕與生病的身體

懷孕的身體 這裡的第一個例子，出自楊恩有關懷孕身體的研究。她的焦點很顯然是空間性的，因為她想知道懷孕身體（懷孕主體經驗的基本部分）的身形和邊界的改變，如何提出了有關身體之所在的問題。

或許令人意外的是，討論身體存在的哲學家，絲毫沒有研究過孕婦的主體性，因為要顯示單一統合身體之笛卡兒式假設的侷限性，沒有比懷孕身體更清楚的例子了。楊恩認為，「懷孕顯露了一種身體經驗的範型，透明的自我統一消失了，當身體展開它的計畫時，也積極自我照料」。相對於身為統一的主體，

懷孕主體在幾個方面是沒有中心、分裂，或雙重的。她體驗到她的身體既是她自己，又不是她自己。她的體內活動屬於另一個存有，但這些活動又不是別人的，因為她的身體邊界轉移了，也因為她身體的自我定位既聚焦於她的軀體，也關注她的頭腦……。懷孕的存在〔也〕導致獨特的過程與成長的時間性，藉此女人得以體驗到自身是介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分裂（1990a: 161）。

當然，懷孕徹底改變了個人身為有邊界的身體，以空間和其他身體區隔開來的觀念。「懷孕……讓何謂內部、我自己，以及何謂外界、分離事物的界線，變得流動不定。我經驗到我的內部是另一個人的空間，但又是我自己的身體」；分娩或許是「內部與外界之身體區分最徹底的懸置」（Young, 1990a: 163）（參見圖 2.3）。正如佛洛伊德（Freud）和拉岡（Lacan）主張的，嬰兒對於母親與嬰兒自身之間，沒有最初的界線感，楊恩指出，孕婦和剛當上媽媽的母親，也有同樣經驗。



圖 2.3 慶生：都市壁畫

懷孕期間，我身體的完整性遭到破壞，不只是因為這種內部的外在性，也由於我身體的界線本身也不斷變化。懷孕期間，我對於我的身體在何處終結，而世界從哪裡開始，簡直沒有確定的感覺。我無意識的身體習慣退位；我的慣常身體和此刻身體之間的連貫性，也打破了……。我移動身軀，彷彿像七個月以前一樣，以為能夠繞過椅子、穿越人群，勉強擠過去，結果卻發現，我被自己前面突出的身體擋住了路——但那不是我，因為我沒料到它會阻擋我通行。當我靠在椅子上綁鞋帶，堅硬的肚皮輕觸到我的大腿時，令我感到驚訝。我並未預期我的身體會碰觸自身，因為我的習慣保留了原來的界線感 (Young, 1990a: 164)。

59

楊恩指出，在一個傾向於貶低藐視女人，將女性美界定為纖細苗條、體態優美的社會中，對某些女人而言，懷孕的經驗，其體重和物質性，會「產生一種力量、凝聚和正當的感受」，以及

自尊心。她認為，孕婦時常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滿足，或是一種自愛 (self-love)，感到與母性身體間有原初的性慾連貫性，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稱之為「極爽」(jouissance)。「懷孕和性慾的文化區隔，使她得以解脫在非懷孕狀態時，那種使她異化和工具化的性慾物化凝視」(Young, 1990a: 167)。然而，楊恩對於女人遭受的醫療專業對待，以及因懷孕經驗而招致的異化，則比較不樂觀，尤其是分娩，經常被當成需要醫療介入的「混亂失序」或功能障礙狀況。

60

在紐西蘭從事研究的地理學家羅賓·隆赫斯特 (Robyn Longhurst)，以空間中的懷孕身體當做博士論文主題，檢視了孕婦對她們身體改變的反應，以及在某些主要是公共空間裡，為何感覺不自在的原因。她發現，當孕婦的身體與她們占用的空間關係改變時，許多孕婦會覺得很尷尬，而不是楊恩所陳述的自愛和自信 (Longhurst, 1996, 1997)。當女人逐漸不出現在公共空間裡社交，連在街頭、商店，甚至在醫院或醫生診所中，都開始覺得不得其所時 (這令隆赫斯特很驚訝)，有一種常見的反應，就是退縮到越來越私密而小範圍的領域裡。不過這或許跟楊恩有關女人討厭懷孕被醫療化為一種「狀況」的發現一致。

身體的轉變也發生於患病、體重增加，以及晚年的身上，通常以或許沒有懷孕那麼明顯的方式，讓身體成為負擔。懷孕的體型特徵有雙重性：隨著身體有目的地改變，既是負擔，也是樂趣。再者，這是暫時性的身體邊界與體重轉變，以懷孕的特殊時間邊界為標誌。最後，原來的邊界 (幾乎) 會重建。然而，疾病或許有不同經驗，是與身體的疏離異化，以及個人身為女人或男人的自我感受的恆久再協商。下一節，我要檢視某些最近由地理學家所做的身心障礙 (disability) 研究。

「生病的」身體 在有關疾病、身心障礙、健康和健康照護的地理學的新近研究中，又出現有關「不得其所」身體的類似議題 (Dyck, 1995, 1996)。誠如已有許多人指出的，最廣義的「環境」，包括物理建築和基礎設施，以及人際關係，都是考慮健全而無須依賴的個體而設計。在一篇有趣的論文裡，摩斯與迪克 (Pamela Moss and Isabel Dyck) 主張，對於承受慢性病之苦的人來說，體現以非常清楚的方式浮上檯面 (Moss and Dyck, 1996)。透過摩斯有關罹患關節炎年長女性的研究，以及迪克對於罹患多發性硬化症女人的研究，顯示物質實踐和論述實踐 (身體與性別的生物醫學再現和一般再現)，如何將這些女人建構成「異常」身體。然而摩斯與迪克指出，她們訪談的女性會抗拒她們的屬性，藉由各式各樣的策略，不僅解決在自家與工作場所中，近用和移動的物理問題，也建構自我的不同認識，成為有身體的性別化女性主體。

在某些個案中，抵抗策略具有我們或許過常聯繫上「抵抗」的正面涵義 (connotation)。例如，某些女人有「隱形的」 (invisible) 身心障礙，像是慢性疲勞，但嘗試在工作場所維持「能幹的表現」。如摩斯與迪克指出的：

61

隱匿症狀和不公開診斷乃是重要的策略。雖然搭電梯比較不費力，但因為同事都利用樓梯，我也一樣；用過午餐，返回工作的路上，走在別人後頭，才不會被別人注意到不穩定的步伐；或者，把需要靈巧手部協調的工作帶回家做，這些都是試圖維持能力一致性的例子。這種女人抵抗生物醫療再現她們罹病身體的汙名化結果 (1996: 744)。

然而，我要指出，在這些個案中，出於恐懼的抵抗，和源於我們會讚揚的積極策略的抵抗，其實一樣多。其他女人採取相反

的做法，爭取讓她們的異常身體，經由特殊治療和預防而得到認可。因此，在不同區位，透過特殊方式，摩斯與迪克認為身體既是壓迫的位址，也是抵抗的位址。她們認為，「與人類身體及其再現之間的斷裂達成協議，在界定個人認同邊界上很重要：邊界會不斷調整」（1996: 474）。我發覺，這種思考方式，不單是在主體認同的流動性方面，也在有關她或他身體的流動性上，非常有意思，而且就像可以用於思考「健全」身體或能幹身體一樣，也可用來思索「異常」身體。許多理論家已經指出，很少有女人或男人的身體能夠吻合不同人生階段中，被渴望的理想化身體再現，這種「達成協議」（coming to terms）是影響我們自我感的廣泛現象。

3 體現的操演：挑戰強制異性戀

過去幾年內，某些最有意思的地理學著作，已經探討了「異常」性慾特質和逾越地方之常規化假設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多地理學家（Adler and Brenner, 1992; Bell et al., 1994; Bell, 1995; Bell and Valentine, 1995; Forest, 1995; Geltmaker, 1992; Knopp, 1992, 1995; Valentine, 1993a, 1993b）研究男女同性戀由於置身「非同性戀」（straight）空間而感到不得其所的情況。我在往後章節中會更仔細說明，建築環境既影響又反映了有關社會關係的主流假設。在異性戀與家庭關係被假定為「正常」的社會裡，那些不順從的人，處於異性戀規範構成的空間中，往往感覺不自在。在餐廳和酒吧裡，在旅館以及在開放空間中，異性戀情感的公然展示，也許不會引起注意，或是得到容忍，但是同性之間的情感表現，或許就不是這樣了。

貝爾、比尼、克琳姆和華倫坦（David Bell, John Binnie, Julia Cream and Gill Valentine）在他們的論文〈極其興奮但無處可去〉（All hyped up and no place to go, 1994）中，援用巴特勒的論點考慮空間中的性別認同操演。他們探討了巴特勒的論點，認為酷兒（queer）認同透過「長期努力檢視兩種目前異議性的性慾認同——超級陽剛的（hypermasculine）『同性戀光頭男』（gay skinhead）和超級陰柔的（hyperfeminine）『紅妝女同性戀』（lipstick lesbian）」（p. 31），來反抗、逾越與諷仿（parody）主導的異性戀體制。如作者指出的，「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對異性戀的模仿，具有徹底轉變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穩定性，破除其原始與自然宣稱的潛力。異性戀是一種操演，和同性戀一樣是建構的，但時常被假定為原始的，因而享有特權」（p. 33）。而且，他繼續主張，

同性戀框架內部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的過度操演，不僅揭露了異性戀偽裝的性質，也揭顯了其本真性（authenticity）宣稱。「大男子氣概」（macho）的男人和「女人味十足」（femme）的女人，不只是同義反覆，也使得異性戀與同性戀建構中，環繞著男人／男性氣概及女人／女性氣質之異性戀描繪的傳統假設分崩離析。同性戀光頭男穿著馬汀大夫短筒靴、吊帶托高的緊身牛仔褲、腰與袖口收緊的短夾克，還剃了光頭；化妝、穿高跟鞋的紅妝女同性戀，兩者擁有不同的歷史遺產，介入了從新法西斯主義到女性主義等不同辯論，但是將他們聯合起來的是她們對異性戀體制的諷仿（p. 33）。

在他們的論文裡，這些作者探究了各種困擾他們的議題——包括在異性戀空間（straight spaces）裡「瞞天過海」（passing）；關於態度、能見度及其後果（對超級陽剛的同性戀

光頭男而言，這尤其是一項重要議題）；有關在不同空間中，那些「知情者」，包括異性戀者與酷兒，如何能夠有效解讀；以及越界性別操演能否成功挑戰異性戀的建構與空間編碼。例如，在他們有關同性戀光頭男風格的討論中，指出了這些男人的能見度，具有一種挑戰和培力（empower）的效果：「異性戀者最不可能期望光頭男做的事，就是當眾牽手，或輕輕接吻。一旦發生這種事，人們就會注意。同性戀光頭男藉由這種行徑，不僅能夠破除或鬆動男性氣概認同，還能分裂和騷亂異性戀空間」（p. 36）。而且，這種行爲也讓男同志得以相互辨認：「能見度意味著同性戀光頭男在異性戀世界中，經由在街頭共同構成的相互瞥視，開創出自我培力的酷兒空間」（p.37）。

63

大約在對男同志而言，光頭男風格變得很重要的同時（1990年代早期），女同志開始「重新根據有關女性的新詞彙，從事」（p.42）既反映又挑戰異性戀女性氣質的超級陰柔諷仿。作者解釋了這種表面上的悖論：

紅妝女同性戀的超級陰柔氣質，在理論上已經打破了在異性戀基礎上，將男人/女人和男性氣概/女性氣質結合起來成為二元對立組的鎖鏈裡的最後鏈結，因為同性戀者的觀念——「真正女人」和 T-婆（butch-femme）——打破了性別認同（男性氣概或女性氣質）必然清楚映繪於二元性別化身體（男性，女性）上的假設。但這些觀念仍舊維持了性別認同與性慾之間的連結，因為有男子氣概的女性（同性戀者/T）還是渴望「有女人味的」真女人。紅妝女同性戀是慾望著女人的女性，破壞了異性戀最後的穩固建構。當 T / 婆看似能夠強化異性戀原型正當性的局外人，紅妝女同性戀則藉著女性偽裝內部各種異性戀符徵（signifier）的微妙混合，揭露了異性戀的「原型」有如巴特勒（Butler, 1990a）所論，畢竟只是模仿罷了（p. 42）。

由於這種女性操演（feminine performance）對大多數女人而言都很尋常，它產生了一種逾越和破壞的效果，因為它

擁有潛力，能促使異性戀女人質疑她們外表的解讀方式，挑戰她們看待其他女人的方式，因此破壞了異性戀空間的生產。同樣的，以這種方式來破壞空間，意味了異性戀男人或許無法區辨他們的慾望對象（p. 42）。

藉由挑選這些引述段落來點明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我或許不經意提出了比作者原本意圖更加明確的感覺。根據他們的結論，他們的意圖在於提出一系列問題：「同性戀光頭男與紅妝女同性戀認同的操演，是否使得『異性戀空間』的『異性戀體制』破裂？……何謂逾越？何謂諷仿？當人們開『玩笑』，到底誰贏、誰輸？」（p. 44）。他們注意到波爾多（Susan Bordo）對巴特勒著作的批評。她指出，巴特勒沒有考慮越界操演的文化脈絡，以及不同讀者回應的重要性。如波爾多所論，巴特勒「沒有考慮不同『讀者』（男性／女性，黑人／白人，年輕／年長，同性戀／異性戀等等）可能的不同反應，或者可能使他們的解讀複雜化的各種焦慮……當我們試圖賦予〔巴特勒的〕抽象文本某些『軀體』時，我們立即遭遇困難」（Bordo, 1992: 171; 以及引自 Bell et al., 1994）。

64

雖然我贊同這項評論，但我希望透過經驗研究，可以發現不同的「讀者回應」。實際上，我已經試圖在我自己有關商業銀行的研究中這麼做，我在第五章會回到這項研究。或許相當令人訝異的是，在一篇由地理學家撰寫的論文裡，貝爾和其他人很少關注特定空間。這些同性戀男人和女同性戀者，特別是後者，從未真正外出到任何地方。

在《性別、地方與文化》(發表貝爾和其他人論文的期刊)的最新一期裡,刊登了四則對這篇論文的有趣回應(Kirby, 1995; Knopp, 1995; Probyn, 1995; Walker, 1995)。普羅賓(Probyn)與諾普(Knopp)都提議了可能使性慾特質與空間的研究,遠離抽象層次的辦法。就像普羅賓解釋的,「我要找出在空間中女同性戀身體的獨特性,擺置於與空間中其他女同性戀者的關係中」。她關切「思索女同性戀的慾望,及其如何可能改變空間性的結構,並在不同空間結構中被改變」(Probyn, 1995: 79)。在一則假想的酒吧場景的逼真描述中,普羅賓指出了當不同女人進入這種男性空間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她敦促地理學家記得「作為社會性別化(gendered)或生理性別化(sexed)空間的生產條件,在歷史上、物質上和策略上是不同的」,注意女同性戀主體總是雙重主體,捲入身兼女人和女同性戀者的重疊(doubling)之中。

普羅賓認為,「她同時是空間重疊(doubling of spaces)中的具體實例,又是生產的發動者,一種空間摺疊於另一種空間上的發動者」(1995: 81)。用這麼抽象的字眼,很難理解這個概念,但我認為普羅賓的空間重疊概念,非常類似空間既被社會關係影響,也影響社會關係的地理學爭論。於是,在這種特殊狀況裡,回到普羅賓的酒吧例子,一名紅妝女同性戀和她的同伴,起初進入了一個由男人透過相互警視作用而強化其為異性戀空間的空間裡。如果這兩個女人公然傳情示愛,那麼,她們就使得酒吧空間,以及男人視她們為女人的看法,都產生了裂縫,開創了(雖然短暫)性慾化的女同性戀空間。由此可見,空間的性慾化(sexing)可能會遭受挑戰,即使做為男性化與異性戀空間的主導性建構,幾乎沒有受到干擾。

在往後章節裡，我會藉由其他個案研究，重新探討這裡的某些主題。例如，在第四章裡，檢視做為地方認同基礎的性慾特質，第五章則考察工作中的性慾特質。

4 身體 / 城市

在最後的個案研究裡，我想不轉向另一個經驗事例，而是鎖定一篇理論性和思辨性的論文。葛洛茲（Elizabeth Grosz, 1992）在這篇論文中，開始闡述身體如何被銘刻為社會文化的加工品，以及身體如何同時「重複銘刻並投射自身到它們的社會文化環境，使得該環境既生產又反映了身體的形式與利益」（1992: 242），這兩方之間的連結。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葛洛茲的目的接近普羅賓的意圖，普羅賓在我們剛才考察的論文中指出，空間透過身體，「透過一個……身體朝向另一個身體的關係性移動」（Probyn, 1995: 81）而性別化。我也曾在前文提及，營造形式（built form）既影響又反映了社會關係的觀念，現在已經廣為地理學者接受：如我將反覆論說的，空間和地方具有社會性別（gendered）和生理性別（sexed），而性別關係和性慾特質則是「空間化的」（spaced）。但是，葛洛茲挑戰了身體和城市是彼此分離的形式的假設：

身體及其環境都不能被假定為形成了有機統一的生態系統。相反的，身體及其環境將對方造就成為超真實（the hyperreal）的形式，成為擬象（simulation）的模式，趕上並轉變了雙方可能擁有的任何真實，使之成為對方的意象：城市由身體的擬仿物造就，反過來，身體也被轉變，被「城市化」（citified）、都市化為獨特的都會身體（1992: 242）。

以一種聯繫了本章和下一章主題內容的方式，葛洛茲藉由某些方法，將身體和城市在思辨上連結起來。據此，她主張，

城市的形式、結構和規範，滲入且影響了構成肉體和主體性（以及將肉體建構為主體性）的其他一切要素裡。城市影響了主體看待他人的方式（就這一點而論，家屋建築將主臥室跟其他起居和睡眠空間劃分開來，還有房間的功能分化等，都和較小的家庭規模這個因素一樣重要），影響了主體對空間的理解、主體與空間的排列連結關係，以及主體在空間中的定位。我們所經歷的空間性的不同形式（城市的垂直相對於地景的水平——至少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如此），影響了我們在空間中的生活方式，並且因而影響了我們的舉止和身體方位，以及主體之身體操作的形式——這是主體日復一日必須在其間協商的領域，而這對其肌肉結構和營養脈絡的影響，則提供身體最根本的物質性支撐和維持。再者，城市當然也是身體被文化浸透，身體被影像、再現系統、大眾媒體與藝術接管和轉化的場所——在這個地方，身體在表徵的層次被再度探究、轉化、爭奪，以及重新銘刻。反過來，身體（做為一種文化產品）根據其變化不定（人口方面、經濟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需求，轉化且重新銘刻了都市地景，擴張了城市、郊區的界限，甚至進入了與之接壤的鄉村（1992: 248-9）。

雖然這個段落乍看之下有點複雜難解，但我認為再讀一次，它就會變得既清楚又沒有爭議。不過，葛洛茲的論點連結身體和城市的方式，是當前地理學者傾向於忽略的。不過，如葛洛茲指出，而女性主義地理學者也如此認為的，「只要城市將文化生活切分為公共和私人領域，在地理層面上，劃分與界定了個人和群體所占有的社會位置和區位，城市便定位與組織了家庭、性，以及社會的關係」。很高興看到社會理論家如此清楚地提出了，以地理學做為關鍵社會科學學科的宣稱。

葛洛茲以有關「空間內爆成爲時間，距離變質成爲速度與溝通的瞬間，工作空間瓦解成爲居家電腦系統」，將會「在城市居民明確的性別和種族身體，以及在城市形式與結構上」造成影響的一些臆測，來總結她的論文。她相信，城市和身體會成爲電子網絡的一部份，「構成資訊機器的一環，身體的四肢和器官將變成可以跟電腦互換的部件」（1992: 251）。因此，哈洛威（Donna Haraway, 1991）已經非常敏銳地描寫的人機合體（cyborg）時代，或許已經接近了，而我們（身爲提高性能的身體／人機合體）可能日漸邁入了並介於歐莒（Augé）的非地方（non-places）中。無論發生什麼事，葛洛茲相信新科技「將會根本改變我們設想城市和身體及其相互關係的方式」（1992: 252）。

這是篇有趣的論文，身體和城市之間的相似處非常動人，但我認爲葛洛茲過度誇大了這個類比。身體與城市都是「事物」，但也有差別。事實上，哈維（David Harvey）曾經主張，「沒有理由說城市是宛如身體的『事物』（例如，城市的邊界散漫得多，而且雖然城市典型上具有機構，卻沒有心理，或甚至不具備人類擁有的那種能動性）」（1996: 278）。而且，在我看來，葛洛茲也輕忽了主導性機構的重要性。不僅是特殊的都市形式，而且在可接受身體之特殊樣式的定義與維持上，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都至關重要。

不過，描繪身體與城市之間的類比，在建築與都市計畫中有悠久的歷史。在一篇討論古代雅典以迄當代紐約，有關西方文明中城市歷史的迷人分析裡，森涅特（Richard Sennett, 1994）追溯了身體的醫學知識、身體的形象和再現，以及都市形式與規劃的關聯。森涅特指出，譬如在哈德連皇帝（Emperor Hadrian）的時代，身體幾何完型的羅馬觀念如何被轉譯爲都市設計。他也考察

了基督教城市 (Christian city)，顯示了發展中的不潔身體觀，如何既引發都市聖殿的創建，也導致猶太聚居區 (ghetto) 的產生。在現代城市裡，諸如發現血液循環這種醫學進展，變成都市設計裡的類比，例如透過城市動脈來改善交通循環，以及城市改良以促進「健全」城市的成長。

澳洲藝術史學家貝絲特 (Sue Best) 擴大了身體和城市之間的類比，主張城市往往被直接設想並書寫成彷彿它們是陰性，或是女性。在她有關性慾化空間 (sexualized space) 的論文裡，貝絲特審視了隱喻和社會實踐，從而闡述了女性身體和空間的關聯。我收錄一段簡短的引述：

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華納 (Marina Warner) 將之描述為典型女性的淑女之城。整個巴黎的公共空間，因為容納了女性肉體而顯得舒緩柔和，建築物甚至被描繪為具有「豐胸和陰道的外形……枕般柔軟的屋頂和張嘴的入口」(1985: 36-7)。

紐約，「二十世紀的首都」，不那麼隨和友善，提供了講求速度的二十世紀浪漫風格。費茲傑羅 (Scott Fitzgerald) 只有過一次與紐約夜晚的韻事。如他所述，她「基本上憤世嫉俗又冷酷無情——除了照亮麗池 (Ritz) 飯店屋頂的那晚之外」(1971: 143)。這是適合二十世紀的女人，紐約有活躍的原慾——不像伊底帕斯化、陰道般的巴黎——因此，她在入口處有個陰蒂通往港灣，或者更確切的說是「陰蒂的附屬器官」。這是庫爾哈斯 (Rem Koolhaas) 對康寧島 (Coney Island) 的稱呼 (1978: 23)。

徹底現代的洛杉磯，二十一世紀的未來首都，可以預見或許是一個女人的擬像。據李歐塔 (Lyotard) 所言 (見於《太平洋城》[*Le Mur du Pacifique*])，她不過是白皮膚的綿延，是沒有孔洞或深度的表面……。與這座公路城市發生情色邂逅，是件枯燥的情

事，當然，透過了汽車的媒介。汽車變成找出這個龐大、編織拼湊身體殘餘性感帶的一隻手：「置身洛杉磯迷宮裡汽車的盲目，不是別的，正是順著修長的大腿，肩膀和鼠蹊的寬度而往返游移時，手掌的盲目」（Lyotard, 1989: 64）（Best, 1995: 182）。

貝絲特論文的開首，引述了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克莉絲蒂娃（Kristeva, 1986）和依希嘉黑（Irigaray, 1987）主張空間與女性氣質之間具有關連性的著述。她們認為，相形之下，時間傾向於和男性氣概有關。在一篇有趣的論文中，瑪西（Doreen Massey, 1992）論及空間和地方可能理論化為積極而非消極的方式，從而質疑了上述關連。誠如我已經指出的，空間不是無生命的，不只是社會行動的容器，而是認同構成裡的重要元素。瑪西和貝絲特的論文很值得閱讀全文，我希望你找出來看，以探尋這些有趣的思考性與性別、空間與城市之間連結的新方式。

68

結論

社會理論將身體置於核心，或許是當代理論事業最令人興奮的一步。我會一再強調，性別化身體的問題——它的差異化建構、管制和再現——絕對是認識每個空間尺度的性別關係的關鍵。對於身體及其所在的態度，貫穿了國族的意義與家的意義，以及社區和諸如街道和城市等開放空間的意義。這些議題都會在後面章節裡深入探討。在這裡，我希望我已經透過理論摘述和經驗例證，說明了我們對於身體的認識如何隨時間改變，以及這如何有助於更深刻認識各式各樣女性和男性身體的建構。

一般而言，西方啓蒙理論家都忽略了女性身體，不是予以自然化，就是將它們理論化為匱缺或缺席。女性主義理論家為了回

應這種缺席，重新宣稱女人的身體是理論解釋的對象。但反諷的是，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她們也和傳統思想一樣，忽視了男性身體，並讓男性身體保持規範地位。晚近的研究取向，則將身體理論化為表面，銘刻了制度性的實踐，視男人和女人的身體為在空間和時間中有所變化的客體，並加以探問，並開啓了地理探索和跨學科研究的豐富場域。有關體現及其意涵，以及從身體與世界的物質和象徵關係，來思考和談論身體，依我之見，這些想法很接近位置性和區位的觀念。這些都是出色的地理概念，而且似乎是許多並未直接關注體現議題的各種女性主義理論家，日益常見的描述性別差異特殊性的方式。當然，對地理學者而言，女性主義理論裡逐漸強調反思位置和區位的問題，導向了活力充沛的跨學科爭論，以及越來越多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從事的傑出理論和經驗研究。

延伸閱讀

對於想要更徹底比較性別化身體的不同理論家的人，傅雷克斯（Jane Flax）針對女性主義和精神分析的出色評價《思考片斷》（*Thinking Fragments*, 1990），是一本很清楚又饒富洞見的書。葛洛茲（Elizabeth Grosz）的書《變化莫測的身體》（*Volatile Bodies*, 1994），也是針對各種取向及近來女性主義在身體方面的研究，卓越的批判性導論。在探討女性主義者如何回應並發展了傅柯的著作方面，很值得讀一下瑞瑪扎諾哥魯（Caroline Ramazanoglu）編輯的文選《起身對抗傅柯》（*Up against Foucault*, 1993），布里斯托（Michael Bristow）的概論式教科書《性慾特質》（*Sexuality*, 1997）則是介紹某些關鍵理論和（男性）理論家的有用入門書。

貝爾與華倫亭（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編輯的文選《描繪慾望》（*Mapping Desire*, 1995），收錄了某些地理學者針對身體和性慾特質的研究，柯羅米娜（Beatriz Colomina）編輯的一卷《性慾特質與空間》（*Sexuality and Space*, 1992），則是針對各種空間再現議題的多學科檢視。

派爾（Steve Pile）在《身體與城市》（*The Body and the City*, 1996）裡、史瑞夫特（Nigel Thrift）在《描繪主體》（*Mapping the Subject*, 1995）中，以及連同納斯特（Heidi Nast）在《穿越身體的地方》（*Places through the Body*, 1998）裡，探究了身體、主體性和空間的關係。《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裡也經常有論文，討論不同地方的身體地理。隨時注意這份期刊。例如，納許（Catherine Nash, 1996b）的論文評價女性觀看一系列以男性身體做為地景的形象來獲得快感的方式，藉此挑戰了地景女性化和男性凝視的重要性這兩種論點。她的論文奠基於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以及地理學者蘿絲（Gillian Rose, 1993）的著作，蘿絲說明了男性凝視的觀念如何影響了地理學的地景分析。

蘿絲自己從事了有趣的研究，討論女人做為地方中之身體的攝影記錄。例子可以參見她最近的文章，有關 1930 年代東倫敦（East London）的照片（Rose, 1997），還有她在《描繪主體》（*Mapping the Subject*, Rose, 1995a）裡的論文，檢視了女性主義藝術家創作的各種影像中，空間性和主體性的連結。女性主義地理學者開始在不同場域裡探討身體操演。詹斯頓（Lynda Johnston, 1996）指出女性健美者雕塑般的身體，如何挑戰了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的二元概念；她與隆赫斯特（Robyn Longhurst）（Johnston and Longhurst, 1998）一起比較了她們與孕婦的身體形式。路易斯

與派爾 (Clare Lewis and Steve Pile, 1996) 檢視了里約熱內盧嘉年華會中操演身體的情色特質。也有越來越多針對能力較差身體的關注，例如《環境與規劃 D：社會與空間》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 Society and Space*, 1997) 特刊裡的論文，以及《人文地理學進展》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中一篇附有出色參考文獻的有用調查 (Park et al., 1998)。

本章沒有提到的一項特質是膚色，但迄今地理學者對此很少有詳盡的著述，雖然我在第四章會概述某些最近的研究。然而，有大量討論黑人身體的社會科學文獻，檢視黑人身體如何既受到慾求，又遭到非黑人辱罵。譬如，黑人男性氣概和狂野異性戀之間的刻板印象關連，在媒體再現上是常見的特徵，見於像《辣手刑警》² (*Shaft*) 這類 1970 年代黑人電影的諷仿。但這有恐怖的後果，例如在部分美國南方遭指控強暴會導致處以私刑。西格爾 (Lynne Segal, 1990) 檢視了「白種男人的黑種男性」神話建構和強化的方式。地理學者已經拆解了地方和膚色的關連，例如文學和地理文本中 (Barnett, 1996; Jarosz, 1992) 將非洲再現為「黑暗」大陸的方式，皮特斯 (Pieterse, 1995) 則檢視了西方流行文化裡的非洲形象。

在挑戰負面涵義 (connotation) 方面，**黑就是美** 這句話成了黑人自豪的象徵，但這有逆轉並頌揚胡克斯 (bell hooks, 1991c, 1994) 所謂的白人異性戀父權社會所強加之特徵的危險。都希爾 (Ann DuCille, 1996) 注意到，透過廣告宣傳的商品化，「資本主義挪用了它視為**黑人特性** (blackness) 的某些符徵，並讓它們可

譯註 2：這部電影出品於 1971 年，於 2000 年拍了同名續集，或譯為《神探沙夫特》、《鐵杆神探》或《殺戮戰警》。

以行銷」(p. 27)，但還是沒能大量雇用黑人模特兒。維吉斯(Debbie Weekes, 1997)則傾聽了英國年輕黑人女性在面臨矛盾的
黑人特性意象時，如何界定美貌。

3 家、地方與認同

HOME, PLACE AND IDENTITY

導言

71

我在前兩章主張，性別和體現的社會建構，結合了物質社會關係和差異的象徵再現，從而區分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區別尊崇和厭惡、渴求和討厭的事物。以同樣方式，家的「現實」和象徵意義會結合起來，在不同社會以不同方式建構出特殊的家。

「家」一定是英語裡意義最深遠的字眼之一，實際上，在許多語言裡都是如此。例如，地理學家哈維經常回顧德國國社黨份子海德格（Heidegger）的著作，以及他有關寓居（dwelling）或家乃是人與物達成精神統一之關鍵位置的論點。這裡有個例子，是海德格對於黑森林農舍（他理想的家）的詩意描述：

力量的自足令大地和穹蒼、神性與凡人融為一體（*oneness*）而進入了事物，讓房屋有了秩序。它將農舍安置於南向的背風山坡，鄰近泉水的草地上。它賦予房舍寬闊低垂的木屋頂，合宜的斜度可以承載積雪的重量，屋簷深深下探，庇護廳室，可以抵擋漫漫冬夜的暴雨。它也沒有忘記大桌後頭的角落聖壇：它在房間裡替神聖的兒童床和「亡者之樹」（這是他們對棺材的稱呼）留了位置，如此，它在同一個屋簷下替不同世代設計了各自生命旅程的特質。這是從寓居中現形的技藝，依然將工具和框架當做物品來使用，建造了農舍（引自 Harvey, 1996: 300）。

72

對法國理論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哈維也引述他的著作）而言，寓居和家也是人類發展出歸屬某個地方的感受的關鍵元素。

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在價值層面，它們一起構成了記憶和意象

的共同體。因此，房舍不只是每日的經驗，是敘事裡的一條線索，或是在你訴說的自己故事裡。透過夢想，我們生活中的寓居場所共同穿透且維繫了先前歲月的珍寶。因此，房舍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的最偉大力量之一……。沒有了它，人只不過是個離散的存在 (Bachelard, 1969)。

我們在這裡見到了有趣的雷同之處：家和身體都是記憶的儲藏所。巴舍拉對於家的觀點，影響格外深遠。比如說，梅爾斯 (Nancy Mairs, 1989) 在她對童年及因多重硬化症而逐漸無法動彈的動人記憶裡，以及法國人類學家巴勞爾 (Joelle Bahloul, 1992) 在她對位居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猶太祖先房舍的人類學研究裡，都在書首引述了巴舍拉的話：「被『收容』的不僅是我們的記憶，還有我們遺忘的事物。我們的靈魂是個居所。只要記得『房屋』和『房間』，我們就學會了居住在自己裡面」 (Bachelard, 1969)。

所以，我們在這見到了詩意的描述，理論家賦予房屋和寓居力量，帶有庇護和安全、愉悅的意味，還是記憶的儲藏庫。在某些意義上，這兩位男性理論家，巴舍拉以及尤其是海德格，似乎都要追回前工業的田園景緻，當然兩者都否認，在建構和維持一個居所，把房舍轉變為家時，男人和女人的勞動。例如，在海德格的引言裡，農舍似乎是自行興建，是個幾乎和地景一樣「自然」的現象。不過巴舍拉的著作，顯然是要對女人「說話」，因為他承認家在意義和主體性的建構上非常重要。家庭空間是「社會秩序的物質再現」，而且「社會再生產，乃透過再現於棲居場所的社會秩序的象徵性永存來達成維繫」 (Bahloul, 1992: 129)。

這種在家庭空間和秩序裡的**再現**，正是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謂的**習癖** (habitus) (Bourdieu, 1977)。因此，對巴

勞爾而言，她從 1937 年至 1962 年間阿爾及利亞一棟房子裡的居民得來的家園回憶，是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整體社會秩序，以及猶太人和穆斯林在其間位置的再現。因此，家庭空間裡社會關係的焦點，跨越了私人和公共、特殊與普遍的邊界，而且不同於經常出現的錯誤斷言，並非聚焦於「只是」家庭或私人領域。

家務領域的起源及其在工業社會裡的空間分隔

家庭做為安全和休憩的場域，與工作的殘酷世界區隔開來，這種家庭的精神性物化，不僅見於海德格的著述，而且傳揚廣泛；拆解和揭露這種觀點背後的假設，正是 1968 年以後女性主義者某些最早期著作的焦點，並奠基於先前數十年女性主義理論家的卓越批判。這些女性自 1960 年代晚期以來的書寫，指出了都市空間劃分為家庭和支薪工作（waged work）兩個世界——所謂與女人相關的私領域，以及男人的公共世界——在西方是伴隨工業資本主義而發展，對女人的生活和地位造成了巨大影響（Allen and Crow, 1989; Mackenzie and Rose, 1983; Madigan and Munro, 1991）。對於那些受到鼓勵（某些情況是被迫）去認同、並受限於家庭的女人而言，家庭「是交替著褫奪權利、虐待和實現的位址。正如傳統上我們鼓勵男人『謀取好生計』，但期待女人『持家』」（Mertes, 1992: 58）。由於將持家視為仰賴女人的「自然」技能，而且沒有財務報酬，家務於是遭致貶抑，長期未能形成理論。

然而，每個女性深知家事的現實，十分單調乏味而反覆，而且在許多地方是極為辛苦的勞動，包括了家事和育兒。十九世紀

晚期開始，英國和北美組織起來的宣傳活動，要藉由某種國家提供的家庭津貼，來表彰女性對家庭和經濟的貢獻。例如，史普林·萊絲（Margery Spring Rice）於 1930 年代致力宣揚促進勞工階級女性的健康，做為運動的一環，她進行一項針對 1250 位貧窮女性的問卷調查，揭露了她們家務工作的單調沈悶，以及仰賴不足收入過活的掙扎。如史普林·萊絲說明的，女性的工作乃「為愛」而為，

比任何男性工作更為持續不懈，而且只有其中最堅強的女人，才能保持工作水準，並且防止在健康、幸福，以及如果不是道德而是文化水準方面，太常見到的悲慘下滑。最不可指望她們的就是平靜思考，以及從事手頭上立即得做的工作的最低要求以外的其他活動。她們過著私人且往往十分孤獨的生活：她們的工作既無報酬，亦無組織。不僅她們自己，另外一半仰賴家務而成長茁壯的公眾，都將家務的必然性視為理所當然。對於現在婦女能夠投票選舉的下議院議員而言，他們看不見在家庭狹小陰暗無組織的工作場所中，發生了什麼事情（Spring Rice, 1981: 18）。

74

這是強而有力的懇求，要求承認家事其實是跟任何其他形式相同的工作，但家事環境往往比其他工作場所糟糕得多。如史普林·萊絲所述，待在家裡是一種孤立的經驗：

絕大多數男人的工作遠離他們的家庭，回到家裡是為了休憩。幾乎所有家庭裡，除了非常年幼的孩童外，所有小孩都花費大量時間離家在外，若不是在學校，就是離校後在他們打工的地方。對他們而言，家庭也是玩耍或休息的地方。對父親和小孩都一樣，這些離家的時間，帶來了新的接觸和休閒娛樂，例如俱樂部、露營與遊戲，以及更嚴肅的興趣。但是一般而言，母親都待在家裡（1981: 13-14）。

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一些烏托邦思想家建議了一些重組家庭供應的辦法。海登（Dolores Hayden）在她的書《七個美國烏托邦》（*Seven American Utopias*, 1976）裡，記載了 1790 年至 1935 年間，由公社主義社會主義者發展的沒有廚房且分享設施的住宅計畫，類似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歐文派社會主義者（Owenite socialist）的提議（有關他們提議的簡述，參見泰勒〔Barbara Taylor〕的《夏娃與新耶路撒冷》〔*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1983〕）。可惜，這些實驗大多數不是沒能開展，就是猶如曇花一現。美國作家和小說家基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當時稱為史蒂森〔Charlotte Stetson〕）1989 年出版了《女人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她也於書中批判了女人的家奴身份，並主張她們應該參與公共領域。她不但認為參與公共領域是確保女人平等的根本，也熱情地相信合作和撫育的女性特質，對於促使過度武斷好鬥的男性公共世界恢復「平衡」，亦屬必要。她主張女人跟男人一樣，應該離家來擔負「世界—工作」（她的用語）。

基爾曼也在她的小說裡處理女性主義議題，初版經過一個世紀後，有些篇章讀來仍饒富興味。《黃色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1892 年）是描寫一位年輕母親遭到善意的丈夫逼瘋的故事，直到 1970 年代女性主義重新詮釋以前，這部小說顯然是被當成恐怖故事而再版。在一系列其他小說中，包括她最著名的《她鄉》（*Herland*）（1915 年），基爾曼描述一個虛構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女人握有權力，家事不再專屬於家宅，育兒是集體責任。在將近一個世紀後，這些想法看來依舊基進，甚至是空想。

然而，西方十九世紀工業社會中發展出來的家庭與工作之分，以及女性在家中的孤立隔絕，從來就不是嚴密完整的——英

國在 1850 年到 1950 年的一百年間，有超過三分之一女性捲入了某種形式的支薪勞動。但是在十九世紀，當男人認識到來自薪資較低的女性勞動的競爭威脅時，女人逐漸被排除在薪酬較佳的工業職業之外。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仰賴工資維生女人的小孩置身低劣環境，兒童死亡率極高，促使慈善家支持不該容許女人參與某些工作的主張（C. Hall, 1992）。重要的是要記得，對勞工階級女人而言，要能確保她們的家庭達到堪稱合理的生活水準，並且保證她們的男人每天吃飽穿暖去上班，所需要的家務工作非常辛苦而費時。想像十九世紀，當礦場既無淋浴設施，家裡也沒有自來熱水時，一名礦工的妻子要做些什麼工作（McDowell and Massey, 1984）。

家裡的天使

然而，家中勞動的意義，及其再生產工業勞動力的重要性，儘管有我前文討論過的例外，但至少在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很容易遭致忽略。相反的，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期間，但在英國始於更早時期，家聯繫上了**對立於**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建構的特徵。因此，在英國，一如其他工業化時期的西歐社會，家被賦予一種精神特質（令人想起本章開頭引述的海德格段落），而且家的理想化具備了宗教特性。家事，尤其是育兒，被當成女人「神聖的」本分，她們和一家之「主」在家裡受到保護，免於為嚴酷競爭的資本主義世界傷害。家成為情感生活的理想中心，在其他地方可能偽裝起來的感覺，在家裡得以充分展露。因此，家被建構成愛、情感和同情的所在，養育和照顧他人的重擔則加諸女人身上，卻將女人建構為「天使」，而非勞工。家也成為男人價值

的地位象徵，但鼓勵女人不僅要達致更高的清潔標準，也要裝飾和美化他們的家。莫悌斯（Mertes）引述一名美國勞工領袖於1906年發表的演說，巧妙概括了盛行的意識形態：

我堅信，致力於家庭職責的妻子或母親，為支撐家庭做出了最大貢獻……我有信心，除了……妻子除了履行她天生的家庭職責外，她會執行那項最令她快樂的工作，致力美化居家環境（Mertes, 1992: 66 引自 Gompers）。

請注意甘培斯（Gompers）的假設，不僅認為女人做家事是天生自然，還假定做家事令人愉悅！

工作生活與家庭生活的完全區隔，以及將女人排除在外，這種情形在英國與美國的中產階級裡最盛行。例如，霍爾（Catherine Hall）追溯了凱德貝瑞（Cadbury）家族的歷史，顯示了男性凱德貝瑞成員的妻子與姊妹，如何緩慢但徹底被排除在公司商業生活之外（Hall, 1982）。到了十九世紀末，不只是家族成員，所有已婚婦女都禁止在伯恩維里（Bournville）的凱德貝瑞工廠工作。然而，中產階級女人閒散奢華的生活或是「好工作」，端賴她們的勞工階級姊妹努力，來維持她們勞動密集的維多利亞式家庭生活的安穩順暢。英國十九世紀末，將近一百萬名女人在其他女人家裡工作賺取薪資，其他婦女則被迫在自己家裡從事支薪工作，例如接受送洗衣物或寄膳宿者。這兩種工作都是在家裡的「家務」就業，儘管前一種情況是在另一個家庭的家裡，這個事實意味了這種女性就業形式遭到忽略，並聽任其不受管制。這並未導致將女人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的要求，像排除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廠和礦井外那樣。

霍爾是早期研究女性家務勞動的史學家之一，她在這方面及

其他主題的論文，集結在《白人、男性與中產階級》（*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裡。在此，她主張

家庭主婦很少認為她們自己有歷史，而史學家不認為家庭主婦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但是〕女人在家的歷史——像是婚姻、育兒和家務勞動的變化性質——是急需探究的領域……身為家庭主婦是一種由社會界定的身份，而且在不同歷史時刻會改變定義（1992: 43）。

霍爾自己，她與大衛朵夫（Leonore Davidoff）的合作（Davidoff and Hall, 1987），以及我前面提到的凱德貝瑞家族研究，在揭露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的女人家事歷史方面，深具影響力。她提及中產階級女人逐漸退縮到她們家居的隔絕隱遁中，勞工階級女人則遭到許多行業和服務活動排除。她認為，家務活動的限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許多行業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組織，先前屬於延伸家戶的一部份：

77

釀酒業是個典型的例子：這是特別受女人歡迎的企業領域，但是到了十七世紀末，釀酒變成一個有組織的行業，不再對女人開放。可在家中習得的技能，不足以建立女人在同業中的地位——當然，如果女人願意的話，她們還是可以替自家釀酒，但那變成了私人活動，可能不容易擴展到社會領域……資本家和勞工的區隔，以及家庭和工作場所的分野一旦發生，對男人而言，為保護而組織他們的行業，就變得更重要：商品生產和家務勞動的區隔，是無可避免的結果，除了既有的雇主同業公會外，男性工人聚集起來，雇員開始組織結社。對於位居支薪勞工新位置的熟練工而言，為了能妥善地協議，他們必須仰賴冗長的學徒期和許多入門限制，來維繫他們的獨占地位：最容易排除的群體就是女人（Hall, 1992: 52）。

不但男人聯合起來，將女人排除於行業外，在十九世紀期間發展的慈善運動，也使女人越來越侷限於家中，例如，爲了女人自己的健康著想，她們被那些人們認爲需要體力且危險的行業排除在外。採煤業是個典型事例（參見 John, 1980）。在英國，完成意識形態排除（如果不是完成了實際排除的話）的第三個要素是宗教。清教徒革命時代以來，以及由於後來不信奉英國國教的中產階級崛起，女人被建構爲次等人，是她們丈夫的家庭伴侶。霍爾（Catherine Hall, 1992: 58）引述密爾頓（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的亞當（Adam）：

因為女人身上
找不到比學習家事，並幫助她丈夫做好工作
更美好的事物了。

78

大衛朵夫與霍爾（Davidoff and Hall, 1987）也認爲，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期間，福音傳道運動的發展，對於家庭化女性氣質（domesticated femininity）的特殊觀點的出現很重要。福音運動採取理性科學的世界觀和道德秩序，將神話、迷信和自然，同需要加以控制的劣等人（女性、兒童、鄉村居民和勞工階級）關聯起來。

性慾，被視爲最非理性的力量之一，被劃歸婚姻的內在核心，性的展現則成爲理性工作的終極對立面。女人，尤其在懷孕而成爲明確清晰的性存在時，便聯繫上了獸性，而與世界的嚴肅工作不相容。科學和公共衛生運動援引了純潔和汙染的範疇，區隔了廢料、廢物和垃圾與有用的東西，以便控制有害的物質、景觀、聲音、氣味——還有人群（Davidoff and Hall, 1987: 26-7）。

這裡我們再次看見，女人身體與女性氣質和家的社會建構的類似之處。所以，女人——或應該說是已婚婦女——被建構成需要控制。而且，有鑑於性慾和汙染的關聯，有點諷刺的是，女人也被建構為純潔和神聖，成為家庭領域的天使，職責是替家庭帶來秩序。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進展，家被描繪成無法在他處（比如男人繁忙的工商業世界）覓得的德行與情感來源。羅斯金（*Ruskin*）在他的論文《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裡指出：

這是家最真實的性質——它是和平之所——不僅抵擋一切傷害，而且防禦所有恐怖、疑慮和分裂的避難所。若非如此，它就算不上是家；只要外在生活的焦慮滲入其中，或者外在世界那個意向不一、未知、沒有愛，或者有敵意的社會，因丈夫或妻子允許而跨越門檻，它就不再成為家（引自 *Hall*, 1992: 61）。

羅斯金本人並未設法營造幸福的家庭生活，因為他受到與他對妻子身體和性慾的想像相反的現實所震撼。但即使是創造和提供這種家的意識形態的當時，某些評論家還是不為這類修辭所惑。1825年出版的《為半數人類請命》（*Appeal on behalf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裡，湯普生（*William Thompson*）反而將家描述成「妻子的終生牢房；她丈夫把它粉刷為平靜幸福的住所，卻仔細在房門外尋找一種沒那麼平靜，而是更紛雜多樣且令人興奮的幸福」（引自 *Hall*, 1992: 61）。一百六十年後，女性主義作家坎普貝爾（*Beatrix Campbell*）以幾乎完全相仿的措辭寫道：「英國男人的家或許是他的城堡，但他卻小心不在那裡花費太多時間」（*Campbell*, 1984）。很顯然的，二十世紀對家務勞動及家有如監獄的批判，有個早期的先驅。

然而，「女人的地方就在家裡」的意識形態，成為遍及十九世紀英國所有社會階級的主導意識形態，並且牢牢攫住了所有女人的生活和心靈。這意味了對「外出工作」的勞工階級女人而言，家事仍是她們生活的份內工作。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韓弗瑞斯（Jane Humphries, 1977）承認十九世紀許多勞工階級女人家務工作的重擔，但她反對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受困家中必然身受壓迫的正統主張。她指出，付給男人的那份家庭薪資，可以讓女人待在家中，提昇許多勞工階級家庭的整體生活水準。在羅伯茲（Elizabeth Roberts, 1988）針對二十世紀初住在蘭開斯特（Lancaster）的勞工階級女人的口述歷史中，她也發現，許多勞工階級家庭的性別關係，主要是奠基於合作，而非對抗。男人和女人深知造成他們貧窮的不平等和不正義，渴望找到一種「過得去」的方式，並且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盡力培育子女。因此，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超過了性別差異。

二十世紀初期的數十年間，家務工作和女人之間自然化的關聯，以各種方式制度化，儘管有兩次世界大戰的「起伏」（blips），當時女人為了回應勞工短缺，不顧家務，大舉離家（參見圖 3.1）。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注意戰爭期間的政府宣傳，將工業勞動比喻為各種家務事，以便鼓勵女人參與。例如，把焊接比擬為編織！儘管整個二十世紀，女人開始從事支薪勞動，人數逐漸擴大，尤其是在英國，女人從事兼職以便結合她們的「雙重角色」，但是直到與 1970 年代工業再結構有關的服務部門就業的顯著崛起，家庭生活的意識形態才遭到嚴重挑戰。在兩次大戰之間以及戰後，家務工作更穩固地建構成為女人生命的本分。例如，家政學（domestic science）發明出來成為學校科目，後來還成為



圖 3.1 鑄釘工羅西：第二次世界大戰女性勞工的熟悉形象。

80 大學的學科，而且主要只對女孩講授。家裡的家務工作，特別由逐漸變得專業化的廣告工業，呈現為理性且系統化的一組作業，需要專門化的工具和其他財貨。當時女性主義理論家關切的主要早期工作之一，就是考察家庭領域中的女人角色，還有她們的勞動對於再生產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維繫女人壓迫結構的貢獻。

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

81 儘管有基爾嫻的先驅工作，但是直到 1960 年代晚期以後，婦女運動再度繁盛，女性主義做為一門理論學科開始發展以前，賦予家務勞動理論解釋的工作一直是步履蹣跚。受到當時主導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觀點影響，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激辯著家務勞動做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裡的範疇的意義。當代女性主義者援用恩格斯討論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裡家庭和私有財產角色的早期著作，認為區分工廠和辦公室裡的生產性工作，與女人在家中的再生產勞動，對於資本主義運作是必要的。按照這種觀點的說法，女人的家務勞動，在日常和世代的基礎上再生產了勞動力。女人讓男人保持清潔、吃飽穿暖，準備好每天外出工作，並且生育和照顧擔任未來勞動力的小孩。因此，女人也受到資本主義剝削，但也有人主張，她們還遭受個別男人剝削，在家裡占用了她們的勞力。就像沃爾碧（Sylvia Walby）解釋的：

女人幹的活，可能包括了從替丈夫燒飯洗衣，到照料他們的小孩。身為家庭主婦的女人為丈夫幹這些活。在這些生產關係裡，家庭主婦為剝削她的丈夫從事勞動。她並未因這種勞動而得到金錢報酬，僅僅維持生活而已（有時候）。妻子勞動的產物是勞動力：她自己、她丈夫，以及她小孩的勞動力。丈夫能夠占用妻子

的勞動力，因為他擁有她所生產的勞動力。他可以當這項勞動力是他自己的，並加以出售（1989: 221）。

家庭也日漸成爲市場，容納了資本主義體系大量生產的商品，當中有許多物品，先前是由個別女人自家產製的。例如，像罐頭食物和果醬這類產品，以及商業釀製的啤酒，取代了家庭生產。而且，連同工廠製造的廉價衣服、肥皂等，變成了消費品。家庭逐漸變成消費單位，而非生產單位。

愛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 1979）在最早且深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裡，界定了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造成女性劣勢的男性權力體制）的關聯，認爲女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履行了四項主要功能。首先，她們執行社會界定的角色，諸如妻子或母親，從而穩定了父權結構，尤其是家庭；其次，她們爲支薪與不支薪的勞動力，再生產了新勞工；第三，她們以身爲生產者的角色，穩定了經濟；以及最後，她們自己在勞動市場裡工作，賺取比男人低的薪資。我會在下一章探討第四項功能，而且誠如你記得第一章提過的，沃爾碧（Sylvia Walby, 1990）認爲家務勞動和支薪工作，正是當代工業社會中六組父權關係結構裡的兩組。

82

計算（與支付）婦女的家務工作？

除了在理論上討論家務勞動外，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對於承認和報償女人的在家工作，也有實際貢獻。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家務有給一度是英國女性主義運動的訴求之一。然而，由於某些人認爲支付女人的家務工作，將會強化女人的家務工作責任，從而鞏固了其附屬地位，所以這項訴求從未獲得全面性支持。這可能使女人更難以挑戰既有的性別區分，以及進入支薪勞

動市場裡薪資較佳的職業。相對的，這些女性主義者主張，男人應該接受他們在家中的責任，分擔家務工作。

不幸的，1960年代迄今的時間預算調查(time budget survey)說明了，男人明顯表現出不願意公平分擔家務。1995年，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針對男女時間運用調查得到的數字顯示，女人一天平均花68分鐘煮飯，86分鐘照料小孩，25分鐘洗衣，70分鐘打掃和46分鐘購物。相較之下，男人只在廚房花28分鐘，55分鐘跟小孩在一起，3分鐘洗衣，43分鐘打掃並做其他家庭雜務，以及26分鐘購物。其他研究也顯示，當女人也從事支薪工作時，她們為家務工作付出的貢獻減少，但降幅不大。她們的男性伴侶投入家事和育兒的時間確實稍微提高，有趣的是，這些時間與女人的賺錢能力成正比(Morris, 1992)。

當家務工作是由女人在其他女人家中執行的時候(我會在下一節更詳細檢視支薪的家務工作)，其價值就進入了國內生產毛額的國家經濟估算中。然而，不支薪勞動未計算在內。多年來，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和其他人一直主張，這是一項明顯的差距，而且女人不支薪勞動的估算，應該納入國家會計系統(Waring, 1989)。終於在1997年，經過卅年以上的施壓後，英國政府承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如果計入家務勞動，經濟體會擴大一倍以上。剛才概述過的時間預算調查，透露了人們花在做家事上的時間，是工作時間的一倍半。國家統計局估計，如果以和支薪工作相同的平均比率，來估計花在非支薪工作上的時間，其價值將是每年7390億英鎊的龐大數額。如果推估的價值是將工作拆開，以平均薪資費用來聘僱保姆和托兒來照顧小孩，僱清潔工做家

事，請油漆工和裝修工來代替自己動手等等，那麼總額會降到3410億英鎊，因為這些工作在勞動市場裡位居最低薪資之列。即便如此，這個數字是當前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6%，其產值超過英國製造業部門的總和。

雖然這些工作實際獲得金錢報酬的前景黯淡，但是這些工作納入國家會計帳，以及政府承認了女性主義的論點，認為無論支薪與否，主要由女性在家中承擔的家務工作依然是工作，已經是往前邁進了一步。下一節，我要檢視支薪家務工作——它也是（但不全是）由女人擔負的工作。

有酬家務勞動

家裡的有酬家務工作，不僅質疑社會上接受的家的意義，以及家與私人及家庭之間的關聯。還揭明了家庭、階級位置和種族差異之間的複雜交錯，正是這種交錯區別了女人，造成女人之間的分化。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支薪家務勞動在前文及第一章的父權體制理論化中遭到了忽視，這種理論假設所有家務勞動，都是女人處於一種與個別男人的依賴關係中，「為愛」而做的。

家中的有酬勞動——主要是打掃和育兒——由勞工階級女人為中產階級女人執行，在美國和加拿大，通常是由有色人種女人替白種女人工作。因此，對於家庭生活的共同膜拜——這是同時在工業英國和美國發展出來的觀念，認為女人是家裡的天使——在這兩個國家間，以及事實上在兩國內部，採取了不同的社會和地理形式，取決於將勞工階級女人和有色人種女人納入家庭幫傭的方式。

在英國，地理學家葛瑞格森與洛威（Nicky Gregson and Michelle Lowe, 1994），考察了不同形式家務工作的地理模式。她們發現，日常打掃工作主要是由地方勞動市場填補，至於育兒，尤其是住在雇主家中的保姆工作，則吸引了更大範圍的年輕勞工階級女人。她們特別注意到，來自英國北部地區的年輕女人，移動到倫敦和東南部的中產階級家庭裡工作。誠如她們在書中序言所論，

當代英國的支薪家務勞動，以及尤其與育兒相關的勞動，是一項情感議題。這種現象質疑了所有女人與家務勞動之間的關聯，以及家務勞動是為愛而非為金錢而做的無薪給活動的假設。另外，它似乎產生並反映了某些女人之間的重大差異與區別（Gregson and Lowe, 1994: 5）。

她們認為，把育兒建構成一種活動的有關性別、愛和照料的假設，是她們所謂雇員和雇主間「虛假親屬關係」（false kinship）的建構基礎，將育兒建構成私人和訴諸情感的工作，而非直截了當的薪資關係。結果，親屬關係的觀念時常導致捲入關係兩方的女人之間的困難，以及保姆和其他家庭勞工對受雇條件和環境的不滿。

葛瑞格森與洛威發覺雇主和家庭雇員間有族群差異的例子很少，但是在美國，家務工作不但有階級區分，也有族群分化。在南方各州，黑人家事服務是奴隸制建立模式的殘餘，而且如霍格（Haug, 1992）指出的，「黑人保姆形象」已經成為文化刻板印象。在美國北方城市和加拿大，貧窮的白人移民女性起初掌控了家事服務（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的小說《化名葛瑞絲》〔*Alias Grace*, 1996〕，是針對 1840 年代加拿大一名這類女人

表 3.1 從事私人家戶服務受雇婦女比例，依種族族裔群體分，1900-1980 年，美國

	1900	1930	1960	1980
非裔美人	43.5	53.5	39.3	5.0
歐裔美人	29.8	12.0	4.4	0.8
美洲印第安人	13.4	22.5	16.8	1.4
華裔美人	35.6	12.1	1.7	0.8
日裔美人	28.6	29.9	8.2	1.4
菲律賓裔美人	n.a.	34.4	3.7	0.9
墨西哥裔美人	n.a.	33.1	11.5	2.4
美屬波多黎各人	n.a.	n.a.	1.2	0.7
波多黎各群島	78.4	27.5	13.7	1.4

資料來源：

T. Amott and J. Mattheai, *Race, Gender and Work*, Montreal and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1991 p. 325, 表 10.3。

的生活和境遇的引人入勝評價)。然而，美國於 1940 年代以後，隨同被新工業僱用的男人，越來越多受雇黑人女性大規模遷移到北方。在西南各州，起初則是僱用墨西哥移民與原住民從事家務工作。只有在西岸，由於聘僱中國男人而打斷了性別和家務勞動之間的關聯，中國男人的男性氣概因而遭受懷疑。

表 3.1 顯示，美國於 1900 至 1980 年間，家務僱用的族裔分類。對黑人女性而言，特別是南方黑人女性，沒有什麼其他工作可供選擇，尤其是第二次大戰以前。以類似一般女人透過一套二元對比而被建構為不如男人的方式，在奴隸時期發展且在家事服務中延續下來的一組兩極對比，使得白人與黑人女性相互對立。其他關係性範疇就以這種方式映繪於黑 / 白二分上，諸如性感 /

冷感、不潔 / 純潔、汙穢 / 清潔、動物 / 人類、放蕩不羈 / 品性端正。因此，骯髒的家務工作就由本身被建構為低劣和汙穢的女人擔任。

在英國，類似的一組兩極對立被用來區分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女人，或許以最極端的形式，展現在迷戀「骯髒」勞工階級女人的維多利亞時代學者兼律師孟比（Alfred Munby）的素描和照片裡；麥可林托克（Anne McClintock）在她那本激勵人心的書《帝國皮革》（*Imperial Leather*, 1994）裡，於帝國主義脈絡下，進一步探討了骯髒、種族和階級的關係。

在美國，針對非裔和非洲加勒比海裔出身女人擔負的支薪工作性質變化的歷史評估，顯現了近來的經濟變遷。以及轉向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替有色人種女人打開了家事服務以外的其他機會。然而，很多人從家庭領域的烹調、備便飲食、打掃清潔和育兒，轉移到商業組織裡的同類型工作，譬如洗衣店、療養院、餐廳和速食店（Amott and Matthaei, 1991; Glenn, 1992）。而且還是有許多有色人種婦女在其他女人家裡工作。

在南非，性別和種族同樣彼此相關，這個世紀以來，幾百萬黑人女性離開她們鄉村地區的小孩，搬進城市去照顧白人小孩。波佐里（Belinda Bozzoli）動人的書《富肯的女人》（*The Women of Phokeng*, 1991）裡，在寇特索（Mmantho Nkotsoe）協助下，紀錄了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生於農村南非富肯的年長黑人女性的生命故事。種族隔離政策期間，她們住在波普那共和國（Bophuthatswana）的「家邦」。誠如波佐里提及的，大部分史書並未記載這種女人的生活，她們早期身為農民女兒的生活，或者成年後極度艱苦期間採取的應對策略，鮮少為人所知。這個計畫

包含的十六名婦女，大多在二十歲左右成爲都市勞工，其中很多人擔任女僕。她們的遷移有個共同模式，遷移會逐漸增加距離，先移往附近的城鎮盧斯騰堡（Rustenburg），之後再搬到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波佐里描述這些女人從事家事服務的原因，以及她們對此事的觀點。她提醒我們，不要不自覺就將這些女人視爲受壓迫或無力（disempowered），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不應該假設選擇家事服務爲職業，完全出於偶然，或僅僅是勞動市場經濟的結果。在引導女人從事這類型工作上，跟較大的結構性力量一樣重要的是，從她們自己對處境的覺察的觀點來看，家事服務是相當不錯的交易……。這是在這個或那個勞工階級職業之間做選擇，而且就像一名女人說的，「廠商」（意指公司）顯然「不適合女人」。有些因素強化家事服務成爲一種職業選項，包括傳教士幫她們爲這種工作做好了準備，以及她們接受了家長統治的意識形態。根據莫柯爾（Nthana Mokale）（受訪者之一）的說法，家事服務比農場工作好得多——事實上，它被認爲提供了一份良好收入，能爲家庭所需賺取足夠薪資，以及爲成就好姻緣備妥必要的初始嫁妝。女人自己的工具主義，在這裡也扮演一定角色，這使她們保持清醒，記得她們是爲了自己而來到城市，爲了實現自己的夢想，入侵城市來獲取她們需要的資源（Bozzoli, 1991: 96-7）。

對於那種將女人建構爲受害者、不相信她們自己的能動性，以及充分利用有限機會的方式的分析，這是很重要的矯正。還記得在第一章裡，坎蒂猶娣（Deniz Kandiyoti, 1988）主張，女人和父權體制及家長制「協商」，與環境抗爭，但也在既有處境中做最佳選擇。波佐里和寇特索栩栩如生記載的這十六名女性的生

活，無疑是奮鬥的人生。她們有很多人終生是政治積極分子，反抗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政策，尤其投入了反通行法（pass laws）的運動。這些女人仰賴她們的家族，以及波佐里所稱的「家邦女人」（homegirl）的網絡。她們利用這些網絡，在薪資較佳郊區的勞動市場建立了好位置，在某些案例裡，她們並非家戶裡唯一的家務勞工。以下是波佐里研究中的兩個女人，回顧她們 1920 年代的情況：

梅克格威（Mekgwe）太太說，「女人只打掃和照顧小孩」。男性家僕早期壟斷了家事服務，在這一行仍占優勢，他們通常執行諸如園藝和烹飪的工作。莫柯爾說，像是在她受雇的家庭裡，「我簡直就是從富肯來的猴子，只能煮粥類食物，不能做砂鍋菜」。莫索托（Mosotho）的男性擔任烹飪、服侍和園藝，而「我只打掃房屋並照顧小孩，你知道，就像保姆一樣」。到了傍晚，「他煮晚餐、擺飯桌、上菜，我則幫小孩洗澡，哄他們睡覺」（Bozzoli, 1991: 99）。

所以，當時南非的家事服務中，有內部的性別分工，男人跟女人一樣都是僕人。相同的區分可以在譬如今日的加州城市裡發現，拉丁裔女人從事育兒和家事，拉丁裔男人則受雇擔任臨時雜工和園丁（Romero, 1992）。在英國，家務工作壓倒性地是由女人擔任，而且有地位層級，像是打掃被視為比較不需技能，和育兒的薪資相比，通常報酬低微（Gregson and Lowe, 1994）。對許多女性家務勞工而言，尤其是那些從鄉村移往城市的遷徙者，或是跨國移民，接受這種工作通常意味了遠離她們的小孩，以便照料那些較富裕女人的孩子，因而中斷了她們自己生命中母職和家庭的連結（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加拿大的家務工作：建構刻板印象與差異

經常有人主張，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重點，會隨著實踐者的年紀而改變。那麼，或許是反映了加拿大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日漸成熟，最近一期《性別、地方與文化》刊載的兩篇文章，聚焦於族群特性和差異的建構，以及這種建構如何影響不同背景女人在加拿大城市裡擔任保姆和其他家務勞工的就業。在第一篇論文裡，普瑞特（Geraldine Pratt）一開始便澄清她自己對這個主題的真實興趣：「早在我的小孩出生以前，我就很擔心日間托兒的事」（1997: 159）。讓身兼母親和地理學者的普瑞特感興趣的煩惱之一，是保姆仲介、政府政策和個人實踐建構種族刻板印象的方式。史蒂爾與英格蘭（Bernadette Stiell and Kim England, 1997）所寫的第二篇論文，處理了類似議題，顯示如何透過一組複雜的制度實踐，產生了保姆階層。其中，白種歐洲人保姆地位高於有色人種保姆，這影響了家務勞工的權力與報酬，以及她們和潛在與實際雇主之間的關係。然而，普瑞特說明了這些關係（雖然是權力關係）並非直截了當的，而是被有關「母性替代、殖民過往、種族差異和上班母親的焦慮」的不一致和矛盾情感撕裂。

這兩個加拿大城市研究，連結了兩個在漸增的支薪家務工作地理文獻裡浮現的主要論題。第一個主題強調，對低收入女人而言，國內與國際移民日漸重要，並著重國族觀念或國族刻板印象的意涵（England and Stiell, 1997; Mattingly, 1996; Radcliffe, 1990）。相對的，第二個主題聚焦於「核心」經濟體裡的經濟與社會再結構，對於高薪高階工作的女人，以及進入低階「服務業」工作的低薪女人而言，如何改變家庭和支薪工作之間的關係（Gregson and Lowe, 1994; Moss, 1995a）。

家是天堂與（或）監獄

除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強調家務勞動的理論化，及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對於家庭結構和男性權力問題有興趣的女性主義者，自 1960 年代晚期以降，也開始建構一種家是牢籠或陷阱、監獄的論點（Gavron, 1968; Oakley, 1974），而且，對某些女人而言，家是個恐懼和虐待的位址（Campbell, 1988）。這裡的雙重焦點，是男性加諸女人的暴力，以及虐待兒童。有人主張，「英國男人的家是他的城堡」的假設，結合了家是私人關係的私人地方的觀念，導致國家針對男性權力凌駕女人的無可接受形式，抱持著官方的寬容。例如，家庭暴力不會被定義為像其他人際暴力形式一樣，是極度嚴重的身體傷害，而且警察不願意介入他們視為「男人和妻子」間的私人爭端。許多女人也不願意控訴，因為她們常常在經濟上依賴她們的男性伴侶，而且往往不是家的共同所有人或承租者。在英國，皮濟（Erin Pizzey）和其他人投入推動婦女庇護運動，在英國很多城市成立了一系列庇護所。

89

然而，在某種狀況下，有些當局擁有進入家中的權利，而且女人的行為與持家標準，過去曾受到監督，某些情形下目前依然如此（Donzelot, 1979）。例如，地方當局的住宅經理（housing manager）過去不僅發送施惠性質的清潔標準建議，還會不經通報，突然造訪。住宅移轉要求方面，在討論一項新分配時，將照料標準納入考慮，是司空見慣的事（Sarre et al., 1988）。社工人員、強制就學官員、衛生訪視員和社區護士，依然有權進入家中。

然而，在這段時期的理論文獻上，有個或許過於簡單的假設，認為家庭和國家制度結構——例如，福利國家和醫療專業——會自動成為父權壓迫的工具。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

1977年的書《婦女與福利國家》(*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就是這種取向的好例子。當人們察覺機構經常反映並引發更矛盾的目標和政策時，一種更細緻的論點逐漸為人聽聞。對許多女人而言，家庭不只是壓迫性社會關係及(過多)家務勞動的位址，還是透過浪漫愛，以及與小孩和其他受撫養家屬間的關係，而獲得自我實現的場域。同樣的，雖然福利國家的機構或許反映了女人依賴男人的假設，但這些機構也在各種政策和計畫上支持女人及其小孩，提供許多女人支薪工作機會(Pateman, 1989)。

認為家是壓迫之所在的斷言，尤其遭受黑人女性主義學者和作家的批評。她們主張，對她們來說，僅能憑靠家這個地方來逃離最初的奴隸制度，以及後來的種族歧視社會：美國女性主義作家胡克斯(bell hooks)所稱的「白人至上主義資本主義父權體制」。在廣為引用的論文〈家園：一個抵抗的位址〉(*Homeplace: a site of resistance*)中，她認為，「黑人女性藉由打造家園來抵抗，家是所有黑人……能夠在我們的理智和心中得到肯定的地方，儘管有貧窮、困苦和剝奪，也是我們恢復在外頭公共世界裡遭致否定的尊嚴的所在」(1991b: 42)。

最近的女性主義著作裡，已經更廣泛認識到家的矛盾特質，也承認了女人為改善有害的居家環境而投入的鬥爭(Breitbart and Pader, 1995)。

無家可歸

不過，在英國和美國，有越來越多人根本無家可歸。許多工業社會裡的貧窮和經濟再結構、男性失業，以及削減國家津貼(如果有任何津貼的話)，影響了遊民的規模和性質，導致越來越

多年輕人以街頭為家 (Sassen, 1990; Venness, 1992)。曾經有一度，刻板印象中的遊民，是有點浪漫化的流動勞工或流浪者：一種無法安定下來，扛起家庭和工作責任的男性形象。1950年代，這種形象的特殊版本，以垮掉的一代 (Beats) ——週期性踏上旅途的年輕人——的形式出現。他們的典型人物是克魯亞克 (Jack Kerouac)，他在《旅途上》(On the Road, 1957) 虛構了自己的某種生活版本，是一本象徵了青年世代反叛的書。不過，克魯亞克及其同伴只是不時踏上旅途：他們有家要回，也參與各種支薪工作 (Cassady, 1990; McDowell, 1996)。對其他男人而言，隨著戰後時期旅舍床位縮減，無家可歸越來越艱辛，平均餘命也嚴重降低。1990年代中期的英國，一名無家可歸男人的平均壽命，估計約為四十歲。

對女人來說，無家可歸挑戰了有關女人地方的每個假設，因此，許多女人經常試圖掩飾或否認她們的困境。在洛杉磯，曾發現無家可歸的女人住在汽車裡，在百貨公司裡更衣，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仍然保有工作。華森 (Sophie Watson) (Watson with Austerberry, 1986)、維尼斯 (April Venness, 1992) 和其他人也主張，僅僅在頭頂上方有個屋頂，並不算擁有一個家。例如，華森研究了寄宿工作的女人，或是住在旅社或臨時住所的女人。她認為，這些住在不安全住所的女人，也應該計入無家可歸的行列。

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右翼政府當選，連同橫跨那十年頭尾的經濟衰退，導致了低收入家戶負擔得起承租或購買的住宅逐漸短缺，以及越來越明顯可見的城市街頭無家可歸問題。在薩森 (Saskia Sassen, 1990) 針對倫敦、紐約與東京的比較分析中，她發現這些城市裡無家可歸的性質有所改變。除了男人，有越來越

多女人和小孩無家可歸。在紐約，有個「解決之道」是遊民侵入了地鐵隧道。墨頓（Margaret Morton, 1995）在一本出色的攝影論文裡，記錄了收入和財產極微薄的人，在這些隧道裡最惡劣的環境中，建構某種「家庭生活」的努力。

91

南加州大學的一個地理學家團隊，迄今好幾年來針對洛杉磯市區遊民，從事一種結合了學術和實踐的研究。羅威與吳爾屈（Stacey Rowe and Jennifer Wolch）於1990年發表一篇有趣的論文，描繪幾位無家可歸男人和女人的日常活動。她們發現，女人和男人之間（做為情侶或配偶）形成了雖然空間受限但複雜的網絡，對某些女人而言，在維繫相對安全和自尊，以及塑造街上的某種臨時「家庭基地」方面，複雜網絡扮演了要角。儘管傳統的父權分工在街頭重建，譬如女人還是承擔烹飪工作，但羅威與吳爾屈認為，這些網絡或許是脫離長期無家可歸的重要途徑，提供了一些支持和個人價值感。

在一項可以對照的研究裡，針對年輕得多的遊民群體，澳洲新堡（Newcastle）街童的社會—空間網絡，溫徹斯特與柯絲蒂羅（Hilary Winchester and Lauren Costello, 1995）既沒發現類似的網絡，也沒有脫離無家可歸的途徑。相反的，這些兒童是個外部群體，他們的網絡強化了與定居同儕之間的差異，而且他們的行為似乎鼓勵他們進入長期的習慣性無家可歸。有趣的是，溫徹斯特與柯絲蒂羅在這些年輕男女間，沒發現什麼傳統父權關係的證據。女孩成為幫派領袖，她們「不受限於家庭領域，也不被期待擔負多於男孩的家務職責」，雖然，作者提醒我們，

這是因為家庭領域幾乎不存在……。小孩子擅自占用的空屋（squat）髒透了，女孩或男孩都不打算維持秩序和整潔……沒有

清洗和整理，也沒有什麼該做的烹飪和採購。因此，非法占據的空屋沒必要打造得像「家」（1995: 340）。

溫徹斯特與柯絲蒂羅也發現

女孩不遵守任何有關傳統美或時尚的公認標準。群體裡的許多人，包括女孩與男孩，都採用了紋身和毀傷個人肢體的形式。例如儀式性地鞭打他們身體的某些部位，在譬如他們的前臂上留下平行的疤痕。群體視這種自殘為個人勇氣的標誌，圈外人則可能將它解讀為群體認同的形式，以及低自尊的表現（1995: 341）。

92

不過，對女孩而言，後果很重要：否定或至少遮掩她們的女性氣質與劣勢。誠如溫徹斯特與柯絲蒂羅提及的，這些女孩不露出有吸引力的傳統身體外表，對她們的安全很重要。如同已有研究的「包袱女士」（bag lady）的情形（Merves, 1992），匿名和怪異讓女人比較不會成為顯眼的性騷擾目標。

結論：家的意義

在第三世界城市裡，無家可歸的規模遠遠超過「西方」許多城市的狀況。事實上，在世界某些地方，有家或無家的區分沒什麼用處，因為有許多都市居民住在不穩定的違建營地（squatter camp，譯按：指未經允許占居土地形成的聚落）、木屋貧民區（favellas，譯按：葡萄牙語）和貧民窟（bidonville，譯按：專指北非的貧民區）裡。然而，在所有社會裡，家都不只是個實質構造而已。住屋（house）是生活關係的所在，尤其是親屬關係和性慾的關係，它也是物質文化與社會交往的關鍵連結；住屋是社

會位置與地位的具體標記。在一本名為《住屋論》(*About the House*)的有趣文集裡，幾位社會人類學家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幾個不同地區，透過民族誌個案研究，檢視了人、房舍和觀念的相互關係 (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編者的導論開頭，以開始有如義務般地引述了巴舍拉的一段話；「住屋的意象會朝兩個方向移動；住屋在我們裡面，猶如我們在住屋裡頭」(Bachelard, 1969)。

這本書的文章針對不同地方的住屋類型和社會關係的多樣性，提出了迷人的洞識。這些文章論點過於分歧多樣，無法在這裡摘述（不過，雖然這些論文座落於陌生的理論辯論裡，但社會地理學家應該會發覺它們很值得探究）。這些論文的共同出發點是評價李維史陀 (Lévi-Strauss, 1983, 1987)「住屋社會」(house society) 觀念的用處，雖然李維史陀的焦點是與親屬關係的連結，而且實際上忽視了住屋是物質性的人造物，是棟建築物。不過，我要在這裡簡略評論的，是編者在導論裡提到的住屋與身體的關係，這與我在第二章討論過的葛洛茲 (Elizabeth Grosz) 的論文類似。卡斯坦與修瓊斯 (Carsten and Hugh-Jones) 也強調物質文化與身體的關連，並說明了以住屋為焦點，如何能夠結合通常被視為分開的人類學探究領域。對地理學家而言，我們關心的是要連結不同的空間尺度（如第一章所述），這些學者的評論可以激發思考。他們主張：

住屋與身體有緊密關係。住屋是人的延伸；就像是額外的皮膚、甲殼，或是第二層衣服，住屋不僅遮蔽與保護，也會揭露和展示。住屋、身體與心靈持續互動，住屋的實質結構、家具裝修、社會習俗與心靈意象，同時促成、塑造、支持與限制了在其範圍

內展開的活動和觀念。住家在成為思考對象以前，已經是個既成的環境，受到先前世代的塑造與長久居住，住屋是社會化的首要作用者……。在有秩序的空間裡穿梭，身體「閱讀」住屋，而住屋承載著有身體的人的記憶。透過習慣與居住，每個人建立起對其文化基本架構的實際掌握 (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 2)。

和城市一樣 (參見 Sennett, 1994)，住屋經常被當成身體，具有同樣的特色與命運，影響著自我感受。「如果人類建造住屋，而且以自己的形象來製作居所，他們也會利用住屋和住屋意象來建構自己，成為個人和群體」(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 3)。然而，就像我針對家務勞動提出的論點，卡斯坦與修瓊斯指出，住屋，尤其是非西方社會的住屋，都遭到人類學家忽視，不被當成是研究的場所，因為住屋無所不在，「如此尋常、熟悉，是事物樣貌的一部份，我們幾乎不會注意到它」(1995: 3-4)。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加上女性主義者的提醒，即家與「女人」有關，因此這算是雙重的視為理所當然了，而這種忽視也得到了部份解釋。再者，探討住屋形式和結構，以及其中容納的不同社會關係之間關連的研究，因學科分界而區隔，例如區分為建築和社會學的研究。住宅生產被當成經濟分析的一個面向，但養育小孩模式的變化，卻是社會學的問題。

然而，女性主義學者質疑了這些視為理所當然的，將做為分析領域的住屋或家予以區隔的做法。近來的女性主義研究，產生了令人振奮且比較全面性的分析，地理學家也開始對此有所貢獻。橫跨時空的不同社會和區域裡，家的意義、住屋的性質，以及無家可歸的後果，現在逐漸成為跨學科探究的領域。雖然住屋與家是有最強烈的性別刻劃的空間區位之一，重要的卻是不要把這種連結當成理所當然，也不要認為它們是永恆而無法改變的。

摩爾 (Henrietta Moore, 1986) 所謂的「空間文本」(spatial text) 可以隨著時間過去而重寫，只要男人和女人挑戰和爭論譬如說內在和外在、公共和私人之間的傳統關連。

事實上，卡森與修瓊斯所編文集裡的人類學研究，顯示這些空間區分在某些地方可能跟性別一點關係也沒有，反而標示了階級或地位區別、家系或親緣、婚姻或手足的關係。比較研究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可以質疑從特定社會的角度看似「自然」或理所當然的關係，而且跨文化研究的領域很廣泛，有待大量探究。

94

當然，移民本身就是跨文化的。離開家，然後在另一個地方重新起家，對許多人而言，是日益尋常的經驗。我在第八章會回到這個議題，探討對那些離開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度的人來說，家的意義是什麼，以及相關的國族認同和領域依附的問題。我在本章結尾，想要再次引用胡克斯，她思索了離開家去對抗貧窮和壓迫，對她的意義：

我必須離開我稱為家的空間，以便越過邊界，但我也必須再次返回……。事實上，家的意義本身會隨著去殖民化、基進化而有所改變。有時候，家是烏有之處 (nowhere)。有時候，我們所知的家只有極端的疏離和異化。於是，家不僅只是一個地方。家是許多區位。家是能夠促成和促進多樣而不斷變化之視角的地方，一個我們可以發現看待現實的新方式的地方，是差異的邊境 (hooks, 1991b)。

延伸閱讀

地理學家所寫討論公私領域的空間分化根源的文章裡，或許最經典的是麥肯齊與蘿絲 (Suzanne Mackenzie and Damaris Rose,

1983) 收在安德森等人 (Anderson et al.) 編輯的《冗贅空間》(*Redundant Space*) 的文章。大衛朵夫與霍爾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的《家庭財富》(*Family Fortunes*, 1987) 是一本有關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葉，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的傑出研究，對於英國以家當做避風港的觀念，提供了仔細的歷史分析。《母性：勞工階級妻子捎來的信件》(*Maternity: Letters from Working Class Wives*, Davies, 1978) 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勞工階級女人的生活，及其成為母親的結果，提供了動人的洞察。

性別和家的最近研究，包括麥迪庚和孟若 (Ruth Madigan and Moira Munro) 的一系列論文 (〈性別、住屋與「家」〉 [*Gender, house and 'home'*, 1991] 是篇入門的好文章，她們也有一篇文章收錄在普南與牛頓 [T. Putnam and C. Newton] 編輯的有用選集《家戶選擇》 [*Household Choices*, 1992])。當肯 (Nancy Duncan, 1996a) 收在編輯文選《身體空間》(*Body Space*) 裡的一章，以及邦蒂 (Liz Bondi, 1998) 的論文裡，或許可以找到有關公私之分重要性的新摘述。多摩須 (Mona Domosh, 1998) 在《人文地理學進展》裡的論文，提供了最近有關家的研究的摘要。維尼斯 (April Venness) 在她的〈美國的家與無家可歸〉 (*Home and homel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 中，包括了有關家的意義的有用討論，茹蒂克 (Susan Ruddick) 的《好萊塢年輕人與遊民》 (*Young and Homeless in Hollywood*, 1995)，是對洛杉磯年輕人生活的迷人檢視。巴勞爾 (Bahloul) 的人類學研究《記憶的建築》 (*The Architecture of Memory*, 1992)，是動人的個案研究，談論 1937 年到 1962 年間，阿爾及利亞占用公共建築物的猶太人與穆斯林家戶裡的社會關係。

希爾弗史東 (Roger Silverstone) 新編的選集《郊區景象》 (*Visions of Suburbia*, 1997), 探討各處中產階級郊區環境的生產和消費, 希爾威史東稍早的選集《消費科技》 (*Consuming Technologies*, 1992) 也包含有關打造家 (home making) 的論文。在孟柯與摩姆森 (Jan Monk and Janet Momsen) 編輯的洛特列奇 (Routledge) 婦女與地方國際研究系列中, 英格蘭 (Kim England) 編的文選《誰要照顧嬰兒?》 (*Who Will Mind the Baby?*, 1997) 是另一本傑出的書。除了先前引述有關支薪家務勞動的著作, 摩斯 (Pamela Moss, 1997) 還研究了營業管家, 她們開公司車往返不同顧客的家時, 她們的工作場所實踐跨越了「公」「私」空間邊界。在這裡, 旅程和家事都是有償勞動。家成為支薪家務勞動的位址, 但其他工作形式也常在家裡進行。歐柏豪瑟 (Ann Oberhauser, 1995, 1997) 檢視了阿帕拉契 (Appalachia) 鄉村地區, 女人在家生產的手工藝和其他財貨。家也是政治鬥爭的所在。例如, 女人在涉及住宅 (特別是公共住宅) 供應、狀況、花費和近用權的鬥爭裡,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維特與薩格特 (Jackie Leavitt and Susan Saegert, 1990) 記載了紐約哈林區非裔美國女人的抗爭, 布雷特巴特與帕德 (Myrna Margulies Breitbart and Ellen-J. Pader, 1995) 描述了波士頓公共住宅社區裡, 性別和種族的議題。最後, 在我編輯的文選《拆解地方?》 (*Undoing Place?*, McDowell, 1997b) 及《空間、性別、知識》 (*Space, Gender, Knowledge*, McDowell and Sharp, 1997) 裡, 收錄了一些有關家的意義的論文。

4 社區、城市與地域

COMMUNITY, CITY AND LOCALITY

導言

96

在前一章，我主張家的私領域，以及工業社會裡支薪工作、政策和權力的公共領域，兩者之間空間分化的發展，對於廣為接受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屬性的社會建構，非常重要。這種區分不僅在家的象徵意義和物質結構中明顯可見，也廣泛銘記於都市地區的空間配置：在於住宅和工業區的分隔（英國城鎮規劃師所謂的「不一致的用途」）、社區規劃和健康生活的概念，以及社會均衡和「家庭」的觀念中，也反映在新市鎮、鄉村發展，以及以三房住屋為主要供應形式的住宅地產上。

有關男女兩性地方的假設，也穿透公共建築物的設計，給男人和女人使用的空間，往往可以藉由明顯的地位符號來區辨（試想一般部門辦公室的主管，以及他——通常是男人——的祕書），或者，例如在運動場和設施上加以區隔。某些建築物——最明顯的例子是男修道院與女修道院，但也有一些學校和俱樂部——嚴格限定專屬單一性別。其他建築物，由於雄偉壯觀，以及長久與男性權力形式有關，或許會令人望之卻步。不僅對許多女人而言是如此，對於位居較乏權力階級位置的男人來說也一樣——國會議院，或是宏偉的牛津與劍橋大學，都是不錯的例子。還有其他建築物，由於與單一性別相連繫，而遭到另一性別厭惡：對女人而言，是彈子房或某些俱樂部（仔細想想這種結合——酒館〔public house〕¹——在措詞上看似自相矛盾），對大多數男人來說，或許是兒童保健診所和產科病房。

譯註 1：這裡是指 public house 的字面意義是公共房屋，卻排斥女性，所以實際上不是公共的。

過去二十年左右，性別關係的社會與文化建構，及其於建築環境中的表現，成爲女性主義研究的關鍵領域（Bondi, 1991; Booth et al., 1996; Boys, 1984, 1990; Greed, 1994; Hayden, 1981, 1984; Little, 1994; Little et al., 1988; Matrix, 1984; McDowell, 1983; Roberts, 1991; Spain, 1993; Watson with Austerberry, 1986）。同樣重要的是，當個人協商和改變這些結構時，要審視他們的生活和有所企圖的行動。因此，在這一章裡，我會考察部分研究，將重點放在社區層次，而非特定的建築物。就社區而言，我指的是中型尺度的地方：比如城市裡的地域或住宅區，或是鄉村和單一產業村落。我想探討的問題是，各種不同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是否關聯、反映和影響這些不同地方裡的社會—空間關係。

此外，這一章也會提出以下問題：階級和族群的區分，如何是不同地方特殊性別化認同之社會建構的一環。有個悠久的地理學傳統，源自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裡，都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研究，以及有關城市中不同居民的空間區隔的分析。晚近以來，除了比較傳統的種族和階級重點外，性別和性慾特質也成爲焦點。地理學家長期忽視性別和性別區隔的社會建構，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不單因爲性別被視爲「自然」，而且男人和女人遍及整個都市區域，而非限定在特定地域，不像依社會階級或族群特性來區分的群體。因此，多年以來，它看似無需探究；然而，建築形式、都市象徵以及性與性別化的主體性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成爲重要的地理學議題。

一如往常，按照地方的尺度來區別——如前所述，社區屬於中級層次——不太能掌握當代地理學家界定地方的方式。誠如我在第一章指出的，地方不再被界定爲有邊界或範疇性的，而是一

組社會—空間關係的組合和並存。因此，瑪西（Massey, 1991）就提醒我們，地域可能是全球性的。正如瑪西針對她自己的地域或社區（西倫敦的基爾本〔Kilburn〕）所表明的，地方居民感到有歸屬的特殊地方感，乃是地方特定歷史，和各種當代變遷的衝擊結合起來的結果。所以，透過地域如何影響和反映歷史與地理——那當地用以建構身為男人或女人的特定方式——其他地域或許也能加以定義。

98

在這一章，我想要嘗試掌握，對位居不同生命週期階段的女人和男人而言，成長並生活於不同地域（或許在內城，或在衰退的農業或工業鄉村裡），有何差異。在這裡，我想知道一般意義上的日常社會關係，而不是工作場所或休閒活動的特殊經驗。我稍後才會說明這些活動的性別化（gendering）。所以，儘管我知道任何空間劃分都不是無懈可擊，但是本章討論的是地域（locality），這是社會學家過去常稱為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y）的一種版本。我的例證取自西方工業社會。

地方造成的差異

大約卅年前，哈維出版了《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1），他在書中主張都市財貨和資源——工作、住宅、學校、污染性設施（polluting uses），以及像公園這種照料健康的資源——的空間分佈和位置，以及這對於住在該城市或地區的居民，所造成的不同近用狀況，是反向實質所得重分配的機制。富裕居民負擔得起住在帶給他們開放空間、乾淨空氣，以及進入好學校機會的地區，還付得起旅行到城市其他地方的花費。貧窮和被剝奪的人，卻由於缺乏選擇而被迫住在通常充斥噪音和

汙染，而且學校和住宅區或許老舊且品質粗劣的地區。因此，富人和窮人生活水準的不平等，由於城市本身的結構而加劇。這就是哈維所謂實質所得重分配的意思。

儘管針對他專注於分配問題，從而排除了權力、控制和建築形式之生產等問題，存在著批評的可能（哈維在該書第二部份，對自己的著作提出了批評），但依我之見，就考察城市區位造成的後果而論，他的研究仍然強而有力。如果將安全和自由表達另類認同的議題，納入哈維對於人群近用所欲物質財貨和資源的討論裡，他的分析就更犀利了。這些就是本章的核心議題。

勞工階級社區裡的性別關係

居住隔離研究的主要焦點之一是社會階級分隔，針對位於城內地區，以及工業或農業鄉村的單一階級社區，已有許多傑出研究。雖然對於性別問題不具有刻意或明確的興趣，但這許多研究描述了特殊男性氣概形式的發展，那是從事繁重且往往危險的體力工作時產生的男性情誼，並透過共享的男性情誼建構男性氣概。從事這類工作的男人，在工作場所裡彼此依賴，也經常在工作場所外發展緊密的個人連繫。文化評論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就是在這種幾乎所有生活領域裡，居民彼此都有私交的社區中，成長茁壯。

99

一種強烈的地方歸屬感，代代相傳，以艱辛工作的傳統自豪，並與特殊的勞動政治形式攜手並進。雖然這或許是共同力量和驕傲的根源，女性主義作家坎普貝爾（Beatrix Campbell, 1984）則認為，女人或許對這種政治感到厭惡。勞工的俱樂部、酒吧，以及工黨委員會的房間，都是男性團結的位址，僅偶爾遭到女人

突破——1984年的礦工罷工是個典型事例，當時女人的支持至關重要，且顯而易見。在許多早期社區研究中，例如《煤炭是我們的生活》（*Coal is Our Life*, Dennis et al., 1956），幾乎看不見女人的日常生活，儘管在貝斯諾綠地（Bethnal Green）的社區研究學院裡（Young and Willmott, 1957; Willmott and Young, 1960），差不多同時完成的著作中，母女間的緊密聯繫，被視為內城的特徵，也是共同歸屬感的重要部分。楊恩與威爾莫特（Young and Willmott）指出，當城內地區再開發，或者居民遷移到別處時，往往可能中斷了這些女性的跨世代連結。

然而，在早期社區研究的傳統中，性別分工既未遭受質疑，也未加以解釋。相反的，男人與受薪勞動的關係，以及女人和家的關聯，被視為理所當然。在我與瑪西於1980年代早期所寫的一篇綱領性論文中，我們試圖考察一個多世紀以來，英格蘭不同地方連續幾波的空間再結構期間，性別區分的變動性質，藉以對抗這種忽視（McDowell and Massy, 1984）。我們指出，在傳統的勞工階級社區中，男人的工業工作縮減，分廠則受到這些地區「沒經驗的」女性勞工吸引，從而改變了男女勞動力參與率的均衡。也有越來越多出色的女性主義個案研究，關注世界其他地方勞工階級社區裡的女人生活。例如，拉克斯頓（Meg Luxton, 1980）比較了北加拿大的煉鋁城鎮富林福隆（Flin Flon）裡，三個世代的女人生活，吉普生（Kathie Gibson, 1991）則研究了某個澳洲採礦社區裡的性別關係。

定義社區

不過，在援引某些研究，闡明空間區分與性別認同的連結之前，或許應該簡單談一下前文在「理所當然的」意義下使用的「社區」一詞。跟地方或地域這種術語一樣，社區是那種有各種廣泛使用方式，擁有許多定義，難以令人滿意的字眼。社區通常（雖不總是）用來標明小尺度、空間上有邊界的地區，並假定區域內的全部居民或部分居民，具有某種將他們聯繫起來的共同特徵。因此，「勞工階級社區」或「亞裔社區」是常見的措辭，它們往往與「城內地區」（inner area）聯繫在一起。

100

社區一詞的由來，源於托尼斯（Tönnies）的演化社會學，他在十九世紀末區分了藉由共同聯繫、禮俗社群（*gemeinschaft*）、社群整體社會生活所凝聚的社區，以及那些特別是受到工業化影響、基於受限生活區域而連結起來的社區，托尼斯稱為法理社會（*gesellschaft*）（Tönnies, 1967）。托尼斯的著作含有反都市偏見，成為眾多批評的焦點，並且刺激了經驗個案研究，試圖展現將居民繫於工業鄉村和都市社區的緊密紐帶。事實上，我剛才提到的研究，都屬於這個範疇。

社區還是一種蘊含了溫暖和團結涵義的詞，暗含了這種假設：缺乏社區是一件糟糕的事。然而，晚近以來，大家接受了這個詞也有負面涵義，尤其當人們拿社區當做少數族裔團體的婉轉說法，以及更廣泛用於指稱保守或回顧過去的態度時。儘管有這些問題，社區仍然是個常用詞彙。我在這裡以一種特殊意義來使用它：跟地方和地域這類術語一樣，社區指涉流動的社會關係網絡，或許與領域有關，但不見得必然如此。因此，社區是一種關係概念，而非範疇概念，同時以物質性的社會關係和象徵意義來

界定。社區是取決於脈絡、偶然的，並且以權力關係來界定；社區邊界是以包納和排外的機制創造的。雖然這些機制可能與時俱變，從而改變了邊界，但社區必然是有界線的實體。不管排外的判準或特徵為何，無可避免會將某些團體或個人置於外界。儘管社會評論家伊格納惕夫（Michael Ignatieff, 1992）認為這個詞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騙局」（pious fraud），而且「少數族裔被稱為『社區』，要麼是因為這讓他們感覺好過一些，不然就是因為這使得大多數白人比較有安全感」。但是我要指出，只要記得社區是透過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建構，它仍舊是個有用的詞。我們不應該馬上拒絕「社區」一詞，或自動視之為非善即惡的東西，而應該以其建構和意圖的複雜性，當做分析的主題。

記住這些有關權力關係的評論，我要轉而討論性別、認同和地方之間關聯的經驗考察。就像我在第一章主張的，性別認同與種族、族群、階級和性慾特質根本上彼此相關且糾結難分，在我選擇的個案研究中，我嘗試闡明這種連結。據此，第一個個案研究引自凱利（Patricia Fernandez Kelly）的研究，她是一位在拉丁美洲和美國從事田野工作的都市人類學家。我在這裡想更仔細審視的個案研究，是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性別、青少年和社區之間的關係。接著，我會概述對男同性戀和單身女子在縉紳化（gentrification）裡的角色，日益升高的興趣，最後轉向有關郊區認同、性別和族群，這個比較不熟悉文獻上。郊區是缺乏研究的區位，都市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似乎都受到了內城地區假想的危險所引誘。

在都市族裔聚居區裡成長

1990年代早期，凱利在美國巴爾的摩西區三個內城鄰里從事田野研究。她的目標是檢視居住在窮困鄰里的人，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如何談論他們的價值觀，以及他們的行動如何反映或不反映其說法。凱利認識到，「人們從他們居住的地區獲取知識」（1994: 89），所以，都市空間是認同建構、知識習得和社會行動的重要面向。凱利訪談的地區，遭受經濟再結構，尤其是一座大型鋼鐵工廠關閉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男人就業機會的喪失。廣泛的吸毒和青少年懷孕，以及當地的貧困，是這個地區的關鍵社會議題。

凱利特別感興趣的是青少年的態度，她們面對的選擇及其決定，尤其是關係到母職的決定。她強調，美國城市中的白人和黑人青少年面臨不同選擇：

即將從高中畢業的十七歲白種女性，住在中產階級鄰里，打算念大學，縱使舉棋不定，但為了不危及其他機會，很可能會延緩母職。在這個情況裡，年輕女性認為生下非婚生子女，不但是違反規範，而且是阻擋非常真切而可欲的選擇的障礙。

102

即將從高中畢業的十七歲黑人女性，住在都市族裔聚居區，面臨一組不同選擇。例如，她的社會網絡不太可能包括許多曾經在「好」大學裡求學，接著得到「好」工作的人。結果，她生活圈裡的很多成人和青少年，或許將高中畢業視為一個階段的頂峰，應該帶來成熟的責任。而且，這位年輕女性可能與同儕團體中的男人，共享由主流價值培育的印象，即生育子女使個人有資格成為成人社區的成員。在這種情況裡，母職有個明顯的意義：它不是一種越軌偏差，而是接近主導規範的路徑（1994: 100）。

因此，除了「種族」外，區位和階級也建構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而且女人的意義隨著時空而改變。在一項有關倫敦白人和黑人年輕單親媽媽的研究中，芬妮克斯（Ann Phoenix, 1988, 1991）挑戰了以下假設：英國黑人女性對懷孕和育兒有明顯的「文化」態度，使她們有別於白種女人。對這兩群女人而言，母職提供了一條途徑，通往這些在勞動市場裡不夠格的年輕女性得不到的責任和成熟。住在英國勞工階級社區，或是美國族裔聚居區裡，意味了貧窮和歧視限制他們接近城市其他地區各種機會和社會接觸。在地域裡學到的行為和態度，反映在風格和語言上，即布迪厄所謂的「體現的知識」（*embodied knowledge*）（Bourdieu, 1989；參見第二章），將這些年輕女性與她們較富裕的同儕區別開來。誠如凱利總結道，「那些顯示較富裕鄰里中成功的標誌，巴爾的摩的族裔聚居區裡都不存在」（1994: 108）。（下一節裡，我會討論某些卓越研究，有關白人郊區裡的族群認同，這裡的區位影響似乎是反對認同之社會建構中的族群特性。）

如凱利主張的，在族裔聚居區裡，通往成年的途徑特別是以性別分化來標示。這不僅是因為對年輕女性來說，母職是個關鍵轉換，也源於國家機構具性別特殊性的政策和措施。

103

國家現身於窮困鄰里中，是兒童經驗裡的關鍵要素，但不是中立的；它也沿著性別界線一分為二。公共援助接觸到大多數單身女性及其小孩。矯正和犯罪司法體系主要應付男孩和男人。這種分裂影響了成長於巴爾的摩族裔聚居區兒童的生活（Kelly, 1994: 106）。

很多巴爾的摩年輕黑人居住的地區，被國家及其機構建構成有待解決或需要控制的問題。因此，他們的認同感結合了空間區位、他們的階級和性別，而在環境中相互建構。在這種環境下，

這些青少年缺乏「通往掌控了接近更多機會和意義的其他社會網絡的橋樑」(1994: 109)。處於諸如此類的境況中，母職，甚至是參與犯罪活動，都可以視為試圖符合主流價值並達致成熟，而不是違抗或「問題行爲」。

性別、性慾特質與內城地區縉紳化

我現在要檢視另一條近來有關內城地區之地理學術研究的線索。雖然內城「問題」的分析具有悠久傳統，但數十年來，這些地區的住宅更替和社會變遷也是關鍵焦點。二十世紀初，於芝加哥成立都市社會學學派的一群人，認識到都市內部地區的人口特質會隨時間變化。那些年裡，隨著大量移民進入牲畜飼養場和肉類加工廠謀生，稍後進入汽車工業，芝加哥是成長極快的城市(辛克萊〔Upton Sinclair〕出色的小說《叢林》〔*The Jungle*〕於1936年首度出版，是一部有關這些年代的迷人描繪，足以令任何讀者成爲素食主義者)。起初來自東西歐，繼而來自南方各州，男人、女人和小孩搬進負擔得起的最廉價住屋裡，隨後定居內城。雖然支撐早期芝加哥都市社會學者解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長期以來就不足採信，但內城的住宅更替，對都市地理學者來說依然是最重要的研究地區之一。

戰後，英國和美國城市擴張，中產階級受雇者住在郊區，卻在市中心工作，而面臨越來越遠的通勤旅程時，對市區住宅供應的新需求變得很明顯。城市規劃者看到以變革的住宅基地來改善內城地區和吸引新商業和文化設施的潛力(Zukin, 1988, 1995)，房地產開發商和建商嗅到了利潤，在他們的預期和鼓動下，縉紳

化（基本上是以中產階級居民取代勞工階級）約於 1970 年代早期起，成為許多城市裡的顯著現象（Mills, 1988; Hamnett, 1991; Smith, 1996; Smith and Williams, 1986）。最早的研究顯示，內城地區傾向於吸引那些比較不遵奉習俗的家戶，或至少能吸引從事藝術和媒體工作的中產階級。

威廉斯（Peter Williams, 1976）發現在倫敦內城區的艾靈頓（Islington），電視台和新聞業，或是藝術領域的受雇者，通常是第一階段的縉紳者（gentrifier）。其他研究者注意到，一種主要是由單身、彼此無親屬關係的個人形成的家戶生活，例如學生或年輕工人，單身女性或單親媽媽和男同性戀（Allen and McDowell, 1989; Castells, 1983; Knopp, 1987, 1990）。在蒙特婁（Montreal）做研究的蘿絲與維理紐弗（Damaris Rose and Paul Villeneuve, 1988）主張，內城地區特別能吸引單親媽媽，她們在那裡找到各種支持生活的支援服務。邦蒂（Bondi, 1991）、萊昂斯（Lyons, 1996）和麥道威爾（McDowell, 1997c）也考察了縉紳化地區裡單身女性的重要性，但是在英國城市裡，目前只找到有限的證據，儘管華德（Warde, 1991）認為，雙薪沒小孩的夫妻是縉紳化房地產需求的重要來源。

然而，在像是美國紐約（Chauncey, 1995; Duberman et al., 1991）、舊金山（Castells, 1983; Fitzgerald, 1986）、洛杉磯（Forest, 1995）和明尼雅波里（Minneapolis）（Knopp, 1987, 1990; Lauria and Knopp, 1985），以及英國倫敦（Mort, 1996）和曼徹斯特（Hindle, 1994）等城市裡，關鍵的單身縉紳群體是同性戀男人，而不是異性戀女人或女同性戀。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男同志比女人行使更大的權力，不但因為他們比較強大的勞動市場位

置，也由於女人較可能對撫養者，通常是小孩或年長的親屬負責。不過，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認為，「同性戀聚居區」的形構，並非同志特質（gayness）的特殊反映，而是反映了更普遍的男性氣概。他認為，舊金山的男同志選擇住在某個地區，不僅是爲了使其同性戀認同被自己和他人看見，也爲了像所有男人一樣，透過掌控空間的慾望，來確認自己的支配地位。柯司特相信，女同志沒有征服空間的慾望，滿足於內部（因此看不見）的網絡和友誼。他的論點遭到阿德勒與布雷納（Adler and Brenner 1992）嚴厲批評，在我看來批評得很正確。現在這種本質論是不足採信的性別差異觀，也是對於舊金山女同志縉紳者活動的男性盲目（male blindness）（Casebourne, 1997）。

然而，無論哪一個團體，同性戀或異性戀、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或較爲「藝術的」群體，透過與領域聯繫而確立的認同，都是縉紳化的重要部分。如前文所述，早期的縉紳者透過住宅選擇來區別自己和郊區的遵奉習俗者，對男同性戀而言，縉紳化是創造促進其生活風格的整體鄰里服務的方式。因此，舊金山的卡斯楚區（Castro district），自 1960 年代末期以來，就是同性戀縉紳化的關鍵位址。咖啡館、酒吧、書店和房地產經紀人、律師，以及同性戀者擁有的其他商業服務，彼此緊密相鄰而成長，服務了當地社區（參見圖 4.1 和 4.2）。描述 1980 年代卡斯楚地區的迷人虛構觀點，可以在毛平（Armistead Maupin, 1980, 1984, 1986）的小說裡找到，柯司特的說法以外的另一種事實描述，強調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的衝擊，則是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的《山丘上的城市》（*Cities on a Hill*, 1986）。紀錄片《哈維·彌爾克的生活與年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vey Milk*）是針對同性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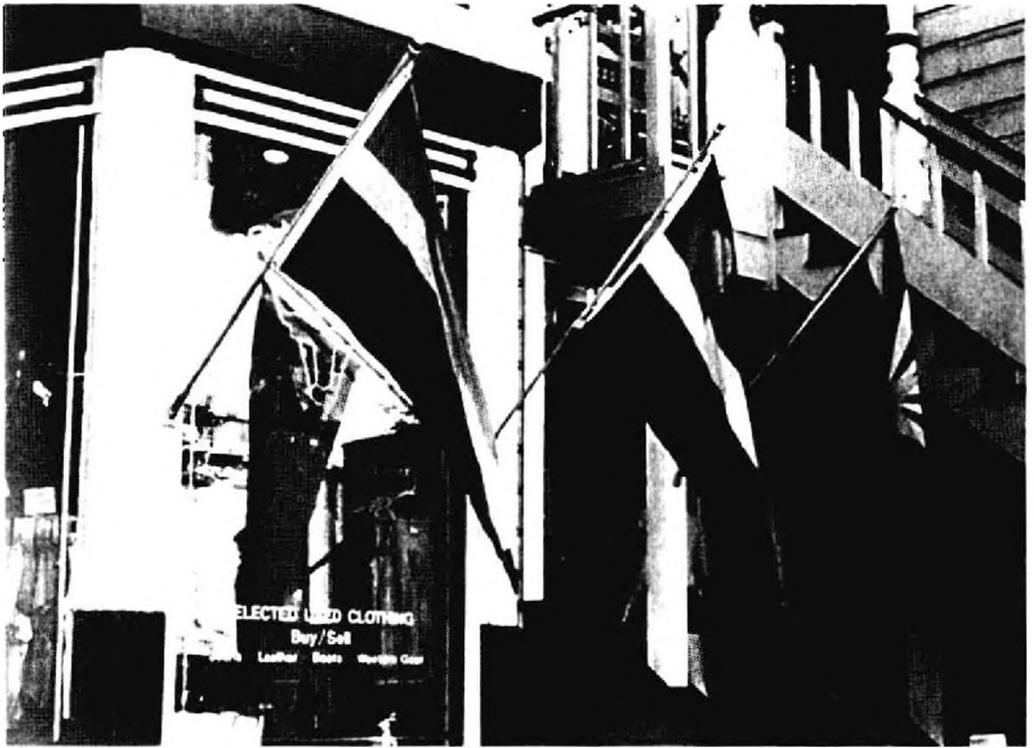


圖 4.1 舊金山卡斯楚區的同志尊嚴旗幟

的居住集中，以及相關的政治權力等較複雜面向的描繪。1970年代，卡斯楚地區選舉出櫃的國會議員哈維·彌爾克，他是地方政治中極端恐同症（homophobia）的受害者，也是一次成功暗殺的遇難者。

106

雖然英國城市裡沒有這麼重要的男同性戀集中地，但倫敦、曼徹斯特和其他大都會區的某些地區，與男女同性戀的生活和政治有關。莫特（Frank Mort, 1995, 1996）曾描寫他稱為倫敦「同性社會」（homosocial）活動和空間的發展：我想介紹他對倫敦市中心蘇活區（Soho）的研究，他在這裡挖掘出男性氣概變動的考古學，以及1960年代以來，男性氣概如何反映於該地區的變動地景和社會關係中。不過，我會把這部分放在第六章，因為相較於社區本身，它比較符合我所指稱的快感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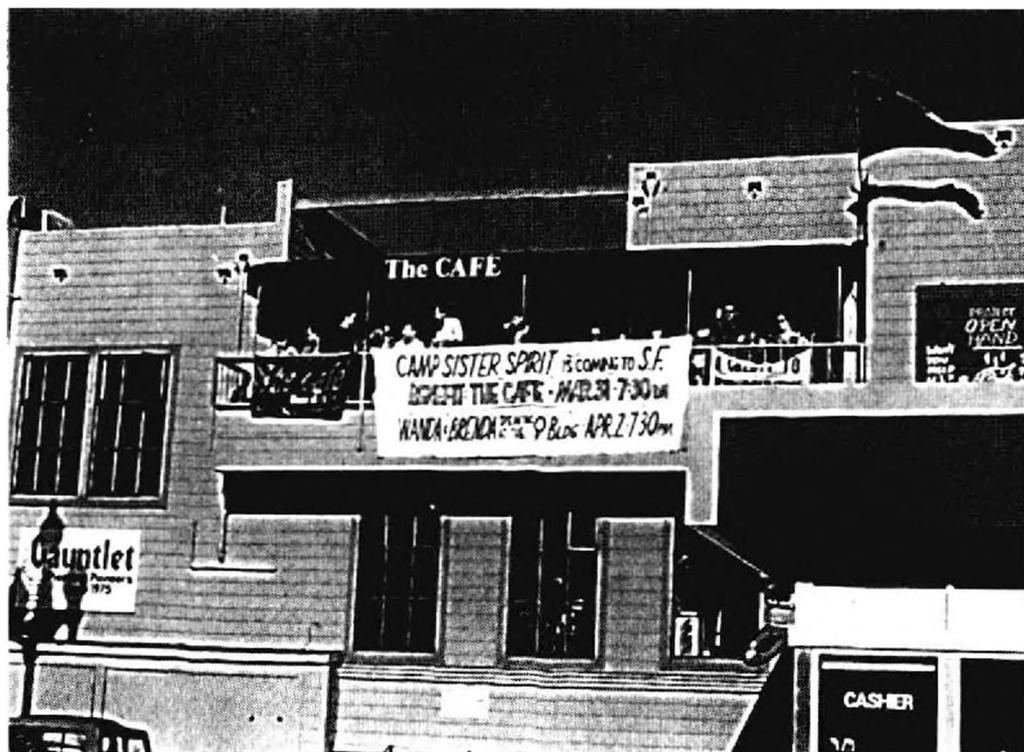


圖 4.2 女人的餐廳，位於舊金山卡斯楚區邊緣地帶

郊區、族群與認同：定位白人特質

如同大衛·哈維和其他人長久以來的主張，城市裡的區位對不同地區居民的機會和生命際遇有重大影響，會重新分配「實質所得」，並惡化社會階級之間的不均等。一般而言，比起市中心，城郊的區位比較接近乾淨空氣和更開放的空間，以及地方學校的各種教育機會，比起內城的學校，郊區學校有更多中產階級聚集，族群混合情形比較輕微。在英國，透過以考試結果和測驗成績衡量的等級成就指標的出版，城市不同區域學校間的差異，近來變得越來越明顯。

107

然而，地理學者比較少探索的是，在物質環境以外，都市區位對個人認同之社會建構的重要性。普瑞特（Minnie Bruce Pratt）

在一篇動人的文章裡，闡述了這種重要意蘊。她探討了她對於自己身為已婚婦女的白人郊區生活風格的抗拒、她以女同性戀身份出櫃，以及她搬到華盛頓特區內城，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我住在華盛頓特區，某個白人郊區居民稱為『叢林』的地方。當我走過兩條半街區到 H 街的 NE，途中在銀行逗留，把我的靴子放在修鞋和鎖匠舖時，我通常是極目所見唯一的白人」（M. B. Pratt, 1992: 323）。

普瑞特解釋道，雖然她選擇住在這個地區，而且開始感到自在和得到接納，但是身為白種女性，使她仍然是個局外人。她住所的門房是波恩先生，「一名深紅棕膚色的男人，來自南卡羅來納州葉麻斯（Yemassee）」，他對她說話時，「他單調地對我說『是的，夫人』：我聽見我的聲音以一種白人女士令人反感的愉悅腔調回覆：我痛恨我的白種女人特質，在我們之間拖著這個地區長久以來的痛苦歷史」。不像她視自己身為富裕白種女孩的地位為理所當然的、她成長的鄰里，

在這個地區，當我外出到鄰里街坊，每個彼此說話的人，對我而言，都伴隨著種族、性和階級的歷史……這是令人精疲力竭的過程，從（如安吉蘿 [Maya Angelou] 所稱的）「無知大多數」的經驗移轉到意識醒覺（1992: 324）。若說這個過程令人欣慰，那是騙人的（1992: 324）。

反思她的童年，普瑞特認識到

我受到我與那些建築物的關係，以及屋裡的人的塑造，受到誰應該在教育委員會工作、誰應該在銀行裡處理金錢、誰應該擁有槍支和監獄鑰匙、誰該進監獄的想法塑造；而且，我受到我在街上沒看見，或沒注意到的東西塑造。

你說，那不是你的城鎮呈現出來的樣子？或許沒錯，但我們每個人都承載著那些成長的地方、機構、某種背景、舞台佈景。所以，我們時常是襯著過往的背景，在如此熟悉、安全的感知框架裡展演出當前，甚至在我們知道自已的感知受到老舊觀點的扭曲、限制和壓縮時，也害怕承擔改變這個框架的風險。

所以，當我改變時，我的一項收穫是：我學到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更精確、複雜、多層次、多向度、更真實……我覺得有必要以不同觀點來觀看，因為我知道，以一種精確世界觀在我面前展開的，往往是個謊言（1992: 325）。

108

普瑞特認為在這篇具有動人標題〈認同：血液 皮膚 心臟〉（Identity: blood skin heart）的文章裡，非常生動且私密地描述的，正是哈洛威（Haraway, 1991）所謂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東西，因為她主張，來自特定位置的觀點，比她所稱的「來自烏有之處的觀點」更為真實。普瑞特童年時期，把她的家鄉視為理所當然的觀點，使她未能認識到她所處地位的階級和種族特權，不僅忽視同一城鎮裡的不同觀點，那也許是有色女人或同性戀男人的觀點，並堅持其特殊觀點是普遍真理。因此，普瑞特認為，面對我們思考的限制，往往很痛苦，體認到我們構想為普遍真理的東西，其實是局部或特殊的位置：「這種痛苦，例如，當我認識到我是如何習慣將我的文化、我的倫理觀、我的道德觀，視為歷史的頂峰、當成過去事物的合邏輯延伸……這種想法將我和置身不同文化的女人區隔開來」（1992: 327）。

身為白人而成長

在一篇針對普瑞特的論文，提出令人驚訝的補充的文章裡，吐恩（France Winddance Twine, 1996）探討了未能承認差異，假

定白人郊區的世界觀就是唯一觀點，對她及其他美國出生的有非洲血統的女人造成的衝擊，她們在白人家庭裡，身為美國郊區「皮膚黝黑的白種女孩」而成長。她說明了某些非裔女孩，如何在缺乏政治化的非裔美人住宅社區的情況下，在離家以前，養成了白人文化認同，而非黑人意識。

儘管吐恩承認過去十年左右，有越來越多由有色人種女性和白種女人撰寫的白人特質研究（例如 Blee, 1991; Frankenberg, 1993; hooks, 1991c; Morrison, 1992; Roediger, 1991; Ware, 1992），但她認為這種文獻「並未討論非裔白人的經驗」。這個斷言非常驚人，容易使讀者中斷思路。不過，有關白人特質之社會建構的文本，假定了白種美國人完全屬於歐洲血統。吐恩的研究，透過審視白人認同如何受到定居中產階級城郊社區的非裔女人建構和扮演，擴大了中產階級城郊社區的種族化性別認同分析。她問的核心問題是，「混血非裔皮膚黝黑的女人，在中產階級城郊社區的地方脈絡中，如何成為社會建構的白種女孩？」以及「非裔女孩白種認同的養成，需要什麼社會條件？」

吐恩在她的研究中，採取了社會建構論取向，同時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她運用質化方法，探討了十六個女人的經驗，她們置身中產階級城郊社區，在青春期以前於社會層次被建構為白人，直到她們成為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種族意識」是該校重大議題）的學生後，才被迫重新建構自己為黑人或雙色人種（biracial）。

吐恩訪談的女人，全都在「擁抱種族無標記、中產階級認同的家庭和社會網絡」裡成長，置身其中，她們是

中產階級小孩的文化無標記同儕。她們身為兒童，沒有意識到自

已在文化上與同儕間的區別。在日常互動上不與歐洲裔美國人同儕區別開來，對於維持白人文化認同而言，至關重要。我不是指膚色、頭髮質地或身體外型的物理區別。而是，這些個人對自我的經驗是文化中立的，而且沒有偏離她們的同儕團體 (Twine, 1996: 208)。

郊區居民在白人文化認同的獲取上扮演要角。1980年，美國的郊區是個排外地區，黑人只占全部郊區居民的6.1%，相對的，黑人占城市居民的23.4%。正當吐恩的研究對象逐漸長大之際，郊區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都很保守，「傳統的」性別分工很常見，炫耀性消費是塑造認同和歸屬感的主要活動。此外，女孩往往是她們學校裡極少數非歐洲裔的美國人之一，或是唯一的非歐裔，而且居住的領養家庭，往往是膚色盲 (color-blind) 或種族中立的，或者有來自「混種」關係的白種父親或母親。因此，空間區位 (尤其是住在排外地區，進入種族排他的學校)，對於乍看之下自相矛盾的種族中立主張的發展，至關重大。

吐恩實例裡的一名二十一歲女性潔西卡，和她的單親英裔美國母親同住於郊區，她解釋道，她母親從未將她「種族化」，而身為小孩的她，也沒意識到有種族認同：「嗯，我媽媽非常理想主義。她很公正。她從不用種族這個字眼。她從不說我是黑人或白人。她只會說『你很特別』……她給我真正的自我感，但不是種族自我的感受」 (Twine, 1996: 211)。

對許多吐恩訪問過的女人來說，直到她們上大學，進入有許多政治化的有色人種的環境後，她們的種族認同才成爲議題。即便如此，對某些女人而言，當她們步入青春期的階段，並開始約會時，反黑人情緒和排外的模式就會成爲議題，而不是到了她們上大學之後，這些女人才被迫做出困難的抉擇，放棄她們的白種認同。

「在我來加大（加州大學）之前，我是白人。在文化上，我是徹頭徹尾的白種……我被當成黑人。我被當做黑人對待，所以我沒有身為黑人的問題……。但這是個艱難的處境。真的很難受」（Tamala，兼有非裔和歐裔血統，出生即被領養，並且「當成白人養大」）。

在柏克萊，這些女人的認同遭到質疑，而且她們不能保持中立。大學生活的前兩年，除了一位，她們每個人都經驗到認同的轉變。無論是否願意，她們迫於高度政治化的氣氛，而「承認並宣稱黑人認同，做為她們的校園社會化經驗的一部份」（Twine, 1996: 218）。

我讀了這篇文章後，在心裡想了好幾個月，我思忖是否在較不政治化的環境裡，這些年輕女人面臨的選擇就會不一樣。吐恩訪談她們時，她們的年紀都在 21 到 25 歲之間，我很好奇，如果她們直接進入工作場所，如果她們是在城鎮不同地方的白人勞工階級家庭中長大，她們會怎麼樣。然而，這些都無法得知，我的眼光被 1997 年中期《衛報》（*Guardian*）的一篇文章吸引。有個被領養的女人，思索她自己在英國被養成「膚色盲」的經驗：

我們全部有九個人。其中四個是領養的，爸媽另有五個親生的小孩：我們是原始的「彩虹家庭」。說起出身，半數家庭成員橫跨全球。我的大姊來自立陶宛（Lithuania），另一個姊姊來自紐芬蘭（Newfoundland），我哥哥跟我分別是奈及利亞與愛爾蘭混血，以及奈及利亞與瑞士混血……在家裡，我們全都受到無差別、堅強的愛包圍。我並未感覺和我的白種兄弟姊妹之間有任何差異。但是，現在我感覺到，我被愛的方式——田園詩式、膚色盲的——無論多麼出自善意，都無法完全代表社會對我的觀點。社會以我的膚色來定義我，可能是正面或負面。在我服下第一劑

公然的種族歧視時，我 21 歲。這聽起來像一部爛 B 級片——「二十一年後，女孩甦醒，並發覺她是黑人」——但這卻是現實。我去探望我哥哥多米尼克 (Dominic)，他也是混種。他對自己的膚色總是更具「根著性」(rootsy)。幾年前，當他看著我們金髮碧眼的姪女和姪兒照片時，他對我說：「妹妹，我們得給這個家添些黑色」。當時我覺得他很可笑，但突然間，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缺乏視覺的參考點。我跟他們沒有視覺上的關聯。

111

接著，作者高翰 (Clare Gorham) 解釋了在她接受自己的命運和教養以前，如何對抗她對白種養父母的怨恨。

我經過幾年的捶胸頓足，哀悼我失落的遺產後，開始領悟到，我其實是在從事空虛的追尋。我有我自己的遺產，為何還期望尋得另一個？一段期間後，我達到某種盼望已久的平靜表象，這主要歸功於我的家人和朋友始終深切的關愛。我們都有種傾向，要把人放進不同的社會範疇裡，像是種族、財務狀況、階級、宗教等等。現在，我能真正賞識那些跨種族而被領養的成人，他們傾向於蔑視那些範疇。我認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額外的好處 (Gorham, 1997: 9)。

高翰的決斷，似乎與最初描述的年輕美國女人不同，後者必須，或者被迫認同「黑人」。雖然高翰不認同她成長的小鎮或城市，但這些事例是階級、種族、年齡、家庭環境和區位，在主體性和認同的建構上交錯方式的有趣結合，也是有關認同的流動性，令人信服的例子。對所有這些年輕女性來說，離家，對於她們重新評估自己的認同，是個重大因素，當然，這對許多年輕人也一樣。這兩個研究也清楚揭顯了這個論點，即「種族」或族群特性是個社會建構，也是缺乏固定指涉的關係性術語。一個世紀或更久以來，認為人與人之間有生物差異的想法，已遭到嚴正挑

戰，而且，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家現在都承認，有過剩的非生物判準被用來區分不同群體。然而，就和性別差異一樣，「種族」和族群差異已經被自然化，將人群建構為「有所區別」的歷史社會過程，卻在種族主義論述中遭到忽略。

然而，差異自然化的一個後果，是將「白種特質」(whiteness) 建構為標準、非「族裔的」(我在前文已經提到，這目前在謹慎的經驗研究中已經遭到質疑)，第二個後果是，輕易假設所有弱勢群體都分享完全相同的文化特徵。不過，在這方面，近來女性主義研究正探討「族裔社區」裡，介於男女之間、第一和第二世代、年輕人和老人之間的縫隙，記錄了有色人種社區內部的巨大差異。雖然膚色和族群特性仍是歧視和不平等的重要主軸，但女性主義者的經驗研究已經挑戰了黑—白 / 貧—富 / 培力和無力等二元範疇間過分簡化的關聯 (DuCille, 1996; Eisenstein, 1994; Lamphere et al., 1997; Williams, 1991)。最近的研究強調了有色人種社區的內部歧異，以及其成員在質疑種族歧視上的成就和積極活動 (Mirza, 1997)。

對許多年輕男女而言，在透過勞動市場參與，以建立身為成熟大人的自信心上，經濟困境造成了問題。下面這節，我轉向 1990 年代年輕男人所做的「選擇」。在第七和第八章，我會回到移民、文化、地方和認同問題，以及重新思索這些範疇的方式。

社區、不安全與郊區住宅的勞工階級男人

坎普貝爾 (Bea Campbell) 在她的書《葛利亞》(Goliath, 1993) 裡，運用對於 1991 年幾個英國城市裡都市動亂的原因和

後果的興趣，探討更廣大的一組問題，涉及了她於 1990 年代初期覺察到的男性氣概之社會建構的改變。她尤其感興趣的是，什麼原因促使年輕人，通常是失業的男人，大部分住在像新堡和牛津如此不同的城市外圍住宅區的市有住宅裡，針對他們所在地域的人和資產，不僅從事反社會活動，像是偷車和駕車遊玩，還有竊盜，甚至是在自己的鄰里縱火。坎普貝爾在余契爾（Thatcher）時代全國政治的轉變中，找到了部分解釋。1980 年代——儘管出自金融服務部門極端不同的個案研究，地理學家列雄與史瑞夫特（Leysdon and Thrift, 1996）認為這是性感 / 貪婪的十年——用坎普貝爾的話說，是個見證了「英國戰後政治特有的有紀律混亂的結束。一向是個好爭論國家的民族調調，現在則是鹵莽、男性化且危險」的時代（1993: 3）。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國家第一位女首相瑪格利特·余契爾（Margaret Thatcher）領導下，這種國家在國族文化上變得更「男性化」的反諷。這項轉變的一個結果，是加深各種場合中，粗暴和陽剛行為形式的巧合。內城裡熱愛飆車速度的「強硬派男人」，全國各地會議室裡的「強硬派男人」，發生粗暴的接管和資產剝奪，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裡的「年輕小伙子」及其對「快速」金錢和金融醜聞的頌揚（McDowell, 1997a），全都有某種共同特徵。但對失業的年輕勞工階級男人來說，因為沒錢，所以被排除在好生活及其相關人事物（如車子、女人和成人責任）之外，贏得公認的男性氣概屬性的唯一方式，似乎是透過偷竊和其他不負責任的行為。這裡與凱利（Kelly）的巴爾的摩研究有類似之處，雖然她的研究主要是關注年輕女人，而非男人。

113

在後文的引言中，坎普貝爾描述一群年輕人連續十八個月，直到 1991 年夏天警察介入為止，藉由非法車展，既娛樂又打擾

了位於牛津的一處住宅社區，即畫眉牧地（Blackbird Leys）的居民，在晚間和入夜後偷車或改裝贓車。

夜晚，男孩蔑視消極底層階級的界定：這些年輕男人並不低於任何人。經濟層面上，他們有閒錢、有剩餘，私底下他們仰賴其他人（通常是他們的母親）來支付維修費用；在社會上他們是逃犯，目無法紀使他們既內在又外在於自己的社區。他們沒工作、沒收入、沒財產、沒車、沒有責任。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事業」不忙。他們真正擁有的是聲譽。

在很多方面，他們是「隱形人」，但他們的名聲還是來自於被看見和表演。他們的虛榮心驅動了勇氣。他們為夜間發生於小廣場的地方戲劇性事件，規劃、準備，並安排適當時機（Campbell, 1993: 29-30）。

畫眉牧地的年輕人，住在牛津一個仰賴汽車產業工作的地區。「牧地是替汽車工業供應黑人和白人勞工的主要來源，對二十世紀許多人而言，汽車工業與現代性、大量生產和移動性的流行經驗有關……這也是涉及男性氣概的工業——汽車主要是由男人製造，並為男人生產」（Campbell, 1993: 31-2）。隨著 1970-1990 年間，在牛津工作，受雇於考里（Cowley）的男人數量減少，從三萬降至五千人，牧地住宅社區就深受不良影響。坎普貝爾指出，

對勞工階級男人來說，在一個世代裡，就業、政治結盟、收入和認同的主要傳統，甚至塑造男性氣概文化的傳統，幾乎都消失了。

小夥子或許已經停止製造汽車，這卻沒有阻止他們偷車。在牛津，隨著男人製造業工作衰退而來的，卻是車輛竊盜的猖獗。

〔牧地〕住宅社區的汽車犯罪……牽涉的是年輕人和權力、機器、速度及超越之間的關係（1993: 32-3）。

所以，透過偷竊、消費和操演，這些年輕人重新建構了某種類型的男性認同，那是他們父親在工作場所創造的男性認同，但是經濟再結構、汽車生產區位的全球轉變，以及英國 1990 年代的高失業率，已經讓他們否定了自己。

最近出版的一篇有趣文章裡，范恩等人 (Fine et al., 1997) 報導了他們類似的調查結果，論及兩個美國城市，紐約州的水牛城 (Buffalo) 及紐澤西州澤西市 (Jersey City) 裡白種勞工階級的男性氣概。這裡也一樣，重工業的衰退，大幅減少男人的工作機會，是沒什麼教育資歷的年輕白種男人，受害尤深。作者針對這些區位，執行了兩項獨立的質化研究——諸如學校、鄰里，有些是在工作場所——勞工階級男孩與男人自己發明了一個群體，與其他弱勢團體相關又疏離。范恩等人研究他們的企圖，他們試圖創造自尊感，並適應勞工階級男性氣概原先的霸權觀念，這種觀念主要是在不復存在的工作場所建構而成的。

研究者發現，

1980 年代晚期和 1990 年代初期，我們訪談的貧窮勞工階級白種男孩與男人，猶如完全不受腐蝕性經濟和社會關係支配似的，敘說著「個人認同」。浸透於一種後工業的、晚期二十世紀的個人主義中，「認同工作」的論述似乎覆蓋著鐵氟龍 (Teflon)。經濟和社會環境侵犯他們個人的福祉越深，傷害與混亂越是遭到否認。霸權以奇特的方式運作，尤其對白種勞工階級男人而言，他們想要認定自己一直優於「其他人」(有色人種和白種女人) (Fine et al., 1997: 52-3)。

對這些男人來說，唯一解決他們因缺乏經濟機會而憤怒的辦法，是尋找代罪羔羊。他們拒絕承認自己置身「歷史之內」，因社會和經濟關係的特殊結合而受苦，也拒絕沿著階級或經濟位置

的界線，跟其他遭受相同結構環境負面影響的「弱勢群體」、女人和有色人種，一起組織起來。「這些男孩和男人不顧一切、戒慎警惕地堅持白種男性身分，好像它們在日漸階級隔離的世界裡，能夠讓自己贏得信譽」（Fine et al., 1997: 53）。他們未能認清，在整個美國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歷史中，勞工階級男性的相對優勢地位已經到了盡頭。「在幾十年的期間裡，外國投資、企業外逃、縮編和自動化，突然令勞工階級成員失去穩定的家庭薪資，這種情況還因工會消散而惡化，任憑白種勞工階級男人感到憤怒，遭到去勢」（1997: 54）。

雖然勞工階級男人不見得比中產階級男性更具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但范恩等人在這些環境中發現，他們的挫折與憤怒，在面對全球經濟變遷的移置反應上，採取了「充滿敵意的形式」。他們建構一種論述，責備那些他們認為應該為竊取他們特權負責的人。然而，對「他者」（黑人、同性戀者和女人）的敵意程度各不相同；有些男人比其他人更不友善。范恩等人提出發人深省的地理類比，指出「就像製圖師使用不同工具來描繪同一個地緣政治空間，所有這些男人刻劃他們的認同，猶如透過種族、性別和性慾特質的框架而有所差異，並形成了對比」（1997: 59）。

在我看來，比起未能說明象徵意義和自我之社會建構的問題，反而處理抽象的失業人數的分析，這種研究提供了更細緻的方法來處理經濟衰退和再結構問題。這種研究顯示了透過「性別透鏡」來分析，可說是力道十足，也清楚地闡明了為何性別在經濟和社會地理方面很重要。

新社會運動、社區力量與社區政治

在地方政治行動中，挑戰與捍衛取得空間不均等分配的財貨和資源上，女性通常扮演關鍵角色。在社會學家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討論城市的早期研究中，他指出有關都市財貨和資源（他稱為集體消費財）的鬥爭，是都市社會學專有的區別性特徵（Castells, 1978）。女人在這些鬥爭或都市社會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雖然柯司特自己相當忽視這個部分。他也沒注意到，由地方或全國政府提供的集體服務，以及由個別女人為她們的家人，或在志願社區工作中替陌生人提供的服務之間的界線，都可以滲透，並隨著國家意識形態觀點的改變，以及移轉給地方服務的金錢多寡而變化（在第七章，我們會回頭針對柯司特的著作，從事更徹底的女性主義評估）。例如，1980年代余契爾政府主政下的英國，隨著「社區照顧」取代了為老人和精神病患提供的機構服務，照顧的擔子更沉重地落在個別女人肩上。不過，柯司特確實注意到，由於女人提供了時間和方法，空間上分隔的服務才能彼此連結，城市才得以運作：例如，把小孩從學校帶去看牙醫，或者往返通勤時，途經保母和超市。

116

現在有地理學家和其他人完成的大量女性主義文獻，探討女人身為都市社會運動和社區政治參與者的重要性，以及西方和非西方社會裡，做為鬥爭和組織基礎的性別問題和議題。我在第七章會在國族國家層次上，討論社會福利供應和性別的問題，並說明女性主義理論的國家觀點。在這裡，我要討論一項有關英國布萊頓（Brighton）女性地方行動的研究，然後檢視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英國某些地方當局成立的婦女委員會的工作。

麥肯齊 (Suzanne Mackenzie) 在她寫的《可見的歷史》(Visible Histories, 1989) 中，檢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 1970 年代末期間，住在布萊頓海濱勝地的女人，成立組織來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各種方式。隨著女人的生活在戰後幾十年間的變化，這些女人透過一連串有關控制生育、分娩和育兒，以及工作場所中的新組織網絡，挑戰了地方政府、修補了服務、縮短差距、滿足了新需要。麥肯齊記載了女人改變和改善這座城市地方環境的多元方法。

然而，尤其在都市內部層次，社區政治引發的關鍵議題之一，就是鄰避 (NIMBY，別在我家後院 [not in my backyard]) 問題。如果地方居民組織起來，把令人討厭的活動排除在他們自家「後院」之外；相反的，把喜愛的財貨和資源含括在內，這麼一來，另一個社區或地域肯定會遭殃。在金錢和其他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將資源分配給某個地區，便意味了另一個地區必得面臨物資缺乏。爲了確保公平，或至少不要忽視最無權無勢社區的利益，就必須有地方政府層級的策略性當局，來監管基於地域的爭論。許多政策（譬如兒童、安全和治安），對男人和女人會造成不同衝擊。由於認識到這一點，1980 年代英國的某些地區，地方政府成立了婦女委員會或機會平等委員會，評估可能改變或改善地方服務以達致更大性別平等的程度。霍福特 (Susan Halford, 1992) 評估了這些倡議造成的衝擊。

霍福特認爲，性別倡議的引介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資源、政治承諾和領導才能，以及地方上政治動員的程度和性質；但是，她也提到，地方政府官僚體制的一般特性，使得任何改變舉步維艱，特殊的性別化結構和關係，也阻礙了女性利益的正面改

變（1992: 160）。在十個地方當局的個案研究中，霍福特記錄了帝國式構造如何證實是令人沮喪的變革阻礙。她發現層級結構中，有不同部門間競爭和組織惰性的證據。再者，地方政府部門時常橫跨性別議題，從而妨礙了性別倡議。此外，組織裡的非正式權力結構，往往在並非性別中立的地方工作場所文化中，邊緣化了個別女人和婦女議題（我在下一章會進一步討論工作場所文化）（Cockburn, 1991; Kanter, 1977, 1992; Marshall, 1984; Pringle, 1989; Watson, 1992）。霍福特說明男性主導下的工會，以及專業和半專業團體，例如地區工程師、規劃師、勘測員，還有醫療及相關職業的專業和利益，如何經常反對變革。在許多地方當局，這些倡議都沒能熬過頭幾年。

新生活方式？

本章收錄的個案研究，說明了營造環境，以及機會、財貨和資源在整個城市裡，以及在地域、鄰里和鄉村之間的不均等空間分配，如何不僅深刻影響了都市居民的生命機會，也對他們身為女人和男人的自我感，造成重大衝擊。很顯然的，區位、族群特性和階級位置之間一組複雜的相互連結，與性別分化有關，而且對於在不同地區身為女人或男人的意義為何，產生了特殊的認識。對於美國族裔聚居區，以及英國內城與外城地區的市有住宅區裡的年輕人而言，通往男性氣概的傳統途徑，由於貧窮和經濟不穩定而封閉了。但他們還是堅持男性氣概的主流定義，強調某些特質，像是面對危險時的男性團結，以及支配女性——但理想上，也保護「他們的」女人。如果男人無法透過合法活動來獲得

這些男性氣概面向，那麼男人往往會循非法管道來追求它們。不過，如同坎普貝爾主張的，這些男人與做為其對立面和敵手而設置的警察和軍人，有很多共同點，後者試圖控制他們的非法或反社會行爲。

118

這些個案研究也清楚說明了都市和經濟議題的關聯。區位的影響部分反映了整個都市地區裡經濟活動的分配，以及城市特定地區中，製造業和其他工作機會衰退造成的不利影響。在下一章，我會針對性別分化和工作場所的關聯，檢視更特定而詳細的問題，第六章則會討論關於區位、另類空間和性別認同的問題。在這兩章裡，焦點將是個人認同、地方和恐懼與快感之間的關聯，而非較大尺度的社區和群體認同議題。

結束本章前，我想提一些推測性的問題，有關另類的社區形式，以及不同的性別化空間的可能性。由於營造建築環境相對較固定，它傾向於反映早先年代的性別分化。我在導論裡指出，城市配置、都市運輸網絡和時刻表，以及個別住家的內部配置，都是基於以下假設：一個男性負擔家計者固定的朝九晚五工作，伴隨著在地方鄰里結合家事和育兒的妻子。我在下一章會詳述的女性受雇增加的現實，以及工作模式的轉變，還有待反映於新的都市配置和住宅設計。事實上，目前為止，顯然已經發生的最重要改變，就是家人每天圍坐共餐的減少（Bell and Valentine, 1997; Gronow, 1997），以及得電冰箱和微波爐之助，以個人的「放牧」（grazing）取代了家庭共餐。更基進的新生活方式的發展，似乎還很遙遠。

然而，有些重新性別化居住與都市空間的歷史先例。這包括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Taylor, 1983）和女性主義者的烏托邦實

驗，尤其在美國（Hayden, 1976），戰時的美國還興建了一座令人興奮的新市鎮，遵循的原則有別於 1940 年代英國新鎮運動內蘊的郊區一致性（McDowell, 1983）。有關這座城鎮，奧勒崗州凡波特城（Vanport City）的描述，出現於海登（Dolores Hayden）的鉅著《重新設計美國夢》（*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1984）的導言，她在書中檢視了過去與近來挑戰「傳統」性別假設的社區範例。凡波特城乃是為威爾罕姆·凱塞（Wilhelm Kaiser）所建，用以安置戰時在他船塢裡工作的女人，包括那個典型人物鉚釘工羅絲（參見前章圖 3.1）。這些女人很多已婚、有小孩，她們的丈夫在軍中服役。因此，在這段期間，這些女工是單身母親，凱塞吩咐他的建築師興建一座城，讓她們得以盡可能不費力地扮演母親和支薪勞工的「雙重角色」。

每棟住屋都靠近托兒中心。這些中心每天二十四小時開放，不僅提供熱食給兒童，也供餐讓他們母親在輪班結束後帶走，這樣她們就不必在疲累之餘還得做飯。每棟房屋也設計有一扇大型風景窗面對船塢，如此一來，小孩就可以看見每天早上他們的母親去哪裡工作。可惜，這項針對主導整個二十世紀城鎮規劃和住宅建築的父權與家庭原則的精采挑戰，到戰爭末期就遭到廢除。回歸「常態」意味了歸鄉的男人重新安置在他們「適當的」地方（包括「他們的」家和工作場所）。海登便指出，戰爭結束後，那些過去的理想，像是家、媽媽和蘋果派，再度成為主流。

還有其他以女人和女人的需求為核心的社區和建築物事例。其中包括了自 1960 年代及第二波婦運成長以來展開的各種活動和建築物。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將美國、加拿大和英國許多城市裡開設的婦女避難和庇護所、藝術中心及書店包含在內

(Wekerle et al., 1980)。還有其他在某些時刻專為女性開放的建築物：地方當局開設的游泳池和運動中心，在英國很常見，但部分公共運輸系統、咖啡館、餐廳、酒吧和公園，有時候也僅限女性。如前文所述，英國有幾處地方當局於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成立了婦女委員會，處理公共空間和公共建築物裡的近用和安全問題。也有討論女性規劃師和建築師角色，以及她們挑戰專業領域中常見的男性至上假設的研究 (Brion, 1994; Greed, 1991, 1994)。

最近有些計畫已在英國和美國展開，迎合特殊女性群體的需求，她們或許是藉由族群特性、年齡或性慾特質，而非以女性本身來界定。同樣重要的是，別忘了早期有關女性專屬社區和實踐的例子：在本世紀和上個世紀，學校、學院和女修道院，提供了女人庇護及獲取自信和證書的機會。近來有關組織文化的研究，說明了提升女人在所有層次上的代表性，以便挑戰歧視的態度和行爲，以及將女人建構為非典型或反常的那些制度實踐和假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Cockburn, 1991; Marshall, 1984; McDowell, 1997a; Wright, 1995)。

然而，有所爭議的是，女性專屬的服務和空間能否賦予女性力量，還是反而使她們陷於特殊需求的族裔聚居區，從而強化了女人需要保護以免於都市生活的粗暴混亂傷害的論點，其方式類似我在前一章概述的維多利亞時代主張。或許，更有趣的計畫是思考沒有性別歧視，沒有性別特殊性的都市環境，看起來會是什麼模樣。在這裡，我們進入了臆測而非當前實踐的領域。不過，海登 (Dolores Hayden, 1984) 基於家和工作應該更緊密連繫的信念，為洛杉磯的單親家長設計了結合在一起的工作場所和家。要

建造一個無性別歧視的城市，就要質疑「工作」、家與鄰里社區的設計和區位，以及與之扣連的性別分化假設。

結論：反思社區

針對社區（界定為面對面交流主導的、有領域邊界的空間）做為都市組織基礎的可接受性，更基進的挑戰來自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楊恩（Iris Marion Young），我們曾在第二章提過她的身體研究。楊恩認為，女性主義者和其他社會進步理論家，必須完全放棄社區概念：

社區的理想偏愛一致甚於差異，偏愛直接甚於中介，偏愛同情，甚於承認從他人觀點來認識他人的限度。社區是個可以理解的夢想，表達渴望彼此坦誠的自我，渴求相互認同、社會親密和安慰的關係。這個夢想可以理解，但我要指出它在政治上有問題，因為受到社區鼓舞的人，傾向於壓抑他們彼此的差異，或者暗中把他們不認同的人，排除到他們的政治群體外頭。此外，這種理想所推動的小型、面對面、分散單位的願景，在大眾都市社會裡，對於邁向變革的政治而言，是不切實際的願景（1990c: 300）。

如楊恩指出的，人在一個分隔成不同空間或社區的城市裡，跟他們自身相仿的人面對面互動時，會感覺舒適自在，但這個城市往往傾向奠基於「一方面支撐了種族歧視和族群沙文主義，另一方面塑造了政治宗派主義的社會整體和認同的欲望」（1990c: 302）。換言之，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在社會層面上幾乎總是分裂的。楊恩嚮往的城市是，不抑制差異和壓迫「異己」（所有不

同於主導規範的人)，反而是向「不被同化的他者」(unassimilated otherness) 開放 (p. 301)。

121

她透過婦女運動的例子，闡明必要的改變類型，她認為，婦運已從奠基於社區理想或女人共同認同的組織化，進展到偏好不被同化的他者的狀態。楊恩認為，在 1960 年代婦女運動的早期，「婦女團體內部的強大壓力，要求成員分享對世界的相同理解……往往導致均質性——主要是異性戀，或主要是女同志，或主要是白人，或主要是學院的」(p. 312)。在近年頌揚「身為女人」的多元方式，這種比較寬容的觀點發展出來以前，許多勞工階級或黑人女性對於她們遭到排斥深感憤怒，導致 1970 年代激烈的派別之爭。這導致了一種運動，不是以成員猶如了解自己般地相互了解為基礎，而是奠基在不以排外為終局的情況下，接受成員之間的差異和距離。

不過，我納悶在人際空間距離強化了人群差異的城市裡，這個理想如何能轉譯為寬容。楊恩指出，「在一個鄙視和貶低某些群體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性戀的社會裡，對這些群體成員而言，固守彼此，頌揚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經驗，乃是必要且值得追求的」(1990c: 312)。當代城市中，接受並頌揚「他者」，似乎是很遙遠的前景。

楊恩主張，必須放棄以面對面社區為理想的偏好，雖然她並不否認相對地域化的城市空間中，共同友誼和合作的價值。不過，在當前的複雜都市社會裡，隨著跨時空連結人群的媒體擴張，有可能出現豐富多樣的一組社會關係和連結。例如，在歐莒 (Augé, 1996) 所指認的非地方 (non-places) 中，我們的社會特徵，像是我們的性別、族群特性、年齡，都變得不重要，而且如

哈維（Harvey, 1989）與紀登斯（Giddens, 1991）提到的，社會網絡橫跨了越來越大的距離。然而，這是否意味了我們將變得更寬容，猶如具有特殊特徵、背景、需求和能力的陌生人般過活，不想、不能，也不應該嘗試「以主觀且立即的方式相互了解，跨越時間和距離而彼此聯繫」（Young, 1990c: 317），而是以相互容忍的關係過活？我感到疑惑，猜想楊恩的願景是個烏托邦夢想：但當然是個值得追尋的美夢。然而，有鑑於當前這麼多人的生活，仍然定著於我前面描述的那種地區和地域裡，這似乎是無法實現的夢想。不過，在較小的規模上，去抵抗強化了各種社會和空間排他的過程與實踐，卻是很重要的事。

延伸閱讀

討論營造環境、地域和性別分化之間關係的最早文集之一，1981年阿德納（Shirley Ardener）編輯的《女性與空間》（*Women and Space*），仍然相當值得閱讀，收錄了一些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史班（Daphne Spain）在《性別化空間》（*Gendered Spaces*, 1993）中，提供了歷史與地理比較。在我看來，海登（Dolores Hayden）的著作特別優秀。她針對性別和空間區分如何以不同方式關聯，所做的學術性但流暢易讀的分析，包括《七個美國烏托邦》（*Seven American Utopias*, 1976）、《偉大的家務革命》（*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1981）、《重新設計美國夢》（*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1984），以及最近的《地方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 1995），揭露並闡明了二十世紀洛杉磯地景中，性別、階級和族群的區分及其再現。茹蒂克（Sue

Ruddick, 1996) 檢視了公共空間與「差異」的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威克爾等人 (Gerda Wekerle with others, 1980, 1995) 針對性別化空間議題已有許多出版，包括規劃更安全的城市，葛瑞德 (Clara Greed, 1994) 也評估了性別敏感規劃的願景。

雖然都摩須 (Mona Domosh) 把重點放在階級關係上，她的書《發明城市》 (*Invented Cities*, 1996a) 討論十九世紀紐約和波士頓的地景，很值得探究一番。布斯 (Chris Booth)、達克 (Jane Darke) 與楊恩多 (Susan Yeandle) 合編的《變遷中的地方：城市中的女性生活》 (*Changing Places: Women's Lives in the City*, 1996)，是非常全面的介紹性文本，附有很好的參考文獻。芬雀兒與雅克布斯 (Ruth Fincher and Jane Jacobs, 1998) 最近編輯的文集，收有女性主義都市地理學者和其他人的論文。《國際都市與區域研究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和《性別、地方與文化》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刊載了許多經驗探查，論及不同環境和地域中的性別區分與關係。本章僅將焦點放在西方社會，但是在殖民和後殖民社會裡，有許多傑出論文和專著探討空間的性別化特質。例如，彌爾斯 (Sara Mills, 1996) 分析了十九世紀末的殖民地印度；在艾須克洛夫特等人 (Ashcroft et al., 1995)，以及摩姆森與基內爾德 (Momsen and Kinnaird, 1993) 的書裡，有許多討論「地方」的論文。最後，楊恩 (Iris Marion Young) 在一些不同地方詳盡闡述了她的社區論點，包括我引用的論文，收於妮可森 (Linda Nicholson) 編輯的書《女性主義 / 後現代主義》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1990)，以及史奎爾斯 (Judith Squires) 的文集《有原則的立場》 (*Principled Positions*, 1992)。

5

工作 / 工作場所

WORK AND WORKPLACES

導言

123

性別和支薪工作的相關文獻汗牛充棟。這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關鍵領域之一，至少直到最近，或許也是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最重要的焦點。在某個程度上，主導本章的議題，剛好和第三章的議題「家園」相反。第三章探討了女性化家庭領域理想的發展，以及這種理想將女性侷限家中的作用。但是，家和「工作」（以受薪勞動而論）的這種區分，在工業社會裡成為慣例，以致看來是不證自明的，我們也認為，至少對大部份人而言，外出工作便意味了離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帕爾（Ray Pahl）在他的書《分工》（*Divisions of Labour*, 1984）裡強烈提醒我們，情況並非總是如此，這也不是當今許多社會的常態。有相當多的工作曾經且迄今依然是在家裡進行，而且家中成員在自家協力生產財貨。誠如我在第三章主張的，育兒和家務肯定是工作，即使婦女勞動在此不被當成工作，而且沒有得到金錢報酬。

124

隨著工業生產的浮現，家和工作在空間上區隔開來，但即使是先進社會裡最「先進」的部分，今日這種區隔也不太徹底。我在前一章也提到，有少數婦女向來就是為薪資而工作，有時候在自己家裡，或是在其他女人家裡。事實上，我於第三章同時討論了血汗勞動和家務勞動，因為那種勞動類型符合女人位置是在家裡的理想觀念。「外出」工作挑戰了這種理想，但即使如此，在整個十九世紀，有好幾百萬女人確實外出工作。其中有許多人的就業類型是在女人構成的女性化「聚集區」（ghetto）裡，主要只與其他女人一起工作，或者從事被建構為「女人工作」的工作和職業，因而比「男人工作」薪資要低得多。二十世紀中期起，女性的受薪勞動參與率擴張了，但女性集中於女性化的職業，依然

是她們就業模式的主要特色。因此，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的關鍵議題，就是解釋女人最初為何會被排除在外，以及她們後來在勞動市場裡集中或區隔的情形。

過去二十五年裡，產生了一連串卓越的理論和經驗研究，包括國家統計的總體分析，以及特殊產業、部門、職業、地域和公司的詳盡個案研究。這個時期的理論關注，也從受馬克思主義啓發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分工分析，轉移到有關工作場所中文化、勞動力和性慾特質在工作上的體現等問題。由於現在已有許多討論這些轉變的極佳調查（Auster, 1996; Bradley, 1989; Crompton and Sanderson, 1990; Dex, 1985; Fuentes and Ehrenreich, 1983; Nash and Kelly, 1983; Stichter and Parpart, 1988; Walby, 1986），我會很簡潔地摘述，在這一章花比較多篇幅探討不同理論傳統中的某些經驗研究。

1990 年代，經驗研究和理論探討的重點又有進一步轉變。部分原因是反映了以下認知：男人和男性氣概必須明確納入女性主義勞動市場研究，以及其他領域之中；但這種轉變也回應了大約 1970 年代初期以來，發生在工業社會的深刻經濟再結構的物質變遷後果，其頂峰是轉向了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對工作場所中男性氣概之社會建構的新強調，也就變得更明顯了。由於工業化西方的特定區域裡，資歷不足的年輕男性能從事的製造業工作幾乎都消失了，這些男人發展出獨特勞工階級男性氣概——圍繞著共擔風險、辛苦工作和團結感受而建立——的機會，例如由煤礦、造船、鋼鐵或化工產業主宰的地域特色，也隨之消逝了（Campbell, 1984; Beynon et al., 1988; Fine et al., 1997; McDowell and Massey, 1984）。我在前一章討論了在英國和美國，失業對年輕男人的某些意涵。因此，稍後在本章最後一節，我會回頭探

討，在許多方面體現了女性氣質之社會特徵的新工作形式，如何被男性詮釋為符合男性氣概的主導觀念。

解釋性別分工

125

近幾十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使得女人成為無產化，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女性受薪勞動者都增加了。然而，國際勞工組織（ILO）蒐集的比較統計資料顯示，勞動力的女性比例，仍有相當程度的地理差異。儘管比較的基礎並非總是完全相容，而且資料蒐集的時代也有些變化（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但是西方國家的女性勞動市場參與不盡相同，以就業年齡女性而論，最高是丹麥的78%，而西班牙僅占43%，義大利和希臘也只有44%。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參與率，更是紛雜多樣。非洲部分地區仍常見極低的比率：例如在阿爾及利亞，1990年代初期，不到5%的女性參與受薪工作，埃及是14%，塞內加爾和摩洛哥為17%。當時的其他「開發中」社會，像是印度和孟加拉、新加坡和巴貝多（Barbados）這類國家裡，有50%至65%的女性受雇，但中國女性只有40%受雇；在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有官方記錄的工作裡，就業年齡女性典型上占不到三分之一。

有各種因素影響這些比例，以及其中的變異。除了「西方」工業化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明顯差異，譬如說，宗教態度也會影響參與率。因此，在西方，天主教國家傳統上女性參與率較低。例如，義大利女人的參與水準在西歐幾乎最低（雖然事實上，1970年至1990年間，義大利的成長率位居西方最高之列）。在別處，阿爾及利亞的數據便說明了，伊斯蘭國家的女性參與率比較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資料太不可靠，不能拿來比

較)。同樣的，工業發展的程度與步調至關重要。例如，目前遭逢經濟危機之苦的亞洲「四小龍」，在 1980 年代發生了快速的工業成長，電子和成衣業工作吸引了大量女性。

在檢視女性工作模式的原因前，大略評估比較的統計基礎是很重要的。估算和定義女性工作，會引發方法論和理論上的問題。先說前者，女性主義者始終主張，將工作定義為正式結構化雇用關係裡的受薪勞動，乃是基於男性的工作理想。很多女人為愛而「工作」，其他許多人則受雇於各種安排，她們的財務報酬也許是暫時或間歇性的，基於善意或私下給付沒有記錄 (Glucksmann, 1995)。在比較不工業化的經濟體中，情況更是如此，雖然這種情形在工業社會也很常見。譬如，女人在家庭農場或家庭企業中充當無薪給的助手，在農業裡擔任週期性或經常流動的勞工，或在例如酒吧、俱樂部和餐廳兼職工作，或是打掃辦公室或其他女人的住家，以賺取現金。大量這類工作不會記錄在國家統計帳目上 (Waring, 1989)。

126

跨國比較的基礎也往往不確定，因為不同國家採用不同估算方式，記錄的時期不同，數字的可靠程度不一。因此很顯然的，我們所認定的「工作」同時是在社會上和統計上界定的，而且在不同脈絡裡有許多種意義，所以國家之間的比較很困難。國際勞工組織蒐集的資料，是目前可取得的最佳資料。

儘管在參與率方面（至少根據官方記錄）有顯著的地理差異，女性受薪工作的模式，普遍有三項區別性的關鍵特色。女性集中在某些部門和職業（這稱為**水平區隔**）；她們傾向於位居職業階層底部（這是所謂的**垂直區隔**），而且女人整體而言賺得比男人整體要少。後面這項特質，不僅是反映了女性與男性從事不同工作的事實；即使男女從事相同種類的工作，實際上，即便他

們從事負擔相同責任的工作，女人還是賺得比男人少。例如，1990 年代中期的英國，全職工作的男人每賺一英鎊，全職的女性平均才掙得 73 便士。如果把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的女性納入比較，這種差別就會更大。

男女進入不同職業的區隔，與性別的社會期待有關。女人從事的工作，傾向於確定她們養育、照顧和支持他人的社會期待。例如在美國，女性擔任九成的牙醫助理、祕書、育兒員、執照護士、托兒所和幼稚園老師 (Auster, 1996)。同樣的，就男人而論，認為體力或分析能力伴隨男性基因而來的信念，導致仰賴力氣的體力工作，以及需要分析技巧的職業都由男性主導。因此在美國，男性擔任九成的卡車司機、汽車修理工和消防隊員，以及飛機駕駛和領航員，還有超過八成的醫生、牙醫和建築師 (Auster, 1996)。在英國和西歐其他國家，性別區隔模式都很類似。

127

在女人主導了於「西方」被界定為「男性的」職業的國家裡——例如，在前蘇聯各共和國中，大多數醫生是女性——這些職業本身和其他男性主導的職業相較之下，被視為較乏聲望，因而沒有很好的財務報酬。這些差異暗示了，並不是職業本身的特徵，要求了據稱與男性或女性特質有關的屬性或技能，反而是**誰從事某項工作**，取決於這項工作在社會上如何被建構、評價，以及伴隨而來的報酬。不過，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地理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奮力建立這層關係，而且在這個過程裡，必須針對廣泛性別區隔模式的傳統解釋，提出反駁的論點。

有各種理論嘗試解釋職業區隔，隨著強調個人選擇或大尺度結構因素而異，但是在大多數理論架構中，結果被認定是個人能力、性向和興趣、持有證照，包括跟階級相關的屬性和接受教育

的證書（這是我們在第二章提過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稱為文化資本的東西〔Bourdieu, 1984〕），以及決定進入特定行業和職位的通例與規則，這些因素之間的折衷。如同過去發展出來的許多職業選擇理論，女性主義者也主張，總體的社會與經濟過程以不同方式影響了男人和女人，性別差異不是遭到忽視，就是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加以解釋。換句話說，是女人的「自然」天資，而非基於性別的歧視，被當成女性歸屬於女性主導之工作聚集區的理由。讓我們檢視有關職業區隔的某些主要解釋類型，以及過去二十五年間，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發展出來的其他可能解釋。

正統的經濟學解釋

供需理論

對於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的增長，最直接的經濟解釋之一，就是勞動供給和需求雙方面變遷的吻合。這種解釋勾勒了一連串改變，意味了女人更具備擔任受薪工作的適當資格，而且更容易雇用，正好配合了勞動需求的升高。這些改變包括女人教育資歷提高、避孕手段的方便取得（至少在比較「開發的」國家），以及與此相關的，個別女人生育小孩平均數目的降低。此外，在某些國家，各種消費者耐久財和服務的更廣泛可得，理論上減少了家事和育兒負擔，將「解放」女性以從事受薪工作。然而，有關「省力」裝置影響的證據很複雜。比如在很多事例中，引介這些裝置，導致了女性力求更高的清潔標準，而非減少耗在家務工作的時間（Cowan, 1983; Oakley, 1974）。在許多國家裡，有關「女

性議題」(兒童照顧、墮胎和性騷擾運動)的競選活動與立法改革,提高了女性地位,並導致更大的女男機會平等,也促使女性加入受薪工作。

在需求面,經濟學家指出,在經濟成長時期,以及隨著資本主義組織形式傳播到世界某些經濟發展的地區,勞動需求也提高了。簡單的需求模型裡,假設資本不在乎勞工的性別,但其他模型則假設女性的加入,與勞工極度短缺的景氣繁榮時期有關。有人認為,女人在景氣好轉的時期被納入經濟結構,經濟衰退時期又被驅趕出去。不過,有關這項論點的經驗證據很有限。長期和跨國的數據皆指出,戰後時期以來,甚至在普遍經濟衰退的時候,多數國家的女性參與都穩定增長(Rubery, 1988)。某些前社會主義社會是例外,在共產主義時代,這些社會的女性參與率極高,但1989年以降就減少了,這既是經濟困頓(升高的失業也衝擊男人)的後果,也是女性在家務勞動仍舊費時費力的情況下,決定退出勞動市場的結果。

人力資本理論

有些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發展了修正版的基本供需理論,更注意性別分化的重要性。以貝克(Becker, 1975)的著述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揭明了供需理論背後有關女性負責家務工作和育兒的假設。該理論假設分析的正確單位不是個人,而是有一定工作量與特定工作有待完成的家庭或家戶。理性分工的構成,是根據每位成員體現的人力資本總量,以及人力資本在勞動市場販賣所能獲得的相對報酬率。有人主張,一般而言,男人比女人接受較好的教育,投資較多時間和精力以獲取

技能或證書。因此，男人進入勞動市場是明智的，因為男人比他們的女性伴侶獲得相稱的較高報酬，女人則較適合擔負持家和育兒這種基本的無薪給勞動。再者，若女人果真進入勞動市場，則該模型預測她們會從事兼職工作，並且（或是）在住家附近工作，因為女人每工作一小時或通勤一英哩的報酬要比男人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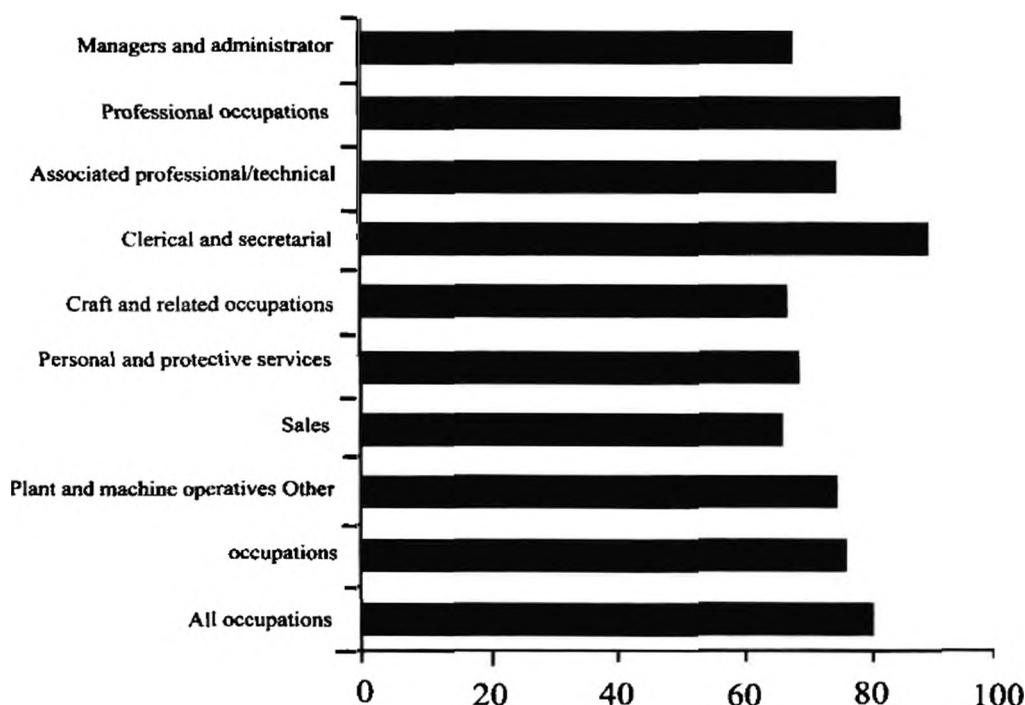
無庸置疑，這些具性別特殊性的模式確實存在。例如，有些女性主義地理學者討論了具體的空間問題，探討距離和區位對於找工作和就業模式的影響。性別和通勤距離的經驗關聯已經確立了。一般而言，女性旅行距離較短，是她們的育兒職責和私人汽車使用受限的結果，雖然這些關係會受到社會階級、教育證照和薪資水準，以及族群特性影響。例如，條件較佳的女性，獲得較高收入，便較有可能到更遠地方工作；少數族裔群體的女性，通勤距離似乎也比其他女性更遠。不過，即便是接受良好教育和薪資的女性，距離和薪資率之間的關係也沒男人那麼明顯（Hanson and Johnston, 1985; Johnston-Anumonwo, 1992; Villeneuve and Rose, 1988）。韓森與普瑞特（Hanson and Pratt, 1995）的研究在引領我們關注空間議題上，尤具影響力，延伸了居住區位，以及找工作行為的性別差異，在維繫職業性別區隔上的角色的了解。他們發展了與女人家庭責任有關的空間圍堵（spatial containment）觀念，藉以解釋勞動市場行為的性別差異。

人力資本模型或許吻合 1970 年代先進工業國家的女性就業經驗模式，卻逐漸偏離 1990 年代的現實，這時候女人接受的教育比以往好（例如在英國，女孩的畢業考成績勝過男孩，而且在 1996 年，英國大學畢業的年輕女性首度超過年輕男性）。在西方的新「彈性」勞動市場中，越來越多女人全職工作，而越來越多男人必須接受兼職的臨時或非正式雇用：以前這被認為是只適合

女人的模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模型，也傾向於將性別分化視為理所當然。因此，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發展的模型，未能探問為何女孩較早輟學，或者不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達致相同水準的資格。因此，這些模型假設特殊的性別分工，卻未加以解釋。

130 爲了尋求解釋，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轉向我要在後文概述的不同取徑。不過，人力資本理論家最近開始修改他們的假設，考慮當代（某些）女性生活的現實。一則根據一位經濟學家撰寫的未出版論文，刊載於《衛報》的報導（19, May, 1997, p. 18）指出，應該引介更細緻的家務勞動觀點，來解釋為何能夠（也確實）賺取高薪的女人，還是會做（某些）她們份內的家務和育兒工作。有人認爲，家務勞動應該根據某個女人若從事勞動市場工作所能賺取的時薪來估算。這篇《衛報》文章透過英國首相夫人、身爲律師的雀里·布萊爾（Cherie Blair）的例子，闡述了這種取向：「如果雀里·布萊爾擔任打掃工作，你要麼可以假定這件事價值一名雜務女傭的費用，譬如一小時三英鎊，要不，你可以看看如果她把時間花在高等法院會賺多少錢，比方說一小時兩百英鎊」。這假設了我們都是有理性的人，爲尋求較佳利益而交易，所以，對布萊爾夫人而言，「打掃工作必須價值超過兩百英鎊，否則她不會去做」。很顯然的，有關職業婦女面對的內咎，以及她們爲何願意做她們份內的打掃工作，學院經濟學家所知有限！

於是，這個模型包含了家戶內男人和女人的選擇，而且重建了人力資本理論家的舊假設。有人主張，男性勞動的價值較高，因爲他賺得比較多（即使對從事專業或管理工作的女人來說，這仍是正確假設，如圖 5.1 所示）。所以，他在廚房水槽邊耗費半小時的價值，高於由他太太來做的價值。或者，換個方式來說，他爲此放棄的收益比較高。根據這個修訂過的人力資本模型的假



統計圖 5.1 女性薪資占男性薪資百分比（全職工作），英國，1996 年（資料來源：Labour Force Survey, 1997）

設，可以推算英國經濟體家務勞動的總價值，並主張「母親貢獻家務勞動的 70%，但只占家務勞動價值的 50% - 60%」。在這個模型裡，一位典型的母親只貢獻家庭總勞動價值的 36%，雖然技術性較高的女人，貢獻可能提高到 46%。也有人認為，隨著女人的「人力資本」降低，以及她的雇用可能性減少，女性家務勞動的價值會隨時間減低。

應該很清楚的是，這個模型僅僅複製了當前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而非解釋了勞動市場的性別特質。它強化了當前的假設，女性被社會建構為較差的勞動力，並將她們列入「較無技術的」勞工範疇。

雙元與區隔的勞動市場

131 如果我們轉向勞動經濟學者，而不是新古典主義理論家的著作，我們會發現有人質疑了正統的假設，即分工是基於個人或家戶單位的理性決策。勞動經濟學者主張，勞動市場的制度結構奠基於差別待遇。在解釋性別分化上，有兩個相關的取向很重要：雙元或區隔勞動市場理論，以及勞動過程理論。雙元勞動市場理論家（例見拜倫與諾里斯〔Barron and Norris, 1976〕的一篇早期論文），正如名稱指出的，主張有兩種勞動市場，一種是首要的，一種是次要的，以就業條件和環境來區分。前者提供高薪、良好的工作環境、工作安全和升遷機會，次要部門裡的工作則傾向於薪資低，提供的晉升機會很少。雖然解釋機制尚未理論化，但人們認為大多數女性任職於次要部門。

132 這種雙元模型有進一步的發展，考慮了勞動市場裡很明顯的、更大程度的區隔，例如雇主利用勞工的種族與族群差異，以及運用年齡和性別差異來控制勞動力（Craig et al., 1982; Rubery, 1988）。因此，這些模型拓展了空間，把性別視為構造勞動市場的核心要素，同時反映了女人的家務和家庭職責。

馬克思主義理論：勞動預備軍

雖然勞動經濟學者從左派觀點寫作，但他們並未採取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架構。而且我在前文指出了，針對女性被建構為較差勞動力的方式，他們傾向於不加以理論化。不過，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的某些最早期著作，卻位居廣義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內。利用馬克思的勞動預備軍（reserve army of labour）概念——因資本主義生產擴張和

改變而低度就業或失業的勞工群體（例如，由於農業和製造部門技術變革而失業的人）——女性主義者檢視了一般女性，以及特別是已婚女性的角色。

英國社會學家碧曲（Veronica Beechey, 1977, 1987），是這個取向的早期關鍵闡述者。她的目標是要解釋英國於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已婚女性就業的顯著成長。她認為在這段期間，已婚女性被建構為供資本家用完即丟的獨特勞動力。她們很少加入工會，而且許多與工作相關的津貼、遣散費，以及政府失業救濟金，她們都沒有領取資格。她們之所以缺乏資格，乃源於稅賦和福利系統的假設，也就是已婚婦女在經濟上應該依賴丈夫，因為她們的優先職責是創造一個家，並照顧男人和小孩。於是，女性被建構為彈性、拋棄式，而且低薪的勞動力，因為家務被視為她們的首要職責。

與人力資本理論家不同，碧曲不認為性別區分是必然的，她反而主張，政府法規和雇主態度將女性建構為依賴群體的方式，既是她們持續擔負家務和育兒責任的原因，也是將她們區隔於少數「合適」工作和職業的原因。美國女性主義者（例見 Power, 1983）延伸了這些論點，也說明了女人的家務如何越來越緊密連繫上資本主義生產。這不僅是「解放」女性外出工作，也使這種情況成為必要，以便有能力購買先前在家中製造的財貨。因此，如我在第三章提及的，二十世紀期間，諸如製作肥皂和果醬、家庭縫紉、釀酒和烘焙的技術衰退了，因為廉價工廠生產的貨品取代了家庭生產。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期間，關心勞動市場的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援用了這些取向的各種版本，在目前稱為分工取向的領域裡從事研究（Frobel et al., 1980; Massey, 1984）。有人認為，在先

進國和新興工業國裡，女性是吸引追求更高利潤率的新流動資本的廉價勞動預備軍。雖然這個「分工」取向，暗中引用女性主義分析，指出女性家庭責任如何部分解釋了她們被建構為預備軍的原因，但在理論上卻認為，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時具備穩定明確的性別屬性。事實上，這個取向的各種版本，尤其是應用於新興工業化國家時，在解釋上仰賴某些甚為刻板的女性氣質觀念——比如說女性被廣泛描繪為年輕、順從和靈巧，而且有異國風情和「東方味」(Said, 1978)。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艾爾森與皮爾森 (Diane Elson and Ruth Pearson, 1981) 質疑這些觀點，以及下述觀念，即女人有如「無經驗的」勞動預備軍般消極等待，有需要時，她們就準備進入工廠和辦公室。相反，她們主張無論在工業國或正進行工業化的國家裡，建構和訓練女性成為「勞工」，使其擺脫父權家庭關係。國家和資本家必須採取行動。她們強調女性的積極能動性，也探查了她們抵抗雇主某些最剝削性的行動的方式。全球勞動婦女組織 (Women Working Worldwide, 1991) 針對各地區 (例如從蘇格蘭到韓國) 從事電子裝配女性的個案研究，說明了不同的抵抗策略。女性主義的發展文獻中，也產生了熱烈爭論，論及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對於女性的低劣地位，及其受到資本家和男性支配與壓迫的情形，究竟是改善或惡化到什麼程度。有些學者 (例見 Lim, 1983) 已經指出，西方女性主義者傾向於強調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剝削性質，低估了進入勞動市場的女人所成就的生活水準之全面改善，以及獨立和自我價值的提升。勞動力參與也可能促使女人逃離壓迫的家庭環境。

然而，越來越多針對世界不同地方之不同部門所做的的傑出經驗研究顯示，對不同女人群體而言，實際結果往往非常複雜多

變，取決於她們過去和當前的環境、她們從事的工作類型，以及她們進入的產業。這些變動的模式具有迷人的歷史和地理情勢。

工作與工作場所文化的性別化

雖然這一切理論取向，都已證明是描述戰後先進經濟體及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性別分工的有力方式，卻沒有一種取向能夠完全解釋，為何女人繼續受僱於範圍狹小的職業。隨著這幾十年的進展，在「西方」所謂的後福特（post-Fordist）工作模式下，這些解釋也顯得越來越不恰當。它們認為女人是次要或臨時的勞工，男人則與勞動市場有首要且全職的依附關係，這樣的假設遭到製造業衰退、服務業成長、女性就業的增長，以及兩性皆有的彈性工作模式挑戰。戴克斯（Shirley Dex, 1985）在她針對女性勞動市場參與之各家解釋的有用調查裡，指出：

女性不是邊緣勞動力，而應該視為永久屬於勞動力……。有關女性是不是勞動預備軍，或是遭到經濟波動打擊的拋棄式勞動力的議題，都是在女性就業上問錯了問題。這些問題受到太多男性中心的理論化影響。針對女性和男性的工作，需要提出更具體明確與性別相關的問題，以便進一步重新概念化正在發生的社會經濟變遷（1985: 203-4）。

重點必須轉移到工作的特徵，而非勞工身上，探討特定性別的特性和特徵，如何透過男女所從事的工作而被歸諸男人和女人。性別化認同是在工作中產生和再造的，而不是個人秉持著穩固不變的性別認同而進入勞動市場。越來越多女性工作的個案研究，開始闡明各式各樣「工作場所」的社會實踐，顯示女人被建

構為「體現的」——不同於被視為標準的不具形體的男性氣概——並且因為女性被視為低劣，而阻礙了女性的進步（Bradley, 1989; Cockburn, 1983, 1991; Game and Pringle, 1984; Milkman, 1987; Pringle, 1989; Westwood, 1984）。

135 女性主義分析逐漸認識到，工作和勞工的性別認同，在工作上都是可以協商和爭辯的。史考特（Joan Scott）就認為，

倘若我們蒐集描述「女性工作者」的活動、需要、興趣和文化的資料，來書寫女性工作史，我們就聽任自然化的對比安於其位，並且物化了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固定範疇差異。換言之，我們過晚展開這個故事，不假批判地接受這個本身需要考察的性別化範疇（「女性工作者」），因為它的意義與自身的歷史相關（1988: 47）。

同樣的觀察適用於職業，如此一來，職業的性別類型化（或者稱為刻板印象化更恰當）過程，便開始遭到拆解。

工作並非性別中立，而是被塑造成適合男人或女人的工作，構成和維繫工作的整套社會實踐被建構出來，以便體現為社會所認可但多變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特徵。在典型「男性」職業的分析中，這個關聯似乎不證自明；譬如說，試想沉重男性體力勞動中的英雄鬥爭和同袍情誼（McDowell and Massey, 1984）。同樣的信念現在也適用於不證自明的女性職業，例如祕書工作（參見 Pringle, 1989），但是要謹記，祕書工作在二十世紀期間改變了它們的性別關聯（Bradley, 1989）。較不顯著的「性別化」工作和新興職業，則歷經了對抗和協商以建立其性別符碼（Crompton and Sanderson, 1990）。因此，注意力已經轉向工作場所文化與管理，以及勞工態度，如何維繫或質疑了性別歸屬和區隔的模式。男女之間的鬥爭和權力關係、日常實踐，以及工作場所中可接受之女

性氣質和男性氣概的生產與維繫，這類新問題已經進入了受薪工作的女性主義分析，個別勞工則成了積極的能動者，與其性別歸屬共謀或加以質疑。

除了個別勞工外，新的研究焦點也轉移到包括了管理和組織結構。正式的組織結構和非正式的工作場所實踐，不像官僚組織的傳統觀點認為的性別中立，而是實際上充滿了性別化的意義和實踐，既建構了工作中的性別化主體性，也打造了符合特殊性別認同的不同工作範疇。對於不同工作場所位址中，不同種類工作之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多元建構感興趣的社會學家（Leidner, 1993; Halford et al., 1997）、組織理論家（Casey, 1995; Hearn and Parkin, 1987; Knights and Willmott, 1986），以及越來越多人類學家，從事了有趣的研究（Wright, 1995）。工作的「再性別化」（*resexing*），如何往往是導致喪失地位、權力或經濟報酬的經濟再結構的重要環節或必然結果，也開始受到了檢視，將在工作上操作性別（*doing gender*）的具體特性，聯繫上更廣大的經濟過程（Halford and Savage, 1995; Halford et al., 1997; Morgan and Knights, 1991; Kerfoot and Knights, 1994）。

136

近來的研究有個轉變，從或許可以稱為「組織中性別的模型」（*gender-in-organization model*），將組織視為性別化行動者言行舉止的佈景（作為性別中立的地方，由於各地方的不同屬性，而對男女有不同影響），轉變為將組織本身理論化為鑲嵌著性別化的意義，並由性慾特質的社會關係所構造。在這些研究中，性慾特質被界定為社會建構的一組過程，包含了慾望、幻想、快感與自我形象的模式。因此，性慾特質不僅侷限於（或主要是）性關係，以及有關性騷擾議題的相關政策意涵。重點反而在於權力和支配，以及有關一般界定的性別合宜行為和性慾特質的假設，如

何影響了管理作為、工作評價的組織邏輯、升遷程序和工作細節 (Acker, 1990; Cockburn, 1991)，以及勞工之間的日常社會關係。對於男性的性慾特質如何塑造了組織實踐，有與日俱增的認知，從而質疑了一般抱持的觀點，即認定工作中的性慾特質是女性勞工專有的特徵。認識到男性體現和男性的性慾特質也該揭露出來、接受質問，導致職業性別化的女性主義分析，產生了重大轉變。男人開始進入女性主義的工作分析，並且緩慢地進入了先前忽視性別重要性的組織社會學。

組織反映了男性價值和男人的權力，往往以理所當然的方式滲入工作場所的每個面向。男性權力在日常互動，以及組織裡許多微觀尺度的互動中，暗地裡得到強化：例如，在談話和工作場所的玩笑裡，「譬如男人認定的幽默、戲弄、同志情誼和力量，女人往往會覺得粗俗，尤其是男性的侵略、競爭、騷擾、脅迫和厭惡女人」(Collinson and Hearn, 1994: 3)。各行各業，包括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特殊工作場所文化裡，還有很多其他方式，訴諸「個人主義、攻擊、競爭、運動和飲酒等高度男性價值」(Collinson and Hearn, 1994: 4)。

探討男性氣概與組織、男性權力、男性論述和性別化社會實踐的研究的擴展，乃是受女性主義影響的學術研究，理解性別化主體性的複雜性，以及主體性如何在不同位址（例如，家、街道和工作場所）被建構，並有所差異的更廣泛轉向的一環。這恰巧與女性主義者，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的企圖一樣，要揭露早期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背後，有關「女人」的特殊假設。早期研究因為暗中聚焦於白種、英國中心和中產階級的女性氣質而遭致批評，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因此越來越致力探究種族、階級和性別相互建構的方式。例如第三章就檢視了支薪家務工作的種族化。

然而，認定第三世界的女性處境，基本上等同於西方前工業時期的女性境況，而且地理學家和其他人，對於被塑造的——譬如由帝國主義塑造的——僱傭實踐中的具體性別關係不夠注意，卻是個準確的批評。

酷兒 (queer) 的學術研究已經興起。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像是巴特勒 (Butler, 1990a, 1993)，我在第二章介紹過她的研究，法斯 (Fuss, 1990) 和威緹格 (Wittig, 1992)，說明了異性戀的「規範性虛構」(regulatory fiction) (Rubin, 1975; Rich, 1980) 如何強化了自然化的男女二元區分。同樣的，1980 年代中期以來，明顯增長的男同性戀學術研究，揭露了霸權異性戀男性氣概的建構與支配，排除了其他男性氣概的形式 (Craig, 1992; Herdt, 1992; Kimmel, 1988; Metcalf and Humphries, 1985; Weeks, 1986)。因此，最近有關性別的一般研究，以及組織社會學派的研究，已經發展出多元男性氣概的觀念，藉以指涉各種橫跨時空的男性氣概形式。闡明歷史和地理變異程度的振奮人心的文獻，也有迅速擴展 (J. W. Gibson, 1994; Gilmore, 1990; Herzfeld, 1985; Kaufman, 1993; Klein, 1993; Mangan and Walvin, 1992; Messner, 1992; Nye, 1993; Roper and Tosh, 1991; Segal, 1990)。

康涅爾 (Connell, 1995) 認為，源於史學和人類學的新學術研究，導向了有關男性氣概如何被塑造成為文化形式的重要研究。為了理解形式的多樣性和轉變，要緊的是去分析特殊脈絡、不同組織和不同地方裡的男性氣概。一門探討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地理學不可或缺，這方面需要大量的比較研究。例如，檢視「全球」組織特定分支機構裡的不同工作場所實踐，還頗有研究餘地。針對無論是否在相同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的男女的比較研究，也幾乎不存在，儘管這種匱乏局部反映了很少有女人跟男人

從事相同工作的事實。隨著女人陸續進入專門職業，這種情況應該有所改變，雖然在接近機會和改變研究焦點這兩方面，改變的步調都太過緩慢。

現在，我要轉而討論幾項迷人的個案研究，有關工作中的性別（gender at work），藉以闡述本章迄今，比較一般性的論點。

性別化工作的個案研究

1 祕書的話：女性聚集區

如前文所述，直到女性主義學術研究開始在學院產生衝擊為止（約莫 1970 年代中期以降），勞動過程和工作生涯的個案研究，都是由男性經驗把持。事實上，工作場所的分析者，似乎著迷於從事體力工作男人的英勇抗爭，非常類似早期研究城市的分析者對內城社會生活的執迷。女人的工作生涯相對而言很不顯眼，原因是女性工作不被認為有趣，也因為主流焦點落在製造業工作的個案研究，意味了多數女人受雇的服務業不受重視。在少數針對女性工作的早期研究中，主要焦點傾向於女性如何結合身兼母親和雇員的「雙重角色」。女人實際在工廠、學校、醫院和辦公室的工作經驗，並未獲得認真看待。1980 年代初期開始彌補這項空缺之際，出現了幾項有關單一工作場所的迷人個案研究：布里斯托（Bristol）的煙草工廠（West, 1982）、汽車零件裝配線（Cavendish, 1983）、列斯特（Leicester）的針織工廠（Westwood, 1984），以及（更少研究的）辦公室工作（Webster, 1986），評估了新科技對技能的衝擊。

這些 1980 年代的研究，主要屬於或可稱為政治經濟學，或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取向，傾向於忽視同一時期其他學域的女性主義理論化的改變。普林哥（Rosemary Pringle）於 1989 年指出，「精神分析、論述理論、文化生產和符號學的女性主義辯論，與大部分工作研究定位其中的政治經濟學和工業社會學架構，彼此間有巨大分歧」（1989: ix）。普林哥自己的研究《祕書的話》（*Secretaries Talk*），嘗試打破這項區分，將工作場所的研究定位於「涉及文化、性慾特質和主體性的辯論脈絡」（1989: x）。這項研究後來成為女性工作研究的經典，激勵了其他人討論工作場所中性別之社會建構的問題。

139

正如我先前主張的，女性受雇於各行各業，其中與女性氣質相關的特徵，與女性所從事的工作有關的特徵，彼此吻合。祕書工作現在基本上被視為陰柔的，而且壓倒性地由女人執行。甚至以祕書為業的男人，會被呈現為失去男性氣概，時常遭到揶揄。這不僅因為祕書的觀念本身被性別化，也因為它是相對於「老闆」範疇（另一個被性別化的範疇，但這時是指男性範疇）而界定的。因此，如普林哥指出的，正因為女性是以「匱缺」（lack）來定義，缺少成為男人所需之物，所以祕書缺乏成為老闆所需之物。如果這些被自然化且視為理所當然的關聯，困擾著男性祕書，那麼這些關聯也對身為「老闆」的女性，提出了難題。既然工作場所裡的所有權力關聯都是男性氣概的，那麼女人能否既掌握權力，又還是個女人？

艾克（Joan Acker, 1990）認為，女人為了在公共的工作世界的最高層級獲致成功，確實必須變成「榮譽男人」，掩飾她們的女性氣質，採取男性的行事作風標準。然而，根據我自己對商業銀行的研究（McDowell, 1997a），我認為這種策略並不可行。儘

管有最近關於認同可塑性和流動性的論點，物質差異仍然有影響，而且男人的男性操演還是比女人的操演得到更高評價。我的一位受訪者就提到，「女人絕對無法成爲跟男人一樣的男人」。置身勞動力的女人，必須找到抵抗策略，使她們能夠挑戰被指定爲「她者」，並找到可以接受的身爲女人的方式，而不會自動被定義爲軟弱無力或「有所匱缺」。

普林哥的書中引述了她與資深祕書的訪談，指出祕書是如何以「貶低她所**做**工作的重要性，而偏好討論她是什麼的方式」（1989: 2，原文的強調）來建構。因此，工作性質（祕書的勞動過程）微不足道，而女性氣質的特徵卻獲得重視。這種過程主宰一切，以至於祕書工作被理所當然地視爲對女人是「自然而然」，所有女性都被假定能勝任這項工作。正如普林哥訪問的一名祕書痛苦地談到，「打字被當成每個女人都會做的事，就跟洗碗一樣！」（p. 3）「女人」和「祕書」的關聯，也以其他方式來鞏固。祕書也「從家庭或性的角度，再現爲妻子、母親、老處女、情婦和蛇蠍美人」（p. 3）。這更強化了她們勞動的瑣碎特性。普林哥在田野研究裡發現，「與祕書談論她們所做的工作，話題必定很快就碰到有關煮咖啡、個人服務、衣服、女性氣質和性慾特質的問題：這些主題是她們自我定義與工作關係的核心」（p. 4）。她提到，祕書與老闆的關係經常奠基於性慾和幻想的形象。這是個親密關係，而且往往充滿情感，也是透過不均等權力關係而建構的關係。

但是，權力不只是單向運作：男性權力凌駕女性雇員。雖然老闆顯然支配著祕書，但祕書可能也會令老闆有所成敗。普林哥就說明了，這往往是個相互權力與脆弱性的關係。英國的基斯（Sarah Keays）與帕金森（Cecil Parkinson）的關係具有啓發性。

帕金森是余契爾第一政府裡的保守派大臣，基斯是帕金森的秘書兼情婦。當基斯將他們的關係公諸於世時，他被迫辭職，事實上，她已經有一個小孩，但帕金森沒有履行跟他太太離婚並與她結婚的諾言。然而，重要的是，記得權力結構和政客奉行（或應該遵守）額外行為標準的托辭，意味著帕金森也受到損害，雖然比起被他遺棄的情婦和女兒，至少他在經濟上的損失不大。

調查女性的勞動市場位置時，普林哥的研究是如何連結論述分析與結構分析的早期重要說明，而且它替女性主義的工作研究，提供令人欣喜的活力。她透過各種方法和原始資料，說明了各種媒體（廣告、電影、管理教科書），以及辦公室日常社會關係中的秘書再現，如何了結合不平等的結構（例如薪資、環境和職業前景方面），以複製工作場所的性別化不平等。

現在，我要轉向另一項傑出的經驗研究，它揭露了某些男人如何能夠重新指派那些看似本質上具女性氣質的任務（打字又是例子），並緊握他們在勞動市場裡的權力。

2 男人的打字工作？印刷產業再結構

對許多男人而言，勞動市場中的男性氣概社會建構，與身體條件和身體操演密切相關。在工作場所裡具備男子氣概，意味天生具有力氣和耐力，這正是肩負工作的關鍵要素。所以，對勞工階級男性而言，沉重的體力勞動包含了身體努力，以及經常分擔危險，藉此產生群體團結和男性的同袍情誼精神，如我在第四章所描述。這種男性氣概是勞工階級男人創造自身價值感的方式之一。康涅爾便指出，「強調工業勞動的男性氣概，既是剝削性階級關係裡的生存之道，也是聲稱優於女性的手段」（1995: 55）。

許多產業工作的衰退、去技術化和臨時化，威脅了勞工階級的男性氣概。此外，透過技術創新的再結構，挑戰了某些職業的性別屬性，改變了男性氣概和機械的傳統聯繫。

考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 1983, 1986）在一連串迷人的個案研究中，檢視引進新科技的各種職業，包括服裝產業和醫院放射線醫學部門。她說明女人如何接受訓練，學會操作新機器，因而使男人失去技能，並時常取代男人。例如，考克伯恩發現在成衣業中，電腦輔助的設計和剪裁，取代了基於手工過程的傳統男性技能。然而，在某些職業和產業中，藉由賦予新科技和新機器男性特質，男人能夠保留傳統支配地位。如康涅爾指出的：

新資訊科技需要久坐的鍵盤工作，而這最初被歸為女人工作（打孔操作員）。然而，個人電腦行銷已經將這類的部分工作，重新定義為競爭和權力的場域——有男子氣概、技術性的，但不是勞工階級。電腦雜誌的文本與圖表、強調「權力」（蘋果電腦將膝上型電腦稱為「權力之書」〔PowerBook〕的製造商廣告文本和圖表，以及大受歡迎的暴力電玩遊戲產業，都宣傳著這些經過修正的意義（1995: 55-56）。

考克伯恩（Cockburn, 1983）在她討論新科技衝擊印刷產業裡性別關係的示範性研究中，說明了握有技術的勞工階級男性，如何設法修改鍵盤工作的意義。將其建構為具有男性氣概，從而維持了他們對這份關鍵職業、他們的權力和高薪的堅持。考克伯恩對於面臨「熱金屬」（hot metal）排版終結之際的印刷業科技變遷的研究，用她自己的話說，涉及了「塑造和再造男人」（p. 3）。直到 1960 年代晚期，印刷業排版工人擔負的工作，都還類似於他們父親和祖父的工作。事實上，這是一項男孩跟隨父親或

其他男性親戚入行的產業，印刷業以其「具有強大工會認同的父權工藝文化」(p. 3) 聞名。

考克伯恩訪談 1960 年代入行的男人，他們「踏進相對而言一成不變的一套階級與性別關係」(p. 43)。但是到了 1970 年代，報社老闆希望藉由電腦化相片排版的引入來重造產業，破壞工會的力量，以便可以裁員。對某些報紙和印刷廠而言，再結構與地理遷移有關，從倫敦中心遷到位於最近再開發的船塢區狗島 (Isle of Dogs)。在這裡，像是工會和墨鐸 (Murdoch) 擁有的報紙之間的鬥爭很激烈。考克伯恩與五十名倫敦報紙排字工人的訪談，在最激烈的衝突之前展開。

新科技引進之際，雖然報社老闆想利用外面的排版公司 (許多公司僱用女性)，但工會堅決主張，原來的男性熱金屬排版工應該重新接受訓練。這引發了有關技能性別化的有趣問題。考克伯恩記載她目睹這些男人工作時的詫異。「就我們過去習於看見女人和女孩坐在打字機旁的眼光而言，穿著袖套，慣於較費力的體力勞動，經常是體型壯碩的男人，看起來確實跟新裝備不成比例」(p. 96)。當然，到了 1990 年代，由於全國新聞經常呈現倫敦西堤區 (City) 交易員面對螢幕的情形，如今我們已經更熟悉男人坐在鍵盤旁的景象。

儘管許多保住排字工作的新聞工作者，是由年輕女性重新訓練的，但他們堅持認為自己的技能比較優越。「男人說：『她們〔女人〕沒有操作過，她們不懂狀況』。『她們是打字員』」(p. 97，原文的強調)。因此，先前的熱金屬排版工人，重新賦予他們的工作男性化技能，雖然這一回是頭腦聰明，而非肌肉發達。這份工作需要的是能夠了解他們輸入了什麼的男人，相對的，女人只有打字技能。根據一位考克伯恩的受訪者的意見，後者只不

過是「一部光學字母辨識機」(p. 97)，而不是擁有技術和經驗的勞工。

3 賣保險：在街頭建構男性氣概

143 美國社會學家雷德納 (Robin Leidner) 也從事工作場所之性別刻板印象化的個案研究。她檢視了速食業和保險推銷 (Leidner, 1991)；我在這裡要聚焦於她有關保險銷售的研究。涉及推銷某樣東西的行業，無論是電話行銷、賣保險，或是挨家挨戶兜售各式商品。乍看之下，或許體現了某些社會建構的女性特質。這些工作中，雇員的工作就是說服他人（往往違逆其意願），讓別人相信自己渴望購買某項商品或服務。這需要魅力、機智、堅持和說服力等特質，相較於男人，這些特質似乎更容易與女人產生連結。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工作有很多是在跟男性氣概有關的公共空間（比如街上）進行，或許還涉及了城鎮和城市之間的往返。這些旅行工作往往是由「男」推銷員擔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或許因為剛才提到的那些魅力和說服力的特質，這些男人在戲劇與電影的再現中，經常描繪成稍微陰暗或可疑的角色，有點娘娘腔，而且絕對不可靠。

雷德納爲了研究這些矛盾屬性，如何變成與男性氣概或女性氣質的性別認同協調一致的操演，她訪談了以「冷不防造訪」(cold calling)（即突然造訪）美國鄉間和小鎮家庭的方式，替全國公司賣保險的男性樣本和少數女性。幾乎所有男性雇員都很年輕，絕大多數二十幾歲，幾乎清一色是白人。男人堅持女人會發覺她們難以勝任這份工作，即使像雷德納提到的，「這項工作要求往往等同於女性氣質的互動義務。建立並維繫融洽關係的技能

——吸引別人現身、支持他們的自我、展現對他們利益的興趣，並仔細監控自己的行爲，以防引起不快——通常被視爲女人的藝術」(1991: 171)。這意味了「由於保險經紀人的某些工作面向，需要一般認爲不具男性特質的技能，保險經紀人對這份工作需要男性氣概屬性的理解，意味著必須重新詮釋這些技能，或降低它們的重要性」(p. 171)。

雷德納發現她訪談過的男人，「將英雄特質歸諸這份工作，將跟顧客的互動設想爲意志的競爭。他們強調，成功需要決心、進取、堅持和禁慾……由於需要堅忍不拔……這份工作於是被建構爲具有男性氣概」(p. 172)。男性經紀人認爲女性過於敏感，或者進取心不足，因而無法獲致成功。所以，雷德納的一名受訪者喬許 (Josh) 宣稱，「大多數女人缺乏這份工作需要的條件。她們沒有那種殺手本能」(p. 173)。女人發覺，處理她們男同事的性別歧視態度，以及對付「旅途中」的生活，是個持續不斷的抗爭，所以有許多人自願離開了。

在我的商業銀行研究中，也發現男性營業員和交易員有類似的性別化斷言，認爲成功所需具備的特質 (McDowell, 1997a)，使得想獲致成功的女人更覺困難。然而，在奈特與威爾墨特 (Knights and Willmott, 1986) 針對各種英國商業銀行工作的有趣研究中，發現男性保衛某種工作領域的支配地位是失敗的。他們在個案研究裡，和雷德納一樣，記載了突然造訪賣保險的男性經紀人，將自己建構成克服抗拒的積極進取經紀人的許多方式。然而，這些英國男人卻在管理階層從事內部再結構，利用撫育、協助和服務顧客等理想化的女性特質，做爲推銷保險的替代方式時失業了。英國銀行裡的女性雇員，從銀行櫃員升級爲保險銷售員和顧問。這項工作經過了重組，把工作帶進銀行內部的開放空間

裡進行。過去經營街頭的突然造訪的外部銷售團隊，則遭到廢除。地理變遷是這項職業重新性別化的一環，帶來了經濟利益。由於銀行付給新晉升女性的薪資，少於她們所取代的男性，銀行得以減少薪資帳單。這提供了一個絕佳例證，闡明了當女人取代男人從事相同職業時，這份工作就會自動歸類為較不具聲望，從而得到較低薪資的論點。

4 在性別化的地方工作

我在最後的個案研究裡要反轉焦點，不討論組織文化和實踐如何成為工作場所中，性別化主體性之社會建構的一環。而是要說明，工作空間如何被建構成為性別化的地方。正如許多地理學者已經說明的，地方本身體現了性別化的特質。例如，我們在第二章概略提到的男性化酒吧空間，女同志在裡頭可能會覺得無所適從。在這個案例研究中，我要援用我自己和寇特（Gill Court）共同針對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¹ 商業銀行的研究，以及瑪西（Doreen Massey）與亨利（Nick Henry）針對英國劍橋科學園區高科技工作場所的研究。這兩項研究最初是研究英格蘭東南部地理變遷計畫的一部份（參見 Allen et al., 1998）。

倫敦西堤區——以及普萊克（Pryke, 1991）等人提到的商業銀行——長期以來是男性主導的空間。事實上，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她熱情的反戰論文《三基尼》（*Three Guineas*）（初版於 1938 年）中，評論了倫敦市中心的男性支配。

譯註 1：City of London 又譯「倫敦城」，是倫敦的歷史核心和金融區。

在一個相當狹小空間裡，聖保羅教堂、英格蘭銀行、市長官邸、有葬禮般魁偉城垛的皇家法庭，全都簇擁在一起；另外一邊則有西敏寺和國會議院。我們的父親和兄弟在那兒……度過他們的歲月。他們曾拾級而上，進出門裡門外，登上講壇佈道、掙錢、主持正義（Woolf, 1977: 22）。

誠如我在《資本文化》（*Capital Culture*, McDowell, 1997a）一書中主張的，西堤區的外部與室內設計和配置，都象徵男性的權力和權威，以及男人對這些空間的合法占有。街道與廣場、其間的空間、建築物的立面，以及交易廳和營業大廳的內部配置，反映並鞏固了城市勞工的理想化為男性氣概的。置身這些空間的女性身體是「不得其所」的。我說明了無論是企業銀行家的冰冷理性和智識領域（在辦公室和會議室），或是在營業大廳嘉年華會般的氣氛中，女性身體都被「她者化」。

在瑪西（Massey, 1997）針對位於劍橋的高科技公司的研究中，她類比了男性主導的修道院與實驗室及研究室，「研究員」在裡頭度過日常的工作生活。就像「象牙塔」大學的菁英空間，修道院和高科技空間都是心靈空間，是知識和理性的空間，也是無私地追求真理和科學的空間。對於抽象、工具的理性形式的著迷，將科學實驗室編碼為男性陽剛的，他們在裡頭「獻身」於追求真理。導致以科學為基礎的高科技公司裡幾乎清一色男性的雇員，長時間工作，忽視了家庭和社交生活。誠如瑪西透過對於有組織的宗教、二十世紀以前的大學，以及當代高科技工作場所的歷史比較，得到的結論：「空間性、認同、性別和社會秩序——它們之間共同構成……已有悠久的歷史。這段歷史即使到了現在，仍然鑲嵌於今日高科技研發新產業的實驗室、排他性男性氣概、菁英和專業化時空之中」（1997: 33）。

我們一再見到，這種以不同形式和不同歷史與地理的共同構成，就是本書考察的西方工業社會地景的支配性特徵。但是，我們也看到女性主義的考察、學術研究、論證和行動，揭露並挑戰了這種支配。

結論

146

從理論重點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追溯女性主義的勞動市場和工作生涯分析的轉變，從主要是處理大尺度社會結構——例如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的性質——的政治經濟學取向，轉變為受到後結構主義觀念影響的近期研究。認同的論述建構、工作場所文化、工作與勞工的象徵和再現，以及工作場所不平等之生產及再生產裡的性慾特質和權力等問題，逐漸成為女性主義的分析焦點。組織通常被理論化為鑲嵌的制度，與一組在不同空間尺度運作的結構和意義互相影響，而這些不同尺度都影響了組織的社會實踐。這並不是否認結構因素的持續重要性，以及資本主義體制和經濟不停追逐利潤的必然性，影響了創造和維持性別化區分的方式及原因。我要指出，結合不同的理論取向和方法，可以在勞動市場分析上獲得豐碩成果，比如說，把個人行為的分析放在個別公司與整體經濟的制度調節架構裡來看待。

如我於前幾章所述，檢視工作場所內外的性別、階級和其他社會區分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隨時間而改變的狀況，也很重要。勞動過程理論家便主張，資本創造且利用了勞工之間的各種差異，而性別不過是其中一種差異，雖然相當重要。很有可能當國家經濟轉變了，其他區分就會跟性別區分一樣重要。事實上，

我們可以說在先進工業社會裡，勞工階級男人失去了他們的生計，而中產階級女人大量進入了專業領域，階級區分重新切割了往昔的舊性別區分。這個論點我在其他地方略有提及 (McDowell, 1991a)，但是必須在公司、區域和國家的比較分析上，從事更細緻的探討。不過，目前在全球尺度上，似乎世界上有越來越多人捲入了我們或可稱為父權資本主義形式的社會關係。在這種形式裡，女性勞工被建構為和男性同僚相較之下，是較為拙劣的勞動力承擔者。由於這會導致較低的薪資，因此對這種處境的挑戰依然是下個世紀女性主義政治的重要部份，一如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情形。

延伸閱讀

近年來，有關性別和受薪工作的文獻已經大幅增加，有各種容易取得的迷人著作、期刊和文章。地理學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期刊包括《經濟地理學》(*Economic Geography*)、《地理論壇》(*Geoforum*)、《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 與《環境與規劃 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以及《環境與規劃 D：社會與空間》(*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 Society and Space*)。雖然在我們的學科裡，還是不常見到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的個案研究材料和特殊組織的細緻分析，或許《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的最近幾期是個例外，刊載了性工作、農場工作和社區工作的文章。藍菲爾等人 (Louise Lamphere and others, 1997) 編輯的《情境生活》(*Situated Lives*)，檢視了美國勞工 (包括黑人和墨西哥裔女性) 的生活差異。

女性主義學者長期關注性別和經濟變遷，也有大量討論第三世界女性無產階級化的文獻。有關產業和地方有用的介紹和個案研究，包括阿博夏 (Haleh Afshar, 1991)、安克與海茵 (Richard Anker and Catherine Hein, 1986)、布萊登與錢特 (Lynn Brydon and Sylvia Chant, 1989)、傅安惕斯與艾倫瑞曲 (Annette Fuentes and Barbara Ehrenreich, 1983)、摩姆森 (Janet Momsen, 1991)、摩姆森與湯山德 (Janet Momsen and Janet Townsend, 1987)，以及沃德 (Katherine Ward, 1990) 的著作。皮爾森 (Pearson, 1992) 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性別與發展議題的出色摘要。地理學者中，錢特 (Sylvia Chant, 1991) 在墨西哥，以及與麥可偉恩 (Cathy McIllwaine, 1995) 在菲律賓做研究，福克納與勞森 (Anne Faulkner and Vicky Lawson, 1991) 則有厄瓜多爾 (Ecuador) 的研究。

其他學科的個案研究方面，可以參看《工作、就業與社會》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性別、工作與組織》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s*) 和《性別與社會》 (*Gender and Society*)。歷史研究方面，《性別與歷史》 (*Gender and History*) 和《歷史工作坊期刊》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是不錯的資料來源。其他社會的性別分工研究，可以參閱《發展與變遷》 (*Development and Change*)，以及《農民研究期刊》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有一些地理學者撰寫的性別與發展，以及第三世界性別議題的評論 (例如，布萊登與錢特 [Brydon and Chant, 1989]；摩姆森 [Momsen, 1991]；摩姆森與湯山德 [Momsen and Townsend, 1987])，但這些現在都過時了。皮爾森 (Pearson, 1992) 的文章提供了關於性別和發展議題的極佳概覽。其他值得一看的新書，包括歐斯特 (C. Auster) 的《工作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Work*, 1996)、霍福特、沙維奇與威茲 (S. Halford, M.

Savage, and A. Witz) 的《性別、職業與組織》(*Gender, Careers and Organizations*, 1997)、麥道威爾 (L. McDowell) 的《資本文化：城市工作裡的性別》(*Capital Culture: Gender at Work in the City*, 1997a)；普林哥 (R. Pringle) 的《性與醫學》(*Sex and Medicine*, 1998)，以及沃爾碧 (S. Walby) 的《性別轉變》(*Gender Transformations*, 1997)。吉普生—葛拉罕 (J. K. Gibson-Graham, 1996) 的書是針對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取向，發人深省的女性主義批判。

6 置身公共場所：街道與快感空間

IN PUBLIC: THE STREET AND SPACES OF PLEASURE

導言

148 在這一章，我們從家與工作場所的內部空間，移動到街道與公園的公共或開放空間，以及休閒的公共或半公共空間：酒吧、咖啡館、游泳池和彈子房，百貨公司和酒館。我們在先前章節檢視過的主題，有許多會再度出現：例如，第二章提到的理想與美麗的女體，以及不同空間和活動的社會建構與性別化特質。不過，我認為區別出休閒的公共空間和半公共空間很重要，因為它們是和家或工作場所不同類型的空間，裡頭性別關係的構成和維繫採取了特殊的形式。因此，根據我先前引介過的史密斯（Neil Smith, 1993）的定義，這些空間和我們已經考察過的空間，位居不同的尺度。這並不是要否認空間或尺度是社會的建構，彼此間有複雜混亂的重疊。比如說，我們在這裡要考察的休閒公共空間，也是許多提供服務的受薪雇員的工作空間，不過，在這一章裡，焦點會穩定地擺在消費的性別化社會關係上。

我們轉向公共空間時，會清楚見到公共 / 私人區分和性別區隔連結在一起的後果。由於女人和家園、家務領域的內部空間有強烈關聯，女性主義對於公共空間的探查，經常聚焦於女人。「在外」經驗的問題和危險，而假設男人會認為他們在這些空間裡的自由和支配是理所當然。因此，有許多文獻提到女人經驗到恐懼和焦慮的方式，以及街道和開放空間裡的實質危險、騷擾和攻擊。我想要討論這些著作，但是我也要說明，非常弔詭地，城市的公共空間也是女人逃離男性支配，逃離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規範的重要地點。事實上，我想要從後面這個領域開始談，然後回頭討論性別區分與資產階級正經高尚（respectability）規範的

149

關聯，這些規範在現代時期建立並逐漸位居主宰。不過，重要的是首先要記得，我在其他地方強調過，這裡的公私之分就和地理尺度的區別一樣，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要質疑並嘗試推翻的社會建構和性別區分。

你可能還記得，我稍早指出，十九世紀中期到晚期的工業社會，見證了將女人（或所謂的高尚女人）建構為家中天使的意識形態的確立。這種意識形態支配了後來的西方思想、住宅供應和都市規劃。這種意識形態對於「家園」定義的意涵，已在第三章概述，對於都市土地使用區分的涵義，也在第四章討論過。在這裡，我要探討相反的情況：那些不服從或不安於室的女人，如何被建構為邪惡和墮落，容易遭受虐待或易遭身體傷害，迫使她們重新考慮參與公共領域的決定。但是，我也要說明，半公共空間，像是十九世紀城市開始興建的大型百貨公司，如何創造出女人可以逃離家庭限制及男性在場／控制的地方，即使只是很短暫的期間。因此，工業城鎮的公共與半公共領域，對女人來說是弔詭的空間，有危險、也有相對的自由等著她們。

接著，我要轉移到二十世紀空間和當代有關性別和公共領域的議題，討論女人和開放空間的關係，透過女性藝術家和作家的不同眼光來探索。我也要考察男人和開放空間，與街道及公園的關係，尤其是那些無法遵守或選擇不遵從男性氣概之霸權觀念的男人的關係。最後，我要評估瀰漫於各種快感空間裡的家庭主義（familialism）和異性戀體制形象的效果。在此，我會特別把焦點放在海灘假期和其他度假地方，以及快感和慾望空間所呈現的都市景觀。

公民資格與公共空間

150 在本章，因為已經徹底討論過公共和私人空間區分的理論基礎及性別意涵，所以主要重點放在個案研究資料上。不過，我在這裡希望模糊性別和空間之間的明顯關聯，主張有待揭露較為混亂且複雜的一組關係，因為有很多活動跨越了一方是女性氣質和私人，另一方是男性氣概和公共的清楚關聯。男人和女人透過各種社會特徵（例如他們的種族、年齡和性慾特質）而區別和統一，因此，並非總是明確排列於性別劃分的這邊或那邊。

我在這一章裡，也要介紹有關公民資格（citizenship）和人權定義的爭論，因為有關公共空間使用的衝突，時常圍繞著占有權的差別主張。自由主義理論家認為，每個身為政體成員的個體，都有置身公共場所的同等權利，但是女性主義者及其他人指出了，實際上這項權利往往遭到否認。在國家定義的規則的運作，以及一般實踐中，有個道德價值的假設，即與**法律**（*de jure*）公民權對比的**實質**（*de facto*）公民權，後者的界定為向那些值得獲得協助，或能夠擔負責任的人開放的公民權。不值得協助和比較沒責任感的人，就被界定為配不上或不適合完整公民資格的特權。因此，實際上，來自左右兩方的批評（Sandel, 1996; Sklar, 1991; Young, 1990b）都承認了，公民權不是一種包容的概念，而是排外的概念。

許多個人與特殊社會群體，被排除在最寬廣的公共空間和場域近用權（access）之外。理由是他們的違法行爲，以及他們拒絕承認所有人的共同權利，或者反過來，原因是他們必須受到保護免於公共場所的騷亂。基於後面這種原因，女性長期以來直到今日，都被排除在公共場域的平等近用之外。因此，將女人建構

為在經濟上和道德上都依賴男人，或是建構為次等人（脆弱或需要保護），減少了她們的自由權利（Pateman, 1988, 1989）。這方面的明顯實例，是對於強暴和騷擾案例的論斷，即法官經常主張女人為了自我保護，應該待在室內。有危險疑慮的男人「在逃」時，要求女人和女孩宵禁是常見的做法。女性主義致力「重申上街的權利」或「重申夜行權」，連帶對男人實施宵禁的對抗性訴求，挑戰了男人占有開放公共空間的較大自由的預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強暴或謀殺案件裡，女人似乎也犯了法，由於她們的行動而應該遭公共領域排斥。因此，英國法官經常在這類案件中暗示，在外頭流連忘返或出入不良場所的女人活該出事；這意味了犯錯的是她，而不是攻擊她的男人（參見 J. Smith, 1989）。一些女性主義地理學者考察了街頭女性安全的問題（Valentine, 1990; Pain, 1991），不過，記得下述實情也有幫助：比起公共場所的陌生人，虐待和身體傷害更可能是受害者認識的人所為，而且往往發生在家庭的「避風港」裡。

151

就特定空間的近用而論，許多其他群體也遭受歧視。年輕人、有色人種和「反文化」群體，時常發覺自己遭到騷擾和驅趕（McKay, 1995; Valentine, 1996），因為都市公共空間越來越變得難以接近且私有化，方式是譬如運用私人保全公司巡邏企業建築物之間的空間（參見戴維斯〔M. Davis〕對洛杉磯的生動描述〔1989〕，以及朱津〔Zukin〕的紐約研究〔1995〕）。對於持續增加的住在街頭、出入口、地鐵和其他隧道的遊民（Morton, 1995）而言，與日俱增的都市空間監控是個大問題。

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傅瑞澤（Nancy Fraser）認為，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這些被排除在外的群體，我們就必須重新思索我們的公共空間概念，視其為多元分化的公共場域，有些群體可以使用

它，其他群體則被排除在外。與認為有能夠挑戰殖民權力和論述的底層主體（subaltern subject）的後殖民理論家一樣，傅瑞澤提出「底層對抗性公眾」（subaltern counterpublics）概念，這是指邊緣化群體可以說出他們需要的公共空間，他們藉此以抗拒空間的主導或正當用途的方式，建構了這些公共空間（Fraser, 1990）。

或許已經有一些底層對抗性公眾存在了。我們或可包括抗議空間，例如新世紀運動的紮營地，或是抗議道路興建者的隧道和樹木。不過，地理學家米契爾（Don Mitchell, 1995）有關 1960 年代晚期，由反文化群體宣布占領的柏克萊人民公園的研究，指出了面對國家和私人財產利益，要保存這類空間有多麼困難。在英國，試圖維持底層空間的抗議運動，也有類似經驗，警察和專業保全公司將參與者從樹上和隧道裡強行拉出來，或是逐離非法占據的空屋。

但是，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是構成「公眾」多樣性最顯著的地方，也是理想化的「公眾利益」概念遭受質疑的所在。哈維（David Harvey, 1992）在湯普金廣場（Tompkins Square）（曼哈頓的一座公園）的使用分析中指出，這個空間的多元使用者——年輕女性和兒童、地獄天使（Hell's Angels）和單車騎士、去機構化的病患（the deinstitutionalized）、濫用各種藥物的人、遊民和企業人士——發覺不可能相互容忍而共存。哈維爲了這篇論文，引用各種原始資料，並靈活運用新聞報導。例如，他一開場就摘錄了《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August, 1989）一篇基夫納（John Kifner）撰寫的文

譯註 1：牙買加黑人教派，相信黑人是上帝將拯救的人。

章。基夫納寫這則報導的同時，除了住在公園的三百位遊民外，還有：

滑板玩家、打籃球的人、帶小孩的母親、看似 1960 年代的舊胎翻新的基進分子，頭髮梳高的黑衣龐克搖滾樂手、找機會痛打基進分子和龐克族的穿厚重工作靴的光頭男、綁細髮辮的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¹、重金屬搖滾樂團、下棋者、溜狗人士——全都占用公園的空間，還有提著他們乾洗好的套裝，要前往已經翻修的「縉紳化」建築的專業者，這種建築正逐漸改變鄰里的特性（引自 Harvey, 1992: 588）。

兩年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指出了都市規劃師嘗試解決這些多元使用者引發的衝突時，面臨的兩難困境：

有鄰里協會大聲疾呼，要求城市關閉公園，其他人則堅持，公園是城市受壓迫者的避難所。昨天地方議員要求宵禁，這可能有效驅逐一百餘名在公園紮營的遊民。女議員弗萊德蘭德（Miriam Friedlander）反而建議，直接將社會服務，像是健康照顧和藥物治療，帶給住在帳篷城市裡的人。副市長伐夫（Barbara J. Fife）說，「我們不覺得公園的利用方式合宜，但我們確實承認這裡有各種利益」。他們繼續說，只有一件事有共識，首先，對於應當採取什麼作為，並無共識，除了大家都同意任何新計畫都可能導致更多騷亂、更多暴力（引自 Harvey, 1992: 590）。

很顯然，有關都市空間的多元占用議題，引發了在針對彼此衝突的適當取用（access）觀念之間，如何裁奪的難題。我將於後文指出，二十世紀對城市裡特定空間與地方的差別性近用的關注，有其歷史先例。

現代性與都市公共空間：城市漫遊者與漫遊女

153

千禧年結束之際，差異和多樣性議題位居地理學研究議程的核心，許多分析都有明顯的回顧特點，回歸到一個世紀以前，這些議題如何發展上。儘管後現代世界的騷動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深具挑戰，但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西歐與美國的工業都市化大幅擴張時，使人脫離土地、遠離家園的巨大社會經濟動亂，不僅重新塑造了空間、性別與認同的關係，也改變了文化的再現。對於十九世紀龐大而空前的城市成長的反應之一，就是在藝術、繪畫、詩歌與文學的一組新運動，以及諸如攝影和電影這類新文化形式的發展上，探討了對於龐大社會變遷的反應。因此，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

城市發展成為大都會的事實是基本的。我們可以看見，藝術和思想中的某些主題，如何發展成為對新穎而擴展中的十九世紀城市的特殊回應，然後，做為分析要點，檢視這些主題……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某種大都會環境中，如何歷經各種實際的藝術轉化（Williams, 1989: 39）。

1850年至1920年期間，做為藝術運動的現代主義已經確立，挑戰了先前藝術再現的理想，並在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立體派等運動中達到高潮。這也是西歐和美國政治動盪與社會騷動的關鍵期，其中，投票權運動是個重要部分。所以，女性的地位及其日常生活的改變，也是都市化和現代性的關鍵部分。

現代性的藝術與文化運動，以及社會動亂，近來吸引眾多來自各種學科觀點的研究關注，包括地理學。例如，在我們學科所謂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中，對於透過做為原始資料的

文學和藝術（例見，柯斯葛洛夫與丹尼爾斯〔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的繪畫和建築研究），以及這段期間的建築環境（例見我在第四章提過的，都摩須〔Mona Domosh〕有關紐約和波士頓的書〔1996a〕）來理解現代性，產生了新的興趣。不過，有人認為，一般而言，女性經驗在這種研究中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沃爾夫（Janet Wolff, 1985）認為，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是幾乎完全把焦點放在生活的公共場域，這是男人主導的領域，因為工業都市化伴隨著與日俱增的男女生活的空間區隔。在十九世紀的龐大新城市裡，出現了一種新式男性人物，即漫遊者（*flâneur*）或窺探者，他們以身為都市旁觀者的角色為樂。我想考察有關這些男性都市觀察員地位的某些論點，尤其要評估是否有與他們對應的女性漫遊者的可能性。

154

法國詩人兼評論家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著作，在確認都市變遷的重要性方面，至關重要。事實上，做為都市藝術運動的現代主義，就是從他的著作汲取了最初的靈感。在一篇於 1859 至 1860 年間寫就的論文〈現代生活的畫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中，波特萊爾（Baudelaire, 1963）概述了一組有關都市經驗瞬息無常特質的論點。他指出，都市生活的矯揉造作，是基於城市中影像和真實的混淆，在城市裡，夢想和奇觀是消費的基礎。依波特萊爾之見，現代都會的典型人物是漫遊者：閒逛的觀察者，凝視但不參與城市中壯觀的發展。漫遊者是都市群眾裡的匿名人物，隱身但一覽無疑的旁觀者，據菲里斯比（Frisby）所稱，他是「處處因匿名而欣喜的王子」（1985: 19）。

這些有關都會中社會互動的轉瞬即逝和匿名特質的想法，成為往後一個世紀內，主要在德國，由齊美爾（Simmel）、托尼斯（Tönnies）和其他人發展的都市狀態社會學（*sociology of*

urbanism) 的重要元素。因此，他們的著作在新世紀的前二十年裡，影響了美國都市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以及後來都市地理學的發展（有趣的是，齊美爾是最早允許女性在成為正式學生以前，就參加他在柏林大學的專題討論會的學者之一）。

波特萊爾和後繼的理論家認為，漫遊者必然是男人，因為當時只有男人有「留連徘徊」和觀看的自由。十九世紀中期的女人，或者是比較高尚的中產階級女性，都不被接受為都市奇觀的參與者，而是受限郊區森林般寧靜的家庭天使。然而，她們較不體面的姊妹們，卻加入了漫遊者或都市紈褲子弟的行列，成為都市局外人。除了漫遊者，據波特萊爾所稱，這些局外人或觀察者還包括了詩人、拾荒者、女同性戀、老女人和寡婦（一般假定這群人可以躲過令人討厭的異性戀凝視），以及娼妓或流鶯，她們在發展中的大都會裡全都仰賴機智過活。後面這群女人，通常被準確地稱為「阻街女郎」(streetwalker)，被視為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雙重性慾標準下的墮落女子。正是她們現身街頭的舉動，使得女人的地位有詮釋的可能，並往往使女性淪為討厭的性慾關注對象。例如，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劍橋，早期的女學生冒險進入群眾時，必須戴上手套和帽子，以便與城市裡許多「道德鬆散」(easy virtue) 的女人有所區別。

在沃爾夫有趣的論文中，她繼續主張，現代性社會學（我們可以加上地理學）忽視大多數女性都市生活經驗的細節。她認為，「漫遊者只可能是男性」（1985: 37）。她指出現代性和現代都市化的英雄——這些漫遊者、移民與陌生人，「共享孤寂行旅、自願離根，以及匿名抵達新地方的前景和可能」（p. 40）——全都是男人。在這裡，重要的或許是她對旅行的自願性質的

強調，因為我在下一章描述的十九和二十世紀期間，也有數百萬女性成為移民，但多半出於必要而非選擇。但是，沃爾夫認為，各種書寫堅持現代都會生活中典型遭遇的瞬息無常性質，並不符合多數女性的經驗。

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 1991, 1992）在她的書《城市裡的獅身人面怪》（*The Sphinx in the City*）裡，以及在一篇針對沃爾夫的回應中，不同意沃爾夫認為女性漫遊者（漫遊女）不可能存在的論點。她指出，十九、二十世紀的女人，實際上擁有的自由比沃爾夫認可的來得更多，因為城市是鬆綁和解除小鎮與村莊嚴密階層化紐帶的場域。因此，女人也能經驗到某些都市經驗核心的無根和移置（displacement）。

黑若恩（Liz Heron, 1993）編輯的女性二十世紀城市小說集中，她也認為城市在挑戰性別區分上是重要所在。黑若恩主張，城市是顛覆傳統區分女男生命二分法的坩堝。因此，她認為，

將城市視為一個新開端、一個成年生活初期步入的舞台，這種典型敘述對女人來說有其特殊性。因為女性自我發明的觀念，挑戰了自然—文化的二分：傳統上，世界的空間有待男人探索，女人則是這個世界裡穩定、固著的點。因此，男人超越，女人則堅忍不拔（Heron, 1993: 3）。

反之，城市裡積極獨立的女人則自立自強。黑若恩收錄於文集的小說裡的核心主題，是遷移到城市、過都市生活，以及女人的性與經濟自由之間的關聯。

威爾森指出，十九世紀結束時，女人在城市裡變得越來越明顯可見，在邁向事務員職業崛起所提供的新就業機會途中，穿越街道，以及前往越來越多的百貨公司購物，女人可以獨自在百貨

公司裡徘徊凝視商品，令人聯想起漫遊者的模樣。不過，這並非否定女人依然臣服且受限於侵擾的男性凝視，以及有時候，遭受實際的言語或身體上的騷擾。然而，就像黑若恩提到的，「這可能比較不是城市生活的特色，而是範圍較小的社會環境，例如地方小鎮的特徵」（1993: 7）。都市群眾的匿名性或許能保護女性，同時那種危險邊緣也是探索城市景觀的誘惑。

有趣的是，威爾森延伸了有關性別重要性的論點，認為漫遊者的形象完全不是穩固的主流男性氣概的代表，他實際上是種逾越的形象，一種性別上不穩定的形象，一個被動的旁觀者，而不是較常與男性氣概聯繫的參與者。甚至由於他對服飾和購物的興趣，漫遊者代表了一種騷動不安的女性化男性氣概。黑若恩也認為，主導大量女人的城市書寫的社會邊緣女性人物，是雌雄同體（androgenous）的人物：獨立且工作繁重的勞工階級女性、藝術家的模特兒或作家，若算不上是偏差者和不適應者，也是位於女性氣質定義的傳統範限之外。這些女性主角沒有家庭、通常沒有男人，而且無疑是逃離了單調乏味的家務束縛的女人。

像威爾森這類學者和黑若恩這種作家的著作，還有目前許多其他人探索與現代性有關的轉變中，遭受忽略的女性經驗面向的研究，在對抗先前有關這些轉變的、主要是男性中心的解釋上，非常重要。事實上，沃爾夫最初有關不可能有女性漫遊者的論點，其核心負擔就是這種否定對於社會科學發展造成的理論衝擊。沃爾夫記載了學科長期對私領域的忽視，以及一般社會科學裡，對於女性遭排除且（或）受限而不能參與工作和政治公共世界的原因的分析。我已經提過，這種忽視也是地理思想史的核心特徵。

男人的逾越空間

城市空間和逾越性慾特質之霸權觀點的可能性，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不僅有女性主義學者加以探究，指出其對女性的重要性。對男人來說，城市也是允許更大幅度性自由的場所，有好幾位都市和性別理論家，以不同方式考察了這種關聯。某些這類研究的特色，是同時針對異性戀和同性戀行爲，描繪出城市特定地區的空間意涵。例如，華克威茲（Judith Walkowitz）在她題爲《恐怖樂趣之城》（*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1992），針對十九世紀城市的弔詭反應的迷人考察中，檢視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年輕男人，爲了逃離他們認爲令人窒息的傳統維多利亞道德符碼，而被吸引到特定都市空間的方式。例如，住在倫敦西區上層階級住宅區的年輕男性，把倫敦東區視爲他們的遊樂場。在這裡，他們從事賭博和遭禁的遊戲，像是鬥雞和犬熊相鬥（bearbaiting），以及在與相同階級背景的女性發展「正常」社會關係和性關係的界限以外，投身各種異性戀和同性戀體驗。

157

其他研究者則專注於揭露同性戀行爲的公開表現及其都市聯繫的歷史。因此，酷兒理論家和其他人研究男同性戀的越來越多學術論著裡，有個重點是放在等同於非異性戀認同的城市特殊地點和空間的意義上。事實上，有關同性戀縉紳化的某些最早的研究裡，甚至有人宣稱男同志算不上是同性戀，除非擁有標示出他們的差異的明顯領域認同。

史學家瓊斯（George Chauncey, 1995）的《同志紐約》（*Gay New York*）是本有趣的新書，描繪了1890年至1940年間，城市中不同空間對於男同性戀的意義。瓊斯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前的男同志，涉入了城市某些地方發生的同性戀社會關係的公共世界中，特別是在勞工階級地區。他指出，例如在包渥里 (Bowery)，中產階級男性如何展現性別化的操演，既威脅又重新發明了異性戀和同性戀男性氣概的霸權觀念。瓊斯運用一系列廣泛的資料來源，從報紙到日記，來揭露紐約市俱樂部、酒吧、公寓、餐廳、基督教青年會 (YMCA) 的網絡、中央公園地區和公共澡堂，都是同志性慾地景的一部份。然而，在他研究的這段期間，尤其是透過有關「不道德行爲」的公共論述的嚴格執行，迫使男同志退回衣櫃，同志文化的能見度因而杳無蹤跡。

他的書是值得歡迎的嘗試，將另類性慾認同的社會建構，以及都市地景的象徵和意義連結起來，也是對於以下觀念的重要糾正，即紐約市顯而易見的男同性戀認同，必須直到警察突然搜查同志酒吧引發的 1967 年石牆暴動才出現。瓊斯目前正著手第二卷書，將他的分析延伸到當前。事實上，他的書可能會比本書更早出版：如果你對當代紐約有興趣的話，注意找一找這本書。

在倫敦一項有點類似的研究計畫中，莫特 (Frank Mort, 1995) 建構了一連串他所謂的「城市生活考古」。聚焦於 1980 年代倫敦市中心的蘇活區 (Soho)，他指出性別化的商業體制，如何援用做爲消費場域之都市空間的各種文化建構，將蘇活區塑造成爲與各種特殊男性氣概認同有關的地區。莫特認爲，1980 年代期間，一群獨特的媒體專業者和文化企業家，將倫敦推廣成爲炫耀財富的更新位址，爲男人創造出多元的認同。男同性戀是特別重要的行動者，因爲他們的社會認同和性慾認同受到新消費體制的塑造。這些以消費爲基礎的新男性氣概認同形式，映繪在都市地景上，創造出城市裡的特殊地區，與性別化文化和商業的新樣貌

有緊密關聯。莫特認為，蘇活區是長期與性別化體制（gendered regimes）有關的區域，雖然至少在視覺上，先前幾十年間，它主要是破舊的異性戀體制。不過，戰後時期，尤其是 1980 年代，蘇活區成了特殊類型的同性戀認同發展的重要地域。

莫特運用類似瓊斯採用的資料來源，揭露了蘇活區的不均等考古學，指出它是擁有性異議和文化雜種歷史的空間。二十世紀初期，它是波西米亞（bohemian）風尚與行爲的地區，是混居的移民、藝術家、戲劇界人士、娼妓和爵士樂手摩肩擦踵之地。據莫特所言，這種波西米亞與前衛的文化，「推崇各種類型的男性氣概，〔並且〕以波希米亞人、漫遊者，以及城鎮男人的性格爲核心」（1995: 577）。1960 年代晚期以降，一種組織化的性交易主導了這個地區，但該地區於 1980 年代復興時，昔日的波希米亞性格再度甦醒。這十年間發展的新消費文化，援用了「不同歷史時刻鋪設的城市生活之性別化再現」。獨特的異性社會和同性社會空間建立起來，對於不同面貌的男性氣概認同，各有其差別化的近用機會。

但是，主導該地區的是某種特殊版本的同性戀男性氣概。據莫特所言，有個

逐漸蓬勃的同性戀商品化。酒吧與俱樂部、咖啡館與商店，撐起由商品世界打造的同性戀生活的允諾。在這些商業空間，嘉年華許諾一種「混雜的」烏托邦——女同志、男同志及其朋友的混合。不過，宣稱擁有蘇活區街頭獨特權利的是其中一種人——年輕的同性戀男人。儘管女同志在二月遊行（一年一度的酷兒情人節嘉年華）中現身，但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男性氣概的公共空間觀點，即使這種男性氣概被定義為不正統且逾越的（1995: 581）。

企業家樂見男同志消費的空間集中，但是莫特指出，「蘇活區缺少居住人口，使得蘇活區不太可能促成族群聚集的同志社群，像是舊金山的卡斯楚區，或是紐約格林威治村」(p. 581)。不過，在促使同志認同爲人所見，以及將男同志納入倫敦的規劃議題方面，蘇活區的發展卻很重要。

炫耀消費與奇觀城市

城市做爲消費場域的意義，不僅見於莫特所謂「性別化商業體制」的發展，而是在整個都市歷史中，都是持續不斷的論題。我想回到波特萊爾，或者說是回到受到他影響的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他是於 1920 年至 1940 年代期間寫作的德國評論家。藉此，我要追溯某些炫耀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的歷史，描繪二十世紀消費、都市化和性別關係之間某些關係的輪廓。班雅明在他現在稱爲拱廊商場計畫 (參見摩爾斯 [Buck-Morss] 的書《觀看的辯證》[*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1991]) 的購物和展示研究中，引用了波特萊爾有關城市是神奇與虛構之奇觀展示的想法。在班雅明對於我們現在稱爲炫耀消費的研究裡，他分析了十九世紀末百貨公司的興起，他特別審視了玻璃拱廊的意義，這裡的貨品展示迎合了過路觀眾的窺視快感。班雅明也研究博覽會和展覽，像是 1851 年於水晶宮舉辦的維多利亞女王銀婚紀念博覽會。這裡也是在行人好奇的凝視面前，展示一大批美妙的異國風情商品，甚至是「異國情調」的人。班雅明在這種展示中，看見快感工業的起源，奠基於奇觀和幻想的廣告操縱了大眾的慾望。

隨著二十世紀的進展，消費和廣告的意義，成為經濟與都市發展的主要面向，法國社會理論家狄博（Guy Debord）在1960年代寫到了「奇觀社會」的崛起（Debord, 1994）。稍後，後現代理論家像是布希亞（Baudrillard），指出了超真實（hyperreality）的興起，亦即地方是透過影像和幻想的建構而銷售，影像變得甚至比真實還重要。或許這方面的極端事例是拉斯維加斯（Las Vegas），遊客可以坐在擬仿的羅馬廣場，觀看每二十分鐘一次的日出日落。在遍及全球的水岸開發區，消費者可能在義大利餐館吃飯，或是在仿巴黎的商店和街道上買衣服。但是，如同哈維在他的經典文本《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主張的，在千禧年末，影像和奇觀是凡俗無奇的都市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積累的機制，在這些展示與奇觀光彩奪目的表面下，一如往常乏味的持續下去。

160

不過，幾乎所有這些理論家，都傾向於低估了新都市奇觀發展中性別關係的重要性。對女人而言，消費主義的興起，弔詭地不僅將她們固定於身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地位，是無聊瑣碎，而非認真嚴肅的境地——還有，女人實際上是各種與日俱增商品的消費者，她們的形象被用來銷售和展示商品，並做為異國情調他者的隱喻——還導致了女人可以在沒有男性陪同下造訪的快感空間的發展。我已經提過，在這方面，百貨公司是個意味深遠的地點。下一節將詳加探究。

購物快感：消費是一種（局部）解放

近來對於十九世紀轉向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的重新關注，不

可或缺的文件之一，就是左拉（Émile Zola）於 1882 年初版的小說《女士的幸福》（*Au bonheur des dames*）。一個世紀後，加州大學出版社發行由文化評論家羅斯（Kristin Ross）作序的新版《女士樂園》（*The Ladies Paradise, Zola, 1982*）。羅斯詳細說明了，某些技術和都市的變革，替巴黎在百貨公司發展上的領導地位，鋪好了道路。郝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重大的公共建設工程改變了城市街道，寬闊的林蔭大道切過巴黎心臟而開闢。鋪設了新路面或人行道，讓行人可以閒逛，暫停腳步凝視新商店的櫥窗。玻璃和鑄鐵技術的發展，使大片櫥窗得以鑲嵌在商店正面，電氣化則提升了櫥窗後頭建構展示的奇觀與戲劇性。新商店內部陳設的改變，結合了收集在一間屋子裡琳琅滿目的各式商品，也增進了購物是令人愉悅的休閒活動的印象（參見圖 6.1）。

羅斯認為，1852 年掌管彭馬歇（Bon Marché）零售店（後來成為大型連鎖店）的法國企業家布希寇特（Aristide Boucicault），

可以稱為「隨意瀏覽」的發明者：頭一遭，過路行人可以不負購買義務地隨意進入店家。商品輪替頻繁，價格漲幅不大；大量而頻繁的輪替，為那些實際上是大量生產而貨源充足的商品，創造出供給匱乏的假象（Ross in Zola, 1982: vii-viii）。

光顧這些新商店的消費者主要是女人。鮑爾比（Rachel Bowlby, 1985）在她針對德萊塞（Dreiser）、季辛（Gissing）和左拉小說裡的消費文化的分析中主張，最終的結果是，對中產階級女人而言，那些「龐大如幻影般夢工廠」（Ross in Zola, 1982: ix）的百貨公司裡營造的夢幻世界，成了「第二個」家，是逃避日常生活和家務例行工作的地方。為了消費者的安適自在和短暫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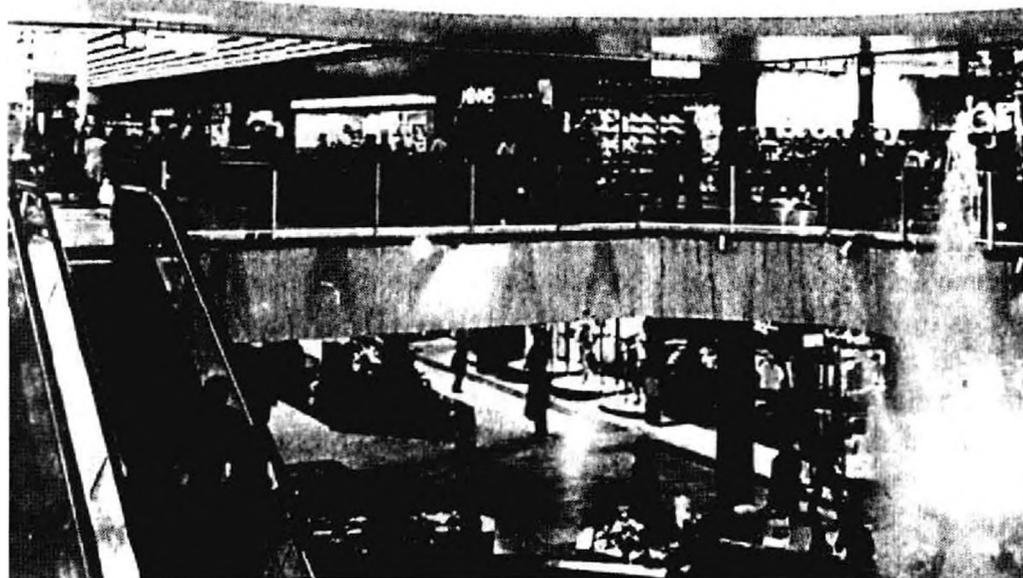


圖 6.1 當代購物空間：北倫敦，布蘭特十字街

憩，提供了茶室、休息室和化妝室。但是，正如左拉在他為小說撰寫的筆記上的觀察，同樣的，女性消費者的慾望受到男性企業家、所有權人和樓層巡視員操弄：這與女性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裡，被建構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都摩須（Domosh, 1996b: 259）引述了道格拉斯（Douglas）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女士的功能在於挪用並保存她競爭成性的丈夫、父親和兒子少有時間去兌現或享受的價值與商品；她替他們的勞動提供了一劑解藥和一個目的」。

因此，商店與街道這類半公共領域中的女性參與，對於維多利亞工業社會發展中的分隔領域，是種強化而非挑戰。左拉在這部小說及其他小說裡也留意到，女性出現在擴張中城市的街道上，具有潛在的逾越面。他強調都市群眾的女性化與反覆無常性

質，其極度興奮且富感染性的活力，以及具威脅性的女性性慾特質。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 1991）體認到都市群眾險惡的一面，甚至認為這種憂懼支撐了城鎮規劃的發展，導致女人再度受限於郊區。在十九世紀，人們相信「『公共』女人，不像公共男人是穩重而理性的人物，而是淪為野蠻和暴力衝動的女犧牲者」（Ross in Zola, 1982: xviii）。貝若絲（Susanna Barrows, 1981）也提到，在這種具威脅性的女性化都市群眾的獨特描繪背後，有個甚至更令人生畏的女性團體投影：法國女性主義者及其與革命熱情時刻的關聯。英國也一樣，尤其是二十世紀初期的選舉權運動中，那些採取公共行動，在街頭遊行抗議的女人，被描繪為公民秩序的一大威脅，是沒有女人味的女性叛徒。

當代女性主義分析裡，廣告與消費在女性認同之社會建構裡的核心地位，仍舊是重要的研究焦點。而且如道林（Robin Dowling, 1993）主張的，相較於文化研究對地方意義的一般認識，近來地理學術研究的特色，在於對地方意義有更細緻的理解。如她所言，「女性氣質是做為地方創造的一環而建構的，一個地方的特質影響了商品的意義，以及與這些商品相關的女性氣質。〔因此〕零售業特別適合從事女性氣質、地方和商品之間關聯的分析」（p. 296）。在她對多倫多市區的伍德渥茲（Woodwards）百貨公司的經驗研究中，道林指出了家庭主義（身為妻子和母親的女人）與現代性（科學理性的優越性）的矛盾論述，如何導致1945年至1960年間，一種特殊的女性消費者的觀念，顯現於百貨公司食品部門設計與經營的改變上。

在英國，目前稱為「新零售地理學」的領域，有越來越多研究，還有其他社會學家考察了消費者和零售業店員的性別化認同

建構（例見洛威與克魯〔Michelle Lowe and Louise Crewe, 1996〕的 The Gap 研究，以及都蓋伊〔Paul Du Gay, 1996〕有關服飾店裡混種主體建構的個案研究）。在這些研究裡，休閒和工作的區分變得模糊不清。不過，新研究探討的是特殊情況下，性別化認同的流動不定，而不是探究女男之間的差異。確實，到了二十世紀末，消費、廣告和購物，逐漸被視為後現代性的要素，奇觀和慾望聯合起來生產了曖昧的性別化流動主體。例如辛普森（Simpson, 1994）和莫特（Mort, 1996）就說明了，理想化的男性身體，現在也如同女性身體般，成為男性（同性戀和異性戀）凝視的對象，而購物成了模稜兩可的性別化活動。然而，如威爾森指出，以及我先前提到的，漫遊者本身，不僅是一個世紀前的去中心且不責任的主體，或許也是千禧年之際，即將來臨的新的後現代主體的先驅。

163

出去到野外（不得其所）

我現在要闡述女性和「廣大野外」的關係，藉以說明地方、女性氣質和休閒之間關係的各種面向。由於性別的社會建構與公私二分的關係非常密切，因而引發了在鄉間和半鄉村公園，以及城市和都市邊緣其他綠色空間中女性位置的問題。我在第二章曾經指出，特定體育活動的女性參與，傾向於奠基在端莊有禮，以及理想女性身體建構不要求體力的假設上。我在這裡要改變重點，聚焦在積極的身體快感上，特別檢視英國鄉間和都市鄉村邊緣休閒林地的女性地方。首先，我們轉向英國地理學家柏吉斯（Jacquelin Burgess）及其同僚（Burgess, 1996; Burgess et al., 1988;

Harrison and Burgess, 1994) 的著作。然後，看看攝影師波拉德 (Ingrid Pollard) 所闡述的有色人種女性對英國鄉間的特殊回應。

柏吉斯及其同僚持續好幾年，探討民眾對英格蘭南部各種開放空間 (包括都市公園和半荒野地區，像是都市邊緣的沼澤地和休憩林地)，所抱持的態度及其使用方式的社會和文化面向。他們的研究考察了性別、年齡和族群差異。他們在研究裡訪談的男人和女人，都表示擔心性侵害：女人憂慮自身安全，男人則替他們的女性友人和家人擔憂——雖然內政部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實際上青少年男孩才是最容易在公共空間遭受人身攻擊的群體。然而在此同時，年輕人，尤其是他們大規模群集時，也被其他人視為具威脅性。柏吉斯發現，對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女人而言，對白種男人和 (或) 青少年幫派種族攻擊的恐懼，壓抑了她們對林地的使用和享受，即使她們偕同家族成員前往。我們在都市公園裡，像是紐約市的湯普金廣場，也發現同樣情形，「社區」空間由某些群體支配，若不是以實際行為，就是藉由他們現身所暗含的威脅，而排除了其他群體。

164

參加諸如林地散步這類鄉間活動，引發了全體女性的安全問題。但是對有色人種女性來說，還有涉及英國鄉間的再現和意義，以及將有色女性排除於再現之外的更深層而複雜的議題，值得探討。雖然地景的意義是流動多變的 (例如，試想湖區 [Lake District] 的再現，相較於當代田園牧歌式的雄偉壯麗，十八世紀卻被再現為貧瘠險惡)，鄉間的再現和國族形象密切相關。英國鄉間的保護被視為是保存國家遺產的一環。實際上，這種關聯通常與特別理想化的英格蘭有關，而不是涉及整個國家。例如，這個領域的重要機構之一，是英格蘭鄉村保護協會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 [CPRE])。不過，如吉洛伊 (Paul

Gilroy) 指出的，身為英國人的英國特性 (Englishness) 形象，排除了黑人英國公民：「英國國旗上沒有黑色」(Gilroy, 1987)。譬如，對於「康斯塔伯鄉村」(Constable country)² —— 賽福克郡 (Suffolk) 鄉間起伏的土地 —— 或是「莎士比亞英國」(Shakespeare's England) 綠色草地的稱頌，乃是基於一種否定了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文化襲產 (Malik, 1992) (有關文學中的國族及其排斥的再現，更一般性的討論可以參見薩依德 [Edward Said] 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4]，我將在下一章探討性別和國族認同的關聯)。

在英國，黑人主要是以都市為基地，住在英國較大的城市裡：根據 1991 年人口普查，多達半數的非白種居民，住在大倫敦地區。1984 年首度展出的《田園插曲》(*Pastoral Interludes*) 展覽中，黑人藝術家波拉德 (Ingrid Pollard, 1989) 以一系列附上圖說的照片，探索她與英國鄉間的關係。波拉德出生於 1950 年代的蓋亞那 (Guyana)，在孩提時期就來到英國。關注鄉間之社會建構的諾丁罕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地理學者金斯曼 (Phil Kinsman)，於 1992 年訪問波拉德，出版了一份研究報告和一篇文章，正是我在這裡引用的材料 (Kinsman, 1993, 1995)。

金斯曼這麼描述這場展覽：

[它] 由置身鄉村地景的黑人男女的五張著色照片構成，附帶了文字說明，提到造訪鄉間的恐懼感、缺乏歸屬感、暴力威脅感，甚至死亡，也提到將黑人帶往英國的奴隸制度的歷史。標題當然

165

譯註 2：John Constable (1776-1837) 是著名的英國風景畫家。

有諷刺意味，指涉了英國文化中整個田園風光理想的領域……波拉德將《田園插曲》歸因於她個人的假期經驗，一段與黑人朋友的特殊對話，談到黑人自我設限於英國某些地方，以及某些觀眾對於初期照片展示的複雜解讀。他們看見照片中的排除隱喻——刺絲網和石牆——她先前並未打算以排除做為照片主旨（1995: 301-2）。

波拉德指出，黑人對於英國鄉間的經驗是「恐懼地景」：這是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描述女性（Pain, 1991），特別是女同志（Valentine, 1990）的普遍經驗時使用的概念。然而，佩恩（Pain）和華倫亭（Valentine）都越來越將重心放在都市，而非鄉村環境。波拉德的鄉間批判，取決於對黑種英國人認同社會建構的考察。據金斯曼所言，

她表明了造訪鄉間不被認為是黑人經驗的一部份，就算真的造訪鄉間，也必須克服信心障礙。她強調，前往鄉間是個跨文化活動，必須學習鄉村的符碼，這種情況證實對黑人是個障礙。雖然也有非常真實的物質障礙，阻止黑人前往鄉間。但事實上，使人望之卻步的大多是意識形態的阻礙，其中之一是，人們怎樣看待黑人認同感和鄉間的關係（1995: 307）。

出生牙買加（Jamaica）的著名英國社會學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認為，離開土地的疏離經驗，以及缺乏無論對英國或加勒比海的歸屬感，是移民的共同經驗。我在第八章會更詳細探討這種經驗，考慮到移置（displacement）與流移（diasporic）認同形構的問題。雖然波拉德的作品明白專注於種族，但是在她針對展覽反應的記錄中，指出勞工階級和-white中產階級女性在她的照片裡發現了自身經驗的共鳴。這說明了階級、種族和性別分

化，在人群對不同地方的經驗中，既區分又團結了這些群體的方式十分複雜。

性別化的海灘

除了鄉間，公共休閒場所的另一個主要選擇是海濱，尤其是海灘。隨著生活水準和平均薪資的提昇，以及二十世紀期間大眾運輸的改善，「西方」有大量人群每年離開規律的日常工作，到陸地邊緣稍事歇息。我在本章和前幾章裡指出了，有關性慾特質的假設——兩性之間的適當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容許的能見度——在營造環境中清晰可見。有關誰的身體被允許出現在哪個空間，以及身體間互動的明確和隱含的規則及管制，都設定在建築物的性質與形式、建築物的間隔空間，以及內部劃分之中。除了一些例外的個案和地方外，這些管制都是基於異性戀社會關係和女人明確的低劣地位。或許公共領域中主導性的性慾特質，最明顯展示於海灘，以及相關的假期設施中。在這個海陸之間的闕限地方——直接意義就是邊緣地帶——建構了西方社會關係的二元關聯組，變得顯而易見，而且在某些事例中會有所逾越。

166

海灘是自由的地方，在這裡，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慣常生活分割（至少對度假者來說），全部或部分瓦解了。在介於陸地與海洋的空間裡，自然和文化的邊界也是流動不居。退潮時，海灘或許藉由椅子、地毯、食物和遊戲設備而「文明化」，但這種拓殖是脆弱且暫時的，所有的痕跡每天被沖走兩回。在這個破格（*anomalous*）的狹長地帶，自然—文化二分裡文明化一方的其他跡象也遭到挑戰，例如臨時占用者連同衣服一起脫掉了許多他們

階級地位的符號；他們變成只是各種形狀和符號的身體，快感變成主要是身體而非理智上的經驗。費斯克（Fiske, 1992）在一篇名為〈閱讀海灘〉（Reading the beach）的文章裡，指出以下的二元名單遭到破格的海灘範疇挑戰（p. 57; 名單裡的「泳者」〔bathers〕指的是泳裝）：

A	破格的範疇	非 A
海洋	海灘	陸地
自然		文化
裸體	上空 / 泳裝	著衣
毛	日曬成棕褐膚色	皮膚
游泳	衝浪板	划船
魚	水肺	(男) 人
動物	寵物 (狗)	(男) 人

這些劃分中使用「男人」(man) 一詞，或許有點令人生厭。

167

然而，有個二元範疇沒有在海灘上遭到挑戰。由於海灘是性慾特質展示和凝視支配的所在，性別分化在脫光了衣服以後，當然變得更明顯。海灘主要是觀看的場域（事實上，踰越了單純觀看的行為，受到公共法令明文禁止）：男人看女人，女人看女人，男人看男人，女人看男人，還有成人觀看兒童。儘管海灘往往因某些群體的主導而有所區分，例如年輕男性主宰的衝浪海灘，或是由成人和兒童主宰的家庭海灘，然而，除了某些例外地區，支配展示的是異性戀男性的凝視。在澳洲從事研究的社會學家費斯克，在他的論文中，或許有點出人意料地選擇關注衝浪者文化的性別歧視。

衝浪板或許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破格範疇的絕佳例子。它以科學的

方式，仔細設計鱗板的配置和殼體形狀，它甚至也是使男人能漂浮在海上的最小物體〔又提到男人，但如我們待會兒所見，這一次，費斯克指的就是男人〕……。猶如迎合了衝浪板的破格地位，它既神聖又充滿禁忌。對衝浪小子（surfie）而言，衝浪板幾乎是崇拜的對象，但是有強烈的禁忌，禁止女孩，或者太年輕或太老的人騎乘衝浪板。

費斯克繼續寫道：

在此，我們關心的不是以男性性慾特質來從事衝浪板的佛洛依德式解讀，但值得討論大多數青少年次文化的性別歧視性質。青少年次文化中的男女行為，有明顯的區別，男人積極主動且占支配優勢，女人消極被動而居隸屬地位。貨車、摩托車和衝浪板，傳統上是由男性駕駛和騎乘，涉及其中的尺寸、技術、裝飾，都是男性地位秩序的一環。女性是旅客、旁觀者，被男人擁有、掌握、炫耀。衝浪者的書寫夾雜著控制浪潮的描述，以及輕易掌控女孩的描繪。他們對兩者有獨一無二的表達方式……但關鍵術語是狩獵，一體適用於浪潮和女人。狩獵是男人首度指稱其掌控自然的所在：它是烹飪的前提，烹調隨後成為自然之人文化成的共鳴隱喻。結果，狩獵被當成自然活動——獵食、獵捕女人、追獵浪潮的男人，是個行止「自然的」男人，因為他遵循身體的需要而行動（1992: 60）。

謝天謝地，自然的兩旁加上了引號。費斯克探討衝浪者的態度和語言時，他似乎頗為著迷於衝浪者的男性氣概，讓我覺得他幾乎相信他們有關女性被動和劣勢位置乃「自然而然」的論點。

如果你有興趣進一步探索青少年次文化中，性別歧視儀式的某些原因，你或許可以看看我編的社會地理學讀本《消解地方？》（McDowell, *Undoing Place ?*, 1997b），我在書中重印了有關摩托

車騎士和摩登族 (mods) 的研究，你也可以查看史格爾頓與華倫亭 (Skelton and Valentine) 編輯的文選《酷地理》 (*Cool Geographies*, 1997)。

結論

這一章已經清楚說明了性別、性慾特質與空間之間，有一連串複雜的關係。其中的區分和連結，比公共和私人的簡單二分（及其各別與男人和女人的關聯）還要繁複許多。性別和地方、認同與特殊地點之間，對男人和女人而言，都有複雜矛盾的關聯。對兩性來說，城市及其公共空間同時跟恐懼和喜悅、危險和任性的自由有關，而海灘是個破格的空間。性別、認同和地方，以及其間關係的定義，總是比早期的女性主義分析和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的看法，還要破碎、複雜且流動不定。「西方」工業革命所建立的工作場所和家、城市和郊區、私人家庭生活和公共領域之間的特殊區分，具體展現於十九世紀城市，在 1950 年代的美國和英國都市地區臻於極致，但總是被比理論分析有時承認的，還要更加零碎的線索和區分交錯切割。

再者，都市空間本身並非只是都市規劃師和製圖學者那種直接、容易辨識，或是科學性的空間。都市空間還透過由日常空間實踐賦予意義的成套迷思和再現而建構，一如迪塞陶 (De Certeau, 1988) 和列斐伏爾 (Lefebvre, 1991) 的觀點。空間對不同群體而言有不同意義，而且每個空間都在一天、一週或是更長的歷程裡，由一連串不同的社會群體占有。他們的言行在不同時間，賦予同一空間不同意義。比如說，白天和夜晚的街道與公

園，或是淡季和旺季的度假勝地，實際上是不同的空間，對那些生活其中、使用空間者的日常經驗來說，它們就是不同空間。

到了二十世紀末，透過全球通訊和資訊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空間和時間的深刻重組，雖然並不均衡。但至少對某些人而言，讓社會關係和性別區分脫離了特殊地域的掌握，從而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橫跨廣闊的時空距離而重新組合。資本、人群和觀念的這些變化、遷移和移動，在許多學科裡，針對位居當代社會理論核心的日常生活空間化，提出了新問題。因此，地理學的關切是新千禧年的核心問題。在倒數第二章裡，我要討論有關移動、旅行和移置之後果的理論與經驗問題，但是首先在第七章，我要離開城市尺度，探討一下性別和國族國家的關係。

169

延伸閱讀

貝爾與華倫亭 (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 1995) 的《描繪慾望》 (*Mapping Desire*)，或許是地理學家所寫的第一本論文集，認真考察了與不同性慾特質相關的多元地理。它收錄的文章討論了各種區位裡的女同志和男同志的關係，以及抵抗的策略。本章引述的莫特 (Frank Mort) 的《消費文化》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1996)，是一部傑出的蘇活區歷史考掘。我在第四章提過的，毛平 (Armistead Maupin, 1980, 1984, 1986) 對於 1980 年代舊金山卡斯楚區的虛構描述，提供了這座城市「另類」生活的洞察，費茲傑羅 (Frances Fitzgerald) 在她的書《山丘上的城市》 (*Cities on the Hill*, 1986) 裡，則是以比較嚴肅的觀點探討了同一個地區。它們都與這裡及前一章討論的題材有關。

希爾德 (Rob Shields, 1992) 編輯的論文集《生活風格血拼》(*Lifestyle Shopping*)，包括了探討不同類型消費空間的章節，並援用了列斐伏爾、梅菲索力 (Michel Maffesoli)、班雅明和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的概念；對這些「偉大男性」著作的當代相關性有興趣的讀者，這本論文集或許有些用處。不過，在廣告的魅力和影響下，這本書很難勝過威廉森 (Judith Williamson) 的新聞寫作。《消費激情》(*Consuming Passions*, 1985) 是集結她在報章 (例如 1980 年代的《新社會》[*New Society*]) 發表作品的選集。貝爾與華倫亭 (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 最近的書《消費地理》(*Consuming Geographies*, 1997)，是針對區位和飲食關係的有趣評論。艾茵雷 (Rosa Ainley, 1998) 編輯的文選，收錄了各種公共空間的論文，包括倫敦的開放空間、紐西蘭的購物中心、牙買加京斯敦 (Kingston) 的舞廳，以及加州的真實與虛擬街道。最後，萊格莉與洛威 (Neil Wrigley and Michelle Lowe) 的書《零售業、消費與資本：邁向新零售地理》(*Retailing,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Towards the New Retail Geography*, 1996)，一如書名所示，是「新」零售地理學家撰寫的論文集。

7

性別化國族國家

GENDERING THE NATION-STATE

導言

170 我在前一章的個案研究中指出，土地意象（英國鄉間的例子）如何與國族性的再現密切相關。在這裡，我要更深入探討國族國家再現的問題，並且拆解這些問題如何性別化的意義與意識形態，以及與含納或排除某些女性和男性群體的規則有關。在前一章裡，「種族」或族群特性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在這裡變得格外重要，因為國族通常是以特殊空間或領土與其民族之間的連結，並排除「他人」來界定的。在這一章，我還想提出第二組國族國家的議題，就是國族國家的制度和規訓將女人界定為有別於男人，並據此給予差別待遇的方式。到了本書這個階段，發現「差異」也隱含著階層，以及女性遭受到低劣或不公平的對待，並不會令你詫異。在這兩種情況裡——再現和權利——有關被選舉權和公民權的問題，都很重要。

女性主義學者致力研究性別和國族國家的關係，產出了兩種彼此關聯的文獻，即有關國族國家，以及國族國家的制度和實踐如何奠基於公私二分的探討。基本上，這裡的焦點鎖定了二分對立的公共面，雖然我在討論國家機構時，應該會指出它們的行動也影響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所謂私人生活裡的相對權利，這種行動的例子包括管制性慾或健康照護方式等（你可能會回想起第二章，傅柯認為身體規訓是生命權力〔biopower〕發展成為現代社會控制機制的關鍵面向）。

171 本章我要介紹的第一組國族國家的女性主義文獻，圍繞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以及國家以其分配和強制政策而擔任公民裁判者的行動。我們可以將文獻區分為兩個相關領域。第一個領域主要關心身為公民的女性權利，尤其是她們的正式權利，其中

或許最受關注的是選舉權。啓蒙運動以降的國家機構發展中，參與國家決策制定和政黨政治行動（正式意義的政治），一般認為適合男人從事，但不適合女人參與。女人做爲一個群體被視爲不如男人，因而必須抗爭，首先爭取選舉權或正式代表權，隨後爭取承認與身爲女人的生活和需要相關的一切議題，都是政治議題。在這些抗爭裡，一種主要以權利爲基礎的政治佔主導地位，女人要求跟男人享有同等待遇。

晚近以來，尤其到了 1980 和 1990 年代，公民權或經濟正義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圍繞著認同而非權利近用問題而組織的政治取代了。除了承認基於譬如年齡、種族或性偏好的女人之間有不同利益外，還有宗教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文化復興及國家內部的族裔國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突顯了以認同問題爲核心的一套論述、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舊有的政治劃分，尤其是基於階級利益和（雖然程度較低的）性別區分的政治，已經被取代了，差異政治取代了平等或同化政治。我將於後文更仔細探討這種政治的哲學基礎。

有關國家之正式制度的女性主義興趣的第一個範疇裡，第二組議題關切的是女人與福利國家。傳統上，女人爲家人的健康擔負主要職責，由於她們能生育，而且比男人活得久，因此她們是保健服務和福利津貼的主要客戶。此外，她們是保健服務的重要勞工，尤其位居較低微的職位。因此，性慾特質、分娩和健康管理的「私人」議題，透過這些福利機構和法律體系而受到規範和控制。

女性主義分析國族與性別之間關聯的第二個主要範疇，焦點非常不同。不同於第一個範疇裡的兩組研究，引用政治理論並聚焦於社會實踐，第二個範疇將政治焦點結合上晚近女性主義和批

判的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對於文本、圖畫和營造環境圖像中，國族形象、象徵與再現的分析。曾經探討過的議題，包括危機時刻與長期而論的國族認同建構，家邦、母國和（或）父祖之國的象征意義，檢視了國族的性別意象，以及國族特性與性慾特質的關聯（Parker et al., 1992; Radcliffe and Westwood, 1996; Yuval-Davis, 1997）。在此，認同政治引發的某些問題，併入了在後殖民和後帝國民族對抗其先前歷史的鬥爭中，國家的性別化象徵作用的問題。近來所謂宗教的原教旨主義，以及族裔國族主義的復甦，對女性主義學者而言，也引發了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它們十分仰賴國家和國族的性別化觀點，以及具有性別特殊性的社會實踐。

什麼是國族國家？

然而，第一項任務是嘗試界定國家（state）和國族（nation）。這裡同樣有大量文獻，將定義聯繫上替代性的理論觀點。雖然有種普遍一致的見解，認為國家是由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以及警察和軍隊組成的機構群體。但是，對於國家實現了誰的利益，卻有不同意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認為，國家是實現資本家利益的體制，雖然不同資本（例如金融資本或工業資本）的利益會彼此競爭（在哈頓〔Will Hutton〕有關英國國家的通俗書籍《我們所處的國家》〔*The State We're In*, 1995〕中舉例指出，尤其與德國國家相較之下，英國國家會犧牲工業資本而偏袒金融資本的利益）。多元主義理論家卻認為，國家代表各式各樣利益團體的利益，不同之處只在於他們如何看待衝突性利益的解決之道，是經達致共識，或是不同利益的結盟。其他人認

爲，因爲嵌進「國家」這個詞裡的一整套制度機構，非常眾多且紛雜多樣，因此，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定義「國家」觀念，並予以理論化。相對的，跟特定議題有關的一整套制度機構的各種政策和措施，才是分析的重點。

女性主義者要提出的重要議題是，這些制度在什麼程度上是爲了男人利益和男性權力而行動。雖然聚焦於各種制度，是某些性別與國家研究實際的進行方式——例如，考察選舉權運動，或是福利支付對某些女性群體的影響——但我要指出，保留國家這個觀念有其用處，因爲它提供了國家與國族的連結，從而使我們得以提出有關國族主義與國族特性的社會建構，以及它們援引性別化意識形態、象徵和再現系統的方式的問題。因此，國家是統治特定領土和住在國界內部人民的一套制度，儘管也有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國族（stateless nation），他們與特定土地或領土的關係仍然有爭議。巴勒斯坦（Palestine）是當今最明顯的例子，但也有爭論其佔領權的新興國族例子。下一章，我會討論不同類型的無國家（statelessness）與移置（displacement）的問題。

173

當然，國族國家的疆界會隨時間改變，可能會或不會圈圍出物理上連續的領土。同樣的，國族國家不是恆久不變的實體，就像二十世紀末，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分裂成爲許多國族國家，便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國族國家本身是多元且變動的實體，擁有影響多端的多重意圖。而且，尤弗－戴維斯和安錫亞斯（Yuval-Davis and Anthias）在他們編的性別與國族國家的有趣論文集的導言裡提醒我們，針對國家角色所做的明確女性主義分析，「牽涉了檢視國家的特殊政治計畫，以及它們扣連於其中的經濟和政治脈絡，還有既建構又反對該政治計畫的社會力量」（1989: 6）。

我在這一章，首先將重點放在國家政策上，特別是國家福利政策，以及它們建構、定義和影響女人的自我感、社會位置及人生機會的方式。不同國族裡最明確的性別關係指標，就出現在這裡——例如界定了女人對男人的依賴、對男女的性慾管制、女性的生育權，以及不同家戶成員責任的福利政策——以及法律或正式的公民權，而且就像我在導論裡指出的，有大量女性主義研究揭露了它們的結構。我會探討這裡提出的某些議題，然後轉向國族象徵主義和性別化再現的研究。地方政府（那些在次國家層級運作的實踐和機構）也影響了性別化的社會關係，我在第三章討論女性倡議的特殊事例時已經指出了這一點，而且國族國家的許多政策和措施，實際上是在地方層次執行的。不過，這一章我要關注的是整個國族，而不是地方制度。

定義公民資格：平等與差異

174

女性主義理論化與實際政治的最重要領域之一，在於將公民權利擴展到女性的鬥爭，以及嘗試裁斷平等和差異的競爭性宣稱。女性主義史學家亞歷山大（Sally Alexander）指出，女性主義向來繞著「要求平等和堅持性別差異」之間的緊張打轉（1987: 162）。對於涉入選舉權運動的早期女性主義者而言，女男平等的承諾是優先目標，雖然她們在例如有關母性和兒童健康的運動上，也承認兩性差異。然而，不論追求平等的陳述看起來有多麼單純，這種平等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仍然有待界定。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在英國、其他西歐國家和美國的選舉權運動中，與男人平等的目標被視為理所當然。女人想要接

觸那些她們認為只對男人開放的優勢，她們認定值得追求的平等形式，乃是女性在公共領域（例如工作和正式政治的世界）的平等再現和參與。美國於 1920 年，英國在 1928 年，女性終於實現了充分的選舉權，但這並未帶來一切「公共」場域裡的女男平等。例如，劍橋大學直到 1948 年才正式授予女性學位，而且如我在第五章指出的，實際上，所有經濟體裡的幾乎一切就業部門，女人還是無法獲得平等薪資。女性獲取公民權和政治權的改變速度，在不同國家有空間上的不均等，而且世界上還有好幾個地方，婦女尚未獲得選舉權，或是參與正式或公共政治場域的平等權利。《世界地圖集裡的女性》（*Women in the World Atlas*, Seager and Olson, 1986; Seager, 1997）裡的地圖，針對 1980 年代早期不同國族國家的女性地位，提出了有意思的比較。

你知道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區別，是啓蒙思想和自由主義理論的關鍵二元區分，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與行動份子極力要解構和撤除的區別。這種區別位居有關形式平等論證的核心，而且對女人來說，既是達致投票和法律平等的偉大力量，也是她們爭取實質平等的障礙。讓我們更仔細考察這個矛盾。

西歐於啓蒙運動期間過渡到現代秩序時，各種傳統特權遭到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起源於焉成立。以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步調，君權神授遭到了挑戰，出現了主張個別公民皆平等的社會生活的個人主義理論。佩特曼（Carole Pateman）便主張，「缺乏個人身爲自由且平等的人，從傳統社會的先賦等級制度束縛解放出來的概念，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都無法想見」（1987: 103），雖然她也指出，女性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對公私之間界線的意見不一，而且女性主義者在後期著作裡，對自由主義進行了更徹底的

批判。如果自由主義者堅持個人第一，就必須找到某種說法來合理化女性被排除於平等權利之外，公私區別在這就非常重慶。

洛克 (John Locke) 的《政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參見 Laslett, 1967) 爲此提供了理論基礎，他認爲家庭有別於市民社會 (通常市民社會的定義，包含了那些相關但不同於國家特殊組織的制度和實踐：例如教育體系和組織化的宗教)，政治權力的界定則包括了丈夫對妻子的支配，基於男性身爲「較有能力和較強健者」的「自然基礎」。洛克認爲這種「自然的」從屬關係，乃是基於感情聯繫和血緣。因此，先賦與情感區別了家庭和公共領域，而在公共領域裡，自由個人之間的聯繫，據稱是基於普遍和非個人特質，而那是似乎僅限於男性的特質。於是，身爲妻子和女兒的女性，被排除在「平等、同意與習例的公共領域」(Pateman, 1987: 106) 之外，這與自由主義理論的主張相反，公共領域仰賴父權體制的特權，或是在現代自由主義國家中，立足於佩特曼所謂的「兄弟關係」(fraternity)。基於兄弟關係，男人在私領域支配女人，但是在公領域，同意一份規定男人之間社會平等的「契約」(Pateman, 1988)。

我曾於前文指出，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導致了一種顯而易見的性別劃分，那就是已婚婦女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洛克將家庭從市民社會中排除，從而排除了女性的公民權，這點由於看似非常「自然」而一直不成問題。雖然後來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彌爾 (John Stuart Mill)，相信女性並非較低劣的人類，不應自動被排除而不得參與公共事務，還是建構了一種「分別但平等的意識形態」。市民社會乃界定爲由公領域和私領域構成；據稱，女人選擇在私領域裡扮演妻子和母親角色，從而在這

個私人場域擁有權力和成就感。現今在某些地方，這些論點仍然有影響力。

女人的平等與平權

很顯然，自由主義理論很容易遭受女性主義的下述主張所攻擊，即：女性身為有理性的個人，應該擁有參與公共領域的平等權利。自由主義尤其容易因為女性沒有選舉權而招致抨擊，這方面的重要論點，是由十九世紀末、邁入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國家發展中的選舉權運動發起。事實上，女男形式平等權利的確立，在戰後年代的西方女性主義運動中，仍然保有重要的組織化地位；在諸如 1970 年代引進英國的性別歧視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和平等薪資法（*Equal Pay Act*），以及美國於 1967 年通過的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先前的民權法案僅指涉了種族差異）等立法背後，都看得到女男形式平權。

176

在英國，從大學到地方當局的各種機構都採納了機會均等政策，政黨也開始屈服女性對於更平等代表的要求。例如，1997 年有 120 位女性當選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議員。然而，工黨針對某些選區提出全女性的議員候選人名單，卻被宣告為非法而廢除，成為短命政策。這說明了自由主義的機會均等政策引起的一個最有爭論的議題。力求平等要以什麼方式實現？如何達成女性在各種場域裡的平等代表？

在美國，藉由配額制度（*quota system*）的機制，將正向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引進了大學入學政策。在一段合理時間內，達到譬如女性與男性，或是有色人種與白人之間的預期

比例。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在美國某些州裡，包括德州和加州，正向差別待遇卻遭到質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州的大學招生再度偏袒白人。這兩個州裡，質疑配額制度的論點是，不指派或招募「最適合這份工作的人」是不公平的。

在這裡，我們觸及了自由主義者的第二個難題。「最適合」的人是什麼意思？人與人之間的評斷標準如何建立？它們公平嗎？現在已經清楚確知，大多數評估架構都有內建的偏見。女性主義對於工作評估方法的分析指出，這些重視魄力或果決行動的架構，傾向於獎賞那些在社會上建構為男性氣概的技能。同樣的，如果大學入學的唯一基礎是測驗分數，進入「好」鄰里的「好」學校的學生，往往表現水準較高，導致偏袒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學生，在許多案例中，還是私校學生。所有地理學家都知道，社會階級和收入、居住區位和學校成績之間，有空間上的關聯，誠如我在第四章概略提過哈維（Harvey, 1971）很久以前就主張的，城市是以惡化社會階級不平等的方式，從事「實質所得重分配」的機制。

當有人提出「跟誰平等？」的問題時，就產生了機會均等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第三個相關難題。費利浦（Anne Phillips）指出，「對於性別平等的承諾，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種平等，應該採取什麼形狀。與男人從事的工作薪資相同，或是平等分擔男人所做的工作？與男人競爭的機會均等，還是每個生活領域裡的數量均等？家事和育兒責任平等，或是女人居家的更好環境？」（1987: 1-2）。例如，我提過的每一種政策，都奠基於一套不同的假設。配額制度預設了數量上的代表性，英國的平等薪資法則基於男女同工同酬的假設。不過，這項法案對於差別報酬的

影響卻很有限，因為誠如我們在第五章所見，勞動市場中男女高度區隔，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因此，邁向更大平等的較適當方式，或許是承認男女的差異，以及他們從事的不同工作，並將這兩者納入考慮。

平等與性別差異

女性主義理論家長期以來便體認到，自由主義假設我們都是無性別個人的限制。事實上，最基本的差異（女人生小孩的能力），已經被舉例為女性不平等的（部分）基礎。除非制度機構的政策和實踐，將女性的生育角色納入考量，否則女性絕不可能在平等基礎上與男性競爭，如果這是一項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標的話。當然，某些場域已經考慮了差異：例如，女人有權放產假，並領取產假薪資。在英國，目前這項權利僅向連續兩年由同一雇主聘僱的女性開放。在某些國家，男人在他們的小孩出生時，也有權放陪產假。不過，一般而言，傳統的機會均等政策中，忽視了家庭議題。尤其是在勞動市場，都假設女性能夠自行適應替男性設計的職務。因此，例如在大學系統裡，晉升主要是基於個人每年的出版數量，而不顧及女教授最近是否曾經分娩。

178

無論是基於性別、年齡、體能或失能，或是以其他區別為基礎，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導致了重新設想平等和社會正義概念的嘗試。在這方面，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楊恩（Iris Marion Young）的著作影響深遠。我在第二章曾經介紹楊恩的部分著作，概述了她有關懷孕身體的分析。某些地理學者，包括哈維（David Harvey, 1992, 1996）、勞斯（Glenda Laws, 1994）和我自

己 (McDowell, 1994b)，都覺得她以群體而非以個人之間的不均等為基礎的正義概念，極為發人深省。楊恩在她的書《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中，建構了不公或壓迫的多重定義，取代了認為物質財貨和資源分配的不均等，才是不正義之基礎的信念。楊恩援引早期的論點，但增加了社會聲望、體力和理想化身體之刻板印象的觀念。她認為不正義有很多種形式，由「五種壓迫面貌」組成，包含「分配以外的社會結構和關係」(Young, 1990b: 9)。這五種面向藉由將劣勢群體「他者化」的方式，也就是把該群體界定為有別於且不如「常規」的方式，創造出人群的階層區分，而如你所知，常規正是出自性別之社會建構文獻的常見觀念。

楊恩區分的五種壓迫面貌裡，第一種是**剝削**，這涉及某個群體佔用另一個群體的勞動價值，例如資本家佔用勞工的價值，或是男人佔用女人的家務勞動。第二個向度是**邊緣化**，某些人，像是年長者、失能者或失業者，被排除於有用的社會參與之外。第三種是**失勢** (powerlessness)，其定義為除了專業勞工以外的團體，不受重視。第四種向度是**文化帝國主義**，這是一種雙重排除，對於某些群體的觀點和經驗的刻板印象化，將他們建構成「他者」，他者則因主導群體的經驗與文化被普遍化成為規範而遭到排除。第五種是**暴力**，楊恩將其定義為隨機而無故的攻擊，除了羞辱成爲他們目標的人以外，別無根據。

楊恩的研究為政治理論家和政治地理學者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以便超越立足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報酬分派（無論是社會階級之間，或女男之間的分配）的區分來思考，並將這些連結上基於我們或可稱爲文化規範的不平等。在這方面，她的最後兩種壓迫面貌尤其重要。楊恩主張，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關鍵機制，

就是將「他者」限制在他們的身體裡。因此，「主導的論述以身體特徵來定義他們，並將他們的身體建構為醜陋、骯髒、敗壞、不潔、受污染或罹病」（1990b: 123）。對女人而言，對於美麗且令人嚮往事物的傳統和理想化觀念，同時「使得大多數女人變成乏味、醜陋、令人厭惡或可怕的身體」（p. 123），並將女人建構成爲只是個身體。

在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以及有關公民資格性質和福利國家的研究裡，有類似楊恩著作的觀點。在第一個領域裡，回想沃爾碧（Walby）對父權體制的定義，她根據經濟結構和文化實踐，區分了六種壓迫女性的不同面向。同樣的，在分析戰後英國的不平等時，社會政策專家提特幕斯（Richard Titmuss, 1987）依據薪資分配、福利國家津貼和工作場所的「額外福利」。包括物質財貨，像是汽車和退休津貼，以及賦予某些人的個人決策地位、聲望和權力，勾勒出不平等的三重結構。然而，儘管提特幕斯承認不平等有多重軸向，他的研究還是屬於不平等的分配模型。

楊恩和沃爾碧的研究裡，還是有不同壓迫軸向的區別、它們的分析性區分，以及它們的對等地位（每種面向都一樣重要嗎？）的問題。然而，要理解楊恩的壓迫理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導向了一種不同於自由主義模型的政治觀。分配的（不）正義模型要求的是平等主義的重分配政治，但是「差異」版本的正義則導向解放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在這裡，我們看見了在整個二十世紀裡分裂了女性主義政治的二元對立。楊恩建構了一個有力的論點，主張政治鬥爭的目的，並不在於廢除群體間的差異，而是接受並頌揚差異，她認爲不應該將差異階層化。

這引領我們通往當前地理學家內部（甚至是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裡）重大的激烈論戰。接受（甚至頌揚）差異，必然導

致毫無形式的相對主義；造成無力針對差異與歧視及其相對重要性的基礎做出判斷嗎？認同政治裡，後現代理論家與行動主義者（通常是女性、同性戀、生態學家、綠色組織成員、道路抗議者和其他人的各種結合）站在同一邊，對抗相信進步的現代主義信徒，以及那些持續相信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分化具有壓倒性意義的追隨者。大衛·哈維或許是地理學者中最著名的第二種立場的擁護者，因為儘管他嚴肅看待女性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的研究，他仍然確信地理歷史唯物論（geo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解釋比較優越，而且他在那本既冗長又複雜的書《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的某些地方，令人不安地藐視女性主義政治（但參見楊恩於《對蹠地》〔*Antipode*, 1998〕裡的回應）。

在前一種擁護差異的陣營裡，有各式各樣的觀點，但大體上都同意雖然不正義沒有單一基礎，但某些差異確實比其他差異來得重要。許多社會科學家長久以來體認到，「種族」、性別和性慾特質，都是壓迫的結構面向，而對抗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異性戀主義的政治鬥爭，並不會減損以階級為基礎的鬥爭。誠如女性主義理論家傅瑞澤（Nancy Fraser）近來在思考階級政治和認同政治時的主張：「我拒絕認為我們必須在它們之間採取非此即彼選擇的觀點……最明智而令人滿意的取向，乃是發展能夠涵蓋分配和承認的、更廣為包納的正義概念」（Fraser, 1997b: 127，另見 Fraser, 1995）。她提議，每一種社會正義的取徑（馬克思自由主義者和差異視角），都必須兼顧經濟和文化面向，因為文化差異既受到經濟運作影響，也影響了經濟運作。事實上，我在第五章已經概述過，女性主義經濟研究的成就之一，就是說明了性別

分化在經濟過程裡具關鍵重要性。對所有的「他者」而言，變革性的重分配當然是承認的基本面向。充分參與公共生活需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事實上，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89）指出，個人會發現，如果缺錢，就不可能成為完整的現代國家公民。她認為，某些受薪工作形式或最低基本收入，是現代公民資格的必要條件。

個人即政治

緊接著前面有關文化規範（關涉身體，以及承認暴力是權力的一部份）重要性的討論，幾乎不消說，女性主義者也會爭論對自由主義理論十分重要的第二種公私之分：市民社會和私領域的分界。1960年代女性主義的口號「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所傳達的觀念，同時挑戰了何謂政治的定義，以及參與政治場域的基礎。在現在被視為認同政治先驅的運動中，1960年代中期以來，女人開始環繞著健康和生殖、育兒和家庭暴力的「私人」議題而組織起來。這些議題從來未曾被定義為政治議題，而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學裡界定的政治地理學中，當然也是隱匿不見。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和其他人主張，柯司特（Castells）對於「集體消費」（即都市貨品和服務的國家供應）的定義，不僅意味了忽視女性在家裡「爲了愛」而提供服務的工作（記得第三章的論點）；也表示整個1980年代，國家越來越仰賴女人在家庭和社區的自願工作，這是「撤回國家」（rolling back the state）和不當命名為「社區照護」的政策的基础，都沒有得到適當的分析。

沃爾碧 (Sylvia Walby) 在她最近的《性別轉變》(Gender Transformations) 一書中，針對柯司特的集體消費概念，以及他將女性主義鬥爭歸屬於更廣闊的「新社會運動」範疇的做法，簡述了其中的問題：

[柯司特] 並未善加處理所謂集體消費的性別化性質……。〔他的〕主要錯誤源於將勞動力的生產概念化為消費而非生產。「消費」概念的用法，意味了不承認女性在家裡身為家務勞動而做的事是工作。這個詞暗示了「休閒」，而非工作。這會令人誤解……柯司特忽視了他所命名的集體消費議題，是資本循環的一部分的程度，是父權體制的一環。對柯司特而言，資本主義裡由個人移往集體消費的移動，其實是徹底改變某些性別關係面向的運動：從父權生產方式的私有化勞動，到父權生產方式之外的社會化勞動。柯司特沒能覺察到性別動態的重要性，這表示他對於產生「新社會運動」的結構變遷，提出了錯誤的說明，僅考慮資本主義，而沒有父權體制。再者，他沒有分析推動和抗拒這些轉變的力量性的性別特質，而且他對於這些改變的歷史細節的解說，也不正確 (Walby, 1997: 143)。

雖然我不同意沃爾碧將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完全分開 (所謂的雙元系統取向)，但我極力支持她的結論。我在別處 (McDowell, 1991a) 曾經主張，最近的經濟和福利國家轉變裡，在逐漸仰賴女性的受薪、家務和自願工作的方式上，有著重大矛盾。沃爾碧認為，柯司特把圍繞著「消費」(又稱為家庭生產) 的女性主義鬥爭，視為「新社會運動」的一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她的這項提醒也很有幫助。

女性主義試圖社會化女性的家務勞動，這種嘗試自第一波女性主義以來就存在了……。第一波女性主義者爭取公共教育、供應學童膳

食、托育、公共健康照護……〔還有〕我認為，這些女性主義者的努力，構成福利國家發展背後的重要政治力量（1997: 143）。

性別區分、國家制度與空間差異

將女性主義對於國家措施和政策的研究，區分為三種空間尺度，亦即國際、全國和地方尺度，應該不會有太多錯誤。已經有各種議題經過探究，從差別性公民資格政策如何排除了某些女性群體，到接受服務資格的地方差異，以及關注女性抗爭以確認她們認同的研究。

我們首先檢視國際層次的問題。這方面，英羅（Cynthia Enloe）的研究頗負盛名。她在國際政治與性別關係方面有豐富著述，包括軍隊角色的分析，以及國際經濟區分和性別關係的研究。在這裡，我要從她的書《香蕉、海灘與基地：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觀》（*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9）舉例子。雖然英羅的書處理國際政治中廣為接受且定義明確的議題——例如，國族主義運動、外交、軍事擴張和國際債務——但她以非傳統的女性主義觀點來探討這些議題，將重點放在身為這些場域裡的國際行動者的女性而非男性身上。她的書包括性觀光產業，與軍事、外交服務和家庭幫傭有關的性別化旅遊模式的研究，並且分析了性別在諸如香蕉和牛仔褲等農產品與工業產品的生產、廣告和消費裡的重要性。她的開創性研究，在過去幾年間，激發了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從事許多類似議題的研究。

讓我們從《香蕉、海灘與基地》序言裡的一段陳述開始，她在裡頭解釋了引導她將女性放置在這本書核心的想法。

183

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心裡想著波卡洪塔絲 (Pocahontas)，結束時卻思索著卡門米蘭達 (Carmen Miranda) 的一生。波卡洪塔絲葬於倫敦的高門公墓 (Highgate Cemetery)，里約熱內盧則有一座獻給卡門米蘭達的博物館。這兩人都不是思索當代國際政治的慣常起點，但她們兩位都讓我以新穎的方式思考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

波卡洪塔絲是包漢坦印第安人 (Powhatan Indian) 部落酋長的女兒，她在族人與開拓殖民地的英國人之間，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她後來跟其中一名英國移民結婚，並且遊歷倫敦，猶如確認了殖民事業確實是文明化的使命。然而，由於她死於肺中積累的文明化煤灰，而未曾返回她的新世界家鄉。

卡門米蘭達生活於三個世紀以後，但她的生命與這位印第安先驅姊妹的生命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她是一名巴西雜貨商的女兒，她成為好萊塢明星，以及美國總統拉丁美洲政策的象徵。她因心臟病而早逝，這或許是由於美國流行文化快車道上，狂亂的生活步調引起的。

當我試圖弄懂世界大事時，這些女人不是那種我被教導要認真對待的國際行動者。但是，我越是思索波卡洪塔絲和卡門米蘭達，我越開始懷疑我遺漏了國際政治的一整個向度——我約略知道政府之間的關係，不僅僅仰賴資本與軍備，也仰賴控制女人做為象徵、消費者、勞工和情感慰藉者的方法……。在這裡，我認為在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裡，身為消費者的女人是全球政治行動者。再者，如觀光業顯示的，公司及其政府同盟正在行銷通常不認為是「消費財」的產品：熱帶海灘、女人性慾、空服員的服務 (Enloe, 1989: xi-xii)。

這些就是瑞區（Adrienne Rich）所指的「位居政治後排」（引自 Enloe, p. xii）的女人。但隨著女性主義者重新定義何謂「政治」一詞的意思，並堅決主張觀光業和育兒，跟國際政治家風範、金融流動和戰爭一樣，是值得學術研究關注的議題，使得女人的能見度日益增加。而且，正如英羅所論，假使女性主義研究能夠揭露國際政治和經濟如何「仰賴人造的男性氣概觀念，我們就可以指出，這個看似難以抗拒的世界體系，或許比我們受到誘導去相信的更為脆弱，更有改變的可能」（p. 17）。

家庭幫傭與世界政治

雖然我在第三章已經討論過家務工作，但是在這裡，我要具體檢視英羅有關國際場域中家務勞工意義的研究。你大概記得前幾章提到過，二十世紀初期的工業國家中，家事服務僱用了好幾百萬名婦女。然而，到了 1950 年代，家庭幫傭似乎成了剩餘職業。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經濟變革，替勞工階級女性開創了薪資較佳的工作，而她們比較富裕的姊妹卻似乎屈服於這種觀念，認為身為無酬家庭主婦乃是她們生活的理想命運。不過，197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她們開始體驗到勞工階級女性從未放棄過的薪資工作和家務工作的雙重負擔。

針對這種轉變，有各式各樣基於集體和個人立場的回應。受到女性主義運動影響的女人，開始公開或私下組織起來。在公共場域中，她們組織運動以爭取增加國家供應，尤其是育兒設施；而在家裡，那些與男性伴侶同居的女人，則試圖鼓勵他們參與家事和育兒。大約在 1980 年代，那些輕信「女強人」觀念的其他

女人試圖「全盤掌握」，其他人卻以例如拒絕升遷，或者兼職工作方式，達成傳統的妥協。身為女性主義的女人，掙扎於另一種不同的選擇——僱用其他女人來做她們的家事，並照顧她們的小孩，這種存在已久的資產階級做法。在家裡聘僱另一個女人，似乎是否定姊妹情誼的宣稱，但是在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已經不足的國家育兒供應面臨刪減，對許多女人而言，似乎沒有留下多少能夠接受的其他選擇。

工業國家中，目前受僱為保姆、廚師和清潔工的女性，絕大部分是移民，不是來自前殖民地，就是來自較貧窮的國家，有時候是鄰國。譬如在美國，很多家務勞工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Romero, 1992）；在加拿大，某些城市裡的家務勞工一般是來自加勒比海的女性（England, 1997; England and Stiell, 1997），但在其他國家，菲律賓女人是家務勞動市場的重要群體（G. Pratt, 1997）。以下是英羅探討促使窮困女人為了家事服務工作而遷移的理由：

女人在國外尋找家庭幫傭工作，原因很多。儘管那些理由或許是扭曲發展的結果——菁英分子貪汙腐敗、依賴剝削的國外投資者、拒絕實施真正的土地改革——但一般而言，移居國外女性的說法比較直接。她們必須賺錢來扶養沒有土地的雙親或失業的丈夫。她們是小孩的唯一扶養者。她們擔心如果沒有移居國外的話，除了淪為娼妓，將別無選擇。她們無法在接受訓練的專業領域找到工作。內戰使得祖國生活令人無法忍受。已經在海外的姊妹和同學保證幫她們找到工作。或許出於私人盤算，但她們有助於試圖平衡貿易並清償國際債務的政府（1989: 184）。

許多貧窮國家的海外勞工匯款，是出口收益的重要組成：例如 1980 年代，人民（男女）通常在中東國家工作的巴基斯坦、

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寄回家鄉的錢，佔其國外收入的大約兩成到五成。後面兩個國家，是最依賴女性移工匯款的國家。女性家庭幫傭的法律地位，在每個工業國家都不一樣，但這些女性工作的環境，往往是極度剝削的。例如在英國，一個暫時移居英國的家庭，可能會帶著一名菲律賓女傭，但她在這個國家並沒有自主的居住權。這使她無法離開單一雇主。同樣情況也出現在義大利，以旅遊簽證入境，但想要取得長期客居簽證的女人，離不開特定雇主。在很多國家，只擁有旅遊簽證的女人，通常從事非法工作。其他情況下，女人可能根本沒有證件。例如在加州，很多家庭幫傭是非法入境美國而沒有證件的勞工，因此很容易受剝削。

因為家務勞工按照定義是受僱於家中，並且通常長時間工作，因此她們發覺很難以集體方式組織起來，改善她們的處境。然而，英羅卻記載了一些倡議。「1950年代的多倫多黑人公民資格協會，創辦了一間旅舍和聚會場所，讓擔任家庭幫傭的加勒比海女人可以相互交談，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能夠逃離令人無法忍受的家戶」（Enloe, 1989: 189-90）。近來在洛杉磯，發動了一場稱為「超級傭人」（*Superdomestica*）的倡議運動，伴隨了活潑有勁的廣告和服務諮詢中心。

但是，英羅強調，女性家務勞工與其雇主之間的關係，絕不只是私人關係：不僅有葛瑞格森與洛威（Gregson and Lowe, 1994）發現的「虛假親屬關係」（*false kinship*），他們的關係也受到政府移民法規及管理所影響。在1980年代的加拿大，一群加勒比海和菲律賓女人成立聯盟，推動改革移民法規，使得持臨時簽證的外籍家務勞工，能受到勞工法較好的保護。事實上，阿奎諾（Aquino）政府於1988年，強行禁止所有菲律賓人受聘於外國，

但是許多女人認為這並不適當，因為這既減少她們的工作機會，也沒能認識到她們在「主人」國家中受到保護的必要。例如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叫做菲律賓聯合反抗禁令（United Filipinos Against the Ban）的團體。由於政府持續需要外匯，影響所及，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政府逐漸放鬆了全面禁令。

很多國家裡，菲律賓人的處境還是有問題。例如在英國，有好幾個法院案例，雇主被判犯了不人道待遇或殘酷的罪行。一位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兼小說家史坦沃絲（Michelle Stanworth）利用這種案例，做為她的小說《奔尋庇護》（*Running for Shelter*, 1995）（以史賓〔Michelle Spring〕之名出版）主角普林斯頗（Laura Principal）進行的虛構調查的依據。

如英羅強調，

移民家務勞工彼此的關係，以及與雇主之間的關係，大部份是由有關移民的政治辯論塑造的。這些辯論經常表明了社會自身的國族認同，以及如何設想本身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通常充斥著有關男女公民資格的假設。大體而言，第二次大戰以來，許多政府表現得好像「移民勞工」是男性。一個「移民家庭」是由男性勞工的妻小組成。這種描述與事實不符，因為政府仰賴移民女性在醫院工作，打掃辦公大樓、飯店和機場、照顧兒童，並且在戰後經濟擴張的數十年間，操作縫紉機……儘管有這些事實，這幅男性化移民勞動力的肖像，鼓勵政策制定者將對於女性移民的限制，視為防止男性移民勞工扎根的手段。如果勞工的妻小留在他們的祖國，那麼當勞工的經濟效用減弱時，就可以將他遣送回國（1990: 190-1）。

英羅總結她的家務勞工國際流動研究，論及一項有用的提醒，那就是不要簡化這種過程的地理形勢。這不僅是富裕的第一

世界女性，僱用她們比較貧窮的姊妹：「實際上，成千上萬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替其他比較富裕的第三世界女性，打掃住家、照料兒童」。例如在中國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對「本國」女性而言，家事服務是一項重要職業。家務工作的令人迷惑地理正陸續被揭露，包括評估致力改善女性生活的各種政治運動的成效 (England, 1997; England and Stiell, 1997; Pratt, 1997)。

全國層次的性別與權利

英羅對於國際議題的關注，與女性主義理論家尤弗一戴維斯與安錫亞斯 (Nira Yuval-Davis and Floya Anthias) 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她們共同 (1989) 以及各自 (Yuval-Davis, 1997) 研究了不同社會中，有關女性與國族國家間關係的各種問題。和英羅一樣，這些研究者關切女性被納入或排除於公民資格的方式，也關心女人「在生物上、文化上和象徵上再生產國族」的方式 (Yuval-Davis, 1997: 2)。在此，女性主義的研究在揭露階級、性別和族群特性的複雜關係方面，非常重要 (Blunt and Rose, 1994; Moghadam, 1994; M. L. Pratt, 1992; Ware, 1992)。已經有研究針對各種歷史情境中，有顯著移入人口的殖民、後殖民和工業社會，描述了在區別不同女性，並且將某些群體建構為較不合格的方式上，階級渴望和種族歧視恐懼的決定作用。誠如英羅所論：

187

英國、美國、荷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女人，或許不是她們國家殖民政策的設計者，但她們有很多人卻以奴役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女人的方式，扮演著殖民行政官員的妻子、傳教人員、旅遊作家和人類學家的角色……。如果不是這些「可敬」女性的

自願加入，看到殖民開拓給了她們一個冒險機會，或財務安全或道德承諾的新契機，那麼殖民將會大有問題 (Enloe, 1989: 16)。

這個有趣且細心的歷史研究，為當前女性主義有關差異和多樣性的論點，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也提出了通常令人痛苦的問題，亦即女人捲入了壓迫其他女人的政治行動。

除了分析福利國家，近來的女性主義研究聚焦於在國族國家看似日趨衰弱的情勢下，性別和國族特性的問題。1990年代政治地景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各種社會運動的意義。它們日益茁壯、挑戰了國族國家的權威和正當性，並且基於種族、宗教、語言或族群特性，而從事排他性的群體實踐。這些運動往往質疑國族國家的疆域基礎，可能以次國家，或超國家的聯盟為基礎。例如中歐的族裔國族主義，導致了先前的國族分崩離析成為較小的群體，其他諸如巴斯克 (Basque) 或庫德族 (Kurdish) 國族主義運動則橫跨了國家邊界。在許多奠基於或許可以鬆散地稱為認同政治的社會運動中，家庭、女性地位和性別關係的問題，逐漸成為核心議題。

188

性別與福利

當我們轉而檢視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時，我們發現有大量研究，討論了國家控制女性權利的方式，尤其是在可以泛稱為福利的領域。女性主義學者和行動份子長久以來體認到，福利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對於女性生活有深遠的意義。尤弗一戴維斯 (Yuval-Davis, 1997) 評論道，「女性爭取生育的權利，自運動初始就位居女性主義抗爭的核心」(1997: 22)。墮胎和避孕的權

利，還有生育的權利，都是女性主義施壓的核心領域。本世紀裡這些權利的存在，有顯著的地理變異，這跟不同國家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有組織的宗教勢力息息相關。人口政策往往是國家強加其國族定義的關鍵方法。尤弗一戴維斯寫道：

這些政策的主要向度，通常是或多或少關切國族的「基因庫」。專注於系譜和起源的國族主義計畫，是主要的國族集體組織原則，傾向於比其他國族主義計畫更為排外。一個人唯有生為某個集體的人，才能夠成為該集體的完整成員。控制婚姻、生產，以及性慾特質，可能因而成為國族主義高舉的議程。當「種族」的建構加入共同基因庫的觀念中，對於異族通婚的恐懼，遂成為國族主義論述的核心（1997: 22-3）。

納粹德國的人口政策和婚姻禁令（Koontz, 1986），以及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是這方面最惡名昭彰的例子，但還有其他事例。這些例子包括宗教規定和禁令（例如，猶太認同必須傳自母親），以及決定公民資格的規定。在當代英國，所謂的父系規則，意味著對移入者而言，完整的公民資格僅限於那些有英國祖父的人。尤弗一戴維斯（Yuval-Davis, 1997: 27）引用一則 1970 年代的案例，一名迦納（Ghanaian）男人，基於他非洲祖母合法嫁給他英國祖父的理由，請求英國公民資格。他的案子遭法官駁回，法官主張在那段有爭議的時期，沒有英國男人能合法跟非洲女人結婚（WING, 1985）。在其他例子裡，控制乃是基於想要限制人口成長率。共產主義革命以來，中國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是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然而，在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裡，政府則想提高出生率以增加人口，母職備受尊崇，並獎勵擁有大家庭的母親。在前蘇聯，有十個小孩的女人被稱為「女傑母親」

(heroine mothers)。二次大戰後的法國和今日的以色列，運用兒童津貼和寬厚的產假，鼓勵婦女生育更大的家庭 (Abdo and Yuval-Davis, 1995; Ehrlich, 1987)。

另一種增加人口的方法是引進移民 (DeLepervanche, 1989)，但是在這些所謂的移居社會裡，也許有或隱或顯的出身良好與否的階層制度，影響了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女性地位。二次大戰後的「白澳」政策，就是個例子，即使現在已經廢止這項政策，依舊存在著某種隱含的族裔階層 (Stasiulis and Yuval-Davis, 1995)，以色列的例子也是如此。在英國，通常由右翼政客 (余契爾和包威爾 [Enoch Powell]) 提出的，結合洪水和沼澤的修辭意象，屢次對少數族裔群體出生率表達的恐懼，乃是出身、出生率和國族特性的關聯，導致或多或少符合資格的群體的階層制的其他事例。

支持與反對國家

女性主義學者對於福利國家的角色和女性地位，長期以來抱持著矛盾心理。早期研究 (例見 Wilson, 1977) 傾向於強調國家福利政策的壓迫角色，不僅是因為我前文概述過的方式，也由於各種其他政策的效果。這些政策奠基於女人依賴男人的假設，而她們的關鍵角色就是擔任妻子和母親。1940年代英國由貝佛瑞基 (William Beveridge) 引介的戰後福利服務背後的假設，被廣為徵引，做為這種論點的證據。例如，奠定戰後福利國家基礎的1944年白皮書 (White Paper) 主張，已婚婦女的任務是重建家庭生活，而非進入勞動市場。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女性主義者針對福利國家和性別不

平等的關係，已經發展出更複雜的理解，針對國家對於某些女人群體（尤其是單親媽媽）的必要（儘管水準不足）支持，以及福利國家機構做為女性雇主的重要性，都已經有所研究（Fraser, 1997b; Pateman, 1989）。隨著 1980 年代早期承諾「撤回國家」的美國和英國右翼政府出現，福利政策日漸遭受抨擊。此時，女性主義分析者發展並捍衛這種新論點，主張為女人服務的福利政策對於達致更大程度的女男平等深具意義，就變得很重要了。

1980 年代以前，認為女人的關鍵角色位居家庭的想法，仍然是工業國家福利政策的基礎。它奠基於所謂的舊「性別秩序」上（McDowell, 1991a; Fraser, 1994），但是這個秩序在過去二十年裡開始崩潰。我在第四章提到，許多國家裡為數日增的婦女進入了支薪工作的社會關係，改變了女性在家裡的地位，並挑戰了舊有的父權觀念。除了這種大規模的城鄉遷移，以及前往「西方」國家的移民，還有種族歧視態度和行為的崛起，以及較富裕者對（因民主黨人當選美國總統，以及英國工黨執政而徹底改變的）重分配政策漸增的敵意。很顯然的，福利制度背後的社會預設，不僅遭到了挑戰，還在某些情況下被掃除了。

傅瑞澤認為，舊性別秩序奠基於家庭薪資系統的理想（男性生計負擔者可以用受薪勞動所得扶養家屬），這種系統深植於大部分工業時代福利國家的結構中。這些福利國家有

三個層次，社會保險方案位於第一層。目的在於使人民免於勞動市場的變化無常（並保護經濟免於需求不足），在生計負擔者患病、失能、失業或晚年等情況下，由這些計畫取代其薪資。許多國家還以提供全職持家和育兒的女性直接支助的第二層方案為特色。第三層方案涵蓋了「殘餘」部分。大部分是傳統貧窮救濟的殘留物，這種公共援助方案提供窮人微薄、污名化、經過家境調

查的援助，因為他們不符合家庭薪資的情況，因此沒有要求體面支助的權利 (Fraser, 1997b: 41-2)。

然而，在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隨著性別關係和家庭結構的轉變，家庭薪資系統的性質無可逆轉地改變了。非正式、臨時和兼職工作，不能提供過去工業的男性工作的那種家庭支持基礎。同時，女性在勞動市場和家庭中的地位改變了 (McDowell, 1991a)。家庭和家戶也日益多樣化 (Stacey, 1990)。

基於這一切理由，傅瑞澤堅稱女性主義者應該致力於「福利國家的系統性重建思考」(1997b: 42)。她要求女性主義者努力思索，主張性別平等原則應該支持不同國族國家以不同方式形成的後工業性別秩序，並且思考可能維持更大平等的各種福利機構。幸好，對我們來說，她也持續解構針對這種要求的兩個現行的女性主義回應，並代之以第三種選擇，雖然在我看來（我緊接著就會說明），這是極度樂觀，但是很重要的未來願景。

傅瑞澤提議，目前為止，在當代的社會民主體制裡，廣義可被視為女性主義的文獻和實作當中，可能區分出兩種論及未來福利供應前景的觀點。她分別稱為**普遍生計負擔者** (universal breadwinner) 模型，以及**照顧者等價** (caregiver parity) 模型。傅瑞澤認為，第一個願景隱含在大多數美國女性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當前政治實踐中，而且我要補充，這也是支撐 1997 年當選的英國工黨政府早期聲明的觀點。這個模型是透過女性就業和由就業推動的福利政策（例如日間托兒），來促進性別平等。另一方面，第二種模型則在英國以外的西歐國家較為明顯。透過政策來確認非正式照護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與薪資勞動具有同等價值，來致力提高婦女地位，達致性別平等。主要的政策手段是提

供照顧者經濟津貼。這兩種模型對應了我前面概述的平等 / 差異的區別。

這兩種模型各有其擁護者，但其意涵和成本都很龐大。由於薪資上的性別不平等依然很明顯，普遍生計負擔者模型難以實現，而替個別女人的勞動來建立替代性的照顧服務，費用十分龐大。同樣的，除非照護工作的性別分派遭受挑戰，否則這還是個女性的「聚集區」，而且很難建立對等的尊重，這會損害照顧者等價模型。傅瑞澤的回應是提出她稱為**普遍照顧者**（universal caregiver）模型的折衷辦法或第三種選擇。這個模型結合了其他兩種模型的最佳特點，鼓勵男女在他們生涯裡的不同時刻，擔負主要照護工作。目的是要「使男人變得更像現在的大多數女人」（Fraser, 1997b: 60）。藉由「促使女人當前的生命模式成為每個人的規範」（p. 61）的措施，以便造就更高程度的性別平等。這些措施包括了比目前全職工作時間來得短的工作週；就業支持服務不僅由家庭提供，還由國家和志願機構來供應，以便激勵不僅是要扶養家屬的男人，而是所有男人都去工作。

192

政策目標是要消除受薪工作和照顧工作的性別編碼。傅瑞澤認識到，這會導向「顛覆既有的性別分工，降低以性別做為社會組織結構原則的強度。在極端情況，它意味著解構性別」（p. 61）。有趣的是，我們看見這裡的論點很類似通常比較關切文化政策和身體政治、而非福利國家的女性主義者的觀點。

很明顯的，傅瑞澤的目標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中猶如烏托邦。要達到這些目標，不僅需要大規模的社會經濟再結構，要對許多在全球經濟體裡運作的私人公司有更大的政治控制，還需要新的所得與財產累進稅制，替新的福利服務提供資金。時值二十世紀末的今日，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嘗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並考慮

實施懲罰性的工作福利 (workfare)¹ 方案，以便迫使個人停止仰賴救濟金，進入勞動市場，但這種進步性再結構的前景，看起來根本不可能發生。

不過，傅瑞澤認為，女性主義者必須恢復設想適合後工業性別秩序的性別平等烏托邦願景的能力，這種論點在尤其是後現代時期特有的變換不定思想氣氛中，是極具說服力的主張。這正是她的著作如此具啟發性的原因；它重振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於1960年代末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早期分析中，嘗試奠定的某些根基，當時的政治氣氛似乎滿懷希望。女性主義當然必須繼續與當前其他理論流派有所區別，差別在於它承認朝著比較進步的方向，改變當前個人與社會集體之間關係的渴望。

福利供應與空間變異

儘管支撐戰後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福利改革的家庭薪資系統，就其存在與值得追求的假設而論，有共通之處，但是國族國家之間和之內仍有重大變異，傅瑞澤的雙元福利供應模型已經闡明了這一點。她不是唯一構想福利供應模型的人，拿她的著作跟艾斯賓—安德森 (Gosta Esping-Andersen, 1990) 的研究比較，會很有意思。雖然他的模型並非明白標榜為女性主義取向，但在他所謂的福利體制 (welfare regime) 的區分上，確實表明家庭價值和宗教的重要性。他指出國族國家之間的各種差異，這些差異對國族國家福利政策的發展深具影響。這些差異包括宗教的角色、國家

譯注 1：workfare 是指領取福利救濟者必須接受公共服務工作或參加職業訓練。

中央集權的規模和程度、中產階級的規模、勞工組織力量的大小，以及諸如教會等社會保守機構的角色。

艾斯賓—安德森指出三種體制。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仰賴嚴格的資格審查，發給低收入戶主要是經過家境調查的救濟金，同時鼓勵由市場供應。在這裡，福利只是安全網而已。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以及英國逐漸地也屬於這個範疇。第二種是「更新的統合主義—國家主義體制」(updated corporatist-statist regime)，由國家供應來補貼家庭資源。在這裡，女人明顯被界定為受撫養的眷屬，藉由提供某些家庭津貼來鼓勵她們成為母親，但不常提供日間托兒。這個模型常見於宗教禮儀仍然很重要的地方，包括奧地利、法國和義大利。第三種體制是「社會民主主義」模型，普遍供應高品質服務。目標是要將養育兒童的費用社會化，並且顧及個人依賴。在這裡，福利和工作的區別融合在一起，並鼓勵女人工作。事實上，這個模型仰賴充分就業，以便支應福利供應的龐大費用。瑞典是 1970 年代最接近這個模型的國家，但是 1970 年代以後，瑞典就退出了對於普遍、非市場供應的完全承諾。

雖然這三種體制並不完全吻合傅瑞澤的三元模型——部分因為她的第三種選擇仍然是未來的樂觀提議——但艾斯賓—安德森的第二種體制，具有照顧者等價模型的某些特徵，而他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很類似普遍生計負擔者的典型。這三種體制也跟沃爾碧的私人與公共父權體制的區分，有饒富趣味的相似之處，例如，照顧者模型強調家庭照護的持續重要性。

然而，目前為止，地理學者的研究重點，傾向於探討國家內部區域或地方層次更細緻的空間變異，而不是關注國族國家之間的差異。設施的區位，以及相對於各聚集區的可及性

(accessibility) 問題，是很多研究的焦點，並且發展出結合地理距離和社會距離的可及性精密衡量方法。例如，勞斯 (Glenda Laws) 針對美國供給老人的國家福利服務的有趣研究中，考察了年齡、性別關係和空間流動之間的關聯，指出國家政策如何將限制人民移動的規定予以制度化。她指出：

不同於其他社會隔離形式，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基於年齡的隔離是被正式（按照法規）承認並強制實施的。滿一定年齡的兒童方可就學。達到國家法定年齡的年輕人，才能進入酒吧和酒館空間。駕駛執照同樣要求持有者達到法定最低年齡。進入某種住宅的標準乃是基於年齡。因此，儘管我們譴責基於各種特徵的歧視，但是基於年齡的歧視，卻依然受到國家認可的法規保護，而這些法規既是對待不同年齡者的社會態度的原因，也是其結果。這些法規限制個人可以去的地方，在駕駛執照方面，則限制了個人可以抵達這些地方的方式 (Laws, 1997: 47)。

然而，這些限制往往是為了保護受到限制的個人，也是為了保護廣大的社群，認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勞斯拆解了性別化身體、年齡和身體外貌、受限的物理移動能力和退化的視力、性別和收入，如何與基於「公民」和「正常」家庭生活之特殊觀點的福利政策彼此交錯，從而造成了整個生命歷程的性別化空間移動模式。瑪西 (Doreen Massey, 1998) 也透過一則感人的個案研究，探討日益增加的空間限制，如何影響她住在曼徹斯特郊區年邁雙親的日常生活，而發展了類似論點。

想像的共同體與性別化的國族意象

本章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探討過各種國家機構，如何以歧視女性的方式，既建構且利用了性別區分的具體方法。現在，我

要轉而簡短地討論，國族國家本身如何在它的再現和象徵上，通常被呈現為男性氣概或女性氣質的性別化體現形象。因此，這一節的重點從國家的具體實踐及其男女差別待遇，轉移到性別化的語言、意象和人工製品，如何被用來建構特殊的國族主義和國族認同。當然，這種區隔並不像我在這裡呈現的那麼清晰明確。我們已經知道，譬如說，女性氣質和國族特性的概念，如何影響了對待移工的方式。

195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於對地理學術研究產生重大衝擊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1983年初版）中，主張現代國族國家是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它之所以是想像的，乃因為即使最小國族裡的成員，也不會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與他們相遇，或甚至聽聞他們，但每個人心裡都有他們同體一致的想像」（1991: 6）。拜科技變遷之賜，尤其印刷文字的發達，使大多數人口得以消費建構這種想像國族（*imagined nationhood*）的文本和地圖，使這種同體一致成為可能。據安德森所述，所有國族都是**有限的**，具備有限但彈性的邊界（即使力主擴張主義的國家，在渴望主宰世界以前，都會躊躇不前）；**擁有主權**（這個概念本身是源於破除君權神授觀的啓蒙運動和革命時代觀念之一）；而且是個**共同體**，因為「儘管或許在各國族裡普遍存在著真實的不平等，國族總被認為具有深厚、平等的同胞情誼」（p. 7）。因此，簡言之，國族是個文化人工製品，由地圖、旗幟、建築物、紀念碑、共同習俗、運動，以及政治修辭建構而成，以便將公民納入共同的計畫。

雖然安德森揭露了想像的共同體如何建構和維繫的諸多面向，使其得以要求人民做出最大犧牲，但他的分析忽略了性別的重要性。平等的同胞情誼，這個措詞雖然在理論上是性別中立

的，但帶有男性團結一致的涵義。雖然我想補救安德森將性別意象和社會關係排除在外的缺失，但重要的是強調基於階級和種族的差別化想像與語言，也是國族認同之社會建構的一環，和性別化的象徵結構一樣，它們發揮了包容某些群體，並排除其他群體的作用。因此，如同針對殖民和後殖民國家的許多傑出分析顯示（Bhabha, 1990, 1994; Said, 1978; Spivak, 1987, 1988; R. Young, 1995），再現和想像國族的方式流動不居，而且會在不同歷史環境下塑造和重塑。

我在這裡要考察兩個例子：首先，援用華特（Bronwen Walter, 1995）、納許（Catherine Nash, 1993）和強森（Nuala Johnson, 1995）的研究，檢視住在愛爾蘭和英國本土的愛爾蘭女人的國族特性和國族主義。其次，透過瑞德克里夫與衛斯特伍德（Sarah Radcliffe and Sallie Westwood, 1996）的研究，比較簡略地查看當代拉丁美洲的國族認同。

關於英國族群特性和認同的研究，往往忽略了遷徙到英國的白種移民。我們稍早提過，吉洛伊（Gilroy, 1987）聲稱「英國國旗沒有黑色」。但英國特性的社會建構，是「以男性、中產階級、倫敦周圍各郡、英國國教徒，以及白人為特徵」（Walter, 1995: 35），同時。種族化並排除了其他「他者」，包括在英國的愛爾蘭人。此外，一如華特的討論，性別經驗會與國族特性交錯，因此不僅「愛爾蘭特性和英國特性的再現是高度性別化的建構，而且在愛爾蘭社群裡身為男人或女人，或是在英國社會裡身為愛爾蘭女人或愛爾蘭男人的物質經驗，都截然不同」（p. 35）。地方在族群認同的建構，以及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的物質差異上，都舉足輕重。族群特性並非不變的社會特性，而是流動且取

決於脈絡的。如霍爾（Stuart Hall）指出的，「族群認同遠非永恆固定於某個本質化的過往，而是受到歷史、文化和權力持續不斷的『操弄』」（plan）（1990: 225）。許多愛爾蘭人在英國是「隱形的」，因為我們很難從人口普查的官方統計數據評估愛爾蘭人的人數，而且因為他們是白種人，這意味人們無法立即辨別出他們與大多數英國人的不同。英國的愛爾蘭人普遍被認為是與恐怖行動有關的「可疑份子」，使得許多愛爾蘭裔很謹慎而不引人注目，於是增強了這種隱形特質。

愛爾蘭認同和宗教錯綜複雜地聯繫在一起，透過頌揚共享的過去與未來的神話、故事、詩歌和事件，建構並維繫了兩種宗教信仰的族群特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男性氣概在這兩種宗教信仰裡，由於跟戰爭和死亡有關，成為國族認同建構不可或缺的部份。女性很少以個人面目現身：戰爭紀念碑上的雕像和姓名幾乎都是男性的。當然，女人在國族主義論述中並未缺席，但是

僅限於隱喻世界，而非積極參與，〔並受限於〕確認她們的無能為力的再現形式。家庭的譬喻在國族敘事的描繪上很普遍——家鄉、母國、祖國、國族兒女。這種意象使得表面上的利益共同體內部的社會階層被自然化，以致社會階層的性別化形構毋庸置疑（Walter, 1995: 37）。

如我們先前所見，女性與家庭及家的關聯的自然化，在小尺度的個別家庭和都市土地使用規劃上也很明顯。愛爾蘭國族在象徵上再現為女性，尤其強烈：身為保護和受難人物的「愛爾蘭母親」，是回應英國帝國主義的有力形象。然而，女性人物的公共再現，卻經常被視為違法越界，或具高度顛覆性（Loftus, 1990）。我們也曾提過，女人和街道的關聯往往被解讀為不道德。

強森 (Nuala Johnson, 1995) 在針對當代愛爾蘭的雕像和紀念館的有趣探究中，得到了這個結論。她調查發現，神話與虛構的女性人物，數量上超過「真實的」政治和文化人物。例如，都柏林 (Dublin) 建了一座喬依思 (James Joyce) 《芬尼根守靈夜》 (*Finnegan's Wake*) 裡女性角色普魯若貝拉 (Anne Livia Plurabella) 的雕像，藉以象徵這座城市及其河流。強森如此解說雕像的揭幕式：「雕像揭幕後，歷經一連串重新命名——『佳骨肌浴缸裡的放蕩女子』、『陰溝裡的妓女』、『汗水坑裡的女僕』——這可以說是都柏林人貶抑紀念物本身的高尚藝術矯飾，降低雕像威望的策略」(1995: 57)；強森引述史密斯 (A. D. Smith, 1991: 11) 的話，認為這也是揭露「後殖民脈絡中，『自奴隸轉變為主人的男性角色移轉』」策略。普魯若貝拉的女性形象，「喚起公共空間裡的女性是妓女、妖婦、汙染源的性別編碼刻板印象，她在城市水域裡沐浴，〔她被〕縮尺到幾乎是厭食症般的比例」(Johnson, 1995: 58)。而且，強森 (跟華特一樣) 強調，

雖然做為母國，以及家與家庭私領域保護者的女性寓意形象，在國族主義論述中頗受歡迎。但是在城市裡，女人在公共空間中的角色，一如普魯若貝拉的重新命名所示，侷限於在通常由男性佔據的街道上閒逛的妓女，或是勾引男人的女人 (p. 58)。

因此，女性雕像是 (前幾章出現的) 性別二元對立的具體再現 (圖 7.1)。

納許 (Catherine Nash, 1993) 在她的愛爾蘭國族主義研究中，經由探討愛爾蘭藝術家普蘭德蓋斯特 (Kathy Prendergast) 的作品，將目前為止本書出現過的主題串連在一起。仔細檢視了普蘭德蓋斯特的畫作，納許指出藝術家如何創作映繪於女性身體



圖 7.1 倫敦廣門維納斯 (Broadgate Venus)：女性陰柔、半裸的黑人。她意味了帝國或奴隸？

的國族主義意象，避免某些女性主義作品中，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自然和有機直覺聯繫的本質主義。並避免存在於某些討論認同、地方和地景的後殖民研究中，關於土著或種族接近自然的假設。

愛爾蘭的種族認同研究中，對抗殖民和帝國權力是持續不歇的主題。當然，對於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後殖民國家來說，這是個統一的主題。也有許多精采的研究，討論了許多新興國族的藝術、文本和地景中的認同再現。瑞德克里夫與衛斯特伍德 (Sarah Radcliffe and Sallie Westwood, 1994, 1996) 已經開始拆解拉丁美洲創造國族的悠久複雜歷史，以及這種歷史在不同國族國家中的獨特性。她們認為，「由於〔它們〕早期的殖民化和早期獨立，拉丁美洲國家具有悠久的後殖民歷史和國族創建計畫，這在時機

和脈絡上，標誌出相對於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差別」(1996: 10)。透過征服、殖民主義和契約勞動，時值十九和二十世紀各個拉丁美洲國家出現獨立運動，必須將複雜的各色人種鍛造成單一國族，成爲一個**民族** (el pueblo)。

在這些運動中，安德森所謂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佔有一席之地，但在後來的運動中，身兼官方宣傳管道的通俗媒體(電影、無線電臺和後來的電視)，也具有同等地位。國旗和其他國族象徵，納入了女人的形象、特定性別的國族服飾、國族曆書、節日和嘉年華會，都是強有力的國族形象。而且瑞德克里夫與衛斯特伍德在她們的研究中指出，「強有力的國族論述，以高度性別化的方式將男女與國族聯繫起來，同時又由於複雜的性關係而碎裂」(1996: 134)。

199

最近新興國族的最重要象徵，就是貨幣——新政權的錢幣和紙鈔——在這方面，女性形體的寓言是國族再現的常見意象(Hewitt, 1994)。女性傾向於以象徵和寓言，或是比較寫實的肖像，出現在鈔票和硬幣上。在這些象徵裡，美麗和德性、自由、正義和富饒是常見的形象。女性氣質要不是代表了文化或公平正義——不屑於凡人致力之世俗抗爭的女性氣質——就是與自然、生殖力和富饒有關。前殖民地發行的紙幣，往往在相同形象中發現文化/自然之分。未穿衣物的「土著」女性，在她們穿著衣服、「文明化的」西方姊妹旁邊現身。譬如說，這正是法國殖民地紙幣上常見的形象。「皮膚黝黑的原住民少女」聯繫上熱帶水果、蒼翠茂盛的植物。而且，如果有穿衣服的話，異國風情服飾則是殖民或東方「他者特性」(otherness)的典型再現，同時激起了帝國剝削的慾望與焦慮或內疚(Said, 1978; Spivak, 1987)。

這些女性再現或寓言（無論是旗幟或鈔票上的塑像、帶狀裝飾、臉孔或人物）的一項反諷，就是女性的象徵形象。通常與那些社會在特定時期裡的女性地位少有關聯，或者根本沒有關係。華納（Marina Warner）在她針對女性做為**紀念碑與少女**的歷史分析中提到：

正義之所以被當成女人來談論，或是在中世紀的道德規範下，像個女人般說話，或是以高姿態現身於紐約市政府或倫敦中央刑事法庭上，並不是因為女人被認定是正義的，這不比認為女人有能力執行正義還要多。從紐約的巨像，到無處不在的法國共和人物瑪麗安（Marianne），自由之所以再現為女人，並不是因為女性從古至今都是自由的。在十九世紀，有眾多這類形象被創造且廣為流傳之際，很顯然相反的情形才是實況……要認識到由理想寓言人物棲居的象徵秩序，與法官、政治家、軍人、哲學家、發明家的實際秩序之間有所差距，通常取決於女性不太可能實踐她們所代表的概念（1985: xix-xx, 強調為筆者所加）。

但是誠如華納（Warner, 1985）、納許（Nash, 1993）和羅斯（G. Rose, 1993）曾引證說明，我也在第一章探討過的，

身體仍然是我們標示意義的地圖；它是我們用來照見並呈現自我的各種隱喻中最主要的一個。在充斥各種意象的當代，從新聞攝影到廣告、愛好者雜誌（fanzine）到色情書刊裡，女性身體出現得比任何其他意象還要頻繁；男人通常以他們自己、身為個體的模樣出現，但女人卻被用來表明某人或其他東西的身分與價值（Warner, 1985: 331）。

如我們所見，「其他東西」往往是企盼許久，奮力爭取的國族認同感。

結論

在這一章，我們前進到一個不同的地方尺度——國族國家——在國族國家的實踐，及其再現和象徵認同這兩方面，檢視了性別與國族特性的某些關係。除了考察性別意識形態和象徵，如何成為國族特性和國族主義社會建構的一環，也審視了身為個人和社會集體成員的男女，遭受差別待遇的方式。本章也引用了各種社會理論，從政治理論到社會與文化理論，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到後現代正義理論。相較於先前的數十年，近年來由於人文地理學、經濟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使得地理學變得更「有理論意識」。這裡的關係不全是單向的。我們學科裡的關鍵概念——空間與地方，連結與距離，遷徙與全球化——已經成為其他社會科學的重要概念，以及研究和理論化的焦點。

跟前面各章一樣，本章的核心連結主題，再度是二分法觀念及其拆解：男女、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個人與象徵、不具形體與女性身體之間，公共與私人之間，以及男人與這些二元詞語組的前項屬性的對應關聯。我在這裡說明這些二分法如何被自然化並影響了政治理想與國族國家，並且闡明了二分法的自然化如何遭致破除，以及後來由於承認性別的社會建構，男女、女女、男男之間社會關係的複雜和多樣性，而質疑了二分法。

我認為本章的長度顯示了，國族國家是個迷人的地理學研究場域。到了二十世紀末，國族國家這個現代的關鍵社會形構，遭受到次國家和超國家層次上，以複雜方式順利運作並相互關聯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勢力挑戰。這對性別關係造成了複雜多樣的影響。有太多事例顯示，國族國家的分裂，以及重構為新的國族，

對於女性造成了負向衝擊，因為這些新國家所建構的國族敘事，傾向於驟然回歸昔日（或許是神話的）強化男性支配傳統的年代。在這些趨勢同時受到國家和宗教所鞏固的國度裡，女性的地位尤其岌岌可危。不過，我們在這方面很難一概而論，概推到超國族層次的趨勢。在歐洲，擴大歐盟並逐漸引進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社會憲章的方案，似乎有可能提昇女性的公民權，並且增進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裡，透過選舉權運動而達致的形式平等。然而，在世界上太多地方，仍然拒絕賦予女人實際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情況下，要擴大女性和男性的公民權利和基本權利，似乎仍有必要持續不斷抗爭。

201

延伸閱讀

在建構和解釋女性主義的國家分析方面，尤弗一戴維斯（Nira Yuval-Davis）是個關鍵人物。她的著作包括與安錫亞斯（Floya Anthias）合編的書《女性—國族—國家》（*Women-Nation-State*, 1989），以及晚近的著作《性別與國族》（*Gender and Nation*, 1997）。依我之見，費利浦（Anne Phillips）的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分析，就其清楚明晰而論，可謂卓越超群。她編輯的《女性主義與平等》（*Feminism and Equality*, 1987）論文集的導言，針對女性主義內部的權利辯論，提出非常清楚的概述。導言之後是由某些著名女性主義學者撰寫的有趣短篇論文，包括佩特曼（Carole Pateman）。她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值得更仔細探究。可以嘗試讀一讀她編的文選《女性的混亂》（*The Disorder of Women*, 1989），以及比較複雜但迷人的《性契約》（*The Sexual Contract*, 1988）。費利浦也合編了一本有趣的論文集《撼動理論》

(*Destabilizing Theory*, Barrett and Phillips, 1992)，不僅收錄女性主義政治理論的論文，也論及了女同性戀認同、權力與身體，以及女性主義繪畫。

楊恩 (Iris Marion Young) 的《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是透過社會正義之後現代界定的意涵來思考的重要書籍，傅瑞澤 (Nancy Fraser) 的新書《正義中止：「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反思》(*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1997)，則提出了回應和替代觀點。愛森斯坦 (Zillah Eisenstein) 在《性別的膚色》(*The Colour of Gender*, 1994) 裡指出，如何理解普遍民主權利的措詞，並加以重新概念化以包括有色人種婦女。這些書都值得一讀。

如果你對拉丁美洲有興趣，可以參見我在本章引用過的，瑞德克里夫與衛斯特伍德 (Sarah Radcliffe and Sallie Westwood, 1996) 的書，以及瑞德克里夫 (Sarah Radcliffe, 1996) 探討厄瓜多爾的論文。夏普 (Jo Sharp) 在《身體空間》(*BodySpace*, Duncan, 1996b) 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以東歐事例來闡明的，有關國族主義之性別論點的有用概述。我在第三章提過麥可林托克 (Anne McClintock) 的《帝國皮革》(*Imperial Leather*, 1994)，在這裡也相關，因為她討論了殖民和後殖民社會的國族認同問題。雅各絲 (Jane Jacobs) 的《帝國邊緣》(*Edge of Empire*, 1995) 是個傑出研究，討論殖民與帝國意識形態如何影響都會中心 (即倫敦) 營造環境的建構和意義。《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第二期刊載了與國族認同及空間利用相關的有趣論文，《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 no. 44, 1993) 的特

刊「國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收錄了本章提到的納許論文，還有其他優秀文章。有個值得關注的探討愛爾蘭的女性主義文獻。除了本章提到的論文，還可以查看納許的男性氣概歷史分析（1996a），以及道勒（Loraine Dowler, 1998）關於北愛爾蘭抗爭中女性的研究。有一些女性主義的戰爭分析：參見英羅（Cynthia Enloe, 1983, 1993）、艾倫瑞曲（Barbara Ehrenreich, 1997）、艾爾須坦（Jean Elshtain, 1987）與梅耶爾（Tamar Mayer, 1994）的書。至於以女性主義觀點來教授地緣政治的更多想法，參見納斯特（Heidi Nast, 1998）對異性戀和地緣政治之間關聯的最近討論。最後，本章提到的某些文章，可以在《空間、性別、知識》（*Space, Gender, Knowledge*, McDowell and Sharp, 1997）裡找到。

8 移置

DISPLACEMENTS

導言

203

在這倒數第二章，也是實質的最後一章裡，我要轉向移動和旅行的特殊考察。雖然前幾章已經提過國族內部和國族之間遷徙的含意，以及後殖民和後帝國移動的崛起，但是旅行尚未成爲關鍵重點。然而，許多評論家指出，在許多近來受到後現代觀念影響的書寫中，旅行是一個關鍵詞和隱喻（例見 Clifford, 1997 與 Kaplan, 1996）。旅行與遷移，不同地方之間地理移動的意義，當然是我們學科打從一開始的重要部分。地理學家從事了各種專門研究，分析各種遷移理由，包括勸服或迫使人們往返不同地方的「推」與「拉」因素，還探討了移民與「接納」人群受到的衝擊。尤其是移民對內城地區造成影響的研究，已經有悠久的都市地理學傳統。

雖然遷移的原因和後果，以及遷移對接納和輸出社群的衝擊，已經有相對完善的記載，但直到最近爲止，對旅程本身的關注卻非常稀少。旅行者、吉普賽人和遊牧者的研究或許是例外，但這方面的地理文獻也很少（Sibley, 1981）。此外，旅行、遷徙與移動，往往被當成特殊且暫時的現象（尤其是相對於定居者而言）來分析。但在二十世紀末，世界上許多地方——例如，盧安達（Rwanda）與蒲隆地（Burundi），波士尼亞—赫佐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和塞爾維亞（Serbia）——比起固定不變的生活方式，居無定所的情況、不穩定和被迫遷移，似乎已經成爲生活中比較「正常」的部分。

204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誇大千禧年末移動規模的新穎經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數百萬人離開東歐和西歐到北美定居；

在兩次大戰期間與戰後的年代，大屠殺的悲劇，讓我們見到成千上萬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被強制載送赴死，以及移居歐洲其他地方、北美和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悲劇使數百萬黑人流離失所，重新定居於所謂的南非家邦（Homelands），幾百萬男人暫時或永久地移居到單性採礦營房和都市旅舍。

有關全球化和全世界人民的移動（無論是為了遊樂，或是對饑荒、疾病、戰爭和迫害的反應——或是為了回應至少在地球上，有待探索的邊疆已經快消失殆盡的感受），最有趣的學術影響之一，是社會科學針對遊歷、旅行及長期或多元移動連鎖的新分析焦點的發展。人類學家克里福特（James Clifford）指出，在他的學科裡，選擇傳統田野（通常是鄉村），研究「未受影響」或「原始」文化的想法，已經遭到了質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二十世紀相互連結和文化聯繫的步調所顛覆，但他也認為，某些早期人類學家低估了移動的重要性。克里福特以一個生動的意象（令人聯想到我用來展開本書的歐莒〔Augé〕的論點），提議人類學家應該重新想像傳統田野。他們應該思索，「傳統鄉村猶如一個轉機的候機室。很難替後現代性，流動、無根歷史的新世界，想像出更為適切的圖像了」（1997: 1）。不過，他也提出告誡，「別這麼快」……因為這全都不是新鮮事。這是過於習慣在他們自己的世界以外，看見「傳統」和「穩定」，以他們指稱為傳統的社會，來對應假定的現代性步調的西方人類學家的反思。

克里福特針對大力宣傳當代全球變遷的新穎特性而發的警語，也引起其他人共鳴，他們質疑當前的全球化跟先前時期有重大區別的程度（例見 Hirst and Thompson, 1996，這是一本由政治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合寫的書）。甚至，旅行和移動的新焦點，

或許反映的不僅是物質變遷，也映照了學術或學科危機。因此，有人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觀念及其相關概念（例如，克里歐化〔creolization〕、混種化〔hybridization〕、傳譯〔translation〕：將於本章稍後更仔細探討的概念），或許比較是理論家處境和理論情勢的反映，而非其他東西。例如，在那些自視為寰宇主義者，卻將異己、被分類者界定為克里歐人（creoles）¹的西方理論家，即分類者的類別化過程中，有很明顯的西方偏見。傅萊德曼（Jonathan Friedman, 1997）是和克里福特一樣的人類學家，他把學科裡的變遷和學科從事者的慾望連結起來。

就某種意義而言，全球文化是人類學調查研究的新對象。在邁向全球體系過程研究的更普遍趨勢裡，對文化專家（人類學家）而言，這至少是個占取利基的方式。如果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各保持其世界體系，人類學家也能擁有自己的文化世界體系（Cultural world system or world system of culture）（Friedman, 1997: 270）。

我很好奇，地理學和地理學家是否會構築相同的論點？當然，對某些地理學家而言，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主形式的日漸滲透，增強了世界體系取向的控制。然而，移動和全球化的新焦點，卻對地理學理論化造成更有趣的衝擊。如我們於前文章節所見，瑪西（Doreen Massey）認為二十世紀晚期的地域是「全球的」（參見 Massey, 1991，Massey and Allen, 1984 的序論，以及 Massey and Jess, 1995 的第一章），這個有力論點，已經向地理學家指出一條結合地方與全球的途徑，以便重申地方的重要性。

譯註 1：creole 指在美洲出生的歐洲裔白人（法國人或西班牙人），或是白人與當地人的混血兒。

1980年代初期以來，學界強調不同尺度間的相互關係，會產生地方的特殊性，這種觀點在重新制定地理學術研究的方向上，極具影響力。或許有人主張，人類學的學術研究也採行了類似路徑，如傅萊德曼承認：

全球化非關文化的流動或移動。文化不會移動。它不是個實體。反之，我們必須探查全球社會過程與社會再生產實踐的關係，以及世界的認同/再現，使意義歸屬於遍布全球場域之特殊社會脈絡的過程（1997: 270）。

我相信，強調相互連結意味了身為地理學家的我們，必須重新思索我們的某些傳統焦點和偏重，轉而以新方法來研究置身移轉過程的人群，他們擁有不固定、不穩定的認同，並處於變遷過程。對習於挑戰僵固性，以及何謂女人的本質主義、不變觀念的女性主義者來說，這是個企盼已久且受歡迎的變化。女性主義學者所做的某些最有趣的新研究，正是著手分析流動和流動性，探討成為女人而非身為女人的方式，以及認同的塑造和重塑。

206

這也提供了大好機會，以便揭露非比尋常而非習以為常的事物，並且顯現「違規」且跨出地方的女人的歷史重要性。女性主義史學家現在揭顯了許許多多「平凡」與非凡女性的重要性，她們是對女性主義史學家而言的「外國土地」上的旅者和探險家，但卻未被納入歷史和地理的書寫，包括了跟男人一同旅行的女人（妻子與伴侶），以及獨自旅行的女人，像是難民與觀光客、薪資勞工、探險家或朝聖者。事實上，克里福特最近就指出，「女性有自己的勞動遷移、朝聖、移居、探險、旅遊，甚至軍旅的歷史——與男性的歷史相關，但有所區別」（1997: 6）。在檢視這方面的研究以前，我首先要探討，把焦點放在旅行上，對地理學的理論化有什麼意涵。

旅行理論

旅行，甚至旅行的想法，質疑「西方」、西方社會理論及制度實踐中，在組織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家與女性的空間關聯。由於向來認為女人的地方理所當然是在家裡，女人移動的歷史便遭致忽略。多摩須（Domosh）指出，地理探險的英雄歷史，以及這門學科的歷史和哲學，都將女性排除在外（參見 Domosh, 1991a, 1991b 和 Stoddart, 1991 的抨擊性回應，以及李文史東〔Livingstone〕的《地理學傳統》〔*Geographical Tradition*, 1992〕，把女人排除在地理學史之外）。雖然現在廣泛接受許多女人是旅行者的事實（我將於後文進一步討論），但根據文化評論家沃爾夫（Janet Wolff）所言，當代社會理論近來對旅行語彙的強調，有繼續賦予男性經驗特權的效果。

沃爾夫在一篇發人深省的論文中，勾勒出當前文化評論裡的流行隱喻——「遊牧批評、旅行理論、觀光客評論家（或評論家觀光客）、地圖、廣告牌、旅館和汽車旅館」——指出：

這些隱喻是性別化的，但絕大部份未曾言明。那就是它們負載了各種性別意涵而進入批判論述，這對於我們在文化研究中如何操作它們別具意義。我的論點是，正如真實旅行的實踐和意識形態，發揮了排除女人或將女人病理化的功能，這類隱喻語彙的運用，必然會產生理論上的男性中心趨勢（1992: 224，強調為原文所加）。

依沃爾夫之見，旅行的語言深具妥協性，以致無法成為重新思索主體性和認同的適當隱喻。

她評估了不同學科，包括人類學、後殖民批評、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研究中，近來理論建構的一些要素，藉此闡明她的論

點。她指出，做為隱喻的旅行，或是旅行理論的觀念，有薩依德 (Edward Said, 1983)、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1991) 及克里福特 (James Clifford, 1988) 等人加以使用。沃爾夫相信這種研究很重要。她認為，「克里福特是近來革新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與概念架構的文化理論家之一，他同時展現和解構了這類研究立基其上的自我與他者的根深柢固意識形態」(Wolff, 1992: 226)。在這類新研究中，理論和主體性都被重新理論化為流動性和暫時性的。雖然沃爾夫承認，「很容易理解為何移動、流動、臨時和過程的觀念，優於靜止和固定等其他觀念」(p. 228)，但是她對於這種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化的關係感到悲觀。她指出，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乃是基於「批判的基本承諾，而這種批判以系統性建構的、真實的性別不平等之存在為前提」(p. 228)。對於旅行和暫時性的陽剛讚頌，卻傾向於否定這些固定結構。

沃爾夫的論點，是針對後現代主義立場的某種說辭，所提出的更廣泛女性主義批判的一環 (參見 Bondi, 1991; Mascia-Lees et al., 1989; McDowell, 1991b; Soper, 1990)，擁抱差異的後現代主義立場，使得提出重新分配權力和資源的普遍政治要求變得更加困難。開普蘭 (Caren Kaplan, 1996) 對於以旅行為隱喻，以及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觀點，也有所保留。有趣的是，她提醒我們，旅行做為一種「開拓心胸」，增長「視野」的活動，跟現代性有悠久的關聯。既然如此，強調的就不是旅行的流動性，以及它對種族中心觀點的挑戰，而是將旅行視為增加旅行者 (通常是白種資產階級西方男性) 文化資本的活動。所以，開普蘭認為她對於旅行和旅行書寫的研究，令她「對據以描述旅行的詞語，深表懷疑」(1996: x)。

我閱讀某些近期的旅行書寫時，發覺我跟開普蘭有同樣的懷疑。除了批判理論中的旅行隱喻研究，旅行書寫也大量增加。某些文本在性質上是「學術的」，但是過去幾年內，增加格外明顯的是主要由男性撰述的通俗寫作（我想到了 Bruce Chatwin, 1979, 1987, 1988、Redmond O'Hanlon, 1996、Paul Theroux, 1979, 1990, 1992，以及 Jonathan Raban, 1980, 1986, 1995），雖然不僅限於男性。這些作者傾向於建構自己成為通俗英雄，奮力、抵抗，並克服困難和誘惑。很顯然的，他們最大的迷戀對象是自己，而不是他們在旅途中遇到的「異己」。這些是焦躁不安且略顯世故的年代裡，男孩自身的冒險故事。

和沃爾夫一樣，我發現除了認定這些是逃避承諾的男人，否認或拒絕在家裡由妻子和母親提供的固定、照護和撫育的「女性」價值的結論以外，很難有任何其他結論。藉由脫逃來抵抗的故事，也忽略了那些保持靜止的人，從事抗爭和獻身變革的可能方式。重要的是要認清，地域主義（localism）不必然意味了狹隘世界觀，遊歷也不見得就意味了廣闊世界觀。我認為，這種假設類似瑪西（Doreen Massey, 1992）提出的更一般性觀點，當時她挑戰了這種想法：由於時間被視為流動且暫時的，從而有將空間和區位理論化為靜滯固定的傾向。

儘管有這些顧慮，但是在我看來，很清楚的是，透過旅行隱喻來重新思索地方和文化概念有許多好處。例如，把重點放在旅行上，讓我們得以撼動單一的歷史觀，最近幾十年來，女性主義者和後現代及後殖民理論家在這方面看法一致。長久以來，支配我們學科的目的論史觀——進步是邁向現代化、西化和都市化的唯一道路——遭到多樣性、旅行和交錯移動等關注的質疑，以及最重要的是遭受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挑戰。

以下是克里福特反省他重新思考文化觀念的努力：

旅行，浮現成為日益複雜的各種經驗：跨越和互動的實踐，擾亂了許多關於文化的共同假設的地域主義。這些假設中，真實的社會存在是（或應該是）以邊界分明的地方為核心……。寓居被設想為是集體生活的地域場所，旅行不過是種補充；根著總優先於路徑。但是，我開始問道，如果將旅行視為複雜且普遍的人類經驗光譜而予以解放，那麼會如何？移置（displacement）的實踐，或許會成為文化意義的構成要素，而不是文化意義的單純移轉或延伸。例如，不能再將歐洲擴張主義的文化影響，當成文明、工業、科學或資本的單純向外散播，而加以頌揚或譴責。因為稱為「歐洲」的區域，不斷受到歐洲邊界以外的影響所重塑和橫越。再說，這種互動過程，在不同程度上，難道跟任何地域、國族或區域都沒有關係？事實上，一個人舉目所見，人類移動和相遇的過程，都是長時間建置而複雜的。文化中心、個別的區域與領土，並不先於接觸而存在，而是透過挪用和規訓人與物不斷遷移的關聯來支撐的（1997: 3，強調為原文所加）。

209

這種將地方視為由連結和移動建構的描述，類似先前瑪西（Doreen Massey, 1991）著名論文裡的論點（重印於兩本最近的讀本，Daniels and Lee, 1996 與 Barnes and Gregory, 1996），提到了地理學家必須如何將「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理論化。因此，或許在持續關注地域性的同時，有必要分析各種空間尺度上的一整套移動，以便了解任何地方的特殊性是如何構成的。克里福特稱這種新的地方概念化為「跨域」（translocal）：在這種地方，「文化」是「地域和全球過程的關係性、非目的論式」的複雜接合。他排斥以前將「混合」——文化適應（一個群體適應另一個群體）或融合（兩個清晰系統重疊的形象）——理

論化的方式。反之，他認為「新典範始於歷史接觸，伴隨著交織了區域、全國和跨國層次的盤根錯節。接觸取向所預設的並非社會文化的整體，隨後彼此產生了關係，而是已經在關係層面上社會建構出來的系統，透過移置的歷史過程而進入了新關係」（1997: 7）。讓我們透過實例，更仔細檢視這個論點如何暗示了理論化認同與地方之關聯的不同方式，或者用克里福特的術語來說，理解跨域的文化。

改變認同

在第三章，我們開始討論一些問題，涉及了移民、文化和社群（社區）這類詞語，如何在將有色人種區別於大多數人口以外的論述裡，彼此關聯起來。在針對移居西倫敦騷霍爾（Southall）地區的傑出研究中，鮑曼（Baumann）闡明了將旅行與移入（immigration）理論化的不同方式的含意。他認為，「族裔認同、文化和社群之間的簡化等式，凝結成爲有關所有少數族裔的霸權論述」（1996: 22）。另外，吉洛伊（Paul Gilroy）指出，這種支配性論述預設了，「文化藉由族群邊界而假定爲永遠相互封閉」（1987: 55）。相較於白種英國人，少數族裔被建構爲「傳統的」，而且經常成爲社會問題。不變的文化價值被認定將出身特殊地區的所有移民團結起來，這種靜態概念非常強大，在英國十分常見，例如左翼和右翼的辯論裡都看得到。鮑曼說明這種共通點：

支配論述的右翼版本，設想來自前殖民地的人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移居英國。然而，他們的族群和文化特色，使他們有別於同樣被物化了（reified）的英國或英格蘭文化。因此，他們住在幾乎

被視為是大社會裡的社會的貧困社區，製造「社會問題」。典型的近例是「黑人社區」以及假想的有問題的家庭結構，還有「亞洲社群」及其「媒妁婚姻問題」。過去的典型移民事例是「愛爾蘭人」及其假設的集體飲酒問題。

支配論述的自由主義版本，避口不談社群文化裡的問題。反之，他們設想外來移民，或者比較委婉地稱為移民，因社會劣勢而被排除於完整的公民平等之外。這些不利條件幾乎是遷移的自然後果，使他們住在隔絕的社區裡，成為他們時常被指為「傳統的」物化「文化」的囚徒。設想的補救之道是漸進的，而且必須同時針對等式雙方，即「東道主居民」和移居者來實施……。支配論述的左翼觀點，則是以文化革命來取代文化改革，但是也贊同「社群」及其物化文化之間的等式。左翼觀點確認社群文化是抵抗種族歧視的必要且進步的形式，而不認為那是系統內部社會流動的阻礙（1996: 24）。

在比較純熟而有趣的近期研究中，包括鮑曼的騷霍爾（Southall）研究，完全拒絕了這些對立的二分法。他反而主張，遷移改變了移民和「東道主」雙方的個人與群體認同、聯繫與文化態度和實踐。一旦確認了文化是流動且暫時的社會建構，隨著時間塑造和重塑（克里福特的跨域文化），移動顯然就包含了所有涉入其中的人，其文化認同與實踐的重繪。

這把我們直接帶到，特別是後殖民文獻中，有關「跨域」認同的最近爭論。在這裡，用以指涉跨域文化和認同的關鍵概念，包括了混種（hybridity）、流移認同（diasporic identity）和文化傳譯（cultural translation）。



圖 8.1 美國的流移華裔女性

理論化跨域認同：混種、流移與傳譯

211

越來越多研究檢視在不同區位——跨越美國與墨西哥邊界的邊境、加勒比海、眾多第三世界人民居住的西方全球城市——旅行與移動的影響，使用了各種術語來掌握發生於自我和歸屬感的轉變。例如，克里歐化（creolization）是個常見的加勒比海用語，但在美國西南方稱為美墨混血（mestizo）或邊界認同（border identity）。混種或混種認同一詞，與流移或流移認同一樣，是更廣泛使用的語詞（流移一詞意味了族群的離散，最典型的例子是猶太人的流移；混種這個源於生物學的詞，則是指繁衍兩種植物或物種的結果，後來用以指涉混血兒）。這些術語通常是有爭議的概念，特別是帶有劣等 / 不潔涵義的混種概念，因此必須謹慎界定。它們有時以彼此關聯的方式使用，像是下面出自

霍爾（Stuart Hall）針對英國認同所做重要研究的定義：「我在這裡指稱的流移經驗，不是由本質或純潔，而是由對必要的異質性和多樣性的承認所界定；由接受並透過差異而生活，而非不顧差異的『認同』概念，由混種所界定」（1990: 223）。

212

因此，霍爾認為流移經驗或混種，包括了移動和改變，然而，某些學者卻認為先前文化認同的維繫，乃是流移定義的重要部分（參見圖 8.1）。例如，對正統猶太人（Orthodox Jews）而言，儘管流離散佈，但他們身為猶太人及歸屬共同國族的自我觀，端賴他們與其他社會群體的文化區隔，以及維繫他們最終將重建並重聚於家園的信仰。

跨越空間：製造連結

所以，文化理論家（例如霍爾）使用混種，只是意指認同和文化形式是混雜和融合的產物，是移動的產物。不過，這個詞語也以各種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伴隨了暗示位於兩個相互競爭世界之間的認同的意象：指涉那些顯然是住在邊界或邊緣地帶的人，墨西哥裔和拉丁裔學者在這方面大量使用了混種、介中（*betweenness*）和邊境（*borderland*）等詞（Anzaldua, 1987）。或者，混種可以用來表示第三種認同，取代了建構混種的兩種認同。在此，越界、介中或第三空間（*third space*）（Bhabha, 1990, 1994）等詞，有時也用來暗指相同概念。事實上，這些詞不是那麼涇渭分明，像是住在邊緣地帶或介中的概念，並不意指邊緣性，而是指超越不是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就是美國的認同（後面我會回到安卓杜雅〔Anzaldua〕的研究）。研究帝國和後帝國印度的抵抗認同的一群印度學者（Spivak, 1987, 1988），也主張頌

揚這種「介中」混種認同。在他們的著作裡，屬民認同（subaltern identity）與混種的概念相仿。

吉洛伊（Paul Gilroy, 1993）在美國黑人流移的分析中，確認了混種文化的新形式，他稱為**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認同。霍爾（Stuart Hall, 1990）在類似的英國文化研究中，偏好「傳譯」一詞，「原住」居民藉此揚棄「小英格蘭人」（little Englander）的態度，而「黑人」拋棄對差異的呼籲，來相互擁抱他們的混種或傳譯認同。不過，傅萊德曼（Friedman）敏銳地指出，「將混種付諸實踐，也就是如果人們積極認同於混種，混種才具有社會意義」（1997: 290）。必須將混種或傳譯視為積極的認同**政治**選擇，對於何謂身為「英國人」的意義，產生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如霍爾本人指出的，傳譯是有關多樣性和變化的樂觀聲稱，它的發展一點也不穩定。反之，「少數」族裔和「原住居民」或許會撤退，重申一種排外而保守的「根源」。因此，在英國，黑人國族主義或拉斯特法里（Rastafarian）² 認同的崛起，成為堅稱文化起源驕傲的重要方式，而白人的要素則依附於白人英國特性（Britishness）、小英格蘭人、英國人（bulldog breed）等諸如此類觀念，這些觀念與令人厭惡的極右派法西斯主義有關。

後殖民文學理論家楊恩（Robert Young, 1995）認為，完全不該使用混種一詞，因為混種本身帶有卑下劣等與異族通婚的種族主義包袱。混種動物，例如騾，不能生育，過去時常假設異族通婚會有類似結果。然而，在快速擴展的文化地理學文獻中，混種一詞卻被廣泛使用。混種概念的重要闡述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認為，同樣在文學領域裡：

譯註 2：Rastafarian 是牙買加黑人教派，信奉黑人是上帝將拯救的人。

混種的重要性並非能夠追溯兩種原始遷移，從中出現了第三種遷移，反而，混種……是促使其他位置得以出現的「第三空間」。這個第三空間取代了建構它的歷史，樹立了新權威結構、新的政治倡議，但因公認的智慧而有不適當的理解……。文化混種的過程，造就了某些不一樣的東西、新穎而無法識別的東西、一個意義與再現協商的新領域（1990: 211）。

雖然巴巴的研究被羅斯（Gillian Rose, 1995b）批評為脫離具體的——或性別化的——取徑，因為羅斯相信巴巴對非性別化的（後）殖民主體的強調，忽略了女性和男性經驗的特殊性，但我發現巴巴的研究，在堅持轉化、超越當前二元區分的新認同的可能性，以及政治變革的前景方面，頗為激勵人心。如我於前文所述，對地理學家而言，這些術語都饒富趣味，因為它們將認同觀念切離了特定地方，迫使地方和認同重新概念化。

區位政治

過去幾年間，在地理學以及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有關地方理論化的研究，有令人振奮的匯流。空間隱喻和概念在這類研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Gregory, 1994; Kaplan, 1996; Nash, 1993; Smith and Katz, 1993）。開普蘭主張：

214

地圖與邊界都是刺激人心的隱喻，標誌了眾人日益覺察到區分包納和排除地帶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以及不確定性的縫隙空間。在越來越多針對浮現的認同形構與社會實踐的跨學科探究中，地形學（topography）和地理學現在與文學和文化批評橫貫交織。有些地理學家相信各種描述和分析模式乃依循敘事慣例，因而是高度建構且具歷史偶然性，從而接合各式各樣的「地理學想像」（1996: 144）。

因此，透過對物質性的分析，以及隱喻和意義分析，得以揭顯建構地方和認同的多元方式，以及它們之間的連結。在這些分析中，如葛瑞哥里（Derek Gregory）主張，我們有必要將「地圖、地景和空間，還有區位、位置和幾何形勢的想像」（1997: 7，強調為原文所加）一併檢視，我們也有必要記得，「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捲入時空殖民化和時空壓縮」（1994: 414）。換言之，有一種空間政治，揭發了認同和地方如何轉化與重新連結，將人群定位於包納和排除的新模式或幾何形勢裡。

在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裡，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莫罕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 1991）開始探討某些可能導源於新地方認同模式的政治再結盟。她指出，許多由於貧困或野心而來自「南方」的第三世界女性遷移，如何替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強而有力的再結盟開拓了空間，以及她所謂的新「鬥爭製圖學」的發展，將「在原處」的第三世界女性與遷移至北方的女性團結起來。隨著藉由政治鬥爭、音樂或電影，以及重新想像的地方感或國族特性，而鍛造出不同地方女人之間的連結，區位政治也可能採取新的形式。莫罕蒂認為，區位政治並非仰賴以領域為基礎的認同，而是倚靠第三世界女人的想像社群成員之間網絡的發展。這些女性共同利益的構成，源自於資方將她們置於邊緣空間、把她們當成正在浮現的全球經濟裡的新無產階級而剝削的方式（Afshar, 1991; Chant and McIllwaine, 1995; Fuentes and Ehrenreich, 1983; Nash and Kelly, 1983; Ward, 1990）。

反思差異

215 在好幾個學科裡，由於將旅行、移動和邊界的隱喻置於概念

中心，而予以重新理論化的最有趣含意之一，或許是針對差異概念而發的挑戰，而差異本身在質疑西方論述的陽具中心主義（phallogentrism）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上位居關鍵。我在先前許多章節裡已經指出，基於性別和許多其他向度，承認多元與差異的理論和政治意蘊，是後現代與女性主義理論的關鍵要素。然而，現在關注混種和傳譯的理論家卻主張，我們必須拋棄「差異」一詞，因為它具有固著及有別於齊一（the One）的意涵：那是單一的資產階級男性氣概，所有其餘「他者」（Others）都相對於此而以不同方式被界定和量度為匱缺（lacking）（這種論點跟楊恩的拒絕使用混種一詞有類似之處，我覺得值得注意）。相對於「對抗性」或「少數族裔」群體認同過去被建構為不同於「常規」，現在則堅稱一切認同都是地方和根源記憶的流動混合物，透過碎片和細微差別、旅途與休止而建構，是一種介中的運動。因此，「介中」（in-between）本身是個過程和動力，而非只是通往最終認同的階段。如普瑞斯（Preis）所論，「具有內在外在、這兒那兒的邊界或屬性的想法，似乎不夠充分。是介中空間讓自身成為接納操作中之不同差異的地方」（1997: 98）。

這些論點呼應了主要是移民自中美洲的美國女性主義者的重要早期研究。例如，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以類似術語書寫了她所謂的「女混血兒意識」（mestiza consciousness）的發展，這是一種邊境意識，源於墨西哥與盎格魯文化的共謀。安卓杜雅要求摒棄二元思維，主張女混血兒意識來自「同時位居兩邊……」。大舉根除個人和集體意識中的二元思維，是長期抗爭的開端，卻是我們最可能期待的，能夠終結強暴、暴力、戰爭的抗爭」（1987: 80）。

在我以評價這些有關流動不定認同的辯論的意涵，來總結本章之前，我想簡短地轉向討論地理學家和其他學者所做的，當前有關旅行和遷移的經驗研究，檢視旅行者的性別區分。

216

我們首先檢視近期有關旅行的研究，接著是移動做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探討。

性別化的旅程：旅行與旅行者的性別

這個領域近期最有趣的地理學研究的發展之一，是結合了對旅行和旅行書寫的興趣，以及殖民與後殖民國家的歷史地理。現代西方強權殖民帝國的發展，導致數百萬人暫時或不同程度地永久離鄉背井。不過，這些男性的遷移史廣為人知，但是對女性生活造成的衝擊，卻缺乏充分探究。對西方軍人和殖民地行政官員（絕大多數是男性）而言，他們的旅程和工作生涯有關，並且與將「文明」帶給另一個較低劣民族的傳教熱忱有關。對於伴隨他們旅行，置身帝國行囊的成千上萬女性而言，身為妻子、情婦和營妓（camp follower），她們的決心各不相同。這些女人必須撫慰她們的男人，在異域創造出家的意象，她們的思想和情感不載於官方文件與條約，卻記錄於家書和日記。即使對於身為護士、傳教士和探險家，或是結合這些角色，前往非洲、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令人敬畏的女性而言，有關她們的歷史記載也不如男性那麼明確。

布朗特與羅斯（Alison Blunt and Gillian Rose）在《書寫女性與空間》（*Writing Women and Space*, 1994）這本文集中，開始提出與官方旅行故事抗衡的故事，解析帝國盛期置身印度的英國女

性、金絲莉 (Mary Kingsley) (亦見 Blunt, 1994) 與其他女人的西非之旅，以及澳洲殖民政治的不同歷史和地理。殖民主義的歷史與地理，透過這些研究而更形複雜。不僅帝國女性變得顯而易見，而且殖民之為繪圖和征服的單一觀點，也遭到了挑戰，由於殖民地女人往往既與支配的策略共謀，又抵抗支配策略，使得鬥爭和抵抗的故事也同樣遭受質疑 (Ware, 1992)。普瑞特 (Mary Louise Pratt) 在她傑出的《帝國之眼》(Imperial Eyes, 1992) 中，檢視了旅行書寫做為帝國意識形態機器一環的角色。她的研究比早期全面稱頌的解釋來得細緻，但也比某些分析少些責難。普瑞特援引 17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證據，說明如何透過旅行書寫來替都會中心的讀者，建構帝國的異己及其居民，以及「邊陲」人民如何接受、挪用並挑戰有關他們自身的再現。

217

到了二十世紀，相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外交官夫人伴隨她們的男人前往殖民帝國。英羅 (Cynthia Enloe) (我們已經討論過她的研究) 認為，儘管女人很少憑本身條件成為外交官，但她們在外交政策上扮演要角。「如果掌握得宜，身為妻子的女人可以協助政府達成國際目標。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率的控制，她們有可能對政府的全球利益造成嚴重危害」(1989: 9)。英羅評論道，「擔任女主人」已然成為不可或缺的外交手腕，外交官夫人正是其中的根本元素。並非所有女性都樂意為之。英羅引述賽克維爾－威斯特 (Vita Sackville-West) 於 1926 年從德黑蘭 (Tehran) 寫給她的新朋友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的信。賽克維爾－威斯特偕同她的外交官丈夫尼可森 (Harold Nicolson) 到那，寫信抱怨到「雖然我喜歡波斯，但我不喜歡外交儀節」。如英羅記載，

儘管她無論於私於公，強力抗拒扮演盡責妻子的角色，但到了

1920年代，薇塔（Vita）遇到她無法避免的角色期待：「她登門拜訪，參加並舉辦午餐會和晚宴……她甚至頒發曲棍球獎」。但她無心為之……於是不到幾個月，她返回英國，留下哈洛德（Harold）獨自應付外交禮儀（1989: 97）。

事實上，薇塔從未安頓下來，成為傳統妻子，而她與哈洛德之間糾纏不清關係的故事，則由他們的兒子尼格爾·尼可森（Nigel Nicolson）在《一段婚姻的寫照》（*Portrait of a Marriage*, 1973）中，以引人入勝的細節加以敘述。

如同英羅的記載，許多外交官夫人覺得她們的無給工作並不受人重視，但沒像薇塔一樣脫逃，自1970年代以降，嫁給瑞典、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外交官的女人，開始為表彰其貢獻而組織和遊說。她們提出「服務、工作、生活費，甚至是薪資的公開要求」，英羅描述，「軍眷加入了她們的政治遊說」（1989: 95）。對這些女人來說，就像歐克利（Okely）研究的吉普賽女人（我在後文將概述她們的生活），旅行傾向於強化她們的從屬地位，而非撼動傳統性別關係。這些經驗事例增添了有關性別化經驗特殊性的理論論點，並提醒我們，要仔細檢視以旅行做為後現代核心隱喻重要性的宣稱。

移動之為生活方式

218 雖然前文討論的男人與女人的旅行，在他們所屬社會中被視為意味深長且具有價值，但其他移動群體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卻被更廣大的社會建構為不是偏差或有問題，就是一種早期生活方式的遺跡。吉普賽人和旅行者（traveller）就是個例子，在許多歐洲國家中常被鄙視為圈外人。

歐克利 (Judith Okely) 是英國人類學家，針對英國吉普賽人 (他們偏好外人將他們視為旅行者)，從事了多年的民族誌研究。她認為旅行者常常 (不正確地) 被視為邊緣群體，會隨著經濟發展，隨著他們擔任商人、小販和臨時工的「傳統」生計消逝而絕跡 (Okely, 1975a)。據歐克利所言，對他們置身邊緣地位的界定固然準確，但這是令人產生誤解的假設。旅行者本身拒絕傳統規範，因而遭到許多居民鄙視。例如，歐克利發現，吉普賽男人不想保有正規工作。他們看不起薪資工作關係，像是將務農視為「女人的工作」，而盡可能自營小規模、家庭經營的事業，譬如廢金屬交易。

歐克利發現，英國吉普賽人在各種生活領域中，有強烈的性別劃分。最有趣的差異之一，是男女選擇在更廣大社會中「矇混過關」的程度。不同於許多看得出來有別於廣大社會的少數族裔，吉普賽人主要不是身體上有所區別，儘管對於「真正吉普賽」人有黑頭髮黑眼睛的刻板印象。雖然群體的成員身分，取決於擁有一名吉普賽父親或母親，但確定成員身分的卻是「生活方式，以及對某些吉普賽價值的承諾」 (Okely, 1996: 51)。不過，缺乏身體特徵，意味了吉普賽人可以選擇隱藏或洩露他們的族群認同，正是在這一點上，性別差異很明顯。

歐克利指出，吉普賽人有四種操演族群特質或族群形象的方式。那就是異國風情、密而不宣、墮落退化，以及歸化 (naturalized) 的形象。女性比較常採取異國風情化的形象，她們運用浪漫虛幻的刻板印象和服飾 (比如圍巾和黃金首飾)，以便利用具有超凡直覺的算命者的吉普賽人形象。不過，男性則比較可能從隱蔽他們的族裔特性而獲益，例如，穿西裝或打領帶以便商談租用營業大廳，或是使用印刷卡片來宣傳他們的柏油碎石生

意 (Okely, 1975a)。然而，偶爾，兩性（但男性比較典型）都會貶低他們的形象，穿著破衣爛衫或行止愚蠢可笑，乞討或是在垃圾堆翻尋。有些人假裝不識字以逃避官方要求。最後，在吉普賽人與「大眾」社會之間，通常是基於個人接觸和交易的某些信賴關係中，族群認同則變得無關緊要。

這四種伎倆或表演，類似於先前章節討論過的，性別認同之為操演或形象的觀念，而歐克利的著作現在被視為是有關流動和移動認同論點的早期認識。吉普賽人自我歸屬的形象與時俱變，「東道主」社會對他們的定義也是如此。歐克利總結道，十九世紀的吉普賽人比較可能被視為墮落而非貧困，但現在更常見的觀點則是後者。不過，吉普賽女人在東道主社會中的形象則比較穩定。如果她是年輕女性，典型上會被視為性濫交、淫蕩、挑逗和刺激；如果她是年長女性，就會被當成壞母親或有威脅的老太婆。由於整個女人群體被異己化，少數族群女性便遭受了雙重異己化，跟比較文明的「白人」女性對比，她們通常被視為較接近自然、性關係比較隨便。這是貫穿吉普賽女人和有色人種女性論述建構的常見線索。

然而，吉普賽社會裡有規定嚴明的性行爲和貞潔守則，兩性間的性別區分很嚴格。儘管與非吉普塞人 (gorgios, 吉普塞語) 之間的關係，明顯要求獨立和衝勁，吉普塞女人仍然強烈受限於傳統，被期待在營地要忠貞並服從她們的丈夫。控制女人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套有關汙染儀式的信念和恐懼，其中，身體的某些部分、衣物和器皿的洗滌，以及食物的準備，都是嚴格規範的主題。吉普賽男人被視為天生純潔，女人則是汙染源，唯有透過仔細檢查她們的行爲舉止，特別是她們的性慾特質，才有可能

企求純潔。因此，許多最本質化的女性氣質刻板印象，似乎可以在擁有移動生活方式的人群中找到最強烈的形式。對於當前於性別化社會關係的理論重建中，轉向流動和旅行隱喻的女性主義理論家而言，這或許是個弔詭。

結論：踰越和轉化

在本章結論，我想回到區位政治的觀念，檢視有關旅行與移動的女性主義、地理學和文化理論匯合的意涵，以及基於地方記憶片斷、基於慾望和經驗的流動與轉變性認同的觀念。我想要評估，從堅持所有宣稱都是脈絡化且情境化，以及對共同區位的理解能發展出政治，能夠導引出解放還是保守的結論。在評估新政治可能性的時候，要提出的問題之一是區位與地方的關係。傅柯（Michel Foucault）主張，空間史（傅柯用的是空間一詞，而非地方）也涉及權力的歷史。比如說爲了讓「西方」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新政治要求，能被嚴肅以待，這些要求（是她們的鬥爭製圖學的基礎）必須被聽見。但是，誠如女性主義評論家普羅賓（Elsbeth Probyn）所論，區位政治取決於「我們從何處發言，以及誰的聲音被認可」（1990: 178）。目前，並非所有「他者」都有平等的聲音。

220

同樣明顯的是，認同政治並非自動具有進步性。霍爾提醒我們，移動和旅行，以及由後現代性（透過資本主義的全球觸角與強迫遷移，以及意欲的移動）引起的邊界消失，或許會導致排外性防禦圈地（enclave）的重塑。遷移會導致緊抓著舊有的認同觀念不放，並且企圖拒絕新的經驗，這種可能性就如同由於打破舊

有的二元區分，而導致進步的認同轉化一樣。在許多情況裡（我在前一章曾簡略討論過族裔國族主義的復甦），移動既會導致舊性別關係的轉變，也可能導向它們的重新確認。

因此，我想以克服對抗性之性別認同的可能性的問題作結。在什麼程度上，目前女人和男人擁有尋找新生成（becoming，至少就我們當前理解的詞意而論，既非女性，也不是男性）方式的機會？是否有「操作性別」的其他方式或多元方式，容許各種多元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的建構，甚至可以超越二元的性別劃分？在什麼程度上，女人可能抗拒和逃離臣屬地位，而非成為臣屬的「學徒」？

自女性主義僅僅是爲了爭取「平等」的運動以來，已經過了好些時候。我在這裡介紹的研究，爲它帶來了不同的展望：新的成套社會關係和再現形式。似乎有可能設想一種不仰賴二元、階層性區別的未來：既非我們當前必須忍受的白人、男性、殖民的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僅是對它的抗爭，而是更爲複雜且流動的世界，具有迴避和逾越舊區分的可能。事實上，或許甚至逾越這個字眼都還不正確：目前正在建構的不僅是逾越這個詞所暗示的，位於慣例外頭的對抗性的性別政治，而是操作性別的新方法，擴大了更具解放性的性別化的可能性。霍爾在他的文化傳譯研究中提及「新的族群特性」。我們或許可以延伸這個詞來指涉「新性別」，透過傳譯，逾越者和那些反對他們的人，都有所轉變。葛洛斯柏格（Grossberg）在討論如何轉化做爲一門學科的文化研究時，主張是時候

超越壓迫模型，包括壓迫者和受壓迫者的「殖民」模型，以及壓迫和抵抗的逾越模型。文化研究必須邁向做爲「轉化性實踐」、

做為社群的獨特生成的接合 (articulation) 模型。兩種壓迫模型不僅不適於當代權力關係，也無法產生結盟；它們無法告訴我們，如何召喚位居不同權力關係中的各種人群片段，投身於追求改變的鬥爭。例如，我們如何以除了深感內疚以外的方式，將握有權勢者的片段捲進來？我的感覺是，答案取決於將認同問題與建構歷史能動性之可能性的問題，再度接合起來，並且放棄那種假設有一種完全位居建置完備的權力結構外頭，並與之對抗的主體的抵抗觀念 (1996: 88，亦為 Thrift, 1997: 150 所引用)。

葛洛斯柏格所用語彙 (片段和接合) 的馬克思主義迴響，或許與近來有關認同政治的女性主義研究不同調，女性主義學者也沒有假設一種位居父權體制以外，並與之對抗的 (女性 / 女性主義) 主體 (事實上，我在這整本書中，已經說明女性主體是如何藉由置身支配性權力結構中的位置而界定的)，但這整段論點卻十分有力。因為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與政治的目的，當然不僅止於挑戰可以挪用的女性氣質觀念的虛構和限制，也包括了男性氣概觀念的部分。

葛洛斯柏格也強調，將認同建構的歷史情境化理解，與更好未來的進步性期待結合起來的重要性，以此取代遍及當前認同研究中，有關歧義、斷裂和移置之分析的焦慮。當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對那些被「常規」(無論是階級政治的男性氣概常規，或是許多早期女性主義的白種中產階級女性的規範) 排拒在外的人來說，這種研究是多麼具有解放性，並且體認到，那些指出不同女人之間，除了依種族或階級界線而產生的區分外，還有慾望和希望上的差異的學術研究，有多麼重要。不過，一個朝向轉變與傳譯的解放前景開放的未來，雖然是多元、流動和暫時性，如果不僅止於認知差異，而是堅持差異，似乎會更有希望。

在性別和性慾特質的某些近期研究中，尤其是酷兒理論家的學術研究，有個如何超越二元對立的指示。我在第二章介紹過的，地理學家貝爾（David Bell）、比尼（Joe Binnie）、克琳姆（Julia Cream）與華倫亭（Gill Valentine）的性別／性操演研究，就是個例子。同樣的，辛普森（Mark Simpson）在他探討男同性戀的《男演員》（*Male Impersonators*, 1994）中，也提及男性認同的多元操演，如何撼動了霸權男性氣概的傳統觀點。例如，他考察廣告業的趨勢，運用男性身體來廣告除了針對同性戀男人，也以異性戀者為目標的各式各樣商品，主張這使得男性身體而非女性身體成為男性凝視對象，擾亂了男性氣概的傳統觀念。起碼在這個有限的例子裡，如果異性戀男性樂於彼此觀看，那麼男同性戀就不再被界定為不同或「他者」。唯有當異性戀男人斷然為異性戀，同性戀男人才會是同性戀。語言學理論家凱麥隆（Deborah Cameron）在類似論點中提及，「唯有女人明確為女人時，男人才是男人」（1985: 156）。如今十分清楚的是，正如許多女人積極挑戰先前有關外表、行止和成就的女性氣質定義，她們也開始停止身為「女人」。這撼動了「男性」與「男性氣概」的範疇，明顯造成當前許多男人的嚴重焦慮。

於是，看似有些改變（以及許多進一步範圍）的證據，但改變的方向似乎還是不明確。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了當前「實踐男性氣概的」男性所面對的不確定性程度，因為女性拒絕位居她們的傳統位置。他在《親密關係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1992）中主張，男人對於性別差異的當代挑戰，同時採取了消極與積極回應。他認為，逐漸增加的男性虐待與暴力程度的證據，構成了消極的回應，而協商性別關係的新方法，以及男女之間更大的個人親密關係，則是

較積極的跡象。然而，爲了使論點無庸置疑而採用不適當的經驗證據，使得他的論點備受爭議，但是它確實支持其他理論家的論證，有關位於新認同形式背後的不確定性，以及新認同浮現所牽涉的政治轉變可能性。

看來，目前我們似乎處於十字路口，在此，差異政治的展望必須與新式的轉變政治相互權衡，後者是挑戰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認同之對立性建構所不可或缺的。不過，我認爲，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女性主義政治長期以來的兩難困境。宣稱一種女性可以賴以發言的立場，似乎需要緊握某些女人或女性氣質的觀念，而不是解構這些觀念，或是最終消散於轉變和不穩定的多元差異網絡中。傅瑞澤 (Nancy Fraser) 認爲，轉變的政治要求「所有人斷絕他們與其利益及認同之當前文化建構的依附關係」(1997b: 31)。在我看來，在男女之間明顯的物質不平等依舊不變的當代社會與經濟環境中，這點不可能實現。事實上，傅瑞澤自己認識到，這種她所謂的「解構的女性主義文化政治」，以及比較古老而傳統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形式（例如，工作場所的運動），還是「與大多數女性的立即利益和認同相距遙遠」(p. 32)。然而，和傅瑞澤一樣，我相信從解構認同的觀念中，還是能大有斬獲。它給我們一個努力的未來願景，就是性別差異的二元建構不再重要，不再使女性身陷成爲「女人」的困境。

223

延伸閱讀

近年來在地理學界內外，有關旅行、移置、遷移、流移和邊界認同的研究，有令人振奮的擴展。關於旅行的重要性，普瑞特 (Mary Louise Pratt) 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992)，是主要引述美洲旅行的一本迷人書籍。地理學家布朗特與羅斯 (Alison Blunt and Gillian Rose) 合編了一本有趣的書《書寫女性與空間：殖民與後殖民地理形勢》(*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1994)，主要 (但不僅) 討論了前大英帝國的旅行書寫。布瑞多蒂 (Rosi Braidotti) 的《游牧主體》(*Nomadic Subjects*, 1994) 是一本較具理論挑戰性的書。在傅瑞澤 (Nancy Fraser) 的《正義中止：「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評論》(*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1997) 裡，可以找到她的政治論點。人類學家漢納茲 (Ulf Hannerz) 的論文集《跨國連結：文化、人民、地方》(*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1996)，檢視了關於地域與社群觀念的遠距移動和文化流動的含意。最後，索波 (Kate Soper) 的《不安的快感：性別、政治與享樂主義書寫》(*Troubled Pleasures: Writings on Gender, Politics and Hedonism*, 1990)，如書名所示，是討論如何在思索達致政治變革的同時，仍能享有樂趣。

9

結語：女性主義研究的困境

**POSTSCRIPT: REFLECTION ON THE DILEMMAS OF
FEMINIST RESEARCH**

導言

224

在這最後一章，重點有所改變，我要仔細考慮在地理學界從事女性主義研究的困境，藉由我自己研究興趣的透鏡，來檢視變動中的爭論。雖然在前幾章介紹過許多有經驗基礎的各種研究，但我還沒有直接討論各章所呈現的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如何實際從事研究的問題。多年以來，是否有一種獨特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議題，一直激辯不休。也有來自各種學科的不少文獻，探討如何做研究以便發現性別的分化，提出有關適當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論的問題。許多地理學家參與了這些爭論（例見 Dyck, 1993; England, 1994; Gibson-Graham, 1994; Gilbert, 1994; Katz, 1994; Kobayashi, 1994; McDowell, 1992c; Nast, 1994; G. Pratt, 1993; D. Rose, 1993; Staeheli and Lawson, 1994）。

225

1995 年的《專業地理學家》（*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刊載了一組特別有趣的論文，由當時剛開始學術生涯的幾位地理學家撰寫。這些女性大多是美國與加拿大的大學教師，她們的工作環境至少容忍、甚至鼓勵女性主義研究。我身為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的生涯，比她們大約早二十年展開，當時女性主義取向的建置比較不完全，某些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基礎研究尚未提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得到容忍，更別說是受到鼓勵，在地理學界是多麼晚近的事情。爲了替事情如何轉變增添一些趣味，我決定採取比較個人的觀點，援引自己的經驗，以及約莫同一時期，地理學界和其他相關學科裡其他人的反思，來檢視女性主義研究，做爲本書的總結。

我不打算讓這章成爲自我中心的耽溺，而是對近期地理書寫的反身性轉向有所貢獻。女性與地理研究群（*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成員寫的第二本書裡，有一些由目前從事寫作的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所做，關於她們自身歷史和地位的類似探討。與《專業地理學家》的撰稿人一樣，許多撰寫文章的女性，成為地理學家的時間比我晚，你或許會想拿本章與她們的生涯自我評估比較一番。

1970 年代早期，正當我完成第一個學位的時候，許多現在學科裡視為當然的事情，連想像都很困難，更何況正式予以概念化。我於 1971 年帶著計量方法和技能的扎實背景，離開劍橋大學——當時計量革命在系上佔主導地位——但也帶著雜匯的區域地理知識。我懷疑在劍橋的整整三年裡，曾經有誰提過政治或國家這類字眼，但能確定的是，從來沒有人說過女性主義這個詞。

1989 年，瑞瑪扎諾哥魯 (Caroline Ramazanoglu) 寫了篇文章，從女性主義觀點討論她於 1960 年代早期 (距我展開學術生涯沒有多久) 所寫的碩士論文。她認為，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發展的新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使她得以重新思考早期的田野工作，察覺執行田野研究時，性別、主體性、情感和權力的意涵。

1960-61 年間，我針對擔任巴士車掌、餐廳員工或糖果包裝工人的全職輪班職工的已婚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這項研究在暗含實證主義方法論架構的戰後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下，撰寫成為碩士論文。雖然實證主義方法論產生的知識，可以在其方法論立場的術語內驗證，但是對照於其他方法論架構所生產的知識，使我們可以斷定它是「不適當的」知識……。我要思考，從女性主義觀點來做輪班工人的類似研究，在哪些方面能夠建構更好的知識。

1960 年普遍假定調查式研究可以生產客觀知識。我根據假設—演繹法從事研究，認為男性位居社會世界中心是理所當然之事。女人是相對於男人來界定的……。我據以從事研究的 [這種] 男性

中心科學立場，將已婚女性輪班工人建構為「反常」。輪班工作妨礙女性對她們丈夫和小孩應盡的「正常」義務。女性實際上是以這些義務，而非身為工人的角度來定義……。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找到社會理論和已婚女性輪班工人的連結。既然這些女性被定義為社會反常，我從未找到令人滿意的連結。

我的其他問題，在當時的社會學文獻裡並未述明，我接受的教育裡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全都是以前各種方式根植於不假言說的權力關係裡的問題。我的年紀是個問題，它（正確地）意味了不諳世故，但論文裡的主要沈默範圍，是性別與性、階級、種族、控制和客觀性……。我也欠缺將研究過程和研究脈絡視為研究一部份的意識。因此，我缺乏概念或方法，來協助我生產在工作組織和家庭生活中，或是研究過程中，女人生活裡所發生事情的知識（Ramazanoglu, 1989: 427-8）。

這在一般認定的 1960 與 1970 年代女性主義學者中，會是個共同經驗。我 1993 年訪問韓森（Susan Hanson）（克拉克大學地理學教授，位於麻塞諸夏州烏斯特〔Worcester, Massachusetts〕，那裡對女性和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是個重要地方）有關她身為地理學者的學術生涯。她解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如何協助她釐清了對於女性不平等處境的漸增關注，這是她在實證和計量分析當道的時期裡，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所做的時間預算分析所揭露出來的（參見 McDowell, 1994a）。1960 年代末，她開始研究工作，以下是她記得的那段生活：

我著手進行瑞典奧普沙拉（Uppsala）地區的旅行模式研究。我唸研究所的時候，行為地理學才剛開始。這是實證主義故事盔甲的第一道裂縫。每個人的觀點都是局部的，而且取決於你的位置，類似於此的各種觀念，當時才首度傳開。1970 年代，由於我用奧普沙拉的資料來檢視女人和男人的活動模式，發展出對性別的

興趣。我研究的一條線索是，關注多重目的旅行和「旅次鏈」(trip chaining)，這與女性生活的複雜度有關，涉及了日常時空路徑上各種活動的組合。我據理反對運輸規劃者，他們認為通勤旅次是你必須納入規劃的主要旅行，並認為它是簡單的單一駐止(single-stop)旅程。

當時我完全不受女性主義影響。我只知道女性有比較複雜的生活。很不幸，我當時對女性主義一無所知。這些問題打那兒來？我在1970年代左右，逐漸受到女性主義影響，但是當時許多問題是來自行為地理學 (McDowell, 1994a: 21)。

年紀和立場相仿的英國地理學家湯山德 (Janet Townsend)，告訴我女性主義如何改變了她對自己研究焦點的看法。她評論自己早期研究中的性別盲，現在她對自己以安地斯山脈 (Andes) 西班牙語區為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忽略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深感驚異。由於後見之明，以及在她之後十幾年來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的著述，她體認到相同資料、相同環境，可以有很不一樣的詮釋。她從女性主義觀點重新分析證據，即對於特殊社會脈絡和行為的預想，從而產生了不同意義：對應於當代地理學家認為「事實」是由理論來述明的觀點，這可以算是個生動實例了。

韓森、湯山德和我展開研究生涯時，學科裡仍然有主宰的觀點，認為研究必須奠基在科學客觀性的理想上，否定個人經驗，以及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的私人互動。但這些簡短的例子說明了，研究發現既非固定，亦非恆久不變，而是會隨著學科變動和受到不同觀點（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或任何其他觀點），以及每種觀點共同採用的方法論影響，產生不同的詮釋。對地理學者來說，我們所揭露的成套社會—空間關係和地方意義，以及對它們的解釋，並非恆定不變，而是多元紛雜且

有所變異。不同觀點的研究者建構了它們，研究者對於正在考察的現象可能有或沒有經驗，他們的解讀和想像的深度與廣度不一，對類似事件的詮釋會與時俱變，隨著她或他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展和深化，以及隨地理學做為一門學科的性質改變而變化。

雖然在地理學門的某些部分，這種認知至今備受爭論，但現在很多人接受了地方和事件具有多元意義和多重詮釋，而且可以用不同尺度來考察。受到部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中所謂「文化轉向」影響的地理學家，開始將地方視為一種空間文本，可以由「讀者」來詮釋，而這些讀者有性別、階級、族群、年齡和生活經驗上的不同定位和差別 (Barnes and Duncan, 1992; Duncan and Ley, 1994; Duncan and Duncan, 1988; McDowell, 1994b)。所以，地方隨著不同人群的眼光而有不同的感知。延伸這個論點，就像普瑞特 (Gerry Pratt) 在反思女性主義和後現代思潮的影響時提到的，所有學術書寫都應該「視為過程，而非結果」(1993: 51)。

228

雖然這種說法仍有爭議，而且常被歸類為「後現代」觀點的追隨者，但認為女性透過不同眼光來看待世界的宣稱，往往是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核心要旨。從大約三十年前，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早期開始，就主張女人與男人在世界上的定位不同，因此他們與其生活所在地方的關係也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是不同時空條件下，導致女性不如男性且遭男性壓迫的一組特殊不平等結構的後果。雖然我已在本書裡指出，現在人們認清女性壓迫所採取的形式，隨著歷史和地理而有所變化，並體認到女男之間的簡單二元區分，是過於極端的世界觀。但是堅持有基於性別區分的、變動中的權力與不平等關係，使得女性主義有別於後現代的差異分析。在這個意義下，女性主義學術研究仍然是具有政治和進步目標的現代主義計畫。

女人研究女人？

起初，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包括韓森、普瑞特、湯山德和我，都認為我們的研究對象理所當然是女人。雖然這或許是個看似陳腐或明顯的陳述，卻一度反映了這些詞彙之間的差異：女人、男人、女性氣質、男性氣概和性別關係。前兩個字眼鼓勵我們探索女人和男人的空間行爲、態度或任何其他東西，並將他們的性別及相關特質視爲理所當然，後兩個詞語則鼓勵我們去質疑女性氣質（順從、被動、養育或情感行爲等）和男性氣概（侵略性、理性、克制的情感等）的社會特質與生物上區分的女人和男人之間的關聯，並且質問這些屬性是否以及如何映繪於身體。而且，由於對性別關係存疑，日益清楚的是，我們爲了獲得有關女人的結論，也有必要探問關於男人的問題。雖然這種關係性的理解，總是隱含於基本上是設計來詢問女性何以有別於男人的一組地理問題的早期研究中，但是在密切關注女性的早期地理研究文獻裡，並沒有那麼明顯。

然而，現在人們認爲，爲了理解女性身爲從屬男性之「他者」的地位，以及女性氣質不如理想化男性氣概的社會建構，除了研究女人和女性氣質外，重要的是也要探究男人與男性氣概。如史考特（Alison Scott）在考察自己的專門興趣（工作場所的性別區隔）時主張的，這個目前如此顯而易見的論點，在早年女性主義研究者的眼光裡，卻幾乎毫無例外聚焦於女性身上。她寫道：

過去十年左右，女性和就業研究的焦點越來越放在性別區隔上，也就是女性傾向於從事女人主導的工作和職業，男性則傾向從事男人支配的工作。這種情況已被證明為勞動市場不平等的最深層向度之一，也是最持久的特性之一。然而，工作的性別比率，最

近才被當成勞動市場的變數認真看待，而且只出現在女性與就業的研究……。〔不過〕，無論研究是否特別關切性別，它都是職業分析的基本資料。

〔本書關心幾個面向上的〕方法論革新，〔一個面向是〕將男人包括在內……。對現今這個領域裡的許多研究者而言，將男人包括在內，或許看似平淡無奇，但我們應該記住，性別區隔仍然普遍被視為「女人的問題」。此外，早期的性別區隔研究主要是關心女性，而且或許因此很少有關於男性的有用資料。長久以來支配了工業關係與勞動市場研究的男性就業研究，並不特別關注性別區隔……無法產生相對不平等分析中，不可或缺的男女之間的系統性比較 (Scott, 1994: 1-3)。

這裡對於研究設計和報導人 (informent) 挑選的含義十分明顯。在設計來探究女性相對地位的未來研究裡，我們必須將男性納入樣本。因此，在我的商業銀行職業區隔研究中，比較了位居相同職業的男女樣本，以便探討在類似工作、資格、工作經歷及晉升模式與前景下的差別待遇 (McDowell, 1997a)。

不過，最初將重點擺在女性身上是很重要的，而且有幾項值得關注的意涵。對許多女性主義者而言，研究女人是一種政治決定，一種讓我們有能見度的策略，揭露我們先前遭排除於地理研究文獻以外的情況 (例如最早的論文之一，題為〈人文地理學不應排除半數人類〉 [On not excluding half of the human in human geography, Hanson and Monk, 1982]，另參見後文摘述)。從當時起，對於將這種研究命名為女性研究或是性別研究，在政治涵義上有何差別，就爭議不斷，擔心男人有可能收編名為性別研究的領域。但是把焦點放在女人，並且稱為女性研究，卻帶來了危險。在地理學內部，過於輕易地發展出「女性地理學」和女學者

與女學生之間的關聯。許多人認為，這種新式研究只是爲了女性而做，也僅由女性爲之，而且一旦在某個課程、期刊或學系的角落起個頭，就能聽任女性繼續研究。其他地理學研究可以照舊持續下去，不受性別區分和權力關係的問題影響，而且幾乎沒有認識到，做爲研究對象的無性別、不具形體的個人，其實主要是男人。但請注意以下的摘述，韓森與孟柯（Hanson and Monk）在她們的 1982 年論文中，已經留意到這個危險，拒絕這種區分。

我們的目的是在於確認地理學研究中的某些性別主義偏見，並考察這些偏見對於整個學科的含意。我們不是指控地理學家在研究時，積極或甚至刻意帶有性別歧視。但我們要指出，由於遺漏對女性的任何考慮，使得大多數地理學研究消極地，往往並非故意地成爲歧視女性的研究。痛斥某些研究者或其傳統，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而是要針對將女性主義視角整合進地理學的方式，激發有活力的建設性批評。

在我們看來，要讓本學科女性主義化，有兩條替選途徑。第一條途徑是發展強大的女性主義研究支系，成爲地理學傳統濃密辯帶中的一條線索。我們贊成這種研究有其必要，但不夠充分。我們偏好的第二種取向，是在所有人文地理學支流中，鼓勵女性主義觀點。依此方式，關切女性的議題會併入所有的地理學研究努力（p. 11）。

如果你看看早年將女性生活納入地理學議程的作者名單，會發現她們都是地理學家，幾無例外。早期，我們的男同事似乎假定他們沒有性別，或是認爲女人不值得研究。這些年來，女性主義研究者堅決認爲，有非常廣大的新領域，經常位於最細微的空間尺度，應該加以開拓探究。這些領域包括了托育服務、家庭權力關係、家務、女性生命週期階段（單親、守寡等）及其與空間行爲的關係、女性的都市暴力恐懼、女性的工作旅次、女性獲取

231 諸如健康照護資源的管道、女性的友誼網絡、女性的（缺乏）社會流動女性、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上，女人的非正式與社區工作，包括先進工業社會和「第三世界」社會的情況。由於這些主題很新穎，或過去不受認可，收集適當資訊和資料往往是一大挑戰。

收集資料

因此，最初的方法論議題之一，就是確定是否有任何既存的有用資料。席格與歐森（Joni Seager and Ann Olson）在跨國基礎上展開這項工作，出版了精采的創新圖表彙編《世界女性》（*Women in the World*, 1986），現在可以買到席格（Joni Seager, 1997）出版的第三版。湯山德（Janet Townsend, 1991）研擬了一張有用的表格，顯示從事比較研究所需的資訊類型，並且建構了她所謂的性別區域地理學，透露了男女在生活與機會上的差異程度。我在這裡重製了這張表，說明僅僅為了描述基於性別的不平等，還需要做些什麼（參見表 9.1）。

當然，欠缺精確統計資料的議題，往往離不開概念問題。例如，除非無給勞動被歸類為「工作」，以如同支薪工作一樣的方式，當成經濟地理學的主題，否則就無法收集無給工作的統計資料。雖然長期以來，「非正式」經濟一直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的關注焦點，但有關「先進」社會「正式」經濟的支薪工作已經取代了其他工作形式的這種假設，卻對直到近期為止都由女性主導的其他工作形式的精確統計資料收集，造成不利影響。在這方面，女性主義地理學家與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有共同興趣，例如，認為不包括家務勞動的國民生產毛額與國內生產毛額

統計資料並不正確（例見 Marilyn Waring 在《如果計算女性》〔*If Women Counted*, 1989〕裡的論點）。不過，也請記得我在第五章描述過，英國政府最近在這方面有所表態。

表 9.1 性別區域地理學的廣泛資料

這些變項在理論上可以映繪到從地方到國際的各種尺度，但資料往往無法取得（大多數資料運用於某處，不過只有那些註記星號的資料，在國際上能廣泛取得，但品質和可比較性可能還很貧乏）。變項的分類必然很粗糙，不同種類之間有許多重疊。性別內部的分化與性別之間的分化，經常同等重要。

空間分工的性別化：誰於何時、何處及如何做了什麼？（所有資料依性別區分）

時間預算

無給工作：參與率，活動種類，工作分擔

有給工作：全職：參與率*，勞動力比例*，失業

有給工作：兼職與（或）臨時工：參與率，勞動力比例

有給工作：單身、已婚和離婚者的參與率，以及依受撫養孩童年齡和數目區分的雙親參與率

職業與產業的集中和隔離

工作生涯的年數

所得，所得分配，薪資 / 收益

工會成員身分

社會安全或保險計畫的涵蓋比例

仰賴國家支持的比例

財產所有權，使用權，信用獲取管道

休閒時間，休閒活動

性契約的性別化

各種性慾特質的比率

依性別分的初婚法定年齡與平均年齡

結婚率，離婚率

習慣法婚姻，媒妁婚姻的盛行率

依年齡與性別分的單身、曾經結婚、離婚、寡居的成人百分比

未婚女性生育數，青少年生育數，無子女的比率，領養

家戶結構，女性當家家戶百分比，獨居比例

依性別和年齡分的賣淫比率

暴力：依加害者和受害者性別分的婚姻強暴發生率，兇殺、攻擊、亂倫、虐童發生率

依性別分的生殖器切割（女孩的切除或陰部封鎖，男孩的去勢）

空間的性別化

依性別和年齡分的個人空間，（日常與終身）活動空間，（公共或私人）交通工具使用，以及遷移

依性別和年齡分的都市與鄉村性別比率

夫妻居住與婚姻距離

深閨制度（purdah）、隱居和面紗的發生率

依加害者與受害者性別分的非婚姻性騷擾、強暴、攻擊、兇殺：在家庭、工作場所與公共空間的發生率

依國家分的性別化

正式政治權力（所有資料依性別區分）

選舉權*，登記的選民，政黨成員

政府、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不同層級的公職人員

法律權利

依性別分的個人權利

機會均等、薪資平等等權利（如果有的話）*

同性戀權利

母職與父職權利，墮胎權

親權與婚姻權；依性別分的離婚權

繼承權

性別化國家政策 例如，徵兵，母職津貼，審查制

福利的性別化（所有資料依性別分）

平均壽命*，年齡中位數

死亡率（依原因與年齡分，包括產婦*和嬰兒*死亡率）

權病率，包括不孕發生率，性病比率

明確界定的失能

健康照護，例如接種疫苗

營養，青春期年齡

自殺率，犯罪率，酗酒等

生殖的性別化

性別比率*（特定年齡和總體）

避孕（類型、可取得程度、使用程度*），墮胎率*

總生育率（女性*；很少有男性資料）

生育率*（每千名成年女性五歲以下兒童數）

偏愛兒子或女兒，依性別而殺嬰

社會再生產的性別化

照顧兒童的設備

教育（依性別而論所有資料，並依年齡而定可行的地方）

識字率*

註冊入學* 與到課率

成就水準與專殊化

依年級、學科分的教師人數，學生程度

宗教

宗教信仰：對於性別認同、活動空間與機會的重要性

性別化習俗

性別化組織，例如俱樂部

性別和性慾特質的媒體再現

對強暴與毆妻的態度

嫁妝或新娘價碼

親屬關係體系

地域、區域或鄉村的多樣性

族群特性

抵抗：改變的性別化

尋求改變既有性別建構的組織

為受虐配偶、強暴受害者提供的避難所

資料來源：J. G. Townsend, 'Towards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gender',
Geographical Journal, 157 (1991), pp. 26-7, 表一

思考女性主義方法

女性主義者著手這項任務，促使世界不同地方的女性生活，更爲地理學家所見時，她們開始自問，是否可能有不同的做事方式。這個問題在以問卷調查、訪談和個案研究爲習慣研究方法的發展地理學、都市地理學，以及社會地理學領域裡，似乎格外重要。例如，或許有女性主義「執行」問卷的特殊方法？事實上，執行這個字眼很刺耳，就像傳統教科書針對人文地理學方法的忠告，唯恐有偏見或因私人互動而污染證據，必須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盡量客觀，不涉入其中。這有違婦女運動對於參與、感同身受，並支持我們的「姊妹」的重視。

234

表 9.2 取自 1980 年代早期，一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針對傳統研究方法和另類方法差異的一次討論，但是她的表同樣適用於當時的地理學（不過，有趣的是，比較這裡的另類方法特質，與 1980 年代地理學針對個案研究優點的討論之間的相似處，例見 Sayer and Morgan, 1985）。

235

一般認爲，協同研究方法必定是女性主義研究策略的一部份。有人認爲，訪談女性的女人，必須認識到她們的經驗共通性，並以之爲基礎，成爲研究者及其協同研究對象互換觀點的一環。因此，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歐克利（Ann Oakley, 1981），在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標題中聲明：「訪談女人：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由於體察到我們的人性，或者應該說，我們共同的女性氣質，利用互動式的女人屬性，而非質問式對話和訪談風格的女性特質，女性主義者受到鼓勵要跟其他女性分享經驗，提出不但與她們的研究對象有關，也是爲這些研究對象而做的研究結

236

果。相較於傳統的做研究方式，令人嚮往的女性主義研究風格特性，鋪陳於表 9.3，延伸了表 9.2 的一系列對比。

在探索與參與者的協同和非剝削關係方面，女性主義者提倡的最常見策略是質性方法論的某些變形，若非基於深度訪談，就是以參與式觀察和民族誌研究方法為基礎。因此，經常有人認為，質性、詳細、小尺度和深度的個案研究法，特別適合女人研究女人。這種方法善用了傾聽、移情的技巧，並確認（共享的）個人經驗。尤其是個案研究法，比起使用其他方法論取向和工具，被視為更能發展研究者及參與者之間，較不具剝削性且更為平等的關係。

在訪談者及她的回應者之間，隨著時間累積而建立的相互連結和關係，因此被視為研究過程的有效部分，而不是必須防範的事物。女性主義個案研究工作努力爭取的理想是互為主體性，而非客觀性，因此，互為主體性應該視為研究產出的一部份，而不是排除在最終成果之外。許多 1980 年代的女性主義方法文本，認為互動式的參與觀察特別適合做為達成女性主義目標的理想方法。如杜莉-克蓮（Duelli-Klein）所論，「使女人能夠以互動過程來研究女人的方法論，將會終結剝削做為研究客體的女人」（1983: 95）。

回顧這個似乎過分樂觀的觀點，以及最近有關研究方法的交流，人們越來越了解權力關係，甚至剝削，不會剛好因為我們都是女人，就變得不重要了。我們有必要思考我們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我們可能握有的權力。1992 年，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凱洛威（Helen Callaway）認為，「『引發知識』（engendering knowledge）的計畫，需要藉由仔細檢視身為性別化認同的我們自己，來展開對於其他社會的研究，包括探究它們的性別關係和意識形態。這

表 9.2 研究方法的對照性宣稱

主流方法聲稱	另類方法承認
執行研究與分析資料時的全然理性	研究與分析時，混合了理性、意外發現與直觀現象
符合科學	精確但富有藝術性
導向仔細定義的結構	導向過程
完全非關私人	涉及私人
以預測並控制事件和事物為目標	以理解現象為目標
關切對學者而言研究發現的效度	關切研究發現對學者和使用者社群的意義
客觀的	客觀與主觀的混合
能夠產生一般原則	能夠產生特殊解釋
關注可複製的事件和程序	關注獨特但頻頻發生的現象
能夠生產研究問題的完整分析	僅限於生產正在進行事件的局部發現
關注探討具事先定義概念的問題	關注在活的有機體內，田野本身產生的概念

資料來源：S. Reinharz, 'Experienti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 in G. Bowles and R. Duelli-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 168, 表 11.

意味了也要不斷檢視我們自己社會的論述中隱匿的權力關係」(參見 Callaway, 1992: 30)。

一旦你決定要研究誰，跟其他女人談話，獲得她們的信任，發現有關她們生活的各種事物，即使考慮到年齡、階級，以及有時候是國族的差異，使我們彼此區隔，這還是宛如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芬曲 (Janet Finch) 在一篇針對她自己關於神職人員妻子的

表 9.3 傳統研究方法與女性主義研究方法比較

	傳統或父權制的	另類或女性主義的
研究單位	事先定義清楚，指定為假設的操作性概念	鑲嵌於發生脈絡中的自然事件
焦點的明晰性	限定的，特殊化，嚴格限制的	廣泛，包羅萬象
資料類型	問卷、訪談和檔案中的態度與行動報告	目擊或經驗到的感情、行為、思想、洞識、行動
研究主題	源於學術文獻的易操縱議題，為了潛在學術貢獻而挑選，有時具有社會重要性	具有社會重要性的問題，有時候與學術文獻探討的議題有關
研究的角色：		
與環境的關係	要求控制，試圖操縱研究環境	開放，沈浸其中，服從環境並受環境塑
與對象的關係	不帶感情、超然的	涉入其中，承諾感，參與，命運共享
身為個人	不相干	有關係，被期待在過程中改變
對研究者的衝擊	不相干	有所預期、記錄、報告、評價
實施方法	經由設計、預先決定	取決於獨特田野環境特徵的方法
效度判準	證明，證據，統計，意義：研究必須可複製並產生相同結果，以取得有效研究發現	完整性，可信度，說明，理解，回應讀者的主體經驗；研究無法複製

理論的角色	做為研究設計的決定因素而具重要性	從研究的施行中浮現出來
資料分析	事先安排，仰賴演繹邏輯，所有資料「進來」就完成了	在研究期間完成，仰賴隨研究過程而改變的觀念
資料操作	利用統計分析	創造完形（gestalts）和有意義的模式
研究目的	假設檢定	透過有根據的概念和描述來發展理解
呈現格式	研究報告：關於事先聲明的假設的結果報告，或提出以工具取得的資料	故事，以新的概念來描述，包括發現過程的記載
失敗	統計上不顯著的變化	說明主題時的過程陷阱
價值	研究者的態度不被揭露、承認或分析，試圖保持中立，客觀	研究者的態度被描述與討論，承認、揭露、歸類價值
讀者角色	對學術社群發表，評價研究的設計、控管和研究發現	向學術社群和使用者社群發表；評估對於感受到的需要的有用性和回應

資料來源：S. Reinharz, 'Experienti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 in G. Bowles and R. Duelli-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p. 170-2, 表 11.4

和幼兒遊戲團體 (playgroup) 母親研究的評論中談到,「按照我的經驗,女性研究者可以毫不費力,就從其他女人那裡得到資料素材」(1983: 71)。不過,輕易就跟其他女人建立融洽的關係,不能使我們免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剝削性社會關係(雖然這些關係並不都是有利於研究者這一方),或甚至無法免除背叛我們的研究對象的危險。

自視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史黛西 (Judith Stacey, 1988, 1990),發現在她的加州矽谷家庭關係研究中,她開始懷疑質性方法能縮小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距離的假設。她發現,相較於她先前的研究,在她詳細描述兩個大家庭的民族誌田野工作歷程中,她更有可能(而非較少)與報導人 (informant) 關係緊密而涉入剝削關係、遺棄和背叛的網絡。因此,她認為,「正因為民族誌研究仰賴人際關係、約定和情感依附,致使研究對象蒙受遭到民族誌學者操弄和背叛的重大風險」(Stacey, 1988: 22-3)。她描述了幾種情況(女同性戀韻事,祕密的父子關係和非法活動),這些訊息使她感到定位於「不真實、不同的情況中,還有我現在會相信是田野工作方法內蘊潛在的,或許無可避免的背叛情況」(p. 23)。我研究倫敦市區向私人房東承租的貧困住戶的博士論文裡,也面臨類似問題,因為這些人要不是告訴我那些我寧願不知情的生活事項,就是更有要求或期望我在房客與房東的爭端上,提供意見或協助,而這種情形問題更大。

帕塔伊 (Daphne Patai) 在一篇有關互動式與培力 (empowering) 研究方法論的可能性——她自己針對「第三世界」女性的田野研究個案——的評論中,確認了類似議題。按她的說法,當「女性主義研究者無意中對研究對象產生吸引力,喚起她們的期望,並導致依賴」(1991: 143)時,就會有危險。研究女

人的女人很可能發現自己處於比較博學、權威、富裕的情勢，或者比她們研究的女人有更多使用各種資源的機會。很容易不經意引起爲了被研究的女人著想而積極介入的期待，這往往導致雙方都感到失望或背叛的感覺。

在巴西貧民窟擔任衛生保健工作者，後來以學院人類學家身分返回的薛波一修斯（Nancy Scheper-Hughes），探討了是否有可能既是田野研究者，又是政治／女性主義行動份子。她的書《死而無淚》（*Death without Weeping*, 1992），就是有關她在那裡長期投入的感人記述。她以和平團（Peace Corps）志工的身分，第一次接觸了村落。薛波一修斯當時才二十出頭，是一名公共衛生／社區發展工作者。她十五年後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回到村落，就以「學術的」而非個人的意義，試圖聯繫先前訪問時認識的同一批女人，與她們及其日常需求保持距離。但是在五年後的最後一次訪問中，薛波一修斯了解到，把她的學術角色與先前身爲朋友和行動份子的角色區隔開來，既不可能，也不恰當。在以下的摘述中，她解釋了自己立場的轉變。

240

1964 到 1966 年底，我第一次住在城鎮山坡上的簡陋小屋，在那裡工作，Lordes、Tonieta、Biu 及其家人與朋友，都是我的鄰居，她們的生活經驗像是一把魔杖，總是將我拉回以現象學為基礎的人類學。我對這個微小但令人苦惱的人類社群的經驗，現在已橫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個民族誌的根源，不在於某些理論的難題（雖然這裡也可以找到這些根源），而在於實際的現實和困境中（p. 4）。

頭一次接觸巴西的期間，我承認我將偶爾遇到的人類學家視為疏遠的個人，過度專注於深奧事物，大半脫離巴西的實際日常生活現實……。然而，過了十五年，到了我回來的時候，運載我回國

的交通工具是人類學，而非政治或社區行動主義……。至於 Lordes、Biu 與 Tonieta，她們加入我其他的舊時鄰居和同事，成為——我怕沒有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關鍵的「報導人」、研究「對象」，以及助理……。至少起初是這樣 (p. 14)。

在那次訪問期間，薛波一修斯決定將學術研究和政治行動主義區隔開來。

每次女人帶著她們要求的事項來找我商量時，我退卻地說，「這是為你安排的工作。現在我的工作不一樣。我無法同時既是人類學家，又是同伴 (companheira)」。我分享對於局外人在巴西社群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的適當分寸的新保留。但我的觀點並未得到重視 (p. 17)。

241

五年後我再度返回，〔我〕並不一直將我的時間均分為田野工作和社區工作，因為我的時間受到城鎮的男性及女性的行動主義者限定，並對我發號施令。如果他們是「我的」報導人，那麼我更是「他們的」海關人員 (despachante，促進或加速計畫前進的媒介者)，而且還「供他們隨意處置」。1985 年以來，我必須擔任雙重角色，但這仍是很難避免衝突的艱困平衡 (p. 18)。

這個例子裡，至少就某種意義而言，研究者比研究對象來得有權力，但顯然有種不利於研究者的權力和聲望不對等情勢。在我的商業銀行職業性別區隔研究裡，我是個懇求者，想接近忙碌、有權勢的人，卻沒什麼可以酬謝的東西。在這些或類似情況下，何種方法才恰當？芬曲評論道，我們很容易讓其他女人對我們訴說，雖然我發現，有權力的女人往往比置身其他處境的女人，更不願意透露她們的感情，以及有關她們生活的訊息。不過，女性研究者經常發現，相對而言，也很容易使男人向她們開

放，就像對富有同情心的女性聽眾敞開一樣（儘管男性報導人與女研究者之間的關係，跟研究者及研究對象性別相同時的關係，十分不同）。

那麼，利用一個人的女性氣質（甚至女性「詭計」）從男性回應人那裡獲取資訊，是否合乎倫理？我們應該／實際上呈現何種女性氣質形象（我們自己的哪個特殊面向）於不同的受訪者面前？雖然對於訪談男人的女人而言，促進訪談或許相對而言很容易，但這或許也顯示了令人沮喪的經驗，因為往往很難打破握有權力的男性／順服的女性、暢談的男人／傾聽的女人，這種二分法的慣例。我做過太多次這種訪談，有權位的男人不肯聽我說，逕自告訴我，他們認為我想聽的東西。

很明顯，如果訪問者是女人，訪問男人就挑戰了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假設。至少從性別角度看，那些有關共同生活經驗的主導觀念，以及與研究對象之間移情關係的發展，都不再適用。然而，這並不是說，應該打消女性主義對傳統研究法的批判。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接受訪問或從事訪談，都應該認真考慮凱洛威的評論：「深刻理解我們自己的性別化認同，以及我們存在的編碼複雜性，可以提供我們洞悉他人生活的最佳資源」（1992: 30）。

我們都是性別化的主體，而我們之間的研究互動，受到與我們的性別化認同有關的性別（涉及地位和權威，事關適得其所或不得其所）假設影響。考慮到這些人際關係，而非試圖忽視它們的反身性研究法和書寫風格，無論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女是男或是他們的關係，都同樣有效。這些方法，誠如瑞瑪扎諾哥魯（Ramazanoglu）所言，「改善」了我們的研究。

但所有仰賴質性方法的研究者，都面臨其他困難的倫理問題。例如，向那些我們知道會贊同我們觀點的人，揭露我們的研究目的，以及或許是我們的政治信念，但是對那些我們知道如果他們能解讀我們的思想的話，就會拒絕跟我們談話的報導人，隱瞞我們的目的，這種做法是否合乎倫理？對於我們可能覺得反感（可能是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的評論），但自認可以信賴我們的受訪者本身卻覺得能放心表達的觀點，應該如何回應？以下的摘錄中，斯瑪特（Carol Smart）概述了她訪談律師和地方行政官時面臨的一些問題：

與律師和地方行政官訪談時，運用女性主義研究實踐的機會很有限。我可以為自己開門，或是以大衣婉拒援助，但這種實踐幾乎不具革命性。事實上，以我的經驗而言，訪談律師和地方行政官，絕少提供女性主義實踐冒現的機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幾乎所有訪談都假定了，訪談者與受訪者分享相同的價值，以及或許是政治信念。這意味著訪談者為了表達反對觀點，不僅必須找到機會，而且在過程中，也動搖了施行訪談的推論結構。換言之，訪談會變得不可能進行（1984: 155-6）。

下一段摘錄中，清楚說明了這些倫理議題，不是女人或受女性主義啟發的研究獨有的，從事有關反種族歧視政策的政治工作的地理學家凱斯（Michael Keith），探討了他的博士田野研究，以及這項研究為他引起的議題。

我自己跟警察的參與式觀察研究……可以說是虛假的、不具代表性的、不民主的，或許還是站不住腳的（摘要）。

我關注……民族誌報導必然會產生的倫理衝突……。以直言不諱、特定議題的角度而言，民族誌學者如何回應研究對象的種族

主義、性別歧視，以及其他偏執表現？慣常的協議或許會認為，公開評斷這種表現並不恰當，會破壞民族誌的信賴。

我坐在因警察與黑人社區對峙而最為惡名昭彰的倫敦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分局之一的區域用車裡，由於不挑戰幾個讓我覺得反感的意見，我在車裡花了八個小時，默認兩名警察對維持治安的見解。只有幾個，因為絕非所有這些見解都能輕易歸類為種族主義，但是當我最後真的跟我的「報導人」吵起來，為的卻是比較普通的，而且我覺得幾乎算不上有爭議的政治（1992: 553）。

243

雖然沉默不語或努力掩飾不滿，或許是被允許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想危及互動，會建議這麼做。但是噤聲不語或「隱匿地」進行我們的研究，卻會引發更困難的問題。欺瞞我們的報導人有關我們的真實身分，是否被允許、合乎倫理？

例如，一些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研究者，為了研究工作場所的性別關係而加入工作，偷偷記錄她們同事的言行舉止。這裡是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摩斯（Pamela Moss）評論她的博士研究，以及她決定喬裝掩飾她的學生和研究者身分的理由。

我為了麥克麥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四階段的研究計畫。〔第一階段〕我受僱於管家經紀服務公司當女傭，為期三個半月……。但這是個困難的決定，我祕密從事這項工作。我以為這種全然投入，會讓我得到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的有關勞動過程的特殊洞見。我也認為，藉由置身於過程之中，我能替自己設定有效的目標，並且替來自內部的集體有效的社會與政治變遷，一起設定解放的目標（1995b: 83）。

當然，我的關心……〔它們〕位於我與受僱於經紀公司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同事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宣稱我是一名女性主義的馬

克思主義博士研究生，計畫研究在受薪家務勞動的後福特主義組織中，從事女傭工作會是什麼模樣，並嘗試在空間上片斷零碎的勞動過程中，尋找組織女性的方式。如此一來，我是否能獲得身為女傭而歷經的權力、勞動及管制的相同經驗？我誇大這個例子來說明一個重點：我想要的是在管家服務經紀公司當女傭的經驗，而不是身為想要有那種經驗的學生——即便我知道，我無法擁有這經驗（1995b: 84）。

摩斯發現，她的經驗和態度與其他女人之間的差異，意謂了她在許多狀況裡，並不能「融入其中」：譬如，她看不同的電視節目，午餐吃不同的東西，但她發現，當她踏在不誠實與坦誠之間的細線上時，就克服了這些差異。

我總是誠實不欺。我沒對我的狀況撒謊，也不自動提供錯誤訊息，誤導任何人。但是，就是在這個地方，開誠佈公的方式進來了，我等著被人詢問。雖然不容易，但我相信自己身為女人的意識，能推翻不舒服的感覺，而大部分時候，我都能辦到（p. 86）。

但摩斯在論文裡，並未揭露她是否對她的同事全盤托出了「真實」身分，或顯示她是否設法捲入了改善這些勞工階級女性命運的運動中。這使得我對她的宣稱感到不安。

有時候，祕密研究引發極度困難的倫理難題，就是在研究者的「祕密」身分使研究者知悉了非法活動，甚至是參與其中的情況下，該怎麼辦。人類學家布喬瓦（Philip Bourgois）在他迷人的書《尋求尊重：在郊區販售古柯鹼》（*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1995）裡，記述他和毒販一起走上街頭。雖然自己不會真正遭到逮捕，但為了維持他的報導人對他的信任，而必須進行交涉時所面臨的決定。由於他帶回家的年輕人，不時出現明顯的反社會行爲，他也發現他的婚姻處於緊張狀態。

採取質性、深度和互動研究方法所引發的這些倫理難題，沒有簡單的答案。正如我挑選的這些例子顯示，它們並非女性主義方法專有的問題。丹尼爾斯（Arlene Daniels）在一篇論及田野研究裡的自欺和自我發現的論文裡主張：

倫理問題的性質是，問題通常並不明確、不容易解決，或者最終無可解決。田野研究在性質上就是，你有可能發現自己身陷一堆私人關係、私密經驗，以及高傲與卑劣的情感，考驗著你自己的體面、虛榮或憤慨感受（1983: 213）。

雖然不可能有如何處理這些困難議題的普遍指引，但是在我看來，你必須堅持自己的倫理舉止與合宜標準，並且以如果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逆轉的話，你比較喜歡自己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他人。

解構女人

將女人納入地理學術研究的早期輕率年代，我們或許犯了將男女差異視為理所當然，假設女性有共同利益的錯誤。近期的研究挑戰了這些假設。女性主義研究的重點有所改變——從認為女性應該是我們研究主要焦點的當然假設，轉而強調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的社會建構，以及研究各種地方、環境和地理尺度上，從家和工作場所到國族，多元性別化認同的建構和維繫。這種重新對焦也導致除了（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對於物質社會關係的尋常關切外，也必須更重視象徵與意義的問題，更重視藝術、媒體、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裡的性別關係再現。如同我在導論裡主張的，這種重新對焦是整個社會和文化地理學中，更廣泛地轉向意義和再現問題的一環。

一個相關的重點轉變，環繞著經常令人痛苦的認知，那就是女人本身也置身於不均等權力關係網絡裡。這種認知質疑了先前對於身為女人的女人彼此具有共通性的想法。而且越來越清楚的是，現在不能再假設女人擁有共同利益，而必須探查這些共同利益的程度與基礎。正如有色人種女性長期以來指出的，她們在西方社會遭到種族主義撕裂的位置，不同於白人女性的位置。她們也根據其社會階級、年齡和家庭狀況、性傾向、是否身體健全，而有不同定位 (Chouinard and Grant, 1995)。這些社會區分在不同環境和地方，將某個女性群體與其他女性群體隔開，導致交錯的差異界線。於是，在特殊情況下，她們的利益也許衝突分歧，或是協調一致。所以，對 1990 年代的女性主義研究者而言，第一步就是質疑認為女人本身是可以探究的自明群體的假設，並探問是哪些女人、在什麼狀況下，以及為什麼，成為我的研究焦點。是什麼將特殊女性群體建構成為合適的探究範疇？回想起來，正如史考特 (Alison Scott) 提醒將男性納入女性主義研究中，現在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女人彼此有所差別。

關注於差異和女性的多元聲音，對女性主義研究者呈現研究結果的方式，造成了有趣的影響。誠如表 9.1 以及源自瑞茵赫茲 (Reinharz) 多年前出版論文的表 9.2 清楚說明的，女性主義學者一直都注意她們研究結果的暫時性，以及她們藉以再現「結果」的方式。然而，近期研究中，有個值得注意且受歡迎的嘗試，企圖解構學術作者聲音的權威性。作者在敘說不同男女生活的臨時故事的過程中，經常成為她自己研究的參與者。她自己的經驗和生命歷程，藉著向研究計畫參與者提出某些問題的方式，成為該過程的有效成分，而不再偽裝成學術「客觀性」。漸漸的，學術研究被視為眾多故事之一，甚至是「虛構」。在這方面，重新書

寫殖民歷史與地理的研究頗具啟發性，以最近重新詮釋的「證據」，來抗衡早期地理學家（通常是白人男性）的單一觀點：在帝國的書信和文件上，增添其他原始資料，例如女性的日誌和「僅僅」身為妻子的女人的信件，藉以敘說比較複雜且多向度的故事，這是在第七章主張過的。

在承認多元聲音是認識性別化認同本身的一部份的同時，似乎已然形成對女性主義研究根本基礎的嚴肅挑戰。後現代哲學的解構轉向，結合了近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內部的發展，廢除了先前年代的理性核心主體。假設男女有別，或是將男女之別，以及男女做為連貫一致認同的地位，視為不證自明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論，因而產生了難題。例如，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的相互連結，意味了有必要針對質疑自動賦予性別區分特權的做法，而且，普瑞特在她針對自己著作的回顧分析中認為，「我們開始拆解性別……〔並且〕敘說一個微妙且擴展的故事……一個充滿歧義、矛盾、多樣性的故事，交織著階級和性別權力、抵抗與改變的向度」（1993: 55）。

對某些人來說，承認複雜和歧義，使得他們懷疑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研究是否還有未來可言。吉普生—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在一篇名為〈若我知道就塞爆！〉（*Stuffed if I know!*）的悲觀論文裡，省思「後現代轉向」對地理學中女性主義研究的含意時，考慮到：

如果我們願意接受女人沒有整體、中心或真實性有待發現，那麼女性主義研究牽涉的是什麼？我們如何訴說我們身為女人的經驗？我們還能運用女人的經驗當做社會分析的資源嗎？是否有可能為女人做研究？我們怎能成功交涉多元且去中心化的女性認同？（1994: 206）

如這段引文所示，吉普生—葛拉罕（事實上，這是兩位女性主義者葛拉罕〔Julie Graham〕與吉普生〔Kathy Gibson〕，她們的聯合認同就是企圖動搖個人作者權威的姿態）仍然承諾了為女人而做研究的解放理想，以及性別建構成為女人和男人的二元劃分。不過，如同我於先前章節指出的，近來的研究中，二元區分遭到拆解，同時也闡明了性別、身體和性慾特質的區別。如我在第一章主張的，性別被某些學者理論化為流動不居，並透過自我反身性實踐而有改變的可能。

女性主義和後現代思想，在堅決主張認同之為建構的、論述的性質方面，以及在奇觀和操演的觀念上不謀而合，導致地理學裡女性主義研究的性質，產生了朝向我們或許會廣泛界定為文化領域的明顯轉變。檢視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概念，如何受到文本、象徵和物質產品，包括電影與文學、高級文化與通俗文化、紀念館與地景等的影響，並反映於其中，這方面的研究大幅成長。這意味了身為地理學家的我們，有必要學習在過去幾十年間，比較不常見的觀看與做研究方法。例如，文本分析與視覺分析，現在被納入許多地理學研究所教授的技能檔案，補充、甚至取代了受到舊社會科學影響的女性主義方法的社會調查法。

事實上，幾年前芭瑞特（Michelle Barrett）認為，「社會科學在學術上已經失去它們在女性主義內部的地位，新興明星則位居藝術、人文學科和哲學之列」（1992: 204-5）。檢視刊登於《性別、地方與文化》的論文，在這裡頗具啟發性，其他地理學期刊無疑比過去刊載了更多實例。只要人們依舊承認不均等物質結構的重要性，我發覺轉而檢視性別分化的象徵結構，深具解放性且能激勵人心。

結論

介紹了各種女性主義地理學術研究，就這樣，終於到了本書尾聲，讓我們以這些問題作結：性別仍然重要嗎？現在性別範疇過度流動不居，以至於毫無意義嗎？女性主義研究還有可能嗎？甚至，如果我們解構「女人」範疇，女性主義政治還有必要嗎？

如果你和我一起抵達本書結尾的話，我想你已經知道我的答案是什麼了。沒錯，我相信女性主義研究與政治仍舊很重要。雖然有可能解構一切經驗，主張一個人從來都不只是個女人（或男人）（例如，我在每一章都嘗試說明，性別無法與年齡、階級、種族，甚至是外貌分離），同樣清楚的是，我們居住在由權力關係構造的社會裡。在當代工業社會中，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以階級位置來區分人民。勞工階級男性和女性可能擁有共同利益，那是勞工階級女性和中產階級女性，或是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無法共享的。但這些社會裡猖獗的性別歧視，還是繼續使女人團結起來。隨著時間流逝，在不同社會，不同權力向度的相對重要性，會隨著權力關係的差別性構成而改變。例如在印度，當前種族、階級、性別與種姓制度的意義，不同於以往。權力關係變化多端，建構我們研究的分析範疇，必須能夠反映這種變化趨向。不過，這並非接受我們之間有毫無止盡的區分，或是承認權力關係流動不居，而易蒙受迅速變遷。我們的生活是由少數幾種重要的權力關係建構，性別正是其中之一。如波爾多（Susan Bordo）承認的，「無論喜歡與否，我們當前的文化中，我們的活動被編碼為『男性』和『女性』，而且會在『性別—權力關係』的主流系統中如此運作」（1990: 152，強調為原文所加）。

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在這裡有個重要任務：揭露這些性別—權力關係的變化、維持它們的方式，以及或許能夠撼動它們的辦法。藉此，我們得以參加這項計畫，顛覆目前我們被迫成為女人或男人的有限方式。

延伸閱讀

有許多討論女性主義方法的書籍，儘管很少針對地理學家而寫，而且地理學方法教科書有忽略女性主義研究的傾向。雖然蘿伯特（Helen Robert）的《從事女性主義研究》（*Doing Feminist Research*, 1981）出版年代久遠，我還是覺得這本書很有幫助。葛拉克與帕塔伊（S. Gluck and D. Patai）的《女人話語：女性主義口述歷史實踐》（*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1991）也很好，史黛西（Judith Stacey）的文章〈能不能有個女性主義民族誌？〉（*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1988），提出某些依然鮮明的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如果你在思考研究與研究方法的話，收錄在《專業地理學家》（*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4, 1995）、《加拿大地理學者》（*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95），以及《對蹠地》（*Antipode*, 1995）的地理學家所寫有關女性主義研究的論文，是個著手的好地方，但我認為思考不同的做研究方法，最有用的方式就是閱讀由女性主義學者發表的，有經驗基礎的論文和書籍。《性別、地方與文化》（*Gender, Place and Culture*）期刊是個起點，而且在我們的學科裡，有越來越多主要期刊持續刊載優秀的女性主義研究論文。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 Abdo, N. and Yuval-Davis, N. 1995: 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Zionist settler project. In D. Stasiulis and N. Yuval-Davis (eds), *Unsettling Settler Societies*. London: Sage.
-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s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 4, 139-58.
- Adler, S. and Brenner, J. 1992: Gender and space: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24-34.
- Afshar, H. (ed.) 1991: *Women,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ongman.
- Ainley, R. (ed.) 1998: *New Frontiers of Space, Bodies and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 Alcoff, L. 1988: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Signs*, 3, 404-36.
- Alcoff, L. and Potter, S. (eds) 1993: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 Alexander, S. 1987: Wome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A.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
- Allen, G. and Crow, G. (eds) 1989: *Home and Family: Recreating the Domestic Sphe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Allen, J. and McDowell, L. 1989: *Landlords and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J., Massey, D. and Cochrane, A. (eds) 1998: *Rethinking the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 Amadiume, I. 1987: *Male Daughters, Female Husbands: Gender and Sex in an African Society*. London: Zed Books.
- Amott, T. and Matthaei, J. 1991: *Race, Gender and Work: A Mult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treal and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 Andermahr, S., Lovell, T. and Wolkowitz, C. 1997: *A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rnold.
- Anderse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 (rev. and extended edn). London: Verso.
- Anker, R. and Hein, C. (eds) 1986: *Sex Inequalities in Urban Employment in the Third World*. Basingstoke: Macmillan.

-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 /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295-310.
- Ardener, S. (ed.) 1981: *Women and Space: Ground Rules and Social Maps*. London: Croom Helm.
- Ashcroft, B., Griffiths, G. and Tiffin, H. (eds) 1995: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Atwood, M. 1996: *Alias Grace*. London: Bloomsbury.
- Augé, M. 1996: *Non-places: The Anthropology of Super Modernity*. London: Verso.
- Auster, C. 1996: *The Sociology of Work: Concepts and Cases*. Pine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 Bachelard, 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1957). Boston: Beacon Press.
- Bahloul, J. 1992: *The Architecture of Memory: A Jewish-Muslim Household in Colonial Algeria, 1937-19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T. and Duncan, J. (eds) 1992: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 Barrett, C. 1996: 'A choice of nightmares': narration and desire in *Heart of Darknes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277-91.
- Barrett, M. 1992: Words and things: materialism and method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analysis. In M. Barren and A.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rren, M. and Phillips, A. (eds) 1992: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rron, R. and Norris, G. 1976: Sexual divisions and the dual labour market. In D. Barker and S. Alien (eds), *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Work and Marriage*. London: Longman.
- Barrows, S. 1981: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udelaire, C. 1963: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4). In *The*

-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ed. J. Mayne. Oxford: Phaidon Press.
- Baumann, P. 1996: *Contesting Culture: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 S. 1975: *Human Capital*. 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echey, V. 1977: Some notes on female wage labour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pital and Class*, 3, 45-66.
- Beechey, V. 1987: *Unequal Work*. London: Verso.
- Bell, D. 1995: [Screwing] Geography: guest editori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127-31.
-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5: *Mapping Desire*. London: Routledge.
-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London: Routledge.
- Bell, D., Binnie, J., Cream, J. and Valentine, G. 1994: all hyped up and no place to go.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 31-48.
- Best, S. 1995: Sexualizing space. In E. Grosz and E. Probyn (eds). *Sexy Bodies: The Strange Carnalities of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 Beynon, H., Hudson, R., Lewis, J., Sadler, D. and Townsend, A. 1988: 'It's all falling apart here':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uture in Teesside. In P. Cooke (ed.). *Localities: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 Bhabha, H. 1990: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lee, K. 1991: *Women of the Klan: Racism and Gender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mley, N. 1996: 'I'd like to dress her all over': masculinity, power and retailspace.' In N. Wrigley and M. Lowe (eds). *Retailing,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Towards the New Retail Geography*. Harlow: Longman.
- Blunt, A. 1994: *Travel, Gender and Imperialism*. London: Guilford.
- Blunt, A. and Rose, G. 1994: *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New York: Guilford.
- Bondi, L. 1990: Progress in geography and gender: feminism and differen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4, 438-45.
- Bondi, L. 1991: Gender divisions and gentrification: a critiqu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190-8.
- Bondi, L. 1992: Gender and dichotom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6, 98-104. Bondi, L. 1998: Gender, class and urban space: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in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s. *Urban Geography*, 19, 160-85.
- Booth, C., Darke, J. and Yeandle, S. (eds) 1996: *Changing Places: Women's Lives in the City*. London: Paul Chapman.
- Bordo, S.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sceptic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Bordo, S. 1992: Review essay: postmodern subjects, postmodern bodied. *Feminist Studies*, 18, 159-75.
-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 14-25.
- Bourgois, P.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wlby, R. 1985: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London: Methuen.
- Bowles, G. and Duelli-Klein, R. 1983: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oys, J. 1984: Is there a feminist analysis of architecture? *Built Environment*, 10, 25-34,
- Boys, J. 1990: Women and the designed environment. *Built Environment* 16, 249-56.
- Bozzoli, B. 1991: *The Women of Phokeng*. London: Currey.
- Bradley, H. 1989: *Men's Work, Women's Work*. Cambridge: Polity

- Press.
- Braidotti, R. 1994: *Nomadic Su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eitbart, M. M. and Pader, E.-J. 1995: Establishing ground: representing gender and race in a mixed housing development.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5-20.
- Brewer, R. M. 1993: Theorizing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S. M. James and A. P. A. Busia (eds). *Theorizing Black Feminisms: The Visionary Pragmatism of Black Women*. London: Routledge.
- Brion, M. 1994: Snakes and ladders? Women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housing. In R. Gilroy and R. Woods (eds). *Housing Women*. London: Routledge.
- Bristow, J. 1997: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Brydon, L. and Chant, S. (eds) 1989: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Gender Issu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London: Edward Elgar.
- Buck-Morss, S. 1991: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urgess, J. 1996: Focusing on fear. *Area*, 28, 130-5.
- Burgess, J., Harrison, C. and Limb, M. 1988: People, parks and the urban green: a study of popular meanings and values for open spaces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25, 455-73.
- Butler, J. 1990a: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1990b: Gender trouble: feminist theory and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 Cain, M. 1986: Realism, feminism, methodology and the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14, 255-67.
- Callaway, H. 1992: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gender implications in fieldwork and texts. In J. Okely and H. Callaway (eds),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Cameron, D. 1985: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Campbell, B. 1984: *Wigan Pier Revisited*. London: Virago.
- Campbell, B. 1988: *Unofficial Secrets: Child Sex Abuse – the*

- Cleveland Case*. London: Virago.
- Campbell, B. 1993: *Goliath: Britain's Dangerous Places*. London: Methuen.
- Carsten, J. and Hugh-Jones, S. (eds) 1995: *About the House: Lévi 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ebourne, J. 1997: *Lesbian gentrification in San Francisco*.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sey, C. 1995: *Work, Self and Society: After Indust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Cassady, S. 1990: *Off the Road*. London: Black Spring.
- Castells, M. 1978: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Arnold.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London: Edward Arnold.
- Cavendish, R. 1983: *Women on the Lin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Chant, S. 1991: *Women and Survival in Mexican Cities: Perspectives on Gender, Labour Markets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ant, S. and McIlwaine, C. 1995: *Women of a Lesser Cost: Female Labour, Foreign Exchange an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London: Pluto.
- Chatwin, B. 1979: *In Patagonia*. London: Picador.
- Chatwin, B. 1987: *The Songlines*. London: Cape.
- Chatwin, B. 1988: *Utz*. London: Cape.
- Chauncey, G. 1995: *Gay New York: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 London: Flamingo.
- Chouinard, V. and Grant A. 1995: On not being anywhere near 'the project' *Antipode*, 27, 137-66.
- Christopherson, S. 1989: On being outside 'the project'. *Antipode*, 21, 83-9.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ckburn, C. 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 Change*. London: Pluto Press.
- Cockburn, C. 1986: *Machinery of Dom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Cockburn, C. 1991: *In the Way of Women: Man's Resistance to Sex Equality in Organisation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Collinson, D. and Hearn, J. 1994: Naming men as men: implications for work,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 2-22.
- Colomina, B. (ed.) 1992: *Sexuality and Space*. Princet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sgrove, D. 1993: Commentary: On The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by Price and Lewi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515-17
- Cosgrove, D. and Daniels, S. 1988: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wan, R. S.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ward, R.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Sexu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oward, R. 1984: *Female Desire*. London: Paladin.
- Craig, C., Rubery, J., Tarling, R. and Wilkinson, F. 1982: *Labour Market Structure,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and Low P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ig, S. (ed.) 1992: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edia*.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Crang, P. 1994: It's show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675-704.
- Crompton, R. and Sanderson, K. 1990: *Gendered Jobs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Unwin Hyman.
- Daniels, A. K. 1983: Self-deception and self-discovery in fieldwork. *Qualitative Sociology*, 6, 195-214.
- Davidoff, L. and Hall, C. 1987: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London: Hutchinson.

- Davies, M. L. 1978: *Maternity: Letters from Working Class Wives* (1915). London: Virago.
- Davis, A. 1981: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Davis, K. 1991: Remaking the She-Devil: a critical look at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eauty. *Hypatia*, 6, 23-34.
- Davis, M. 1989: *City of Quartz*. London: Verso.
- de Almeida, M. V. 1996: *The Hegemonic Male: Masculinity in a Portugese Town*. Oxford: Berghahn.
- de Beauvoir, S. 1972: *The Second Sex* (1949).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ebord, G. 1994: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 De Certeau, M. 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Lepervanche, M. 1989: Women, nation and the state in Australia. In N. Yuval-Davis and F. Anthias (eds), *Women-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 Dennis, N., Henriques, F. and Slaughter, C. 1956: *Coal is our Life*. London: Tavistock.
- Dex, S. 1985: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Brighton: Wheatsheaf.
- Di Leonardo, M. 1991: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Feminist Anthropology in the Postmodern Er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prose, R. and Ferrel, R. (eds) 1991: *Cartographies: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Mappings of Bodies and Spaces*. Sydney: Alien and Unwin.
- Domosh, M. 1988: Geography and gender: home, aga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 276-82.
- Domosh, M. 1991a: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95-104.
- Domosh, M. 1991b: Beyond the frontier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88-90.
- Domosh, M. 1996a: *Invented Cities: The Creation of Landscape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Bost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mosh, M. 1996b: The feminized retail landscape: gender, ideology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ity. In N. Wrigley and M. Lowe (eds), *Retailing,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Towards the New Retail Geography*. Harlow: Longman.
- Donaldson, M. 1991: *Time of our Lives: Labour and Love in the Working Clas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Donaldson, M. 1993: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22, 643-57.
-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Hutchinson.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ouglas, M. 1973: *Natural Symbo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owler, L. 1998: 'And they think I'm just a nice old lady': women and war in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5, 159-76.
- Dowling, R. 1993: Femininity, place and commodities: a retail case study. *Antipode*, 25, 295-319.
- Driver, F. 1992: Geography's empire: histori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Society and Space*, 10, 23-40.
- Duberman, M., Vicinus, M. and Chauncey, G. (eds) 1991: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London: Penguin.
- DuCille, A. 1996: *Skin Trad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elli-Klein, R. 1983: How to do what we want to do: thoughts on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D. Bowles and R. Duelli-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u Gay, P. 1996: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Sage.
- Duncan, J. 1990: *City as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J. and Duncan, N. 1988: (Re)reading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117-26.
- Duncan, J. and Ley, D. 1994: *Place / Culture /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 Duncan, N. 1996a: Renegotiat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In N. Duncan (ed.), *BodySpace*. London: Routledge.

- Duncan, N. (ed.) 1996b: *BodySpace*. London: Routledge.
- Dworkin, A. 1974: *Woman-Hating*. New York: Dutton.
- Dyck, I. 1993: Ethnography: a feminist method? *Canadian Geographer*, 37, 50-2.
- Dyck, I. 1995: Hidden geographies: the changing life worlds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Social Science in Medicine*, 40, 307-20.
- Dyck, I. 1996: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and everyday geographies: home space and the contested body. In R. A. Kearns and W. M. Gesler (eds). *Putting Health into Place: Landscape, Identity and Well-being*.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Ehrenreich, B. 1997: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the History of Wa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 Ehrlich, A. 1987: Israel: conflict, war and social change. In C. Creighton and M. Shaw (eds).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Macmillan.
- Eisenstein, Z. 1979: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isenstein, Z. 1994: *The Colour of Gender: Reimagining Democrac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shtain, J. 1987: *Women and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son, D. and Pearson, R. 1981: 'Nimble fingers make cheap workers': an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ird World export manufacturing. *Feminist Review*, 7, 87-107.
- Engels, F. 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England, K. 1994: Getting personal: reflexivity, positionality and feminist research.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80-9.
- England, K. (ed.) 1997: *Who Will Mind the Baby?* London: Routledge.
- England, K. and Stiell, B. 1997: They think you're as stupid as your English is': constructing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Toront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95-215.
- Enloe, C. 1983: *Does Khaki Become You? The Militarization of Women's Liv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ndora.

- Enloe, C. 1993: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vans, M.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vans, M. and Redclift, N. 1987: *Engels Revisited*. London: Tavistock.
- Falk, P. 1994: *The Consuming Body*. London: Sage.
- Faulkner, A. and Lawson, V. 1991: Employment versus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women's work in Ecu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7, 16-47.
- Feathersone, M., Hepworth, M. and Turner, B. (eds) 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 Finch, J. 1983: 'It's great to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eth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viewing women. In C. Belland and H. Roberts (eds). *Social Researching: Politics, Problems,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Fincher, R. and Jacobs, J. M. (eds) 1998: *Cities of Difference*. New York: Guildford.
- Fine, M., Weis, L., Addleston, J. and Mazuza, J. 1997: (In)secure times: constructing white working class masculinitie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Gender and Society*, 11, 52-68.
- Fiske, J. 1992: *Reading the Popular* (1989). London: Routledge.
- Fiske, J. 1993: *Power Plays, Power Works*. London: Verso.
- Fitzgerald, F. 1986: *Cities on the Hill*. New York: Pantheon.
- Fitzgerald, S. F. 1971: My lost city. In A. Trachtenberg, P. Neill and P. C. Bunnell (eds), *The City: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ax, J. 1990: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rest, B. 1995: West Hollywood as a symbol: the significance of pl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ay 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133-57.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ien Lane.
- Foucault, M.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ien Lane.
- Foucault, M. 1987: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London: Penguin.
- Foucault, M. 198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London: Alien Lane.
- Fox-Genovese, E. 1986: The claims of a common culture: gender, race, class and the canon. *Salmagundi*, 72, 119-32.
-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London: Routledge.
-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6, 56-80.
- Fraser, N. 1991: False antitheses: a response to Seyla Benhabib and Judith Butler. *Praxis International*, 11, 166-77.
- Fraser, N. 1994: After the family wage: gender equ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22, 591-618.
- Fraser, N. 1995: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no. 212, 68-93.
- Fraser, N. 1997a: A rejoinder to Iris Young. *New Left Review*, no. 223, 126-9.
- Fraser, N. 1997b: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Friedman, J. 1997: Simplifying complexity: assimilating the global in a small paradise. In K. F. Olwig and K. Hastrup (eds). *Siting Culture: The Shifting Anthropological Object*. London: Routledge.
- Frisby, D. 1985: *Fragment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robel, F., Heinrichs, J. and Kreye, O.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entes, A. and Ehrenreich, B. 1983: *Women in the Global Factor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Fuss, D. 1990: *Essentially Speaking*. London: Routledge.
- Game, A. and Pringle, R. 1984: *Gender at Work*. London: Pluto.
- Gatens, M. 1991: A critique of the sex / gender distinction. In S. Gunew (ed.), *A Reader in Feminist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Gatens, M. 1992: Power, bodies and difference. In M. Barrett and A.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avron, H. 1968: *The Captive W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eltmaker, T. 1992: The queer nation acts up: health care, politics and sexual diversity in the County of Angel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609-50.
- Gewertz, D. 1984: The Tchambuli view of persons: a critique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orks of Mead and Chodorow.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 615-29.
- Gibson, J. W. 1994: *Warrior Dreams: Paramilitary Culture in Post-Vietnam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Gibson, K. 1991: Company towns and class process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285-308.
- Gibson-Graham, J. K. 1994: 'Stuffed if I know!':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 feminist social research.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 205-24.
-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ings, P. 1984: *When and Where I Enter . . . : The Impact of Black Women on Race and Sex in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Gilbert, M. 1994: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at 'hom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90-5.
- Gilman, C. Perkins 1966: *Women and Economics* (1898).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lman, C. Perkins 1979: *Herland* (191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lman, C. Perkins 1981: *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 London: Virago.
- Gilmore, D. 1990: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Hutchinson.
-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 Glenn, E. W.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ur. *Signs*, 18, 1-43.
- Gluck, S. and Patai, D. (eds) 1991: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Glucksmann, M. 1995: Why 'work'? Gender and 'the tot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ur'.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2, 275-94.
- Gorham, C. 1997: Benign intentions. *The Guardian* 2, 19 Feb., p. 7.
- Greed, C. 1991: *Surveying Sisters: Women in a Traditional Male Profession*. London: Routledge.
- Greed, C. 1994: *Women and Planning: Creating Gendered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Greer, G. 1970: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 Greer, G. 1985: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London: Picador.
- Greer, G. 1997: Do what I say. *Observer Review*, 11 Jan. p. 5.
- Gregory, D.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Gregson, N. and Lowe, M. 1994: *Servicing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Routledge.
- Gronow, J. 1997: *The Sociology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Grossberg, L. 1996: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is that all there is? In S. Hall and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Grosz, E. 1990: Inscriptions and body maps: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corporeal. In T. Threadgold and A. Cranny-Francis (eds). *Feminine, Masculine and Representation*. Sydney: Alien and Unwin. (There is an edited version of this paper in L. McDowell and J. Sharp (eds), *Space, Gender, Knowledge*. London: Arnold, 1997.)
- Grosz, E. 1992: Bodies-Cities. In B. Colomina (ed.). *Sexuality and Spac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Grosz, E.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unew, S. (ed.) 1990: *Feminist Knowledge: Critique and Construct*. London: Routledge.
- Gunew, S. (ed.) 1991: *A Reader in Feminist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Halford, S. 1989: Spatial divisions and women's initiatives in 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Geoforum*, 20, 161-74.
- Halford, S. 1992: Feminist change in a patriarchal institution: the experience of women's initiatives in local government. In M. Savage and A. Witz (eds). *Gender and Bureaucracy*. Oxford: Blackwell.
- Halford, S. and Savage, M. 1995: Restructuring organisations, changing people.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9, 97-122.
- Halford, S. Savage, M. and Witz, A. 1997: *Gender, Careers and Organis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Hall, C. 1982: The butcher, the baker, the candle-stick maker: the shop and the fami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 Whitelegg et al. (eds).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Women*.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Hall, C. 1992: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Reprinted in L. McDowell (ed.), *Undoing Place?* London: Arnold, 1997b.)
- Hamnett, C 1991: The blind man and the elephant: explanations of gentrific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173-89.
- Hannerz, U.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Hanson, S. 1992: Geography and feminism: worlds in collis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569-86.
- Hanson, S. and Johnston, I. 1985: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trip length. *Urban Geography*, 6, 193-219.
- Hanson S. and Monk, J. 1982: On not excluding half of the human in

- human geography.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34, 11-23.
- Hanson, S. and Pratt, G. 1995: *Gender, Work and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Hareven, T. 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O. 1980: The power of signs: gender, culture and the wild in the Bolivian Andes. In C. MacCormack and M. Strathern (eds). *Nature, Gender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C. and Burgess, J. 1994: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n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licts over Rainham Marshes SSSI.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 291-310.
- Harrison, C., Limb, M. and Burgess, J. 1987: Nature in the city: popular values for a living worl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5, 347-62.
- Harvey, D. 1971: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rvey, D. 1992: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588-601.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 Haug, K. 1992: Myth and matriarchy: an analysis of the mammy stereotype. In J. Fuenmayer, K. Haug and F. Ward (eds). *Dirt and Domesticity: Constructions of the Feminine*. 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 Hayden, D. 1976: *Seven American Utopias: The Architecture of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1790-1935*.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yden, D.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yden, D. 1984: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 Norton.
- Hayden, D.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arn, J. and Parkin, P. 1987: *Sex at Work*. Brighton: Wheatsheaf.
- Heilbrun, C. G. 1988: *Writing a Woman's Lif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Herdt, G. 1981: *Guardians of the Flute*. New York: McGraw Hill.
- Herdt, G. (ed.) 1992: *Gay Culture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 Heron, L. (ed.) 1983: *Streets of Desire: Women's Fic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ity*. London: Virago.
- Herzfeld, M. 1985: *The Poetics of Manho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witt, V. 1994: *Beauty and the Banknote: Images of Women on Paper Mone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 Hindle, P. 1994: Gay communities and gay space in the city. In S. Whittle (ed.), *The Margins of the City: Gay Men's Urban Lives*. London: Arena.
- Hirst, P. and Thompson, G.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ndagneu-Sotelo, P. and Avila, E. 1997: 'I'm here, but I'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 548-71.
- hooks, b. 1982: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London: Pluto Press.
- hooks, b. 1991a: Choosing the margin as a space of radical openness. In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Books.
- hooks, b. 1991b: Homeplace: a site of resistance. In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Books.
- hooks, b. 1991c: Representations of whiteness in the black imagination. In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ooks, b. 1994: *Outlaw Culture: Resisting Represen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Humphries, J. 1977: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work-

- ing-class famil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241-58.
-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Cape.
- Ignatieff, M. 1992: Why 'community' is a dishonest word. *Observer*, 3 May.
- Irigaray, L. 1987: Sexual difference. In T. Moi (ed.),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Jackson, S. 1993: *Women's Studies: Essential Reading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1995: *Edge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 Jacobus, M., Fox Keller, E. and Shuttleworth, S. (eds), 1990: *Body / Politics: Women and the Discourses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Jagger, A. and Bordo, S. (eds) 1989: *Gender / Body /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 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Jarosz, L. 1992: Constructing the dark continent: metaphors as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 *Geografiska Annaler*, 74B, 105-15.
- John, A. 1980: *By the Sweat of their Brow: Women Workers at Victorian Coal Mines*. London: Groom Helm.
- Johnson, N. 1995: Cast in stone: monuments, geography and nation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51-65.
- Johnston, L. 1996: Flexing femininity: female body-builders refiguring the bod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327-40.
- Johnston-Anumonwo, I. 1992: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typ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trip distanc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4, 161-9.
- Jones III, J. P., Nast, H. and Roberts, S. (eds) 1997: *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New York and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Kandiyoti, D. 1988: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and Society*, 2, 274-90.
- Kanter, R.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Organis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nter, R. 1992: *The Challenge of Organisational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 Kaplan, C. 1996: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atz, C. 1994: Playing the field: questions of fieldwork in geography.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67-72.
- Katz, C. and Smith, N. 1993: Spatializing metaphors: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In M. Keith and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Kaufman, M. 1993: *Cracking the Armour: Power, Pain and the Lives of Men*. Toronto: Viking.
- Keith, M. 1992: Angry writing: (re)presenting the unethical world of the ethnograph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551-68.
- Kelly, M. P. Fernandez, 1994: Towanda's triumph: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the urb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8, 88-111.
- Kerfoot, D. and Knights, D. 1994: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paternalism. In S. Wrigilt (ed.). *Anthropology of Organis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rouac, J. 1992: *On the Road (1957)*. London: Penguin.
- Kimmel, M. 1988: *Changing Men: New Research on Masculinity*. London: Sage.
- Kinsman, P. 1993: Landscapes of national non-identity: the landscape photography of Ingrid Pollard. Working Paper 17,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Kinsman, P. 1995: Landscape,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photography of Ingrid Pollard. *Area*, 27, 300-10.
- Kirby, A. 1995: Straight talk on the PomoHomo questio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89-95.
- Kirby, K. 1996: *Indifferent Boundaries: Spatial Concepts of Human Subjectivity*. London: Guilford Press.
- Klein, A. M. 1993: *Little Big Men: Body Building, Subculture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Albany, N.Y.: SUNY Press.
- Knights, D. and Willmott, H. (eds) 1986: *Gender and the Labour*

- Process*. Aldershot: Gower.
- Knopp, L. 1987: Social theory,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policy: recent accomplishments of the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s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1, 243-61.
- Knopp, L. 1990: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gay involvement in an urban land movement.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9, 337-52.
- Knopp, L. 1992: Sexualit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capit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651-669.
- Knopp, L. 1995: If you are going to get all hyped up you'd better go somewher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85-9.
- Kobayashi, A. 1994: Colouring the field: gender,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fieldwork.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73-9.
- Kobayashi, A. and Peake, L. 1994: Unnatural discourse: 'race' and gender in geograph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 225-43.
- Koolhaas, R. 1978: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Koontz, C. 1986: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Cape.
- Kristeva, J. 1986: Women's time (1979). In T. Moi (ed.),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Lacquer, T. 1990: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mphere, L., Ragoné, H. and Zavella, P. 1997: *Situated Lives: Gender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Laslett, P. (ed.) 1967: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uria, M. and Knopp, L. 1985: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ay communities in the urban renaissance. *Urban Geography*, 6, 152-69.
- Laws, G. 1994: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Urban Geography*, 15, 603-11.
- Laws, G. 1997: Women's life course, spatial mobility and state policies. In J. P. Jones III, H. Nast and S. Roberts (eds), *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Leavitt, J. and Saegert, S. 1990: *From Abandonment to Hope:*

- Community Households in Harl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 Leidner, R. 1991: Selling hamburgers and selling insurance. *Gender and Society*, 5, 154-77
- Leidner, R. 1993: *Fast Food, Fast Tal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évi-Strauss, C. 1983: *The Way of the Masks*, trans. S. Modelski. London: Jonathan Cape.
- Lévi-Strauss, C. 1987: *Anthropology and Myth: Lectures 1951-82*. Oxford: Blackwell.
- Lewis, C. and Pile, S. 1996: Woman, body, space: Rio Carnival an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23-42.
-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6: *Money / Space :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Lim, L. 1983: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patriarchy: the dilemma of third world women workers in multinational factories. In J. Nash and M. P. Fernandez Kelly (eds).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lbany N Y.: SUNY Press.
- Little, J. 1994: *Gender, Planning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Little, J., Peake, L. and Richardson, P. (eds) 1988: *Women in Cities*. London: Macmillan.
- Livingstone, D.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Blackwell.
- Loftus, B. 1990: *Mirrors: William III and Mother Ireland*. Dundrum: Picture Press.
- Longhurst, R. 1995: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97-
- Longhurst, R. 1996: Refocusing groups: pregnant women's geographical experiences of Hamilton, New Zealand / Aotearoa. *Area*, 28, 143-9.
- Longhurst, R. 1997: (Dis) embodied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 486-501.

- Longhurst, R. and Johnston, L. 1998: Embodying places and emplacing bodies: pregnant women and women body builders. In R. DuPleiss and L. Alice (eds), *Feminist Thought in Aotearoa / New Zealand*.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vell, T. (ed.) 1990: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Lowe, M. and Crewe, L. 1996: Shop work: image, customer car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retail employment. In N. Wrigley and M. Lowe (eds). *Retailing,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Towards the New Retail Geography*. Harlow: Longman.
- Luxton, M. 1980: *More than a Labour of Love*. Toronto: Women's Press.
- Lyons, M. 1996: Employment, feminis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in London 1981-93.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341-56.
- Liotard, J.-F. 1989: *The Lyotard Reader*, ed. A. Benjamin (including passages from *Le Mur du Pacifique*, trans. P. Brochet, N. Royle and K. Woodward), Oxford: Blackwell.
- MacCannell, D. 1994: Cannibal tours. In L. Taylor (ed.), *Visualizing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McClintock, A. 1994: *Imperial Leather*. London: Routledge.
- MacCormack, C. and Strathern, M. 1980: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Dowell, L. 1983: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division of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 15-30.
- McDowell, L. 1991a: Life without Father and Ford: the new gender order of post-Ford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00-19.
- McDowell, L. 1991b: The baby and the bathwater: deconstruction, diversity and feminist theory in geography. *Geoforum*, 22, 123-34.
- McDowell, L. 1992a: Space, 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part 1: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relat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 157-79.
- McDowell, L. 1992b: Space, 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part 2: Identity, difference, feminist geometries and geographies. *Progress*

- in Human Geography*, 17, 305-18.
- McDowell, L. 1992c: Doing gender: feminism, feminist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7, 399-416.
- McDowell, L. 1994a: Making a difference: geography, feminism and everyday life - an interview with Susan Hanson.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18, 19-32.
- McDowell, L. 1994b: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 D. Gregory, M. Martin and G. Smith (eds). *Human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 McDowell, L. 1994c: Polyphony or commodified cacophony: making sense of other worlds and pedagogic authority. *Area*, 26, 241-8.
- McDowell, L. 1994d: Social justice, organisational culture and workplace democracy. *Urban Geography*, 15, 661-80.
- McDowell, L. 1996: Off the road: an alternative view of mobility, resistance and the Beat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 412-19.
- McDowell, L. 1997a: *Capital Culture: Gender at Work in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 McDowell, L. 1997b: *Undoing Place?* London: Arnold.
- McDowell, L. 1997c: The new service class: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life-style among London bankers in the 1990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2061-78.
- McDowell, L. and Massey, D. 1984: A woman's place? In D. Massey and J. Allen : (eds). *Geography Ma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Dowell, L. and Peake, L. 1990: Women in geography revisited.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14, 19-30.
- McDowell, L. and Sharp, J. (eds) 1997: *Space, Gender, Knowledge: Readings in Feminist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 McDowell, L. and Sharp, J. 1999: *A Glossary of Feminist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 McKay, G. 1995: *Senseless Acts of Beauty*. London: Verso.
- Mackenzie, S. 1989: *Visible Histories: Women and Environments in a Post-war British City*.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S. and Rose, D. 1983: Industrial chang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home life. In J. Anderson, S. Duncan and R. Hudson (eds). *Redundant Spaces and Industrial Decline in Cities and Reg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McNay, L. 1992: *Foucault and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digan, R. and Munro, M. 1991: Gender, house and "home": social meanings and domestic architecture in Britain.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Research*, 8, 116-31.
- Maffesoli, M. 1995: *The Time of the Tribes*. London: Sage.
- Mairs, N. 1989: *Remembering the Bone House: An Erotics of Place and Spa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Malik, S. 1992: Colours of the countryside - a whiter shade of pale. *Ecos*, 13, 33-9
- Malson, M. R., Mudimbe-Boyi, E., O'Barr, J. F. and Wyer, M. (eds) 1990: *Black Women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ngan, J. and Walvin, J. 1992: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 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 to 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 (ed.) 1994: *Perilous States: Conversations on Culture, Politics and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tin, E. 1987: *The Wome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Marshall, J. 1984: *Women Managers: Travellers in a Male World*. London: John Wiley.
- Mascia-Lees, F., Sharp, P. and Cohen C. B. 1989: The postmodern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igns* 15, 7-33.
- Massey, D.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 Massey, D. 1991: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 24-9 June. (Also reprinted in T. Barnes and D. Gregory (eds).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6, and in S. Daniels and R. Lee (eds), *Human Geography: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 Massey, D. 1992: Politics and space / time. *New Left Review*, no. 196, 65-84.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ssey, D. 1995: Masculinity, dualisms and high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 487-99.
- Massey, D. 1997: Economic / non-economic. In D. Lee and J. Wills (eds).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rnold.
- Massey, D. 1998: Living in Wythenshawe. In I. Borden, J. Kerr, A. Pivaro, and J. Russell (eds), *Unknown City*. Brighton: Wiley.
- Massey, D. and Alien, J. (eds) 1984: *Geography Ma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sey, D. and Jess, P. 1995: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Places, Culture and Globali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rix 1984: *Making Space: Women and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London: Pluto Press.
- Mattingly, D. 1996: Domestic service, migration and local labour markets on the US-Mexican border.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Geography,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ss.
- Maupin, A. 1980: *Tales of the City*. London: Corgi.
- Maupin, A. 1984: *More Tales of the City*. London: Corgi.
- Maupin, A. 1986: *Babycakes*. London: Corgi.
- Mayer, T. (ed.) 1994: *Women and the Israeli Occupation: The Politics of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Meigs, A. 1990: Multiple gender ideologies and statuses. In P. R. Danday and R. Goodenough (eds). *Beyond the Second Sex: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Merchant, C.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 Mertes, C. 1992: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women and domestic labour. In J. Fuenmayer, K. Haug and F. Ward (eds), *Dirt and Domesticity: Constructions of the Feminine*. 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 Merves, E. S. 1992: Homeless women: beyond the bag lady myth. In M. J. Robertson, and M. Greenblatt (eds), *Homelessness: A 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lenum.

- Messner, M. A. 1992: *Power at Play: Sports and the Problem of Masculi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 Metcalf, A. and Humphries, M. (eds) 1985: *The Sexuality of Men*. London: Pluto.
- Milkman, R. 1987: *Gender at Work: the Dynamics of Job Segregation by Sex During World War 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N. 1988: *Subject to Change: Reading Feminist Wri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1988: Life on the upslope: the postmodern landscape of gentrifi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169-89.
- Mills, S. 1996: Gender and colonial spac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125-47.
- Mirza, H. S. (ed.) 1997: *Black British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 Mitchell, D. 1995: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People's Park, definitions of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5, 109-33.
- Mitchell, J. 1974: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oghadam, V. (ed.) 1994: *Identity Politics and Women: Cultural Reassertions and Feminism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ohanty, C T. 1991: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In C. T. Mohanty, A. Ru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msen, J. 1980: Women in Canadian 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y*, 24, 177-83.
- Momsen, J. 1991: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Momsen, J. and Kinnaird, V. 1993: *Different Voices, Different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Momsen, J. and Townsend, J. (eds) 1987: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Hutchinson.
- Monk, J. 1994: Contextualizing feminis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GU Working Paper 27*, Commission on Gender and Geography,

- Washington, DC.
- Moore, H. 1986: *Space, Text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H. 1988: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ore, H. 1994: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rgan, G. and Knights, D. 1991: Gendering jobs: corporate strategy, managerial control and the dynamics of job segreg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5, 181-200.
- Morris, L. 1992: *The Workings of the Househo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rrison, T. 1992: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 F. 1995: Archaeologies of city life: commercial culture, masculinity, and spatial relations in 1980s Lond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573-90.
- Mort, F. 1996: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Space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Morton, M. 1995: *The Tunnel: The Underground Homeless of New Y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ss, P. 1995a: Inscribing workplaces: the spatiality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Growth and Change*, 26, 23-57.
- Moss, P. 1995b: Reflections of the 'gap' as part of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 design. *Antipode*, 27, 82-90.
- Moss, P. 1997: Spaces of resistance, spaces of respite: franchise housekeepers keeping house in the workplace and the hom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4, 179-96.
- Moss, P. and Dyck, I. 1996: Inquiry into environment and body: women, work and chronic illnes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 737-53.
- Nash, C. 1993: Remapping and renaming: new cartographies of identity, gender and landscape in Ireland. *Feminist Review*, 44, 39-57.
- Nash, C. 1996a: Men again: Irish masculinity, nature and nationhoo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cumene*, 3, 427-53
- Nash, C. 1996b: Reclaiming vision: looking at landscape and the

- bod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149-70.
- Nash, J. and Kelly, M. Fernandez- (eds) 1983: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lbany New York: SUNY Press.
- Nast, H. 1994: Opening remarks on 'women in the field'.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54-66.
- Nast, H. 1998: Unsexy geographie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5, 191-206.
- Nast, H. and Kobayashi, A. 1996: (Re)corporalizing vision. In N. Duncan (ed.), *BodySpace*. London: Routledge.
- Nast, H. and Pile, S. (eds) 1998: *Places through the Body*. London: Routledge.
- New C. 1997: Man bad, woman good? Essentialisms and ecofeminisms. In L. McDowell and J. Sharp (eds), *Space, Gender, Knowledge: Readings in Feminist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 Nicholson, L. (ed.) 1990: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Nicholson, L. 1995: Interpreting gender. In L. Nicholson and S. Seidman (eds),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colson, N. 1973: *Portrait of a Marria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Nye, R. 1993: *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ur in Moder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akley, A. 1974: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Oakley, A. 1985: *Taking It like a Woman*. London: Flamingo.
- Oberhauser, A. M. 1995: Gender and househol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rural Appalachi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51-70.
- Oberhauser, A. M. 1997: The home as 'field': households and housework in rural Appalachia. In J. P. Jones III, H. Nast and S. Roberts (eds), *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O'Hanlon, R. 1996: *Congo Journe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Okely, J. 1975a: Gypsy identity. In B. Adams et al., *Gypsi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England*. London: Heinemann.
- Okely, J. 1975b: Work and travel. In B. Adams et al., *Gypsi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England*. London: Heinemann.
- Okely, J. 1975c: Gypsy women: models in conflict. In S. Ardener (ed.), *Perceiving Women*. London: Malaby Press.
- Okely, J. 1996: *Own or Othe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Okely, J. and Callaway, H. 1992: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Olwig, K. F. and Hastrup, K. (eds) 1997: *Siting Culture: The Shifting Anthropological Object*. London: Routledge.
- Ortner, S.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to culture. In M.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tner, S. B. and Whitehead, H. 1981: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hl, R. 1984: *Divisions of Labour*. Oxford: Blackwell.
- Pain, R. 1991: Space, sexual violence and social contro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 415-31.
- Park, C., Radford, J. and Vickers, M. 1998: Disability studies in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 208-33.
- Parker, A., Russo, M., Sommer, D. and Yaeger, P. (eds)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Patai, D. 1991: US academics and Third World women: is ethical research possible? In S. Gluck and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Pateman, C. 1987: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Public / Private Dichotomy. In A.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teman, C. 1989: *The Disorder of Wome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teman, C. and Grosz, E. (eds) 1987: *Feminist Challenges*. Boston: 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eake, L. 1993: 'Race' and sexuality: challenging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ing of urban social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1, 415-32.
- Pearson, R. 1992: Gender matters in development. In T. Allen and A. Thomas (ed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A. (ed.) 1987: *Femin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
- Philo, C. 1989: 'Enough to drive one mad': the organisation of spa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lunatic asylums. In J. Wolch and M. Dear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 Philo, C. and Parr, H. 1995: Mapping 'mad' identities. In S. Pile and N. Thrift (eds), *Mapping the Subject*. London: Routledge.
- Phoenix, A. 1988: Narrow definitions of culture: the case of early motherhood. In S. Westwood and P. Bhachu (eds), *Enterprising Women*. London: Routledge.
- Phoenix, A. 1991: *Young Moth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ieterse, J. N. 1995: *White on Black: Images of Africa and Blacks in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ile, S. 1991: Practising interpretative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58-69.
- Pile, S. 1996: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 Pile, S. and Thrift, N. (eds)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ollard, I. 1989: Pastoral interludes. *Third Text: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7, 41-6.
- Pollock, G. (ed.) 1996: *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 in the Visual Arts: Feminist Readings*. London: Routledge.
- Porteous, D. 1990: *Landscapes of the Min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Power, M. 1983: From home production to wage labour: women as a reserve army of labou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 71-91.
- Pratt, G. 1993: Reflection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empi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Antipode*, 25, 51-63.

- Pratt, G. 1997: Stereotypes and ambival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workers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4, 159-78.
- Pratt, M. B. 1992: 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 (1988). In H. Crowley and S. Himmelweit (eds), *Knowing Women: Feminism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ratt, M. 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reis, A.-B. S. 1997: Seeking place: capsized identities and contracted belonging among Sri Lankan Tamil refugees. In K. F. Olwig and K. Hastrup (eds), *Siting Culture: The Shifting Anthropological Object*. London: Routledge.
- Pringle, R. 1989: *Secretaries Talk*. London: Verso.
- Pringle, R. 1998: *Sex and Medicine: Gender,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obyn, E. 1990: Travels in the postmodern: making sense of the local.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Probyn, E. 1995: Lesbians in space: gender, sex and the structure of missi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77-84.
- Pryke, M. 1991: An international city going 'global': spatial change in die City of Lond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197-222.
- Putnam, T. and Newton, C. (eds) 1992: *Household Choices*. London: Futures.
- Raban, J. 1980: *Arabi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Fontana.
- Raban, J. 1986: *Old Glory*. London: Picador.
- Raban, J. 1995: *Coasting*. London: Picador.
- Radcliffe, S. 1990: Ethnicity, patriarchy and incorporation in the nation: female migrants as domestic servants in Peru.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8, 379-93.
- Radcliffe, S. 1996: Gendered nations: nostalgia, development and territory in Ecuador.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5-21.
- Radcliffe, S. and Westwood, S. 1994: *Viva: Women and Popular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Radcliffe, S. and Westwood, S. 1996: *Remaking the Nation: Plac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Ramazanoglu, C. 1989: Improving on sociology: the problems of taking a feminist standpoint. *Sociology*, 23, 427-42.
- Ramazanoglu, C. (ed.) 1993: *Up against Foucault*. London: Routledge.
- Reinharz, S. 1983: Experienti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 In G. Bowles and R. Duelli-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 631-60.
- Rich, A. 1986: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1985*. New York: Norton.
- Roberts, E. 1988: *Women's Work 1840-1940*. London: Macmillan.
- Roberts, H. (ed.) 1981: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oberts, M. 1991: *Living in a Man-Mad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Roediger, D. 1991: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 Romero, M. 1992: *Maid in the USA*. London: Routledge.
- Roper, M. and Tosh, J. 1991: *Manful Assertions: Masculinities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 Rose, D. 1989: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Montreal. In J. Welch and M. Dear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 Rose, D. 1993: On feminism, method and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n idiosyncratic overview. *Canadian Geographer*, 37, 57-60.
- Rose, D. and Viileneuve, P. 1988: Women workers and the inner city: some implications of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in Montreal, 1971-1981. In B. Andrew and B. M. Milroy (eds), *Life Spaces: Gender, Household and Employment*.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ose, G. 1995a: Making space for the female subject of feminism. In

- S. Pile and N. Thrift (eds),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Rose, G. 1995b: The interstitial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Homi Bhabha's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365-73.
- Rose, G. 1997: Engendering the slum: photography in East London in the 1930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4, 277-300.
- Rowbotham, S. 1973: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Rowbotham, S. 1989: *The Past is before Us: Feminism in Action since the 1960s*. London: Pandora.
- Rowe, S. and Wolch, J. 1990: Social networks in time and space: homeless women in Skid Ro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184-204.
- Rubery, J. (ed.) 1988: *Women and Recession*. London: Routledge.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eitn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Ruddick, S. 1995: *Young and Homeless in Hollywood*. London: Routledge.
- Ruddick, S. 1996: Constructing difference in public space: race, class and gender as interlocking systems. *Urban Geography*, 17, 132-51.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aid, E. 1983: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intage.
- Sandel, M. 1996: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Sarre, P., Philips, D. and Skellington, D. 1988: *Ethnic Minority, Housing*. London: Avebury Press.
- Sassen, S. 1990: *Global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yer, A. and Morgan, K. 1985: A modern industry in a declining region: links between, theory, method and policy. In D. Massey and R. Meegan (eds). *Politics and Methods*. London: Methuen.
- Scheper-Hughes, N. 1992: *Death without Weeping*.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A. (ed.) 1994: *Gender Segreg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eager, J. 1997: *The State of Women in the World Atlas* (3rd edn). New York: Penguin.
- Seager, J. and Olson, A. 1986: *Women in the World Atlas*. London: Pluto Press.
-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gal, L. 1990: *Slow Motion: Changing Me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Virago.
- Sennett, R. 1994: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London: Faber.
- Sharp, J. 1996: Gendering nationhood: a feminist engagement with national identity. In N. Duncan (ed.). *Body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Shields, R. 1992: *Lifestyle Shopping*. London: Routledge.
- Sibley, D. 1981: *Outsiders in Urban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ed.)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ed.) 1997: *Visions of Suburbia*. London: Routledge.
- Simpson, M. 1994: *Male Impersonators*. London: Cassell.
- Sinclair, U. 1982: *The Jungle* (1936).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kelton, T. and Valentine, G. (eds) 1997: *Cool Ge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 Sklar, J. 1991: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art, C. 1984: *The Ties that Bind: Law, Marri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atri- arch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mith, A.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mith, J. 1989: *Misogynies*. London: Faber.

- Smith, N. 1993: Homeless / global: scaling places.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N.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N. and Katz, C. 1993: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sed politics. In M. Keith and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N. and Williams, P. (eds) 1986: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London: Alien and Unwin.
- Soper, K. 1990: *Troubled Pleasures: Writings on Gender, Politics and Hedonism*. London: Verso.
- Spain, D. 1993: *Gendered Spac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pivak, G. C.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eculations on widow sacrifice.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Spring, M. 1995: *Running for Shelter*. London: Orion.
- Spring Rice, M. 1981: *Working Class Wives (1939)*. London: Virago.
- Squires, J. (ed.) 1992: *Principled Positions*. London: Verso.
- Stacey, J. 1988: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21-7.
- Stacey, J.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aeheli, L. A. and Lawson, V. A. 1994: A discussion of 'women in the fiel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fieldwork.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96-101.
- Staeheli, L. A. and Thompson, A. 1997: Citizenship, community and struggles for public spac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 28-38.
- Stasiulis, D. and Yuval-Davis, N. (eds) 1995: *Unsettling Settler Societies*. London: Sage.
- Stichter, S. and Parpart, J. 1988: *Women, Employment and the Famil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 Stiell, B. and England, K. 1997: Domestic distinctions: constructing

- difference among paid domestic workers in Toronto.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4, 339-60.
- Stoddart, D. 1986: *On Geography and its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Stoddart, D. 1991: Do we need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 and if we do, what should it b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84-7.
- Strathern, M. 1992: *After Nature: English Kinship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ynnott, A. 1993: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Tannen, D. 1994: *Talking 9 to 5: How Women's and Men's Conversational Styles Affect Who Gets Heard, Who Gets Credit and What Gets Done at Work*. London: Virago.
- Taylor, B. 1983: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rago.
- Theroux, P. 1979: *The Great Railway Bazaar*. London: Penguin.
- Theroux, P. 1990: *Travelling the World*.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 Theroux, P. 1992: *Oceania*. London: Penguin.
- Thompson, W. 1825: *Appeal on behalf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 men, to retain them in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 London.
- Thrift, N. 1997: The still point: resistance, expressive embodiment and dance. In S. Pile and M. Keith (eds).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 Titmuss, R. 1987: *The Philosophy of Welfare: Selected Writings of Richard Titmuss*. London: Alien and Unwin.
- Tönnies, F. 1967: *Community and Society* (1887).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ownsend, J. G. 1991: Towards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gender. *Geographical Journal*, 157, 25-35.
- Tringham, R. 1994: Engendered places in prehistor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 169-203.
- Tseelon, E. 1995: *The Masque of Femininity*. London: Sage.
- Turner, B. 1996: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2nd edn. London: Sage.

- Twine, F. W. 1996: Brown-skinned white girls: class,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 205-24.
- Valentine, G. 1990: Women's fear and the design of public space. *Built Environment*, 16, 288-303.
- Valentine, G. 1993a: 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a geography of lesbian friendships. *Area*, 25, 109-16.
- Valentine, G. 1993b: Negotiating and managing multiple sexual identities: lesbian space-time strateg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8, 237-48.
- Valentine, G. 1996: 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adults' public space. *Urban Geography*, 17, 205-20.
- Veness, A. 1992: Home and homel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ideals and real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445-68.
- Villeneuve, P. and Rose, D. 1988: Gend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employment from home in metropolitan Montreal, 1971-81. *Urban Geography*, 9, 155-79.
- Walby, S. 1986: *Patriarchy at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lby, S. 1989: Theorizing patriarchy. *Sociology*, 23, 213-34.
-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 Walby, S. 1997: *Gender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Walker, L. 1995: More than just skin-deep: fem(me)minity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71-6.
- Walkowitz, J. 1992: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London: Virago.
- Walter, B. 1995: Irishness, gender and pl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35-50.
- Ward, K. (ed.) 1990: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Ithaca, N.Y.: ILR Press, Cornell University.
- Warde, A. 1991: Gentrification as consumption: issues of class and gend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223-32.
- Ware, V. 1992: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 Waring, M. 1989: *If Women Counted*. London: Macmillan.
- Warner, M. 1985: *Monuments and Maidens: The Allegory of the*

- Female Form*. London: Picador.
- Watson, S. 1992: Femocratic feminisms. In M. Savage and A. Witz (eds). *Gender and Bureaucracy*. Oxford: Blackwell.
- Watson, S. with Austerberry, H. 1986: *Housing and Homelessness: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ebster, J. 1986: Word processing and the secretarial labour process. In K. Purcell (ed.).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Employment*. London: Macmillan.
- Weekes, D. 1997: Shades of Blackness: young Black female constructions of beauty. In H. S. Mirza (ed.). *Black British Feminism*. Routledge: London.
- Weeks, J. 1986: *Sexuality*. London: Horwood and Tavistock.
- Wekerle, G. and Whitzman, C. 1995: *Safe Cities: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London: Van Nostrand Reinhold.
- Wekerle, G., Peterson, R. and Morley, D. (eds) 1980: *New Space for Wome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West, C. and Zimmerman, D. 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125-51.
- West, J. 1982: *Women, Work and the Labour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estwood, S. 1984: *All Day, Every Day*. London: Pluto Press.
- Williams, P. 1976: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inner London housing market: the case of Islingt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 23-34.
-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89: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Verso.
- Williams, W. 1986: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Sexu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 Williamson, J. 1985: *Consuming Passions: The Dynamic of Popular Culture*. London: Boyars.
- Willmott, P. and Young, M. 1960: *Family and Class in a London Suburb*.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ilson, E. 1977: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Tavistock.
- Wilson, E. 1991: *The Sphinx in the City*. London: Virago.
- Wilson, E. 1992: The invisible flâneuse. *Nem Left Review*, no. 191, 90-110.
- Winchester, H. and Costello, L. 1995: Living on the street: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of Australian street ki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329-48.
- WING (Women,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Group) 1985: *Worlds Apart: Women under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aws*. London: Pluto Press.
- Wittig, M. 1992: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Wolf, N. 1991: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New York: Anchor Books.
- Wolff, J. 1985: The invisible flâneuse: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7-46.
- Wolff, J. 1992: On the road again: metaphors of travel in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Studies*, 7, 224-39.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 *Geography and Gender*. London: Heinemann.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Longman.
- Women Working Worldwide (ed.) 1991: *Common Interests: Women Organizing in Global Electronics*. London: Women Working Worldwide.
- Woolf, V. 1977: *Three Guineas* (1938).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right, S. 1995: *The Anthropology of Organis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Wrigley, N. and Lowe, M. (eds) 1996: *Retailing,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Towards the New Retail Geography*. Harlow: Longman.
- Young, I. M. 1990a: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 M. 1990b: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 M. 1990c: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Young, I. M. 1997: Unruly categories; a critique of Nancy E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 *New Left Review*, 222, 174-60.
- Young, I. M. 1998: Race and gender struggles. *Antipode*, 30.
- Young, M. and Willmott, P. 1957: *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Young, R.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 Yuval-Davis, N.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 Yuval-Davis, N. and Anthias, F. (eds) 1989: *Women-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 Zola, Emile 1982: *The Ladies Paradise*, trans. from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2), introd. Kristin Ro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ukin, S. 1988: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London: Radius.
-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the City*. London: Blackwell.

索引

INDEX

條目後的頁碼係原著頁碼，檢索時請查正文頁邊的數碼。

A

- abortion 墮胎 187
 Acker, Joan 艾克, 喬安 139
 adolescence 青少年 101, 111
 adoption 領養 111
 advertising 廣告業 162
 Afshar, Haleh 阿傅夏, 海爾 147
 age 年齡 194
 AIDS 愛滋病 36
 Ainley, Rosa 艾茵雷, 羅莎 169
 Alcott, Linda 艾爾考夫, 琳達 24, 25
 Algeria, French 艾爾吉瑞亞, 弗蘭曲 72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班尼迪克 30, 195
 angels, of the house / hearth 家的 / 住屋天使 149, 154
 Anker, Richard 安克, 理查 147
 Anthias, Floya 安錫亞斯, 弗洛亞 187
 Anzaldúa, Gloria 安卓杜雅, 葛洛莉亞 212, 215
 Ardener, Shirley 阿德納, 雪莉 122
 arthritis 關節炎 60
 Atwood, Margaret 阿特伍德, 瑪格利特 84
 Augé, Marc 歐莒, 馬克 6, 204
- B**
- Bachelard, Gaston 巴舍拉, 葛斯頓 72
 Bahloul, Joelle 巴勞爾, 約爾 72, 94
 Baltimore 巴爾的摩 101-2, 113

- bananas 狂熱 182
 Barrows, Susanna 貝若絲, 蘇珊娜 162
 Baudelaire, Charles 波特萊爾, 查理斯 154, 159
 Baudrillard, Jacques 布希亞, 雅各 159
 Baumann, Paul 鮑曼, 保羅 209
 beaches 海濱 165-8, 182
 Beats, the 披頭族 90
 beauty, standards of 美的標準 42, 91, 179
 Beechey, Veronica 碧曲, 維羅妮卡 132
 Bell, David 貝爾, 大衛 62-4, 69, 169, 222
 Benjamin, Walter 班雅明, 沃特 159
 Berkeley 柏克萊 151
 Best, Sue 貝絲特, 蘇 67
 Bethnal Green 貝斯諾綠地 99
 Beveridge, William 貝佛瑞基, 威廉 189
 Bhabha, Homi 巴巴, 霍米 213
 binaries 二元 11, 12, 53, 54, 112, 166-8, 222, 246-7
 Binnie, Jon 比尼, 瓊 62-4, 222
 biology 生物學 14, 111
 biopower 生命權力 49, 170
 birth 出生 187
 control 控制 127
 rate 比率 189
 Black Atlantic 黑色大西洋 212
 Blackbird Leys 畫眉牧地 113
 Blair, Cherie 布萊爾, 雀里 130

- Blunt, Alison** 布朗特，愛麗森
216, 223
- body** 身體
- black 黑色 70
 - as city 做為城市 65-8
 - definition of 定義 40-1
 - disabled 失能的 60, 72
 - docile 馴化 50
 - as landscape 做為地景 45, 69, 197
 - lesbian, in space 空間中的女同性戀
64
 - male 男性 163
 - as a map 做為地圖 50, 199
 - maternal 母性 59
 - memory 記憶 42
 - multiple 多元 53
 - politics of 政治 42-4
 - pregnant 懷孕 58-60
 - research on 研究 36-9
 - scaling 量度 48
 - at school 在學校 56-8
 - sexed 性別化 23, 42
 - sick 生病 60-1
 - in space 空間中 41-2
 - as a surface 做為表面 47, 51-4
 - two-sex view 兩性觀點 46
- Bon Marché** 彭馬歇 160
- Bophuthatswana** 波普那共和國 86
- Bordo, Susan** 波爾多，蘇珊 43-4, 63, 248
- 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波士頓婦女保健組織 42
-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皮耶 41-2, 50, 72, 127
- Bourgeois, Philip** 布喬瓦，飛利浦
244
- Bowery** 包渥里 157
- Bowlby, Rachel** 鮑爾比，瑞吉兒
161
- Bozzoli, Belinda** 波佐里，貝琳達
86
- Braidotti, Rosa** 布瑞多蒂，羅莎
223
- Brazil** 巴西 239-41
- breadwinner** 家計負擔者
- male 男性 190
 - universal 普世的 191
- Breitbart, Myrna** 布雷特巴特，米爾娜 95
- brewing** 釀酒業 77
- Brighton** 布萊頓 116
- Buffalo, N.J.** 水牛城 114
- built environment** 打造環境 97, 118-20
- Burgess, Jacquelin** 柏吉斯，賈桂琳 163
- Butler, Judith** 巴特勒，朱蒂絲 23, 40, 54-6, 63
- C**
- Cadbury** 凱德貝瑞 76-7
- Callaway, Helen** 凱洛威，海倫 236
- Cambridge** 劍橋 154
- Cameron, Deborah** 凱麥隆，黛博拉 222
- Campbell, Beatrix** 坎普貝爾，碧翠克斯 79, 99, 112-13, 118
- capital** 資本
- cultural 文化的 127
 - human 人類的 128-31

- multinational 多國的 2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25, 49, 75, 175
 industrial 工業的 37, 73
 post-industrial 後工業的 190
 print 印刷 199
 car 汽車
 industry 工業 113
 theft 偷竊 113-14
 caregiver parity 照護者等價 191, 193
 Carmen Miranda 卡門米蘭達 183
 Castells, Manuel 柯司特，曼威 104, 115-16, 181-2
 Castro District 卡斯楚區 104, 159, 169
 cathexis 貫注 18-19
 Chant, Sylvia 錢特，西維亞 32, 147
 Chauncey, George 瓊斯，喬治 157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學派 97, 103, 154
 childbirth 分娩 171
 childcare 育兒 73, 116, 119, 123, 128, 130, 184-6
 childhood 童年 107
 Chouinard, Vera 喬伊納德，維拉 70, 245
 cinema 電影 153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50, 171, 187
 Civil Rights Act 民權法案 176
 civil society 市民社會 171, 175, 180
 Clifford, James 克里福特，詹姆斯 204, 205, 207
 Cockburn, Cynthia 考克伯恩，辛西亞 141-2
 Colomina, Beatriz 柯羅米娜，碧翠茲 69
 colonial / ism 殖民的 / 殖民主義 151, 187, 195, 216-17
 commodities 商品 162
 community 社群 30, 97
 alternative forms 另類形式 117-20
 Asian 亞洲人 210
 black 黑人 210
 care 照顧 115
 definition of 其定義 100
 imagined 想像的 194-5
 politics 政治 115-17
 power 權力 115-17
 rethinking 反思 120-2
 composers 排字工人 141-2
 comradeship, horizontal 平等的同志情誼 195
 Connell, Robert 康涅爾，羅伯特 18, 20, 141
 consumption 消費
 collective 集體的 181-2
 for pleasure 爲了快感 160-3
 contraception 避孕 187
 Cosgrove, Dennis 柯斯葛洛夫，丹尼斯 27
 cosmopolitans 寰宇主義者 205
 Costello, Laura 柯絲蒂羅，蘿拉 91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 鄉村英國保護議會 164
 counterculture 反文化 151

- counterpublics 反民眾 151
countryside 鄉村 165
Court, Gill 寇特，吉爾 144
crack (快克) 純古柯鹼 244
Cream, Julia 克琳姆，茱莉亞 62-4, 222
credentials, educational 教育證書 127, 129
creolization 克里歐化 204, 211
Crewe, Louise 克魯，露易絲 162
crowd, urban 都市群眾 161
Crystal Palace 水晶宮 159
cubism 立體派 153
cultural 文化的
 artefact 加工品 195
 studies 研究 171
 turn 轉向 227
culture 文化 205, 208-9
 hybrid 雜種 212-13
 patriarchal craft 父權體制技倆 142
 traditional 傳統的 210
 workplace 工作場所 124, 134-8
 年輕 167-8
curfews 宵禁 150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6
cyborg 人機合體 66
- D**
Dadaism 達達主義 153
data 資料
 collection of 其收集 231
 for a geography of gender 為性別地理學 232-4
Davidoff, Leonore 大衛朵夫，里奧諾爾 77, 94
de Beauvoir, Simone 波娃，西蒙 13, 40, 44
Death of Nature, The (Merchant) 《自然之死》(莫荃特) 45
Debord, Guy 狄博，蓋伊 159
deconstruction 解構 21-5
department stores 百貨公司 155, 159-63
desire 慾望 19, 39, 136, 199
Dex, Shirley 戴克斯，雪利 134
diaspora 流移 165, 211-12
dichotomy, mind / body 二分法，心靈 / 身體 35
difference 差異 174
 categorical 範疇的 11
 rethinking 再思考 215
 sexual 性慾的 177-80
domestic labour 家務勞動 73, 123, 128, 130
 and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 81-2
 counting 計算 82
 history of 歷史 76-7
 paying for 支付 82
 violence 暴力 88
 see also housekeeping 亦見持家
domestic production 家庭生產 77, 133
domestic work for wages 掙取薪資的家庭工作 79, 82-8, 184-6
 ethnicity and 族裔性(族群特性) 85, 87-8
domesticity 家務領域
 ideology of 其意識形態 79
 origins of 其根源 73-5
Domnosh, Mona 唐姆納許，蒙娜

- 122, 161, 206
 Dowler, Loraine 道勒, 羅倫 202
 Dowling, Robin 道林, 羅賓 162
 drag 扮裝 23
 Du Gay, Paul 都蓋伊, 保羅 162
 dual roles 雙重角色 79
 dualisms 二元論 11
 DuCille, Ann 都希爾, 安 70
 Dworkin, Andrea 朵爾金, 安德莉亞 43, 50
 Dyck, Isabel 迪克, 伊莎貝爾 60
- E**
 earth, as mother 做為母親的地球 45
 economic models 經濟模型 127-34
 Ehrenreich, Barbara 艾倫瑞曲, 芭芭拉 147, 202
 Eisenstein, Zillah 愛森斯坦, 齊拉 81, 201
 Elshtain, Jean 艾爾須坦, 珍 202
 Elson, Diane 艾爾森, 黛安 133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瑞德瑞曲 19, 37, 81
 England, Kim 英格蘭, 基姆 88, 95
 Enlightenment thought 啓蒙思想 11, 22, 27, 38, 44, 68, 174-7
 Enloe, Cynthia 英羅, 辛西亞 182-6, 202, 217
 equal opportunities 機會均等 177
 committees 委員會 117
 policies 政策 176
 equal pay 同等報酬 177
 Equal Pay Act 均等報酬法案 176, 177
- Equal Rights Amendment 平等權利修正案 176
 equality, equal rights 平等, 平等權 174-80, 220
 ergonomics 人類工程學 40
 Esping-Andersen, Gosta 艾斯賓—安德森, 葛斯塔 193
 ethnic identity 族裔(群)認同 102, 107-12, 196
 religio- 宗教- 196
 Evans, Mary 伊凡斯, 瑪麗 33
 exploitation 剝削 178
- F**
 family 家庭 81, 88, 175, 177
 allowance 津貼 73
 wage 薪資 190
 farmhouse, Black Forest 黑森林農舍 71
 fashion 時尚 43
 Faulkner, Anne 福克納, 安妮 147
 femininity 女性氣質
 characteristics of 其特徵 11, 139, 228
 geography of 其地理 137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場所中 124, 143
 feminism 女性主義 8, 9, 220, 226
 Marxist 馬克思主義的 124
 second wave 第二波 14, 82
 socialist 社會主義的 10, 81, 88, 124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214
 feminist(s) 女性主義者(複數)
 black 黑人 89
 economists 經濟學家 130, 133, 231

- French 法國 162
geographers 地理學者 129, 224-5, 231
geography 地理學 8, 11-12
methods 方法 231, 234-44
project 計劃 10-11
research 研究 224-8
scholarship 學術研究 7, 8-12, 137, 138, 149, 224-5, 227
socialist 社會主義的 192
see also women's movement 亦見婦女運動
- fertility 生育 38
- fiction 虛構
regulatory 管制 23, 54-5, 137
research as 研究 246
- fidelity 忠誠 38
- fieldsite 田野位址 204
- fieldwork 田野工作 239, 240-4
- Filipinas 菲律賓人 185-6
- Fincher, Ruth 芬雀兒, 露絲 122
- Fiske, John 費斯克, 約翰 167-8
- Fitzgerald, Frances 費茲傑羅, 法蘭西斯 169
- flags 國旗 198
- flâneur, flâneuse 漫遊者, 女性漫遊者 152-6, 163
- Flax, Jane 傅雷克斯, 珍 69
- Flin Flon 富林福隆 99
- Foucault, Michel 傅柯, 米歇 22, 40, 49, 220
- Frankenberg, Ruth 法蘭肯伯格, 露絲 22
- Fraser, Nancy 傅瑞澤, 南西 25, 151, 190-2, 223
- Freud, Sigmund 佛洛伊德, 西格蒙 38, 58
- Friedman, Jonathon 傅萊德曼, 強納森 205, 212
- Fuentes, Annette 傅安惕斯, 安奈特 147
- G**
- gay *see* gentrification, gay; men 同性戀者參見縉紳化, 同性戀; 男人
- gaze 凝視 167
- gemeinschaft* 禮俗社群 100
- gender 性別 24
bargain 協商 15, 20, 86
as a category 做為範疇 247-8
coding 編碼 135
deconstructing 解構 21-5
definition of 其定義 6-8, 13-15
discrimination 歧視 39, 127
equity 公平 191-2
identity 認同 108, 134-5, 162-3
initiatives 倡議 117
order 秩序 190
and organizations 和組織 136-8
performance 操演 23, 54-6, 143
reassignment 重分配 37
regime 體制 15-20
relations 關係 148
segregation 分隔 126-7, 229
stereotyping 刻板印象 142
studies 研究 229
transgressive performance of 其越界操演 62
welfare 福利 188-94

- gentrification 縉紳化 103-4
 gay 男同性戀 104-6, 157-9
 lesbian 女同性戀 104
 geography 地理學
 and feminism 與女性主義 25-9
 women in 其中的女人 26-7
gesellschaft 法理社會 100
 Gewertz, Deborah 葛沃茲，德波拉 47
 ghetto 族裔聚居區 101-2
 female 女性 138-40, 191
 gay 男同性戀 104
 Gibson, Kathie 吉普生，凱西 99
 Gibson-Graham, J. K. 吉普生—葛拉罕，J. K. 147, 246-7
 Giddens, Anthony 紀登斯，安東尼 38, 121, 222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基爾嫚，查爾洛特·柏金斯 74-5, 81
 Gilroy, Paul 吉洛伊，保羅 164, 198, 209, 21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3, 204, 205
 Gorham, Clare 高翰，克蕾爾 111
 Gramsci, Antonio 葛蘭西，安東尼奧 18
 Grant, Ali 葛蘭特，阿里 245
 Greed, Clara 葛瑞德，克萊拉 122
 Greenwich Village 格林威治村 159
 Gregson, Nicky 葛瑞格森，尼基 83, 185
 Grossberg, Lawrence 葛洛斯柏格，勞倫斯 221
 Grosz, Elizabeth 葛洛茲，伊莉莎白 50, 65-8, 69, 92
Guardian, The 《守護者》 130
 Gunew, Sneja 古紐，斯妮亞 33
 gypsies 吉普賽人 203, 218-19
- H**
 habitus 習癖 72
 Halford, Susan 霍福特，蘇珊 117
 Hall, Catherine 霍爾，凱瑟琳 75, 76-8, 94
 Hall, Stuart 霍爾，史都華 165, 196, 211-12, 220, 221
 Hanson, Susan 韓森，蘇珊 27, 129, 226, 229
 harassment, sexual 性騷擾 136, 150
 Haraway, Donna 哈洛威，唐娜 22, 23, 66, 108
 Harris, Olivia 哈里斯，歐利維亞 46
 Harvey, David 哈維，大衛 71, 98, 106, 121, 122, 151, 159, 177, 178
 Hayden, Dolores 海登，多洛莉絲 74, 118-19, 120, 122
 health 健康 171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馬汀 71, 72, 75
 Hein, Catherine 海茵，凱瑟琳 147
 Hell's Angels 地獄天使 151
 Henry, Nick 亨利，尼克 144
 Heron, Liz 黑若恩，李茲 155
 heterosexuality, compulsory 強制異性戀 54, 61-4
 hexis 身體習性 41-2
 Holocaust 大屠殺 204
 home 家 31, 71-3

- angels of the 其守護神 75-9
as castle 做爲堡壘 79
meaning of 其意義 92-4
place 地方 89
as prison 做爲監獄 79
spatial separation of 其空間區隔 73-5
- homelessness 無家可歸 90-2
- hooks, bell 胡克斯，貝爾 22, 70, 89, 94
- house 住宅
as body 做爲身體 92
design of 其設計 118-9
- housekeeping 持家 73-4
service 服務 243-4
standards 標準 89
- housework 家事 73, 123, 128
- Humphries, Jane 韓弗瑞斯，珍 79
- Hutton, Will 哈頓，威爾 172
- hybridity / hybridization 混種 / 混種化 204, 210, 211-12
- I
- iconography 圖象學 172
identity 認同
border 邊界 211, 212
diasporic 流移的 210-12
ethnic 族群的 209-10
fluid 流動的 215, 220
multiple 多元的 245
- Ignatieff, Michael 伊格納惕夫，麥可 100
- illness 疾病 60
- images 形象（意象） 172, 214
- imagination, geographic 地理的想像 214
- imperialism, cultural 文化帝國主義 40, 48, 178, 179
- income 收入
earned 賺取 126
redistribution of 其重分配 98
women's compared to men's 女人相較於男人的 131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141
- in-migration 移進來 189
see also migration 亦見移民
- inner city 內城 99, 103-6
- inscription 銘刻 50-3, 55
-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英國地理學家研究院 26
- Institute of Community Studies 社群研究所 99
- insurance 保險 142-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國際勞工組織 124
- interviewing 訪談
covertly 秘密地 243-5
men 男人 241-2
police 警察 242-3
women 女人 236, 239
- intimacy, transformation of 親密關係的改變 38
- Ireland, Mother 愛爾蘭母親 196
- Irigaray, Luce 依希嘉黑，露絲 68
- Irish 愛爾蘭人
men and women 男人和女人 196
問題 210
- Isle of Dogs 狗島 142

J

- Jacobs, Jane 雅克布斯, 珍 122
 Jameson, Fredric 詹明信, 弗瑞德
 瑞克 207
 Jersey City 澤西城 114
 Jews, Orthodox 東正教猶太人 212
 job search 求職 129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 86
 Johnson, Nuala 強森, 努阿拉 195,
 196
 Johnston, Lynda 詹斯頓, 琳達 70
 jouissance 極爽 59
 justice 正義 199
see also social justice 亦見社會正義

K

- Kaiser, Wilhelm 凱塞, 威爾罕姆
 118
 Kandiyoti, Deniz 坎蒂猶娣, 丹妮
 絲 20, 86
 Kaplan, Caren 開普蘭, 卡倫 207,
 214
 Keith, Michael 凱斯, 麥可 242
 Kelly, Patricia Fernandez 凱利, 派
 翠西亞·弗娜黛茲 101-3
 Kerouac, Jack 克魯亞克, 傑克 90
 Kifner, John 基夫納, 約翰 152
 Kilburn 齊爾本 4, 97
 Kinnaird, Vivian 基內爾德, 薇薇
 安 122
 kinship 親屬關係 92
false 虛假的 84
 Kinsman, Phil 金斯曼, 菲爾 164
 Kobayashi, Audrey 柯貝亞許, 歐
 德瑞 69, 224

Kristeva, Julia 克莉絲蒂娃, 茱利
 亞 59, 68

L

- labour 勞動
 gender divisions of 其性別劃分
 125-34
 green 綠色的 99
 indentured 受契約束縛的 198
 market 市場 124, 129, 131-2
 process theory 過程理論 131-2
 reserve army of 其預備軍 132-4
 shortages 短缺 128
 sweated 血汗的 123
 waged 受薪的 124-33
see also domestic labour; domestic
 work for wages 亦見家務勞動;
 掙取薪資的家務工作
 Lacan, Jacques 拉岡, 雅各斯 58
 lack 匱缺 139
 Lacquer, Thomas 雷克爾, 湯姆斯
 46, 54
 Lake District 湖區 164
 Lamphere, Louise 藍費爾, 露易絲
 147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198-9
 Laws, Glenda 勞斯, 葛蘭達 178,
 194
 Lawson, Victoria 勞森, 維多利亞
 147
 Leavitt, Jackie 李維特, 傑克 95
 Leidner, Robin 雷德納, 羅賓 142-
 4
 lesbian 女同性戀 63, 144, 158
 butch-femme T-婆 63

- lipstick 口紅 63
- Lewis, Clare 路易斯，克雷爾 70
- liberal, liberal theory 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理論 150, 174-7
- locale 場所 31
- local, locality 在地，地域 2, 97-8, 124, 205, 208
- Locke, John 洛克，約翰 175
- London 倫敦 90, 158
- Longhurst, Robyn 隆赫斯特，羅賓 60, 70
- Los Angeles 洛杉磯 67, 90, 91, 104, 120, 151, 185
- Lowe, Michelle 洛威，蜜雪兒 83, 162, 185
- Luxton, Meg 拉克斯頓，梅格 99
- M**
- McClintock, Ann 麥可林托克，安 85
- McIllwaine, Cathy 麥可偉恩，凱西 147
- Mackenzie, Suzanne 麥肯齊，蘇珊 73, 94, 116
- McNay, Lois 麥克耐，羅伊斯 38
- Madigan, Ruth 麥迪庚，露絲 94
- Mairs, Nancy 梅爾斯，南西 72
- Manchester 曼徹斯特 104, 106, 194
- Marcus, George 馬庫斯，喬治 3, 31
- marginalization 邊緣化 178
-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已婚婦女財產法 16
- Marx, Marxist 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 132-3
- masculinity 男性氣概 98-9, 104, 113-5
- feminized 女性化的 156
- and machinery 和機械 141
- and organizations 與組織 136-7
- transgressive 越界 156
-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場所中 124, 141-4
- Massey, Doreen 瑪西，朵琳 4, 11, 29, 49, 68, 144-5, 194, 205, 208
- maternity leave 產假 177
- maternity pay 產假薪資 177
- Maupin, Armistead 毛平，阿米斯惕德 169
- Mayer, Tamar 梅耶爾，塔莫 202
- men 男人
- Chinese 中國人 84
- gay 同性戀 104-6, 156-9, 222
- hard 強硬的 112
- honorary 名譽上的 139
- teenage 青少年 163
- working class 勞工階級 114-115, 140-1, 146
- young 年輕的 112-15, 124
- Merchant, Caroline 莫荃特，卡洛琳 45
- merchant banks 商業銀行 64, 139, 144, 241
- mestiza consciousness 女混血兒意識 215
- metaphors 隱喻 206-7, 214, 215, 217
- migrant labour 移工 185-6
- migrants, white 白人移民 196

- migration 遷移 1, 88, 94, 168, 203-4, 210, 220
see also in-migration 亦見 移民
- Milk, Harvey 彌爾克, 哈維 104
- Mill, John Stuart 彌爾, 約翰·史都華 175
- Mills, Sara 彌爾斯, 莎拉 122
- Minneapolis 明尼雅波里 104
- Mirza, Heidi Safia 莫札, 海地·莎菲亞 33
- Mitchell, Don 米契爾, 唐 151
- mobility 流動性 29
- modernity 現代性 3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莫罕蒂, 瓊德拉·泰爾佩德 22, 214
- Momsen, Janet 摩姆森, 珍妮特 27, 32, 95, 122, 147
- monasteries 修道院 145
- money 金錢 (貨幣) 199
- Monk, Janice 孟柯, 珍妮絲 27, 32, 95, 229
- Montreal 蒙特婁 104
- Moore, Henrietta 摩爾, 亨利塔 7, 44, 93
- Mort, Frank 莫特, 法蘭克 106, 157-9, 169
- Morton, Margaret 墨頓, 瑪格利特 90, 151
- Moss, Pamela 摩斯, 潘蜜拉 60, 95, 243-5
- mother, motherhood 母親, 母職 101-2, 138, 189, 190
- movement, forced 強迫遷移 203
- Munby, Alfred 孟比, 阿爾弗瑞德 85
- Munro, Moira 孟若, 莫依拉 94
- N**
- nannies 保姆 88, 184
- Nash, Catherine 納許, 凱薩琳 69, 195, 197, 199
- Nast, Heidi 納斯特, 海蒂 69, 202
-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187, 194-5, 200-1
 black 黑人 213
- nature, women as 女人做為自然的 44-6, 197
- New, Caroline 鈕, 卡洛琳 23
- New Age 新世紀 151
- new towns 新城 96, 118
- New York 紐約 67, 90, 104, 151
 gay 同性戀者 157
-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152
- Newcastle 新堡 91, 112
- Nicholson, Linda 妮可森, 琳達 13, 14, 15, 47, 122
- Nicolson, Harold 尼可森, 哈洛德 217
- NIMBY 鄰避 116
- Nkotsoe, Mmantho 寇特索, 曼索 86
- nonconformism 不墨守成規 77-8
- normalization 正常化 42
- O**
- Oakley, Ann 歐克利, 安 27
- Oberhauser, Ann 歐柏豪瑟, 安 95
- occupations 職業
 masculine 男性氣概的 135

- see also* segregation, occupational
亦見職業區隔
-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國家統計處 82, 83
- Okley, Judith 歐克利, 茱蒂斯 3, 5, 57, 217, 218-19
- Olson, Ann 歐森, 安 231
- oppression, faces of 面對壓迫 178-9
- Ortner, Sherry 歐特娜, 雪麗 46
- Other 他者 (異己) 48, 115, 215, 219
- Oxford 牛津 112-13
- P**
- Pader, Ellen-J. 帕德, 艾倫-J. 95
- Pahl, Ray 帕爾, 雷伊 123
- Paradise Lost* 《失樂園》 77
- paradoxes 悖論 48
- Paris 巴黎 67, 160
- parody 諷仿 62
- Patai, Daphne 帕塔伊, 戴芙妮 239
- Pateman, Carole 佩特曼, 卡蘿 175, 180
- patriarchy 父權體制 15-20
and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 81-2, 146, 181
patriarchal domination 父權支配 56
- pay *see* income 薪資參見收入
-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 240
- Pearson, Ruth 皮爾森, 露絲 133
- performance 操演
bodily 身體 54-6
heterosexual 異性戀的 62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場所中 61
- Phoenix, Ann 芬妮克斯, 安
- Pile, Steve 派爾, 史蒂夫 69, 70
- Pizzey, Erin 皮濟, 艾琳 89
- place 地方 (所在) 2-6, 29-32, 97, 208, 227
gendered 性別化 144
non-place 無地方 6
- placeless 居無定所 2
- Pocahontas 波卡洪達絲 183
- political activism 政治基進主義 240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 138
- politics 政治
feminist 女性主義者 26-7, 247
identity 認同 180, 221
international 國際的 182-6
of location 區位的 213-15, 219-20
transformative 變化的 222-3
- Pollard, Ingrid 波拉德, 英格里德 163, 164-5
- Pollock, Griselda 波洛克, 葛里索達 8-10
- positionality 位置 25
-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151, 187, 195, 197-9
- post-Fordism 後福特主義 134
- postmodern thought 後現代思想 22, 215, 227, 246, 247
- postmodernity 後現代性 38, 204, 217
- poverty 貧窮 38
- power 權力
male 男性 88, 136-7
relations 關係 19, 100, 135, 140, 230, 247-8

- powerlessness 失勢 178
- Pratt, Geraldine 普瑞特，蓋若汀 88, 129, 227, 246
- Pratt, Mary Louise 普瑞特，瑪麗·露易絲 216
- Pratt, Minnie Bruce 普瑞特，迷妮·布魯斯 107-8
- pregnancy 懷孕 58-60
- Prendergast, Kathy 普蘭德蓋斯特，凱西 197
- Pringle, Rosemary 普林哥，羅絲瑪莉 138-40, 147
- printing industry 印刷產業 140-2
- Probyn, Elsbeth 普羅賓，愛爾斯貝絲 64, 220
- production relations 生產關係 19
- property, private 私有財產 37, 81
- prostitutes 娼妓 154, 158
- proxemics 人際距離學 40-1
- R**
- race 種族
- and difference 與差異 102
- discrimination 歧視 176
- racialization 種族化 109-11, 137
- racism 種族歧視 120, 164, 242-3
- Radcliffe, Sarah 瑞德克里夫，莎拉 195, 198-9
- Ragone, Helena 瑞恭，海蓮娜 147
- Ramazanoglu, Caroline 瑞瑪扎諾哥魯，卡洛琳 69, 225
- rape 強暴 150
- remittances 匯款 185
- Roberts, Elizabeth 羅伯茲，伊莉莎白 79
- roles, dual 雙重角色 138
- Rose, Damaris 羅斯，達瑪莉斯 73, 94, 104
- Rose, Gillian 羅斯，姬莉安 29, 69, 199, 213, 216
- Rosie the Riveter 鉚釘工羅絲 80, 118
- Ross, Kristin 羅斯，克里斯汀 160
- Rowbotham, Sheila 羅柏森姆，席拉 44
- Rowe, Stacey 羅威，史黛西 91
- Rubin, Gayle 茹賓，蓋兒 14
- Ruddick, Susan 茹蒂克，蘇珊 94, 122
- Ruskin, John 羅斯金，約翰 78
- S**
- Sackville-West, Vita 賽克維爾-威斯特，薇塔 217
- Saegert, Susan 薩格特，蘇珊 95
- Said, Edward 薩依德，愛德華 207
-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104
- Sassen, Saskia 薩森，莎斯吉亞 90
- scale 尺度 4, 40, 148-9, 205
- Scheper-Hughes, Nancy 薛波一修斯，南西 239-41
- science park 科學園區 49, 144-5
- Scott, Alison 史考特，艾莉森 229
- Scott, Joan 史考特，喬安 15, 135
- Seager, Joni 席格，喬尼 231
- Segal, Lynn 西格爾，琳恩 20, 70
- segregation, occupational 職業區隔 126-7, 129, 229
- Sennett, Richard 森涅特，李察 67,

- 93
- sex 性 13-15, 23
- tourism 觀光業 182
- Sex Discrimination Act 性別歧視
 法案 176
- sex / gender system 性 _ 性別系統
 14
- sexism 性別歧視 130, 143, 242
- sexuality 性慾特質 19, 23, 36, 40,
 49, 99, 156-9, 170, 222
- and the beach 和海灘 165-8
- and homosexual identity 和同性戀
 認同 156-9
- and the workplace 以及工作場所
 136
- plastic 可塑的 38
- regulation of 管制 50, 78, 173
- Sharp, Joanne 夏普, 喬安娜 29
- Shields, Rob 希爾德, 羅伯 169
- shiftworkers 輪班工人 225-6
- Silverstone, Roger 希爾弗史東,
 羅傑 95
- Simpson Mark 辛普森, 馬克 222
- Sinclair, Upton 辛克萊, 阿普頓
 103
- skill 技能 127
- see also* occupations 亦見職業
- skinhead 光頭男 62
- Smith, Neil 史密斯, 尼爾 4, 40,
 148
- Social Darwinism 社會達爾文主義
 103
- social justice 社會正義 178
-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187-8
- new 新的 115
- Soho 蘇活區 158-9
- South Africa 南非 86, 188, 204
- Southall 騷霍爾 209-10
- space 空間
- domestic 家庭的 72
- as fixity 做為固定的 208
- heterosexual 異性戀的 63
- open 開放的 149, 163-5
- of pleasure 快感的 148
- public 公共 60, 148-56, 168
- public and private 公共與私人 73,
 149-51
- queer 酷兒 62
- straight 異性戀的 61
- transgressive 逾越的 156-9
- Spain, Daphne 史班, 黛芬妮 122
- spatial containment 空間封鎖 129
- spatial texts 空間文本 93
- Spivak, Gayatri 史碧伐克, 蓋亞翠
 22
- sport, gender and 性別與運動 57
- Spring, Michelle 史賓, 蜜雪兒
 186
- Spring Rice, Margery 史普林·萊
 絲, 瑪格里 73
- Squires, Judith 史奎爾斯, 茱蒂絲
 122
- Stacey, Judith 史黛西, 茱蒂絲 239
- standpoint 觀點 22
- state 國家
- local 地方 116
- nation 國族 170-202
- rolling back the 撤回 190
- theories of the 理論 172-3
- welfare 福利 89, 171, 182, 190-2,

- 193
 statues, of women 女人的地位 197-8
 Stiell, Bernadette 史蒂爾，伯納岱特 88
 Stonewall 石牆 157
 Strathern, Marilyn 史翠珊，瑪莉蓮 24
 street 街頭
 kids 兒童 91
 walkers 娼妓 154
 subaltern 底層的 151, 212
 suburbia 郊區 106-10, 161
 suffrage 投票權 153, 174, 175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供需理論 127-8
 surfers 衝浪者 167
 surrealism 超現實主義 153
- T**
 tattooing 紋身 51-2
 teenagers 青少年 101-2
 Thatcher, Margaret 佘契爾，瑪格利特 112, 189
 The Gap 162
 third space 第三空間 212
 Thompson, William 湯普生，威廉 78
 Thrift, Nigel 史瑞夫特，尼格爾 69
 time 時間 208
 Tokyo 東京 90
 Tompkins Square 湯普金廣場 151, 164
 Tönnes, Ferdinand 托尼斯，佛迪南 100, 154
- Townsend, Janet 湯山德，珍妮特 33, 147, 227
 trades,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行業的資本主義組織 77
 translation 傳譯 204, 211-12
 translocal 跨地域 209, 211-12
 travel 旅行 203, 207-9, 216-17
 patterns 模式 226
 to work 工作 129
 writing 書寫 207-8
 travelling theory 旅行理論 206-9
 Turner, Bryan 透納，布萊恩 37
 Twine, France Winddance 吐恩，法蘭斯溫登絲 108-10
 typing, for men 替男人打字 140-2
- U**
 Union Jack 英國國旗 164, 1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學 110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倫敦大學學院 28
 utopian 烏托邦 74
 dream 夢想 121
 experiments 實驗 118-19
- V**
 Valentine, Gill 華倫亭，吉爾 62-4, 69, 169, 222
 Vanport City, Oregon 凡波特城，奧勒崗州 118-19
 Venness, April 維尼斯，艾波爾 90, 94
 Villeneuve, Paul 維理鈕弗，保羅 104

- violence 暴力 178, 222
- Virgin Mary 聖母瑪利亞 7
- voice, authorial 作家的聲音 245-6
- W**
- wages for housework 家務薪資 82
- Walby, Sylvia 沃爾碧，希維亞 16, 17, 18, 20, 81, 179, 193
- Walkowitz, Judith 華克威茲，茱蒂斯 157
- Walter, Bronwen 華特，布朗溫 195-6
- Ware, Vron 威爾，馮宏 22
- Warner, Marina 華納，瑪莉娜 199
- Washington D.C. 華盛頓特區 107
- Watson, Sophie 華森，蘇菲 90
- Weekes, Debbie 維吉斯，黛比 70
- Wekerle, Gerda 威克爾，戈登 119, 122
-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條款 189-93
see also state, welfare 亦見國家，福利
- Westwood, Sallie 衛斯特伍德，莎莉 195, 198-9
- whiteness 白人特質 107-12
- Williams, Peter 威廉斯，彼德 104
- Williams, Raymond 威廉斯，雷蒙 153
- Williamson, Judith 威廉森，茱蒂絲 169
- Wilson, Elizabeth 威爾森，伊莉莎白 89, 155, 161
- Winchester, Hilary 溫徹斯特，希拉蕊 91
- wives, diplomatic 外交官夫人 216
- Wolch, Jennifer 吳爾屈，珍妮佛 91
- Wolff, Janet 吳爾夫，珍妮特 155, 206-7
- women 女人
- able-bodied 健全的 245
 - black 黑人 108-12, 121
 - Caribbean 加勒比海裔 185
 - of colour 有色的 22, 25, 83, 245
 - deconstructing 解構 244-7
 - experience of 經驗 246
 - imperial 帝國的 216
 - Irish 愛爾蘭人 195
 - Latina 拉丁美洲的 87
 - married 已婚的 132, 189
 - 'native' 「原住民」 199
 - as nature 做為自然 44-6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37, 186, 214, 220, 239
 - travellers 旅行者 205
 - white 白人 22, 107-12, 245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女性與地理研究群 8, 11, 28, 225
- women's committees 婦女委員會 116, 119
- women's movemen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婦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 8, 42, 119, 121
- women's refuge movement 婦女庇護運動 88
- Women Working Worldwide 全球女性工作 113
- Woodwards, Toronto 伍德渥茲，

多倫多 162

Woolf, Virginia 吳爾芙，維吉尼亞
145, 217

work 工作

participation rates in 參與率 125-6

secretarial 祕書的 135, 138-40

sexing 性別化 143-8

theories of 理論 125-31

women's 女人的 135

see also labour 亦見勞動

Y

Young, Iris Marion 楊恩，艾瑞
斯·瑪莉翁 40, 48, 58-60, 120-
2, 178-80

Young, Robert 楊恩，羅伯特 213,
215

Yuval-Davis, Nira 尤弗－戴維斯，
妮拉 187, 188

Z

Zavella, Patricia 札佛拉，派翠西
亞 147

Zola, Émile 左拉，埃米爾 160-2